清華大學地区研究·译著 IIAS
Are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Translation

地区研究丛书 · 中东系列
刘东 · 主编

Divided Loyalties

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c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

分裂的忠诚

帝国末期叙利亚的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

ames L. Gelvin

[美] 詹姆斯·L. 格尔文——著 | 刘岚雨——译

Gelvin does more than recount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By situating his study within a broader historical context, Gelvin has written a book that will be of interest to all who wish to understand nationalism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出版

从“爱国主义风潮”到大众政治，
探寻叙利亚非精英群体的认同建构，
勾勒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另类图景

大战结束，社会剧变，复杂多元的忠诚纽带重塑民族共同体的“想象”，
从阿拉伯俱乐部到人民委员会，政治舞台何以由埃米尔的宫殿转移至城市街头？
传单、涂鸦、报纸社论，政治精英与普罗大众如何争夺民族主义话语场？
游行、戏剧、节日庆典，公共仪式怎样再现迥然相异的民族叙事？

Divided Loyalties

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c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

一项新颖的研究。大众政治是21世纪的核心，而格尔文以通俗易懂的叙述方式将其娓娓道来。本书为该领域正在进行的一场重要辩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 莉拉·法瓦兹（Leila Fawaz），塔夫茨大学历史学教授

本书清晰地描绘了1918—1920年间从奥斯曼帝国统治向法国委任统治过渡期间大马士革混乱的政治局面……对于任何希望了解20世纪叙利亚历史的人来说，[格尔文]对这一时期大众政治的分析都是无价之宝。

——《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上架建议：世界史
ISBN 978-7-208-18213-4
9 787208 182134 >
定价：96.00元
易文网：www.ewen.co

北京宸星教育基金会
Beijing Chenxing Education Foundation

地区研究丛书 · 中东系列
刘东 · 主编

Divided Loyalties

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c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

分裂的忠诚

帝国末期叙利亚的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

James L. Gelvin

[美] 詹姆斯 · L. 格尔文——著 | 刘岚雨——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裂的忠诚:帝国末期叙利亚的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美)詹姆斯·L.格尔文(James L. Gelvin)著;刘岚雨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地区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Divided Loyalties: 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c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
ISBN 978-7-208-18213-4

Ⅰ. ①分… Ⅱ. ①詹… ②刘… Ⅲ. ①民族主义-研究-叙利亚-1918-1920 ②政治制度史-研究-叙利亚-1918-1920 Ⅳ. ①D093.76 ②D756.19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45259 号

责任编辑 史桢菁
封面设计 安克晨

地区研究丛书

分裂的忠诚:帝国末期叙利亚的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

[美]詹姆斯·L.格尔文 著
刘岚雨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1.75
插　　页　4
字　　数　273,000
版　　次　202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8213-4/K·3274
定　　价　96.00 元

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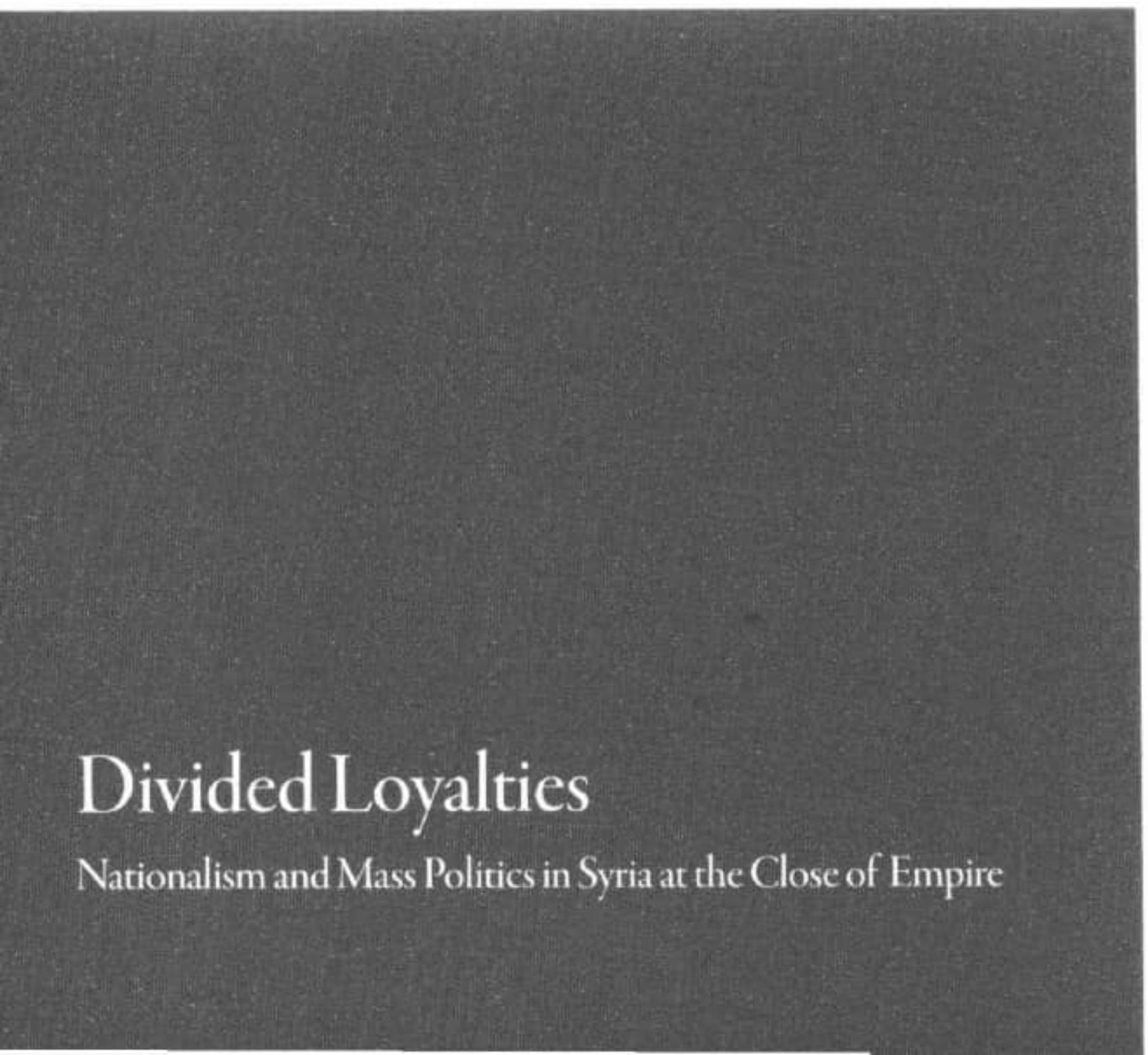
詹姆斯·L. 格尔文 James L. Gelvin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东历史，侧重于研究大叙利亚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历史以及当代历史。主要著作有《分裂的忠诚：帝国末期叙利亚的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现代中东史》等。

译者——

刘岚雨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波斯语言及文学专业学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曾在伊朗德黑兰大学、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美国乔治城大学交流访问。主要研究方向为伊朗派系政治、政治经济周期和政治文化。



地区研究丛书 · 拉美系列

中美洲史：分裂的邦邻（第三版）

西班牙征服的七个神话（增订版）

统治与抵抗的仪式：墨西哥的公共庆典与流行文化

物品、权力与历史：拉丁美洲的物质文化

美洲人：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

殖民时代的拉丁美洲（第二版）

地区研究丛书 · 中东系列

另类的殖民主义：埃及、英国与苏丹地区的统治权

培育国家：性别、家庭与埃及的现代化，1805—1923

分裂的忠诚：帝国末期叙利亚的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

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官方公众号

知世书坊
探索新知 触摸世界

总　序

展开地区研究的三根主轴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在一种并存着刺激与困扰的张力中产生的。它既是以在中国尚属“新兴”的学科来命名，那么顾名思义，当然是顺应了“地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而这项研究在中国的应运而生，则又肯定是顺应了全球化的迅猛势头。——正是在这种方兴未艾的势头中，中国不光是被动卷进了全球化的进程，还进而要主动成为更大规模的“全球性存在”。就此而言，收进这套丛书中的著作，虽然将视线聚焦在了地球上的某一“地区”，但那都要隶属于环球视界中的特定“视域”。

不过，正如罗兰·罗伯逊所指出的，经常要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相伴生的，竟又是所谓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这不光从文化上喻指着，一旦遭遇到“麦当劳化”的夷平，就会激发与强化地方的认同；还更从经济上喻指着，由跨国生产与流通带来的重新洗牌，无论在一个社会的内部还是外部，都会造成新的失衡、落差、不公与愤懑。——正因为这样，反倒是全球化的这一波高潮中，人们才大概是不无意外地看到了，这个世界竟又以原以为“过了时”的民族国家为框架，利用着人类最基本的自卫本能，而煽起了民族主义的普遍排外逆流。

其次又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也是在一种“学科自觉”的批判意识中

产生的。这种批判意识的头一层含义是，正是成为“全球性存在”的迫切要求，才使我们眼下更加警觉地意识到，再像传统学科那样去瓜分豆剖，把知识限定得“井水不犯河水”，就会对亟欲掌握的外部世界，继续造成“盲人摸象”式的误解。正因为这样，我们想借这套丛书引进的，就不光是一些孤零零的研究结论，还更是一整套获致这类结论的研究方法。这样的方法告诉我们，如果不能相对集中优势研究资源，来对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调动各门学科，并且尽量促成彼此间的科际整合，我们就无从对于任何复杂的外部区域，获得相对完整而融汇的有用知识。——不言而喻，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中，“地区研究”既将会属于人文学科，也将会属于社会科学，却还可能更溢出了上述学科，此正乃这种研究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接下来，这种批判意识的第二层含义又是，尽管“地区研究”的初始宗旨，当然在于有关外部世界的“有用知识”，而一俟这种知识落熟敲定，当然也可以服务于人类的实践目的，包括作为出资人的国家的发展目标，不过与此同时，既然它意欲的东西堪称“知识”，那么，它从萌生到发育到落熟的过程，就必须独立于和区隔开浅近的功用。无论如何，越是能争取到和维护住这样的独立性，学术研究的成果就越是客观和可靠，越足以令读者信服，从而也才能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不言而喻，又是在这样的理解中，率先在中国顶尖大学中建立起来的“地区研究”，虽则在研究的国别、项目和内容上，当然也可以部分地与“智库”之类的机构重叠；然而，它在知识的兴趣、理想的宗旨、研究的广度、思考的深度、论证的独立上，又必须跟对策性的“智库”拉开距离，否则也就找不到本学科的生存理由了。

正是基于上述的权衡，我在清华大学地区研究院的第一次理事会上，就向各位同行当面提出了这样的考虑——我们的“地区研究”应当围绕着

“三根主轴”：第一，本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价值；第二，在地的语言训练与田野调查；第三，与国际“地区研究”的即时对话。毋庸置疑，这“三根主轴”对我们是缺一不可的。比如，一旦缺少了对于本国文化的了解与认同，从而无法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就不仅缺乏学力去同外部“地区”进行文明对话，甚至还有可能被其他文化给简单地“归化”。再如，一旦缺乏对于国际“地区研究”的广阔视野，那么，就会沦入以往那种“土对土”的简陋局面，即先在本国学会了某一个“小语种”，再到相应的“地区”去进行综述性的报道，以至于这种类似新闻分析的雏形报告，由于缺乏相应的学术资源、知识厚度与论证质量，在整个大学体系中总是处于边缘地带，很难“登堂入室”地获得广泛的认可。

关于这种所谓“小语种”的学科设置，究竟给我们的知识生产带来了哪些被动，我上次在为“西方日本研究丛书”作序时，就已经以“日本研究”为例讲过一回了：

> 从知识生产的脉络来分析，我们在这方面的盲点与被动，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长期政治挂帅的部颁教育内容所引起的。正如五十年代的外语教学，曾经一边倒地拥抱“老大哥”一样，自从六十年代中苏分裂以来，它又不假思索地倒向了据说代表着全球化的英语，认定了这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国际普通话”。由此，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所有其他非英语国家研究的学者，就基本上只能来自被称作“小语种”的相关冷门专业，从而只属于某些学外语出身的小圈子，其经费来源不是来自国内政府，就是来自被研究国度的官方或财团。[1]

---

[1] 刘东：《序“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有鉴于此，为了能让我们蓄势待发的“地区研究”，真正能摆脱以往那种被动的局面，既不再是过去那种边边角角的、聊备一格的国别史，也不会是当下这种单纯对策性、工具性的咨询机构，也为了能够让它所获得的学术成果，最终能被纳入到公认的学术主流，进而成为人们必备和必读的文化修养之一，我才提出再来创办一套“地区研究丛书”。当然，如果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我以往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西方日本研究丛书”，也都属于海外，特别是美国的“地区研究”，具体而言，是属于“地区研究”中的“东亚研究”。于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本套丛书亦正乃以往努力的延续。另外，考虑到美国的“地区研究”虽说无所不包，甚至还包括哈佛设立的“美国文明”项目，也即还要包括用来反观自身的“本国研究”，可毕竟它那些最富成果也最具功力的领域，还要首推其中的“东亚研究”“中东研究”和“拉美研究”。既然如此，我们这次就先行推出两个“子系列”，即“地区研究·中东系列”和“地区研究·拉美系列”。——如果再算上我以往主编的两套“东亚研究”，那么或许也可以说，这大概是美国“地区研究”的主要精华所在了。

最后，尽管在前文中已经述及了，但行文至此还是要再次强调：在我们规划与期望中的，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全球关怀的“地区研究”，必须围绕缺一不可的“三根主轴”，即第一，本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价值；第二，在地的语言训练与田野调查；第三，与国际“地区研究”的即时对话。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在这套丛书中引进的，就属于对于那“第三根主轴”的打造，也就是说，它既会形成学术对话的基础，也将构成理论创新的对手。也就是说，一旦真正展开了这种学理形态的对话，那么，“前两根主轴”也势必要被充分调动起来，既要求本土经验与价值的参与，也要求在地调查的核实与验证。由此一来，也就逻辑地意味着，对于既具有强大主体性又

具有亲切体验性的，因而真正够格的“地区研究家”来说，无论这些著作写得多么匠心独运、论证绵密、学殖深厚、选点巧妙，也都不可能被他们不假思索地“照单全收”了，否则，人类知识就无从继续谋求增长了，而学术事业也将就此停滞不前了。

不过话说回来，不会去“照单全收”，并不意味着不能“择优吸收”。恰恰相反，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从这套书逐渐开始的、逐字逐句和恭恭敬敬的迻译，恰恰意味着在起步阶段的、心怀诚敬和踏踏实实的奠基。也就是说，从这里一砖一瓦缓缓堆积起来的，也正是这个学科之标准、资格与威望的基础——当然与此同时，也将会是我们今后再跟国际同行去进行平等对话的基础。

刘东

2019 年 8 月 28 日于青岛海之韵

致　谢

本书的撰写离不开朋友和同事们的帮助和支持。由于这本书是基于我博士论文的创作，我首先要感谢本人论文指导委员会中的两名成员，分别是扎卡里·洛克曼（Zachary Lockman）和菲利普·S. 库利（Philip S. Khoury）。从论文撰写到书稿的最终修订，两位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指导，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热心和持续的支持。此外，我要感谢戴维·康明斯（David Commins）、莉拉·塔拉齐·法瓦兹（Leila Tarazi Fawaz）、R. 斯蒂芬·汉弗莱斯（R. Stephen Humphreys）、弗雷德·劳森（Fred Lawson）、戴维·W. 莱施（David W. Lesch）、安妮·麦坎茨（Anne McCants）、迈克尔·G. 莫罗尼（Michael Morony）、罗杰·欧文（Roger Owen）、蔡斯·罗宾逊（Chase Robinson）、尤金·罗根（Eugene Rogan）、马尔科姆·罗素（Malcolm Russell）、尼娜·赛峰（Nina Safran）、琳达·沙特科夫斯基·希尔切（Linda Schatkowski Schilcher）和彼得·斯勒格里特（Peter Sluglett），他们在本书的准备阶段花费时间阅读并评价了全部或部分书稿内容。加利福尼亚大学（UCLA）历史系的罗纳德·梅勒（Ronald Mellor）和加州大学出版社（UC Press）的琳内·维希（Lynne Withey）在书稿的准备过程中提供了鼓励和支持，加快了本书的出版进度。

为了创作本书，我在叙利亚、埃及、约旦、英国、法国和美国开展

过研究，在此我要感谢在这些地方帮助我开展研究的人。我特别要感谢那些同意接受采访的叙利亚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参考文献中），以及帮助我安排访谈的纳贾特·卡萨布-哈桑（Najate Kassab-Hassan）、法赫里·努里·凯拉尼（Fakhri Nuri al-Kaylani）、穆罕默德·卡迈勒·加西米（Muhammad Kamal al-Qasimi）和欧麦尔·哈迪姆·萨鲁吉（'Umar Khadim al-Saruji）。我对阿萨德国家图书馆（Maktabat al-Asad）的斯勒瓦·欧格朗尼亚·博兹（Sylva Oghlania Bolz）和开罗萨拉菲亚（Salafiyya）图书馆/书店的所有人和工作人员深怀感激，感谢他们热心和高效的帮助，还要感谢阿卜杜勒-卡里姆·拉菲克（Abdul-Karim Rafeq）和哈伊利亚·卡斯米（Khairia Kasmieh）指导我了解叙利亚的官僚机构。

研究和写作受到了富布赖特—海斯论文研究委员会（Fubright-Hays Dissertation Research Committee）、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夏洛特·W. 纽康比基金会（Charlottee W. Newcombe Foundation）的资助。我还要向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政治学系的罗伯特·福克纳（Robert Faulkner）和丹尼斯·黑尔（Dennis Hale）、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威廉·格雷厄姆（William Graham）、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职和行政人员致上我迟到的感谢，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向同事们学习并检验我想法的环境。

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纳吉瓦·卡坦（Najwa al-Qattan），她不仅容忍了我对项目进程的抱怨，还参与了无数不请自来的关于叙利亚民族主义的讨论。罗列她对本书创作不可估量的贡献只会使其显得无足轻重。

· · ·

这本书所包含的一些材料以前曾发表过。我要感谢三份出版物的编辑和出版商，感谢他们允许我使用以下作品的内容：

"Demonstrating Communities in Post-Ottoman Syri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5 (1)(Summer 1994), 22—44. Copyright © b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and the editors of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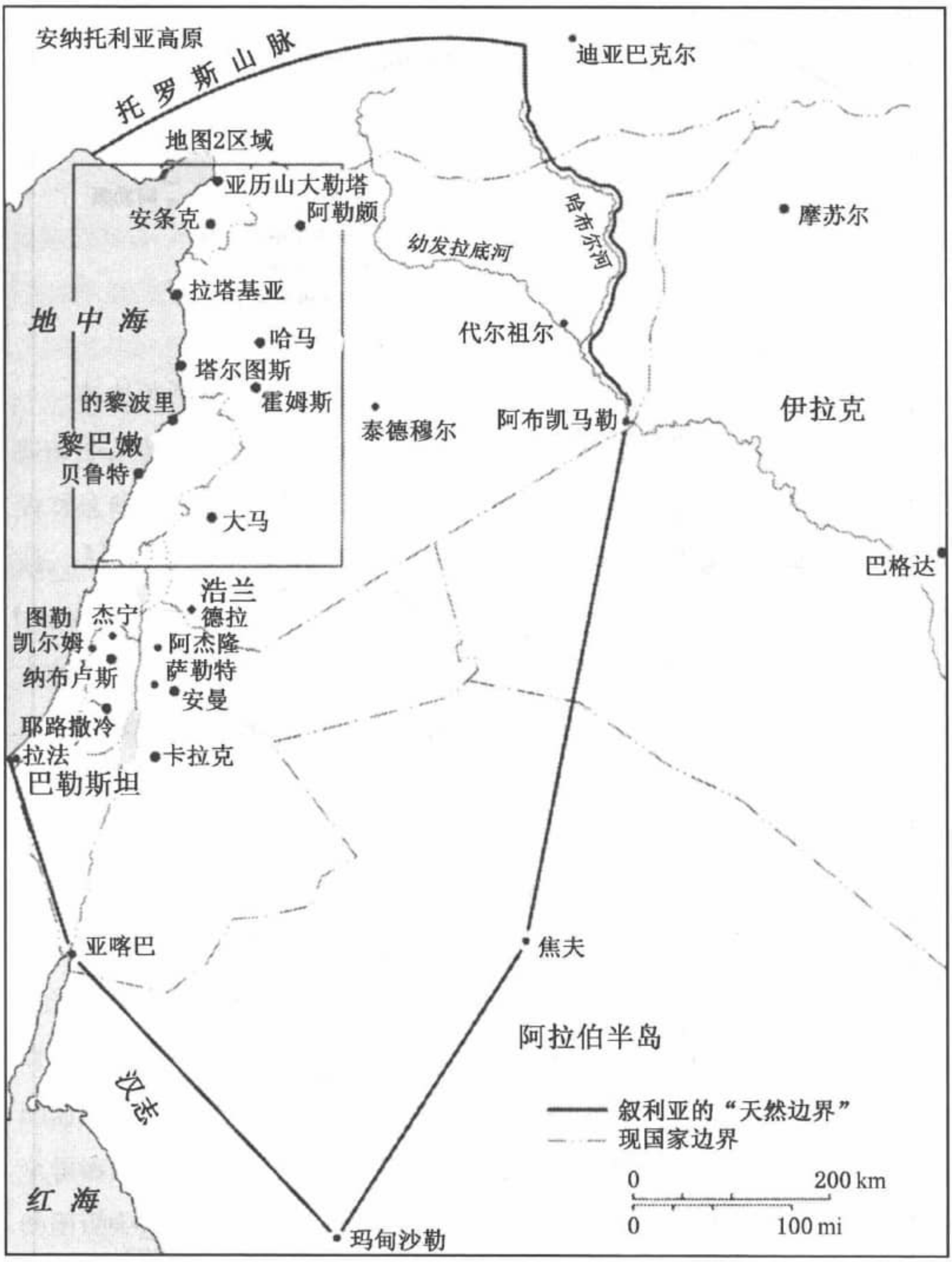
"The Social Origns of Popular Nationalism in Syria: Evidence for a New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6 (November 1994), 645—662. Copyright ©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editors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The Other Arab Nationalism: Syrian/Arab Populism in Its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s," in *Rethinking Nationalism in the Arab World*, edited by James Jankowski and Israel Gershoni. Copyright © 1997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缩略词

AD	Archives diplomatiques，Nantes，France 外交档案，南特，法国
BL	British Library 大英图书馆
DU SA	Durham University，Sudan Archives 杜伦大学，苏丹档案
FO	Foreign Office，London 外交部，伦敦
GCC	Général commandant en chef，armée du Levant 总司令，黎凡特军
GHQ	General Headquaters—Eqypt 总司令部——埃及
HC	Haut commissionarie 高级专员
IO	India Office，London 印度事务部，伦敦

MA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Paris 外交部，巴黎
MD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France 国防部，万塞讷，巴黎
SL：LD	Salafiyya Library，Cario：Lajnat al-Difā’ file 萨拉菲亚图书馆，开罗：国防委员会档案
SL：LW	Salafiyya Library，Cario：Lajna Wataniyya file 萨拉菲亚图书馆，开罗：民族委员会档案
USNA	U.S. 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D.C. 美国国家档案，华盛顿特区
WO	War Office，London 陆军部，伦敦



地图 1　天然边界内的叙利亚

地图 2　西叙利亚和黎巴嫩

目　录

总　序　展开地区研究的三根主轴　　刘　东　1

致　谢　1

缩略词　1

导　言　1

第一部分　费萨尔时期叙利亚的政治组织结构

第一章　从“爱国主义风潮”到大众政治的出现　53

第二章　人民委员会　93

第二部分　话语中的民族主义共同体

第三章　竞争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场的象征性成分　149

第四章　竞争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场的整合力和规范力　207

第三部分　民族主义的仪式

第五章　自上而下的动员和传统的发明　237

第六章　游行共同体　273

结　论　299

参考文献　310

导　言

本书关注的是叙利亚[1]于1918年10月至1920年7月间发生的一些事件，当时正值阿拉伯政府统治大马士革时期。我并未打算将此书构建为对这些事件的叙事性解释，这样的叙事性创作已有一些，或成功或普通。[2]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旨在考察20世纪初期叙利亚民族国家（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竞争性建构，以及该地区大众政治和大众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为凸显本研究的必要性，我将对照在大西洋两岸相隔数月发生的两件事。

1920年7月20日，也就是法国向埃米尔费萨尔下达最后通牒后的第六天，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爆发起义，在这之后的第四天，法国军队开进大马士革，开启了对其长达25年的军事占领。起义席卷了整个城市，小资产阶级商人、街头帮派（neighborhood toughs）、失业青年、来自贝卡谷地（Biqa'Valley）的难民和刚被遣散的阿拉伯正规军士兵占领了街头。与此同时，从敏拜尔（minbars）**到各个街角，充满了已经休会的叙利亚国民大会的前议员、乌里玛和政治煽动者们对政府同意法国提出的要求的声讨。群众领袖们举起桑贾克（Sanjaks）[3]并散发传单，向人们警告那些危害国家的阴谋并描述驻守西部的法国士兵所犯下的罪行。大报用爱国主义的咆哮

---

*　后文中“国家”的表述皆指“民族国家”。——译者注

**　清真寺中的讲经台。——译者注

向敌人嘲讽道，“请告诉教皇、教权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政客，是谁意在征服（叙利亚）”；《基纳纳报》（*al-Kināna*）在两页使用黑体字的版面中宣称，“年轻的叙利亚永远不会向年迈的法国屈服”。[4] 居民袭击了大马士革沙古尔（Shaghur）和梅丹区域内忠于叛徒（kha'in）埃米尔的部队，他们认为埃米尔正在与国家的敌人进行合作。[5] 在不到两周前，同一批居民不仅缴了军警的械，还殴打了他们，因为这些军警试图执行阿拉伯政府那令人鄙视的征兵政策。

当阿拉伯政府试图夺回街头控制权时，正规军（诸如在阿拉伯起义中同埃米尔一同作战的贝都因人和也门人部队）同大众爆发了战斗。其中一群起义者高喊反费萨尔口号，进攻皇宫（埃米尔在皇宫屋顶已经部署好机枪等待起义者）。另一群起义者对屯有武器弹药的大马士革城堡发起猛攻，他们臆断那里囚禁着大众领袖卡米勒·卡萨布（Kamil al-Qassab）和其他的政治犯。据英国人估计，有超过 100 名大马士革人在此轮冲突中丧生；之后费萨尔自己估计，有 120 人被杀、200 人受伤。[6]

翌日，受大马士革起义的鼓舞，阿勒颇地方国防委员会在阿勒颇（Aleppo）发起了类似起义。在地区总督、警察局长、大众领袖的动员下，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地区人口，即约 4 000 名来自内拉卜城门地区的社会最底层人民，发起了对阿勒颇城堡的进攻，抢夺并分发了城堡中的武器。此后一天的早上，又一群起义者在突袭一座军火库时引发爆炸，报道称爆炸造成 500—600 人死伤。[7]

7 月 21 日下午，大众领袖走遍大马士革城区，鼓动居民在巴拉姆基车站（Baramki Station）聚合，从那里向西前往梅萨伦（Khan Maysalun），尤素夫·阿兹马（Yusuf al-'Azma）将军正在那里组织力量抵抗入侵的法国军队。在巴拉姆基，谢赫卡迈勒·哈提卜（Kamal al-Khatib）主持了晚祷，在之后预计到来的战斗中，他将领导礼拜者们走向殉难。在来自大马士革一

个街区的 1 700 名志愿者中，只有 700 人携有武器。志愿者中的很多人曾抵制了阿拉伯政府军的征募，现在他们将出发前往前线，并期待在“国家圣战”（al-jihad al-watani）中英勇牺牲。[8]

在上述事件发生后的第 5 个月，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主管斯蒂芬·P. 达根（Stephen P. Duggan）向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概述了 19 世纪末法国占领后最初几个月里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发展。[9] 在达根的讲演中，存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作品中所发现的问题，怀特将其描述为悲剧的“预设情节结构”（pre-generic plot-structure）。[10] 达根的讲演以追溯“阿拉伯民族主义”（19 世纪的阿拉伯文学复兴、呼唤“民族和代议制政府下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的美好起始和早期承诺作为开头，之后开始论述一些虚假的希望（1913 年的阿拉伯代表大会、阿拉伯起义、1918 年 11 月的英法宣言［the Anglo-French Declaration］、金—克莱恩观察团［the King-Crane Comission］）和考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的镇压、秘密社团运动的防御政治化、“赛飞勒博力克”［seferberlik］[11]、叙利亚烈士的激情），最后以详细叙述背叛和灾难（各种战时协议、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和《贝尔福宣言》［the Balfour Declaration］，以及英国的遗弃和法国的占领）作结。[12] 达根的评论中并没有提及 7 月的起义，这是因为每种情节结构都会限定历史学家对于研究问题的选择以及数据的选择与组织的可供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达根真的考虑过 7 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他也只能将它们当作无关或反常情况。有些稀有历史学家确实将起义者纳入他们的记叙，只是这些起义者的“革命者”（thuwwar）头衔变成了“极端分子”或是“暴民”（the mob）。

达根的讲演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其多么新颖，而是因为其再现了从“纳达”（nahda，19 世纪末阿拉伯文学复兴）到整个托管统治时期一直被用

来阐述阿拉伯中东地区民族主义的主要策略。事实上，不仅达根的同事，诸如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E. Lawrence）、约翰·德·维尔·洛德（John de Vere Loader）、汉斯·科恩（Hans Kohn）、理查德·科克（Rechard Coke）和伊丽莎白·P. 麦克卡勒姆（Elizabeth P. MacCallum）等历史学家和“阿拉伯事业”（the Arab cause）的支持者都使用了相同的叙事结构，而且在此后的 70 多年后，很多研究这一区域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仍在使用同样的叙事结构。[13] 这样做的结果是，从这一叙事结构产生的各式假定和推论为几代历史学家所共享，包括倾向于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历史仅作为思想的（理想主义的）历史，将一群精心挑选的本土精英作为民族主义唯一的创始者（originators）、传承者（carriers）和传播者（disseminators）。

不论是理想主义（idealist）的还是精英主义的假定，都是为了限定历史研究的范围。在将一种精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置于其他所有民族主义建构之上的过程中，理想主义史学家只对民族主义支持者的各种主张进行了表面判断。事实上，这使他们极易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民族主义的存在根植于亘古不变的独特阿拉伯身份之中，也就是社会学家安东尼·D. 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所说的族群（ethnie）。[14] 以扎因·N. 扎因（Zeine N. Zeine）所述为例：

> 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民族主义的含义历经了多次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将种族、文化和民族主义的精神元素这些基本方面纳入考量，我们发现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民族主义之一。阿拉伯民族主义真正产生于伊斯兰的兴起……那些受过教育并接受启蒙的阿拉伯人在世纪之交醒来，并不是为了阿拉伯意识，而是为了独立的政治生活，因为阿拉伯意识从未曾沉睡。[15]

因为阿拉伯族群的完全恢复仅是在等待合适的机遇的增加和关键政治关头，研究这一区域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已经花费过量的时间和经历来揭示不同知识分子在“重新发掘”和阐明亘古不变的独特阿拉伯身份中所作出的贡献，这一身份经历了代代相传的“原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和民族主义，以及务实民族主义（pragmatic nationalism）在整个阿拉伯中东地区大众传播的时机（timing）。

对这一狭隘议题的着迷为无数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崛起”的阐述提供了叙事的焦点，其中乔治·安东尼厄斯（George Antonius）的《阿拉伯的觉醒》（*The Arab Awakening*）可能是讨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起源和早期历史最为有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16] 在书中，安东尼厄斯引用了许多相同的断言，并利用了与 20 年前达根相同的叙述结构。尽管他在一开始简要提及了“阿拉伯民族运动”进入真正（authentic）发展路径之前的“不成功的开始”，例如在阿拉伯瓦哈比运动、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和他的儿子易卜拉欣（Ibrahim）在征服叙利亚过程中出现的“原始—原始民族主义”（proto-protonationalism）。他的真正叙述开始于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的圈子，他们被民族主义所吸引是亲近西方和西方观念的自然产物。因此，“阿拉伯民族运动的故事始于 1847 年的叙利亚，当时，在美国的赞助下，贝鲁特成立了一个中等规模的文学社”。[17] 据安东尼厄斯所述，在形成最初的表述后的数十年中，阿拉伯原始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跨越了社群边界，开始渗透到更广的穆斯林社会中。

尽管在《阿拉伯的觉醒》之后的历史学家大致都接受了安东尼厄斯的方法论假设（methodological presuppostions），但是他们还是一直纠结于其叙述中的一些细节。与安东尼厄斯不同，例如希沙姆·沙拉比（Hisham Sharbi）和 C. 欧内斯特·唐（C. Ernest Dawn）假设了完全不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根源和发展进程，用唐的话说就是“有令人信服的证

据表明 20 世纪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中流行的意识形态最迟也是在 1920 年代形成，来源于伊斯兰现代主义者”。[18] 仍然有一些人，诸如巴萨姆·蒂比（Bassam Tibi）和西尔维亚·海姆（Sylvia Haim），将安东尼厄斯和沙拉比 / 唐勾勒出的轨道相结合，对合成基督教世俗主义和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传播链进行了追踪。[19] 无论这些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资料和路径，他们都忽视或掩盖了阿拉伯事业支持者之间和他们主张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差异。作为结果，阿拉伯中东的民族主义在他们的作品中获得了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回顾性的同质性（retrospective homogeneity）和连贯性。[20]

过去 20 多年，历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的活动对综合和传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之上，这一倾向得到了诸如唐、菲利普·S. 库利（Philip S. Khoury）、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等历史学家的加强，他们对产生了很多早期阿拉伯事业支持者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21] 根据唐和库利的分析，叙利亚“阿拉伯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初期形式）最有力的支持者来自一小部分基于城市（urban based）的地主—官僚（landowning-bureaucratic）显贵，这些人“没有能够获得与他们预期相称的权力和影响力”。[22] 这些精英对“奥斯曼主义”（Ottomanism）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帝国内所有地方主义者、宗教和族群认同都应该置于独特的奥斯曼身份之下）进行了重新解读，拒绝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中央集权化政策，支持有助于增加地方自治权的承诺放松行政管控的政策，以此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与唐和库利相反，哈利迪一直坚持不懈地强调专业人士圈，尤其是记者在发展和宣传阿拉伯主义中所起的作用。[23] 专业人士圈包括“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es）、“中产阶层”（middle strata），或很多人不太同意的“边缘人”（marginal men），他们被研究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在整个后殖民主义世界定义民族目标、点燃民族主义躁动和组织民族主义运

动的群体。正如哈利迪和其他人所展现的，这一圈子并不是那些享有经济、社会和政治优势地位的精英。事实上，因为这些专业人士通常不具备特别有声望的社会背景，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经常将他们的民族主义活动归为他们因被排除在有影响力的职位之外而产生的怨恨，正如库利描述中的地主—官僚。[24] 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相对一般的社会背景凸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有特权获取西式教育、独特的世界观和自我归属（self-ascription，不一定与出生权一致的决定因素），这些使他们与其他可能被列为“民族主义精英”范畴的人相区别。

尽管理想主义历史学家的一些谨慎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阿拉伯世界的某些思想潮流，但是仅将民族主义置于民族主义精英的范围的企图是彻底错误的。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精英在民族主义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克里斯马”和垂直动员的巨大力量，但是这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些民族主义精英界定和主导政治领域的实力最终受到其观点表达其他人口成分诉求的能力的限制，所以那些将民族主义独置于精英领域的历史是失败的，它们仅仅是民族主义辩证法中的一个要素。它们忽略了民族主义辩证法的另一要素，即大众政治的领域，它的主要属性并不能完全归为政治精英的设计。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包括这一要素在内的政治运动重新整合进民族主义的辩证法中，包括七月起义者，他们之前的先行者、后继者，以及就这些运动对随后民族主义合成贡献的阐述。

本书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我将讨论叙利亚政治组织（political organizing）性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过程中和之后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产生后，复杂的、综合性的政治组织频繁地取代、排斥或者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e）那些传统和乡土（parochial）模式的组织，方便了对大量支持者的程序化动员（programmatic mobilization）。这些组织不仅诱导了政治参与的扩大，还打破了之前主导精英类别对权威（authority）的垄断，使

非精英和他们领袖之间的纽带得到了重新界定和政治化。作为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期，大众政治不仅能够成为可能，而且变得不可避免。

一方面因为新的大众组织是综合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些组织吸收了不同风俗习惯和原始忠诚纽带的追随者，它们对那些通常由与众不同的连贯的符号集合产生的可能的意义进行验证、强化、实现和打磨。那些和大众群体有关系的人们并不是毫无组织的“乌合之众”（mob），相反，他们是离散构成的话语共同体的成员，尽管与组成阿拉伯政府成员和其支持者的话语共同体不同，但是他们必须被当作民族主义趋势的一部分来看待。在第二部分，我将比较在费萨尔时期产生的两个主要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话语共同体。通过使用传单、涂鸦、报纸社论、演讲、谣言和其他文本，我比较了最为重要的符号（关键符号）、口号和这些符号和口号所处的场合，从而追溯这些竞争话语共同体的发展。

本书第三部分讨论了在公共/符号空间进行的活动，诸如游行、公共庆祝活动和戏剧，整合了分别在前两部分讨论的主题。那些仪式平衡了不同比例的庆祝和说教（didactic）的成分，不仅包含着符号，而且其本身就是符号。我利用分析仪式，为理解这些竞争性综合符号系统的效能增加了一个维度，政治对手通过推动这些符号系统来指导他们的政治基础或争取政治支持。此外，通过分析公共仪式，我概括出一些独特的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新的政治构造能够吸引大众追随，让相互竞争的政治派系在有意和无意之中帮助创造了新的政治公众。

为了使这些特定的分析得以进行，首先需要完成两个初步任务。正如上文所讨论的，之前关于阿拉伯中东民族主义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历史创作由于受到了理想主义、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和精英主义的假设的巨大阻碍，只能提出对它们想要检验内容的狭隘和扭曲的偏见。因此，本书的

第一项任务就是勾画出一个替代范式来规避上述陷阱。第二项任务稍显有些平淡无奇，即概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紧随其后在叙利亚发生的重要政治、外交、社会和经济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了之后几章所分析现象的背景。

* * *

过去 20 年见证了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由于新的方法论策略（methodological strategies，从世界体系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路径到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批判）以及跨学科和比较研究的扩散，不仅之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被质疑，而且一些基本的类别，包括“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受到新的审视，并/或被归入之前非传统的分析框架。现阶段有关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争论中有四个方面与本书观点尤为相关。

第一，过去 20 年，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在处理研究对象时是持有高度怀疑的。近期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大量作品努力的方向是解构官方民族史，并打击国家支持的民族主义中的目的论倾向，它们将自己表现为不可避免的和唯一的对民族认同的历史表达。其他学者则将霸权化进程本身及对其的抵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结果，诸如“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和“农民变成法国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这样的说法成为我们所熟悉的部分关于民族主义的学术话语。随着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不按官方历史那样对待民族主义，而是像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说的那样将民族主义当作“不同民族表述相互争夺和谈判的地方”，那些对相对并不成功的和经常受到忽视的群体的民族和民族认同建构进行探寻的尝试，诸如那些在社会地位、性别、阶层、种族或信仰和地理位置上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实质上的家庭手工业（virtual cottage industry）。[25] 本书将遵循这一解构主义的分析路径。

第二，当前多数观察家都同意民族主义是“双头雅努斯”（Janus-faced）。就像这位古罗马神一样，民族主义有两张脸，一张回看过去，另一张望向未来。一方面，民族主义运动将自己再现为对古老的和独特民族历史的继承者。为了坚持这一原则，它们重新建构（“复兴”）古老的民族荣耀、文化、符号和神话。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运动同时带有启蒙（Enlightenment）、后启蒙理性主义（post-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及其进步和普遍主义倾向，从而将它们自己置于全球现代主义课题中。[26]

但是，需要补充一点，尽管民族主义运动包括过去和未来，也包括独特性和普遍性，但是不同的运动在对这些看似矛盾的元素进行结合的方式是不同的。对于某些民族主义运动，诸如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现代主义成分完全压倒传统主义成分，传统主义成分出现在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意义仅仅是为现代化努力提供一个历史借口（historical pretext）。甚至希伯来语这一古老语言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的，即区分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那些离散的犹太人中更“落后的”说意第绪语（Yiddish）的同胞。相反，其他民族主义运动，其中包括一些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强调它们的传统主义，在其过程中极力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使他们的运动成为可能的是他们自己的原则而不是传统的原则。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内部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派系通过完全不同的路径来实现“传统主义”和“现代”这两种民族主义面向之间的调和，以期能够实现建构一个独特但又一致的民族主义运动来争取叙利亚人民的忠诚。

第三，很多近代学者还认为身份认同是根据情况变化的（circumstantial）。换言之，身份认同不是永恒不变的（“原生的”），也不意味着对一种民族身份认同的主张会妨碍个人主张其他形式的身份认同。尽管如此，在民族危机或进行民族动员的时期，自封为民族主体与外部“他者”相分割的边

界可能会暂时性地具体化，导致这些主体将民族纽带置于其他归属感之上。[27] 在后文中，我将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阿拉伯中东出现过这样一段时期。

第四，随着民族起源理论从原生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向，对民族的信念从认为民族是自然的和古老的实体变成认为民族在世界历史中是被创造的、而且是相对较新的一种现象。在这一转向的启发下，一些研究对民族形式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出现和传播的必要社会和历史条件进行了探索。诸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艾蒂安·巴里巴（Etienne Blibar）等人认为，民族主义属于一种特殊的用来组织社会关系和社会再生产特殊结构，是为了扩散和分配权力。[28] 为了理解中东或其他任一地区民族主义的出现，我们必须跳出民族主义叙述，将聚焦点放在那些推动社会系统从不利于民族主义向有利于这一意识形态发展转变的因素。这正是我的分析应该选择的起始处。

中东民族主义出现的前提条件和其他地区一样，并无区别。在19世纪，出现在奥斯曼帝国的两股相互关联的进程导致其内部发生了深远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第一，帝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区域的速度加快，尽管并不均衡，但当地市场经济正在融入更广阔的市场经济。[29] 随着商业联系和相关制度的日益凸显，很多先前为地区和国际市场生产农作物的帝国居民开始同外国工人竞争，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借入或借出高利贷以及在外贸中扮演中间人和代理商。另一个促进商业联系扩张的现象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尝试强化和实现中央控制的努力。尽管政府在伊斯坦布尔颁布的规章在各省实施时经常会出现混乱和对立（或许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1858年奥斯曼土地法的应用），但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这一过程使得政府在各个层次上扩大了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对公民的管控。此外，因为政府政策促进了与欧洲相同的制度的建

立，它们有助于欧洲资本的进一步渗透，因此商业联系得以在整个帝国扩散传播。[30]

市场经济的蔓延和国家权力的扩张导致了种种有据可查的后果。例如，这两个进程改变了城市的规模和性质。经济模式的变化和移民导致沿海城市和城市以外市区的扩张。国际贸易的增长导致贝鲁特从18世纪最后25年的一个“微不足道”的6 000人的小镇在20世纪初成为一个拥有12万人口的城市。尽管缺乏明确的数据，大马士革的人口在19世纪中叶至1917年间似乎增长了60%—100%，甚至有可能更多。[31]新到城市的移民通常定居在那些有庇护关系的街区（例如大马士革的梅丹［Meydan］和阿勒颇的卡拉萨［al-Kallasa］），哪怕庇护关系很薄弱。城市建设和重建（有时就像开罗和伊斯坦布尔欧洲沿线的一些区域）以及城区改造（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及战争期间大马士革所进行的改造[32]）改变了城市空间的性质，促进了以居住地为基础的忠诚（quarter-based loyalities）的崩溃，创造了公共空间。在这些公共空间中，将会产生一些仪式，因而会加速历史学家格尔奥格·L.摩瑟（George L. Mosse）所说的“大众的民族化”（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33]

此外，城市化及商业联系的扩张和强化促使了报纸、文化沙龙、私人俱乐部和咖啡馆的扩散，通过它们，新闻得以散布，信息得以交流。在奥斯曼政府通过宣传官方的世俗和以宗教为基础的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重新构建其合法性基础的协助下[34]，文化沙龙和政治俱乐部将政治新手改造成为政治活动家；报纸头条新闻在贝鲁特、大马士革和其他城市街头被大肆宣扬；以及为咖啡馆创作和表演的说教性戏剧作品，这些都有助于提升政治氛围和一个不断扩大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叙利亚的出现。正是在这一新兴的公共领域内，一小部分叙利亚人（人数一直在稳定增加）在世纪之交开始就各式各样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进行争论，其中包括各种民

族主义意识形态。

商业联系的扩散和在整个奥斯曼帝国推行一套统一制度机构的努力共同导致了先前区分国家和市民社会边界的重新划定。国家强加了新的责任，诸如令人憎恶的征兵政策，并以不同程度的承诺和投入接管了之前不属于国家的职能，包括教育和特定类型的公共事业。政府甚至在所有层面上监管着各种福利政策，诸如提供贫困救济和农业援助、向寡妇和孤儿支付津贴。[35] 政府司法管辖在范围和程度上的扩大，以及其对与现代政府相关责任的承担，促进了地方性忠诚的瓦解，再次用摩瑟的话说，这有助于使“政治行动进入人民自己可能共享的戏剧”。[36]

最后，奥斯曼社会的转型，尤其是 19 世纪后半叶的转型，对本土经济和政治精英的作用和构成都产生了影响。在诸如贝鲁特这样的沿海城市，所谓基督教资产阶级在规模和经济实力上迅速膨胀，这主要是因为欧洲政府从奥斯曼政府那里获得了贸易上的优惠条件，并为其客户争取到了特权。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叙利亚的一些小城市，那些同时从土地投资和同伊斯坦布尔奥斯曼中央政府良好关系中获得财富的家庭（上文中提到的那些缺席的地主—官僚精英）的地位和特权也有所膨胀，让那些仅有某种单一优势的家庭黯然失色。与此同时，由业务娴熟的专业人士、纯文学创作者、公务员（尼采将他们恰如其分地称作“无家的国家游牧者”[37]）和受过培训的军官组成的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出现，他们的技艺既是商业联系和行政机构扩张的结果，也是它们继续扩张的必要条件。[38]

根据多数传统叙事，将上述一类或多类精英吸引到阿拉伯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早期文学 / 文化复兴（cultural revival，之前提到的阿拉伯文学复兴）之中的是对“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内在诉求、源于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教育或使中东精英同欧洲精英连接在一起的经历的选择性亲和关系，抑或是对外国人（例如土耳其人和欧洲人）操控的本能的厌

恶。毋庸置疑，随着时间推移，更多来自社会不同类别的人确实将自己归入不同的民族主义潮流中，但是仅基于有目的的选择和本能的反帝主义的解释是不充分的。这些叙述没有考虑到的是，民族主义并不是在意识形态菜单上可以自由选择或拒绝的食物，尽管选择性关系经常会强化中东精英与西方精英以及与派生民族主义信条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些关系自己本身只是辅助性的。

因为所谓基督教资本家、地主—官僚精英和中间阶层的产生都是由于外围资本主义（peripheral capitalism）的扩展及统一治理制度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的推行，所以具体某一类别群体和某些类别群体的组合中的个人在组织他们的世界、建立社会秩序时会自然与大都会中的主导文化相一致，甚至有时会复制主导文化。不同类别的群体所支持的各式意识形态在根本上具有相似性，例如奥斯曼主义、阿拉伯主义、腓尼基主义等，最终何种意识形态能够存活并得以传播则取决于意识形态之外的一些因素（意识形态的制度化程度、意识形态支持者可运用的资源和意识形态间竞争所处的政治环境）。作为结果，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并没有使奥斯曼主义者与阿拉伯主义者相分裂；相反，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使奥斯曼主义者、阿拉伯主义者及他们的同类与其余的社会群体相分裂，那些其余社会群体的转型及整合要么并未彻底完成，要么其转型经历并不美好。例如，根据历史学家詹姆斯·赖利（James Reilly）的描述：

> 工程师是一个新的公务员精英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生活优渥，享有高收入……这些精通于现代技术的工程师和在古塔（Ghuta）使用传统工具每日收入近 3.5 比索的农业劳动者之间的显著差别，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开始生根的发展不平衡，最终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乡差距，并在 20 世纪叙利亚政治和经济史

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39]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将看到，在后奥斯曼时期许多埃米尔费萨尔阿拉伯政府中的民族主义精英开始认识到这一分裂的核心性。他们不仅在话语和意识活动中将叙利亚人民分为那些适合统治的一群被挑选出来的贵族和来自中间阶层的一个自我认同的群体，即所谓“文化人”（mutanawwirūn）* 等和仅适合被统治的绝大多数，而且他们提出的对叙利亚未来的描述中反映出他们所秉承的实证主义（comteanism）和技术官僚的务实主义：

（展望未来）我看到……人们正在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建立学校和大学，直到任何一个村庄都有一所优秀的小学。我看到兴旺繁荣遍及全国，铁路联通了人口稠密的村庄和农场。我看到农民正在利用最现代的农业技术、广泛的贸易和繁荣发展的工业。呈现在我眼前的大马士革是建设得最先进的城市之一。柏油路面的街巷，巴拉达河（Barada River）就像塞纳河一样从东向西穿过城市。河岸旁是滨河大道，高楼耸立。我看到在阿勒颇，运河将幼发拉底河的水引来，滋养着它的花园和公园，使那无水沙漠焕发光彩……工厂在整个王国被建立，使我们不再需要西方的制成品，相反还会将制成品出口到中国、印度和非洲。人民变得富有，国家实力得到了提升，进入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40]

这一对未来叙利亚的抱负与许多其他态度一致，包括对自由市场经济

---

* mutanawwirūn 为阿拉伯语单词 mutanawwir（穆塔纳维尔）的复数形式，意为“学者”或“知识分子”。——译者注

的主张，颂扬“自我成就的人”（‘isāmiyyūn）和“共和国母亲”，埃米尔费萨尔阿拉伯政府中的民族主义精英在讲话和宣传的印刷物中谴责工人的懒惰和娱乐。[41] 根据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的描述，对于活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精英，“独立意味着被欧洲国家平等接受，意味着废除不平等条约（Capitulations）给予外国公民的司法特权，意味着被国际联盟所承认；现代意味着拥有类似于西欧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42]。但是因为这些民族主义精英将诸如“进步”和“世俗主义”这样模糊的概念融入他们的话语，以及其话语所代表的狭隘的利益范围，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仅呈现出“进口的”和“模仿的”特征，而且很难让许多叙利亚人产生共鸣，许多叙利亚人更容易与他们（指埃米尔费萨尔政府中的精英）在民族主义趋势中的竞争对手的话语产生共鸣。

当然，前面提到的精英并不是唯一受奥斯曼社会转型影响的社会阶层。在整个 19 世纪，尤其是 1873 年进入大萧条后，帝国境内的非精英群体日益发现他们自己受到市场和国家的摆布，通过采取对抗行动——逃避征兵、移民、公开叛乱——来发泄他们的愤怒。大马士革熟练织工经常通过罢工来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他们受到的威胁不仅仅是实际工资减少，还有行业协会及行业协会资助的福利项目的削弱、无产阶级化、失业或是受雇于血汗工厂。叙利亚大马士革南部的粮食生产区浩兰（Hawran）在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更多和更加高效的征税，当时国际小麦市场严重低迷，土地所有制正在重建，耕作权也在重新谈判。结果，农民放弃了他们的收成，抵制交税，甚至与派来该地区平息骚乱的奥斯曼军队展开激战，在其中一场战斗中至少有 600 多人伤亡。[43]

罢工、抗税和大规模弃离村庄属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反应性集体行动”（reactive collective actions）。这些行动是为了捍卫传统社会秩序或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既缺少政治纲领，也没有能够

大规模和长时间动员参与者的组织结构。[44] 但是，也正是这些激起叙利亚反应性集体行动的因素预示了有计划和复杂动员所需条件的出现。“商人和国家制造者”影响力的扩大及随之产生的政策促使乡土性和垂直性（verticality）的瓦解，这两点之前被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中东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主导模式的特征。与此同时，由于人口流动和之前提到的身份革命等诸因素，庇护和血缘这样的传统纽带变得脆弱，这促进了横向和社团性关系在叙利亚民众中的出现，他们之间的界限划分基于最广范围的地域市场关系和非正式移民路径。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例如阿拉伯政府在大马士革建立后的第二年，这些重塑后的关系开始与那些不能适应转型后的社会和经济格局的狭隘纵向关系相竞争，吸纳它们，甚至取代它们。[45]

由于移民的涌入或人口的迅速增长，市区的垂直庇护关系格外脆弱，甚至不存在，这使得市区经常成为持续政治动员的中心。例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大马士革梅丹街区日益成为来自浩兰的谷物和移民的集散地，该街区容纳了大量的新移民和流动人口，他们通常会用在新的城市环境建立的联系替代他们与农村内地的联系。正因为此，在法国入侵叙利亚内陆前的几个月内，梅丹的民众为开创无中介的政治动员组织提供了可靠和热情的支持，他们在大马士革接受训练和武装，然后加入游击队。诸如在拉谢亚（Rashaya）和哈斯拜亚（Hasbaya）周边活动的德鲁兹派领导的（Druze-led）队伍和马哈茂德·法乌尔（Mahmud Fa’ur）在戈兰高地领导的骑兵中队，他们反复对占领滨海地区的法国军队进行袭击。法国外交官们将梅丹标注为“革命郊区”（faubourg révolutionnaire），在其他多数大马士革街区的反法抵抗活动被“平息”（pacified）后，梅丹的反法抵抗活动仍在持续，而且该街区的居民在 1925 年叙利亚大起义中作用突出。[46]

因此，在 20 世纪初的头几十年，叙利亚多数地区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使持续和主动的政治动员成为可能。1919 年秋出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席卷了费萨尔政府统治下的叙利亚，这使得来自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反政府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他们中的很多人声称对一个受外人控制的政府感到愤懑，所谓外人诸如汉志人［Hajazis］、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社会中下层宗教界要人和商店店主、当地混混、保守显贵、纺织和谷物商得以团结在一起组成各类人民委员会，诸如高级人民委员会（al-lajna al-waṭaniyya al-'ulya）、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地方分支机构（al-lajna al-waṭaniyya al-far'iyya）、各类国民防御委员会（lijan al-difa' al-waṭani），它们成功地促使非精英群体积极参与政治。通过对密集的家族、市场和地理网络的动员，这些组织不仅向其成员提供了一个能够适应叙利亚彻底改变后的环境的政治共同体模式，而且准许了不同职能市民社会的任务再分配，包括保证谷物价格的“合理”以及召集志愿民兵来加强国内安全和国防保障，这些职能之前是交由政府或那些与政府有联系的显贵履行的。七月起义或许可以被视为这些委员会动员和宣传工作的自然结果。

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这些出现在费萨尔时期叙利亚的人民委员会呈现出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和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描绘的伴随19世纪末欧洲政治大众化出现的“大众政党兼运动”（mass parties-cum-movement）相同。[47] 与欧洲类似，叙利亚人民组织的结构呈金字塔状，街区委员会处于底部，城市和地区委员会处于中间，人民委员会处于顶端。这种结构不仅有助于加快大规模组织成员的动员、活动协调和民主参与（虽然是在受控的条件下），而且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地方问题转移到了国家领域。因此，像其他大众运动一样，叙利亚的大众动员“粉碎了过去本土化的和地方的政治结构，抑或将它推向边缘，抑或将它整合”进一个更为广阔的情景之中。

此外，通过替代和吸纳（co-optation）相结合的方式，这些人民委员会（我们将在第三部分看到，早期在费萨尔政府的帮助下，它们在不同的理由

下不知不觉地开启了这一进程）打破了地方精英对政治权威的垄断，老一代精英和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作为一方、人民委员会作为另一方，开始共同分享城市中的政治权力，尽管双方都感觉到不自在。因此，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随后发生的政治国家化部分改变了传统本土显贵的角色，他们现在不得不与隶属国家政治机器的新贵“老板”达成妥协（modus vivendi）。

最后，这些大众组织是意识形态化的，为其成员提供了一套“全面的世界观”。这使得这些组织可以利用多元复杂的忠诚纽带来吸纳成员，这些忠诚纽带包括家庭的、市场的，以及由空间产生的，结合了纵向和正在出现的横向联接的网络，这一空间网络有助于整合一个新形式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形态也赋予了这些组织较那些单纯的压力集团和特殊利益群体更强的符号生产和符号获取的能力。

因此，除了为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和之后出现在阿拉伯中东的政权提供丰富的、源源不绝的神话创作源泉（mythopoetic wellspring）外，费萨尔时期的叙利亚最为持久的遗产是这些人民委员会的形成。这些委员会不仅是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里叙利亚所经历的社会和政治转型的缩影，而且促进了大众政治的出现。

* * *

叙利亚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近 400 年，直到伊斯坦布尔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出加入同盟国的悲剧性决定。这一决定和随之而来的与战争有关的经济和政治混乱对叙利亚居民的影响深远。

从 1914 年至 1918 年，经济危机猛烈冲击了叙利亚的大众阶层，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基础商品的价格在战争期间上涨，像咖啡、糖和大米这样的商品几乎无法买到。[48] 与此同时，劳动力和交通运输的短缺，大马士革奥斯曼第四军团司令部对家畜的征扣，以及

诸如 1914—1915 年收割季节的灾难性旱灾、1915 年的蝗灾、1916 年破坏农作物生长的热浪等一系列自然灾害，减少了叙利亚境内的收成。协约国的海军封锁了东地中海，这给沿海城市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封锁以不同形式一直持续到 1919 年 2 月，这加剧了沿海城市的食物短缺，货币贬值、囤货居奇、政府强迫征用则造成商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49] 1917 年 7 月，那时奥斯曼纸币的实际价值仅为其面额的约 25%，浩兰农民拒绝出售小麦，除非购买者支付黄金。1918 年，当时奥斯曼货币的价值跌至其面值的约 14%，商人一般拒绝接受奥斯曼纸币，甚至在面临严刑惩罚威胁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很多交易都限于以货易货的形式。[50]

对于很多人而言，叙利亚内陆城市的生活如噩梦一般。奥斯曼政府频频拒绝支付寡妇、孤儿、国家公务员和退休人员所有或部分的一般津贴。即使支付，也是支付贬值的奥斯曼纸币，因此人们很难维持生活。[51] 低营养水平（一方面因为面粉掺假的普遍做法，另一方面因为 1916 年后实行的配给制导致人均消费的减少，共同导致这一情况的恶化）和市政服务的瘫痪，叙利亚的海滨和内陆城市出现了痢疾、疱疹、天花、白喉、疟疾和霍乱这样的流行病。媒体报道了大马士革自杀率、犯罪率和流浪率的升高。[52] 到战争中期，来自奥斯曼军队的逃兵团伙威胁着城市周边村庄的安全，几乎扼杀了本地贸易。农村的不安全反之又向城市释放了难民潮，造成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几乎达到 50 万人（根据一份可能存在夸张的记述）。城市的过度拥挤加上房地产投机，急剧增加了大马士革城内和周边地区的住房成本，以至于 1918 年城市房地产的平均利润率翻了两番，从 4% 升至 8%。[53]

尽管战争对大众阶层而言普遍是毁灭性的，但是对上层阶层的影响则是混合的。一方面，奥斯曼政府流放了“经济犯”（投机者）、政治犯和逃兵的家庭，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54] 例如，在 1916 年 12 月，根据亲谢里夫（pro-Sharifian）的麦加报纸《吉卜拉报》（*al-Qibla*）的报道，奥

斯曼当局逮捕了150名大马士革显贵，并将100个家庭流放到安纳托利亚（Anatolia）。1917年11月，根据该报的另一则报道，有450个家庭被流放，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另一方面，一些商人确实从投机、走私和向奥斯曼第四军团出售物资中实现了财富的增长。[55] 根据记者穆罕默德·库尔德·阿里（Muhammad Kurd 'Ali）的报道："许多商人、政府官员和中间人变得富有……［通过向奥斯曼和阿拉伯军队支付款项，黄金进入大马士革］直到叙利亚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成为安逸富裕的国家。"[56]

除了战争直接对叙利亚居民生活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外，在敌对冲突爆发后还产生了两个相关的政治影响。第一，在对同盟国的失败和奥斯曼帝国将要瓦解的预期下，英国、法国和其他协约国开始商定一系列秘密协议，勾勒出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有序分割的方案。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the Sykes-Picot Agreement）是上述秘密协议之一，规定将帝国的阿拉伯省份划分为由英国和法国分别直接和间接管控的两个区域。[57] 尽管之后该协议为适应谈判时没有预见到的意外事件进行了修改，但是《赛克斯—皮科协定》为战后初期国家主权之争和外交努力提供了根据。

第二个与战争相关的政治影响是麦加哈希姆（Hashemite）家族代表在大马士革的设立。1916年，作为大规模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活动的一部分，英国人鼓励谢里夫侯赛因（Sharif Husayn）和他的儿子进行反对奥斯曼君主的起义，也就是备受吹捧的阿拉伯起义。在一封往来书信中，英国承诺对武装斗争进行支持，并支持在战斗结束后建立一个或多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58] 谢里夫的儿子之一埃米尔费萨尔被任命为北部阿拉伯军队的负责人，参加了英国领导的在汉志北部、巴勒斯坦到今天的叙利亚这一区域的战斗。根据普遍的看法（根据一名美国观察者在埃米尔进入大马士革后不久后对这一事件的概述），费萨尔的"外表和举止令人喜爱，对待各方都是心胸宽广、态度友好。但是他不是一个铁腕人物，他被一群聪明的、

狡猾的和不择手段的政客所包围，他们可以轻易地影响费萨尔”[59]。尽管在攻占大马士革后，联结英国人、费萨尔和被任命的叙利亚军事长官之间的指挥链混乱，但英国人的承认加上家族（谢里夫）和军事声誉，以及一开始对武力的明智使用，使得年轻的埃米尔有足够的力量来将自己树立为“叙利亚的阿拉伯行政和军事事务最高权威”[60]。

这一安排并不是毫无争议的。在英国、澳大利亚和阿拉伯军队进入大马士革的时候，土耳其人已经放弃了这座城市。为了维护短暂过渡时期的秩序，几个群体试图在城市中建立一个统治机构。[61]在大马士革即将沦陷的时候，叙利亚最后一任奥斯曼统治者贾迈勒帕夏（Jamal Pasha，al-Saghir）委任赛义德·贾扎伊里（Sa’id al-Jaza’iri）组建一支国民警卫队来维护秩序。尽管贾扎伊里初来乍到，但他的家族因平息了自 1860 年以来一直困扰大马士革的社区间骚乱而在地方事务上获得了突出的威望。[62]赛义德·贾扎伊里招募到了奥斯曼军队军官谢赫里达·阿塔尔（Shaykh Rida al-‘Attar），阿塔尔也是一个叙利亚显赫法官家庭的子弟，以及地区警察部队领导人阿明·塔拉布尔希（Amin al-Tarabulsi）。其他大马士革居民中的显要也迅速加入他们的事业，其中包括法里斯·胡里（Faris al-Khuri）、塔西尔·贾扎伊里（Tahir al-Jaza’iri）、阿塔·阿尤比（’Ata al-Ayyubi）、巴迪·穆阿耀德（Badi’ al-Mu’ayyad）、沙奇尔·汉巴里（Shakir al-Hanbali）、萨阿达·卡哈拉（Sa’ada Kahala）、阿明·塔米米（Amin al-Tamimi）和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Shaykh ‘Abd al-Qadir al-Khatib），哈提卜是倭玛亚清真寺（Umayyad Mosque）前讲道者（khatib），被贾扎伊里任命为大马士革自治市主席。这些人中的几个人之前在大马士革最富有的地主之一马哈茂德·巴鲁迪（Mahmud al-Barudi）家中出现过，在那里他们成立了一个“人民委员会”（lajna waṭaniyya）来确保大马士革政府向英阿军队和平投降。在人民委员会与赛义德·贾扎伊里和阿拉伯军队代表舒克里·阿尤

比（Shukri al-Ayyubi）[63]达成协议后，贾扎伊里任命了一个由上述人士组成的政府，他自己则是“叙利亚阿拉伯政府总统”，他的兄弟阿卜杜勒·卡迪尔·贾扎伊里（'Abd al-Qadir al-Jaza'iri）被任命为阿拉伯骑兵部队指挥官，舒克里·阿尤比被任命为军事总督。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贾扎伊里和他的政府对费萨尔和阿拉伯起义的真实态度；同样，我们也很难评估双方最终是否能够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来使他们免受英国人的干预。[64]不论有多少可能性，这些事最终都没能发生：作为英国与阿拉伯军队联络人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相信自己对年轻的埃米尔的影响力，视贾扎伊里的人和他们的大马士革人及“摩尔人”（Moorish）支持者为自己门生（protégé）的威胁，因此对贾扎伊里兄弟和他们组织的政府予以公开的蔑视。“他们俩都是疯子，也都是亲土耳其人的，是最令人讨厌的宗教狂热者”，他写道：

> 因此我把他们叫来，在贝拉迪耶（beladiyeh）和谢赫赫拉特（sheukh el harrat）之前以费萨尔代表的名义宣布阿拉伯军事总督舒克里·阿尤比（原定总督阿里·里萨失踪）和贾扎伊里临时政府解散。他们相当难受，不得不被送回家。[65]

尽管费萨尔和他的追随者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得以很快从权力位置上清除他们的对手（在英阿联军进入大马士革不久后阿卜杜勒·卡迪尔·贾扎伊里就在有争议环境下被枪杀），很多重要的大马士革人士对新统治者感到不满，他们感到受到武力的压迫。

在英阿联军进入大马士革后，阿拉伯军队驰往北部，以获得对霍姆斯（Homs）、哈马（Hama）和阿勒颇的控制。与此同时，英国军队将南部的安曼（Amman）的控制权让给了埃米尔的一个当地代表。1918 年 10 月 22

日，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的埃及远征军（Egyptian Expeditionary Force）司令、将军埃德蒙·海因曼·艾伦比爵士（Sir Edmund H. Allenby）将其控制的前奥斯曼领土划分为了两个行政区。他将从汉志北部到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整片内陆区域置于东部占领区政府的管辖下（OETA-East），将包括战前的奥斯曼贝鲁特省和内陆城镇哈斯拜亚（Hasbaya）、拉谢亚、穆阿拉格（Mu'allaqa）、巴勒贝克（Ba'albak）的海岸地带置于西部占领区政府（OETA-West）的管辖之下。由于西部区域在法国政府的控制下，英国批准在内陆东部区域建立由埃米尔费萨尔领导的临时阿拉伯政府。[66]

在阿拉伯政府完整运转之前，费萨尔、他来自阿拉伯军队的亲密伙伴，以及一群经过挑选的非军事政务官就试图赢得民众的支持，并和其管控区域的居民建立直接的联系。费萨尔政府重新恢复了战争时期中止的奥斯曼政府的福利项目，重新向战争遗孀、孤儿、前奥斯曼公务员以及他们的家人支付津贴。[67] 政府也努力试图保持物价稳定，防止城市中心的食物短缺，为此政府直接从浩兰农民手中收购谷物，在每个街区设立委员会来监督食物的分发工作，而且还周期性地将其占领的谷仓中的谷物分发给城市中的穷人，将种子分配给一贫如洗的农民。[68]

为了让民众知道阿拉伯政府的慷慨，高级官员经常和一批官僚、记者，甚至给埃米尔费萨尔或政府创作并背诵赞诗的诗人一道走访大马士革街区和其他城市，并在走访农村时举行分发礼物的隆重仪式。例如，东部占领区的首任军事总督阿里·里达·里卡比（'Ali Rida al-Rikabi）在 1919 年 1 月巡访了叙利亚全国。根据一名随行记者的记述，在进入一个村庄后，里卡比让本地种植户讨论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促请他们在受到委屈的时候直接告诉他。在霍姆斯，里卡比宣布了对犯人的大赦，为那些从安纳托利亚返回的曾在奥斯曼军队作战的叙利亚士兵授予荣誉称号，并拨款对他们进行运输和安置。在哈马和阿勒颇，他向当地村民分发种子，对农民债务

予以延期，向当地慈善机构捐款，下令建设公共工程。[69] 里卡比的巡游之旅一直持续到 1920 年的春天。根据他有记录的最后一次巡游（这次巡游出现在同一个记者的记叙中），里卡比走访了大马士革的不同街区，查看了面包师们的烤箱。当发现面粉掺假或缺斤少两时，他当场下令逮捕了责任人。其他高级别政府官员，包括埃米尔费萨尔自己，也进行过类似的巡游。[70]

阿拉伯政府并没有仅将其善行和宣传对准农民和城市大众。英国官员常常抱怨说，他们支付给阿拉伯政府的补贴被用来收买叙利亚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忠诚。政府贿赂部落领袖、政客、政治和文化社团的成员和记者。阿拉伯政府财政顾问赛义德·舒贾伊尔（Sa'id Shuqayr）的记录中充斥着政治行贿的痕迹：拨款 16 000 埃及镑（P.E.）给尤尼亚（Junia）的显贵；100 埃及镑给大马士革的大拉比（grand rabbi）；25 000 埃及镑用于贝鲁特的宣传工作；1 500 埃及镑拨给大马士革的东正教会。[71] 仅 1919 年 6 月这一个月，舒贾伊尔就记录了大量“捐赠”或“不定期超常支出”，这些钱支付给了以下人员：纳西卜·阿特拉什（Nasib al-Atrash）、阿迪尔·阿尔斯兰（'Adil Arslan）及其德鲁兹（Druze）领袖；迪亚卜、达哈米沙和马扎里布部落的谢赫们；胡维塔特（Huwaytat）部落的阿吾达·阿比·塔亚（'Awda Abi Tayah）和伊本·阿吾达·阿比·塔亚（Ibn 'Awda Abi Tayah）；鲁瓦拉部落的努里·沙兰（Nuri al-Sha'lan）；希腊天主教俱乐部（Greek Catholic Club）、穆斯林—基督教委员会（Moslem-Christian Committee）、联盟委员会（Alliance Committee，Alliance Israelite）和文学协会（Literary Society）；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尤素福·阿兹马（Yusuf al-'Azma），他之后被费萨尔任命为阿拉伯政府战争委员会主席；阿拉伯俱乐部（Arab Club）中的积极分子法伊兹·胡里（Fa'iz al-Khuri）和穆拉德（穆罕默德）·鲁什迪（Rushdi）；德宪兵队总长加布里埃尔·哈达德（Gabriel Haddad）（记录中这笔款项被标示为“家具费用”）；访问大马士革的各贝都因代表团（食

宿费用）；报社所有者等。类似的支出在之后的一个月达到 22 387 埃及镑，约为政府计划收入的十分之一。[72]

尽管做了这么多的努力，阿拉伯政府在大马士革以外的区域仍然只享有表面上的权威。监管东部占领区的政府机构笨重低效：它事实上由模糊不清甚至有时矛盾的权力系统组成，这些权力系统将艾伦比、费萨尔、里卡比和官僚机构连接在一起。此外，监管多数城市行政机构的地方政府仍然被本土显贵所掌控，他们的关切和利益经常和阿拉伯政府及其从大马士革派来的代表相矛盾。城市领导对阿拉伯政府将大量注意力放在首都感到嫉妒，害怕那些被认为是新贵和外国人所策划的中央集权政策，他们不仅对阿拉伯政府将国内外收入来源据为己有感到愤怒，而且为其傲慢低效感到不满。[73] 阿勒颇显贵和大马士革政府的关系尤为紧张，因为他们在外交政策和贸易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当埃米尔在 1918 年第一次巡访北部时，他公开回忆称，该城市的居民对阿拉伯起义缺乏帮助，然后解散了当地的行政议会（majlis al-shura），任命了一个由其支持者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他们之间的关系在 1920 年春天变得尤为紧张，一个由阿勒颇显要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大马士革参加庆祝费萨尔荣升叙利亚国王的加冕礼，据说在仪式上，代表团要求获得对他们城市及其周边农村的自治权。[74]

阿拉伯政府有可能避开或取得不服从的地方领袖的支持，获得大众的认同，这取决于它能否长期获得国际支持，维持可靠的经济资源，主持经济复苏工作。但是，它没能做到上述任何一点。从阿拉伯政府执政初期开始，货币和财政问题便困扰着东部占领区。当协约国部队进入叙利亚时，多种硬币和纸币都在流通。为了结束货币混乱的局面，艾伦比将军强行将以英镑为后盾的埃及镑作为法定货币。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选择：在与占领叙利亚的以埃及为基地的英国驻军交易时应该使用埃及镑，如果仍保持奥斯曼货币作为合法支付手段，这意味着授权使用一个已经不再存在的政

府发行的货币，而且这一货币的后盾是毫无价值的德国马克。但是艾伦比的命令造成了一系列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因为英国当局最初限制通过埃及货币的流通来应对通胀，所以这一货币在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城市地区之外很稀少。此外，叙利亚人对新货币并无太多热情：很多人在从一种定价体系向另一种定价体系转换的过程中遇到种种麻烦，与安纳托利亚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的商人害怕同叙利亚以外的市场切割开来。[75] 更为糟糕的是，在 1919 年秋天巨幅贬值之前，战后一年内，埃及镑在本地一直在持续贬值。

叙利亚人仍然继续使用奥斯曼货币和外国货币，因为这些货币的价值是建立在其金属含量之上的。然而这也是不切实际的：相对货币价值大幅波动，经常受到伦敦、巴黎、伊斯坦布尔甚至巴格达的决策的影响。例如，当英国在伊拉克的行政机构宣布土耳其银币和镍币流通为非法的时候，这两种货币大量涌入大马士革，这导致这些货币的突然贬值，据一位英国观察者所见，这带给“民众极大的苦难”。[76]

协约国采取的行动、官僚机构的缺陷和阿拉伯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都导致政府收入的减少。在英阿联军进入大马士革前，奥斯曼政府已经征收了下一年的税，此外，新的行政当局在叙利亚多数地区缺少足够权威来征税。拥有毋庸置疑的能力和忠诚的税收官也很罕见。1919 年夏天，赛义德·舒贾伊尔在给英国的督查人员的信中这样写道，“非常抱歉，我可能无法在这个月中将 6 月的账目给你们”，

因为各地区的会计非常无能，而且他们的账目极为滞后。在我去年 5 月抵达这里时，我发现过去一年（10 月至 12 月）的账目和今年第一季度的账目都没有完成最终决算……我想提一下，最近一些会计因工作能力不足或腐败已经被解雇。他们将陆续被其他人取代，希望

未来这些会计可以更加规矩。[77]

通常支持阿拉伯政府的《地球报》(*al-Kawkab*) 甚至也承认，政府官员“不会用阿拉伯语写作，甚至不能准确无误地表达自己的思想”[78]。此外，政府对收入的需求与其争取民众支持的策略存在冲突。由于阿拉伯政府最初试图通过减税来赢得叙利亚民众的支持，因此废除了最令人痛恨的两项奥斯曼帝国税种：战争税（wīrkū al-harb），其中包括将工资税提高 3%、不动产税提高 15%，以及最初在 1911—1912 年征收的用于补充收入的特别税。最后，某些税收，例如大马士革地区、阿勒颇地区和哈马地区的什一税和阿勒颇的阿格纳姆税（羊税），阿拉伯政府无法获得，因为他们已经向奥斯曼公共债务管理局承诺偿还前政府的债务。[79]

为了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英国延长了给阿拉伯政府每月 15 万埃及镑补贴的期限。因为这一补贴为白厅确保其战时盟友财务偿付能力和不懈的忠诚，英国保证定期支付一笔固定款项或许是对阿拉伯政府财政问题的适当政治解决方案。然而，这些支出也造成了一个削弱经济的问题：资金直接通过补贴注入经济，加上英国占领军的支出、商品数量的有限，这些都造成了物价上涨。协约国禁运措施的延长、对地区间贸易和与土耳其之间贸易的限制、投机、囤积和运输的不安全，使得价格进一步上涨。[80] 总而言之，通货膨胀不仅削弱了阿拉伯政府的财政能力，而且使它面临另一个看起来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触及它所统治的所有民众日常生活的问题，削弱着它的道德权威。

费萨尔本人在叙利亚几乎没有时间处理政治或经济问题。1918 年 11 月 11 日，在埃米尔抵达大马士革不到 6 周后，谢里夫侯赛因任命他的儿子作为特使，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当时协约国正在决定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命运。费萨尔在欧洲呆了 5 个月。他在 1919 年 5 月初回到大马士革，

负责同盟间叙利亚观察团（the Inter-Allied Commission on Syria，后文中称金—克莱恩观察团，the King-Crane Commission）到来前的筹备工作，该观察团是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坚持下组建的，其任务是“说明（叙利亚）的舆论状况和任何应该强制托管的领土”[81]，并就叙利亚的未来向会议提出建议。在观察团悲剧性的访问后，费萨尔再次前往欧洲，此行长达4个月。费萨尔不在期间，谢里夫侯赛因委托费萨尔21岁的弟弟埃米尔扎伊德（Amir Zayd）作为大马士革的家族代表。英国观察家对扎伊德的评价诸如“行为柔和，观念模糊”，“易变并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非常清楚自己的无知，并因对自己目前地位的焦虑所累”和“绝好的心理学家研究素材”，他作为一个如此无望的统治者（根据几份报告，他还很堕落），以至于法国在大马士革的联络官建议法国政府停止与费萨尔在巴黎进行的谈判。因此，随着叙利亚人越来越多地接触扎伊德，他们会憎恨整个哈希姆家族[82]。

宣布金—克莱恩观察团即将访问中东的消息对叙利亚政治产生的影响是在巴黎会晤的协约国代表和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都没有预料到的。尽管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和法国代表在名义上都表示将致力于“（在中东）建立民族国家政府……政府的权力将来源于本土居民的主张和自由选择”[83]，但实际上他们认为观察团是个麻烦，拒绝任命其代表或接受其调查结果的约束，美国对观察团的支持也是敷衍了事。[84]但是，不管埃米尔费萨尔和他的支持者私下对协约国的诚意有多大的怀疑，在公开层面上他们还是抓住了这根稻草。1919年6月初，埃米尔召集代表们参加叙利亚国民大会（Syrian General Congress），并责成大会制定一份提交给美国观察团的协商一致的要求清单。[85]不久之后，阿拉伯政府分发了在星期五礼拜时宣读的布道词（khutab），并与政治和文化社团以及政府认可的行会一起发起请愿活动、游行示威，支持大会颁布的《大马士革方案》（Damascus

Program）。这一方案指示叙利亚全国各地的地方政治活动分子和当地政府官员（makhātīr，单数 mukhtar）强迫居民和店主在其住宅和店面张贴要求叙利亚统一和绝对独立于在巴黎参加会议的协约国谈判者的标语。[86] 总而言之，虽然协约国让观察团负责简单的事实调查，但是观察团在叙利亚的存在推动了规模空前的民众动员活动。

金—克莱恩观察团的任命还产生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为观察团到来做准备的民族主义精英们策划了示威和宣传活动，目的是向外界观众展示一个渴望并准备独立的先进国家（sophisticated nation）的形象。但在叙利亚转变为一个大的“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的过程中，他们未能将大多数人口纳入自己的民族主义计划。他们从未与人民就意识形态或者行动方案进行商讨，从未整合出一套对非精英群体有吸引力的政治话语，也从未与民众建立过类似于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起的民族精英与未来同胞之间的纽带。简而言之，金—克莱恩观察团的成立及其随后对叙利亚的访问，引发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最终导致了脱离阿拉伯政府和民族主义精英指导的大众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最终于 1922 年发表的观察团报告从未呈交和会。[87]

1919 年 9 月，在金—克莱恩观察团离开中东两个月后，埃米尔费萨尔收到了第二次前往巴黎的邀请。出于担心与法国的紧张关系和军费开支过度，英国政府决定从叙利亚撤军。根据与其欧洲盟友商讨后的计划，英国将叙利亚西部占领区（包括位于东部占领区和西部占领区之间存有争议的贝卡谷地）的临时控制权交给法国军事占领区当局，在法国与阿拉伯政府永久安排达成协议前，东部占领区的控制权将临时交给费萨尔及其政府。《英法协约》（Anglo-French agreement，即所谓“9 月 15 日协议”）引发了历史学家所称的“撤离危机”（Evacuation Crisis），这是阿拉伯政府统治下的叙利亚的历史转折点。用法国军队取代英国在贝卡谷地的军队的计划对

于费萨尔尤其是场政治灾难，因为这被广泛认为有违“人民的意愿”，法国的控制最终会扩展到整个叙利亚。阿拉伯政府通过向协约国展示叙利亚人民不仅渴望独立而且准备独立的策略因此破产。1920 年 1 月，费萨尔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Clemenceau）签署全面协议后，大马士革的政治危机达到白热化。这一协议不仅限制了阿拉伯国家的主权，还确认了西部和东部地区的独立管辖权。对于许多叙利亚人而言，《费萨尔—克列孟梭协议》（Faysal-Clemenceau Agreement）是对分裂叙利亚的正式认可。[88]

“9 月 15 日协议”的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一样深远。英国和法国的决定将阿拉伯政府推到了破产的边缘，削弱了其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政府无力确保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制定财政政策、巡逻边境、支付工资，这些都导致经济活动的急剧减少。更糟糕的是，阿拉伯政府试图通过对该地区居民施加各种各样的苛刻要求来弥补财政缺口，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贫困化和对政府的不满。总而言之，随着“撤离危机”的爆发，费萨尔统治下已经病快快的叙利亚经济陷入无法复苏的滑坡之中。

根据“9 月 15 日协议”，法国和英国同意共同分担向阿拉伯政府支付每月补贴的责任。因为阿拉伯政府不急于成为或被认为是法国的雇员，所以它一开始拒绝默许新的安排。[89] 事实上，英国和法国使用补贴来保证大马士革政府良好举止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经济困境。英国扣留了 1919 年 9 月的补贴，直到政府停止为阿拉伯军队招募 12 000 名志愿军的行动，并在英国军队成功撤离之前，停止了 1919 年 10 月和 11 月的补贴。由于等待英国对“代尔祖尔事件”（Dayral-Zur incident，阿拉伯非正规军对位于叙利亚东部边境城镇的袭击，英国政府怀疑阿拉伯政府是其同谋[90]）和其他被认为是费萨尔政府制造的事件的调查，补贴又被推迟。最后，阿拉伯政府在 6 月才收到 1920 年 1 月的补贴份额。[91]

为了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阿拉伯政府试图增加税费。它将收入

税、道路使用税和印花税提高 100%，房地产税、羊税和法院诉讼税费提高 50%。与此同时，它建议对所有拥有政府财产的城镇和乡村征收特别税，对火柴、香烟和扑克牌征收新税，并增加职业税（tamattu’）和代服兵役的费用（badal）。使负担更为加重的是政府计划以官方货币汇率征税，这使得埃及镑的实际市场价值大大被低估，致使在上述税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28% 的附加税。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要求用黄金纳税，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92]

1920 年春，由于国库仍然空虚，政府实施了一项贷款，这进一步增加了很多叙利亚人的财政义务。虽然参与贷款在理论上是自愿的，但阿拉伯政府要求政府官员投入一个月的工资。其他人也被以类似方式说服：宪兵和地方官员走访商人、显贵甚至外国居民，“鼓励”他们参与贷款，秘密组织“监视之眼”（The Watchful Eye）的特工则向富人勒索钱财。尽管很少人明确知道后一组织的情况，但这一组织中很可能包括民众领袖卡米勒·卡萨布，政府精明地选择他担任推销贷款委员会的负责人，尽管他有“财务不检点”的名声。[93]

阿拉伯政府在其第二年的贫困化使人们怀疑这一历史时期经常出现的政府政绩清单的可靠性。[94] 尽管在官方报纸《首都报》（*al-Āsim*）的版面中充斥着阿拉伯政府制定的各种计划，例如行政改革计划，以及建立、扩大和支持社会、文化和教育机构的计划，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政府完成了大部分计划，政府甚至没有拨出足够的资金来启动这些计划。因此，尽管本导论的目的不是庆贺或诋毁阿拉伯政府的成就，但是压倒性的证据表明，阿拉伯政府失败的尝试比成功的多，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到经济和政治背景）。

阿拉伯政府为避免资不抵债而作出的有时无效、有时鲁莽的尝试，只会加剧东部占领区的整体经济问题。随着现实中经济的自由落体式下滑，经济危机影响到了叙利亚的所有社会阶层。受打击最严重的是各类商人，

包括富有的代理商和小型的零售商。到 1920 年初春，大马士革、阿勒颇与其内陆地区之间的贸易实际上已经陷入停滞状态。当代观察家们认为导致商业崩溃的因素有很多：货币价格波动、对从叙利亚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土耳其的所有货物征收 11% 的关税、贝都因人的袭击。之前政府控制贝都因人掠夺的办法是贿赂，但是现在政府已经无法支付这笔费用了。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在反思阿拉伯政府倒台的原因时这样写道："造成阿拉伯政府分裂的是贝都因的岩石。"

> 没有任何控制他们的尝试，他们伤害了边远的种植园，努里·沙兰（Nuri al-Sha'lan）向来往的商人索取过路费，甚至向街上的驴子征收过路费……贝都因人的掠夺和傲慢是首要的怨恨。有说法称，在大马士革，努里才是埃米尔，而不是费萨尔。[95]

此外，大马士革及其周边地区的铁路安全状况极差，法国驻黎凡特（Levant）军队指挥官亨利·古洛将军（General Henri Gouraud）在给费萨尔的正式投诉中列举了 1919 年 12 月 9 日至 1920 年 1 月 9 日铁路线上及其附近发生的 20 多起抢劫、绑架、盗窃和勒索案件。[96]

为了减轻商业崩溃的影响，阿拉伯政府建立了一个供应部，负责为城市供应商品、定价，以及打击投机者和囤积者。政府还颁布法律，禁止黄金和粮食向东部占领区以外出口。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无一得到执行，据报道，商人为了逃避这些措施，从事了从走私到建立地下卡特尔等一系列非法活动。在从事这些活动时，他们经常得到人民委员会（popular committees）的帮助，人民委员会利用其对商人的影响力，向支持者提供服务并补贴其运动。因此，新法规不仅没有实现其目的，而且进一步疏远了商人和费萨尔政府之间的关系。[97]

除了惩罚性法规，阿拉伯政府显然无法对法国在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作出有效回应，从而疏远了商人。1920 年 1 月，传言开始在两个地区的商人间传播，即法国人计划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实行一种新的货币——叙利亚镑。一种新货币在沿海地区流通的可能使东部地区的商人面临困境。一方面，如果阿拉伯政府拒绝批准在叙利亚内陆使用叙利亚镑，其与沿海的贸易就会崩溃。另一方面，如果阿拉伯政府屈服于法国的要求，允许叙利亚镑作为法定货币在这两个地区流通，叙利亚商人可能会减少他们与伊拉克、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贸易，并在叙利亚内陆大量进口法国商品。使货币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拟议中的叙利亚镑将与臭名昭著的不稳定的法国法郎挂钩，自停战以来，法国法郎一直在贬值。一想到阿拉伯政府甚至会考虑使用这种货币，商人们就会感到惊恐，因为埃米尔既不愿意谈论他与克列孟梭的交易，也不愿讨论他对未来的计划。[98] 与政府的优柔寡断相反，人民委员会回应了那些与东部占领区以外从事贸易的人的焦虑，组织了反对新货币的示威和请愿活动。

商人并不是唯一受到政府政策和经济衰退威胁的群体。“撤离危机”引发的经济崩溃也损害了政府文职和军职人员的利益。在高通货膨胀时期，政府雇员不仅被迫依靠固定工资维持生计，而且其工资经常被拖欠或克扣。截至 1920 年 6 月，公务员和宪兵的工资已被拖欠两个月，军官的工资则经常被拖欠 15—20 天。[99] 据英国在 1919 年 12 月发布的关于阿拉伯国家军队状况的报告称，

> 军官和男性的比例是 1 比 3，有些地方甚至全是军官。这些有名望的人都是被遗弃的土耳其人，大多是那些前来征税却被拒绝的人，他们穿着漂亮的军装，佩戴着勋章，拿着丰厚的薪金。但是，军队在过去两个月里没有见到过任何现金，他们告诉我，埃米尔现在告诉他

> 们将通过征税来支付他们的薪金。村民似乎并不支持征税，他们可能缺乏真正的民族精神，在大马士革有大约600位美女，其中80人称自己是巴格达人。[100]

即使阿拉伯政府设法向其雇员支付了薪金，薪金也往往很少，甚至经常被无故扣发。到1920年初，在通货膨胀面前，士兵的工资缩水75%，有些士兵在大马士革的集市上出售装备和制服以购买食物。另一些士兵则以开小差和哗变的方式回应他们的贫困。[101]政府官员毫无精神气，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在《首都报》刊登告示，向雇员提醒工作时间，并警告他们不要加入反政府组织。[102]

各级政府的贫困使得其他多数城市人口生活困窘，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例如，大马士革的债务累积达20万埃及镑，在阿拉伯政府统治的头一年，市政预算仅有微不足道的35 000镑。[103]因此，大马士革市政府就像叙利亚其他财政拮据的市政府一样，在提供诸如淡水供应、城市照明和卫生等基本服务上严重失职。[104]一家通常支持阿拉伯政府的大马士革报纸在1920年1月抱怨，“连绵不绝的雨水把街道变成了河流”，“收入不足使市政府无法开展必要的维修工程”。[105]另一位观察家在1919年底这样写道：

> 大马士革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比土耳其时代肮脏多了。巴扎里堆满了蔬菜和其他垃圾，隐蔽的角落也没有比用来装各种污秽的容器好多少。[106]

针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犯罪的增多进一步表明了城市生活质量的恶化。据说武装团伙与警察之间的枪战在大马士革街头经常发生。外国观察家注

意到，首都的大部分居民在日落之后拒绝走出家门，那些在夜间冒险外出的人都是全副武装。[107] 大马士革的街头暴力的增加使人们震惊。1919 年秋，该市的穆斯林显贵和非穆斯林显贵进行了会晤，提出请愿，要求在城市中的战略要地修建警察哨所，并由武装平民加强警戒巡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报告称安全状况正在改善被证明是不实的，在两个月后一份亲政府报纸发表了一篇报道，称大马士革市政府正在认真考虑向警察总部长期派驻一名医生，以照顾数量空前的枪击受害者。[108] 外国观察家们称，在拉塔基亚（Latakia）、杜马（Duma）和代尔祖尔（Dayr al-Zur）也有类似的犯罪潮，美国驻阿勒颇领事在 1920 年 2 月抱怨道："甚至在白天，家人离家外出几个小时也会遭到抢劫。"[109]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出现的城市过度拥挤的状况进一步降低了城市市民生活质量，加剧了犯罪、失业和社区紧张关系。过度拥挤不仅在费萨尔时期一直持续，而且因为难民从安纳托利亚、贝卡谷地和东部边境的涌入，情况变得更加严重。难民分两拨进入大马士革、阿勒颇和东部地区的其他城市。第一次是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不久。这波包括约 21 000 名奥斯曼军队复员士兵[110] 和阿拉伯战争难民，在当时，难民最大的组成部分是 1915 年大屠杀中背井离乡的亚美尼亚人。阿勒颇和大马士革收容的亚美尼亚难民人数最多，阿勒颇有 70 000 人，大马士革有 33 000—35 000 人。[111] 大多进入叙利亚的难民只有极少的财产，甚至没有财产（一份战争结束时的报告估计，进入叙利亚的难民有 78% 都是贫困的）。例如，英国人统计，在霍姆斯有 2 000 名赤贫难民。由于生活拮据，他们中的许多人依靠英国军队和阿拉伯政府提供的救济生活。即使阿拉伯政府面临资不抵债的危机，它仍花了近 45 000 埃及镑来救济亚美尼亚人。[112]

第二波难民涌入叙利亚城市开始于"撤离危机"发生不久。乡村安全的崩溃使人们对乡村生活感到极具不安，很多人选择逃离叙利亚农村。从

安曼到阿勒颇，从塔尔图斯（Tartus）到代尔祖尔和泰德穆尔（Tadmur），切尔克斯（Circassians）和阿纳扎（'Anaza）、巴努萨赫尔（Banu Sakhr）、沙玛尔（Shammar）、哈代丁（Haddaydin）和马瓦里（al-Mawali）的部落民利用政府权威被削弱之机来算旧账（settle old scores），并通过洗劫毫无防御的村庄来致富，在这一过程中有数千人逃亡。[113] 另外一些难民是为了逃避阿拉伯军队和土匪、逃兵的劫掠。生活在争议区域贝卡谷地的居民格外受到乡村军事化的影响。法国和阿拉伯政府之间的竞争不仅为村庄间和社区间的对立制造了机会，使其以致命的方式重现，而且村民们经常发现自己被困在法军和民族主义游击队之间持续的边境战争中。1919 年 12 月 6 日至 1920 年 1 月 5 日，武装团伙越过东部占领区和西部占领区的边界，抢劫了今天黎巴嫩境内迈尔季欧云（Marj Ayyun）地区的 30 个村庄。作为对这一袭击和类似袭击的回应，法国从海上和空中对谷地进行了轰炸。根据埃米尔费萨尔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一份官方申诉，1920 年初对东部占领区的贾巴尔·埃米尔（Jabal 'Amil）的报复行动使 2 万人无家可归，最终使很多人逃往内地避难。[114]

正如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大众阶层对在他们看来毫无理由的经济困难、政府弊政或冷酷无情进行了个人和集体抗争。尽管这一时期的抗争在组织和政治动员上跟此前相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大众仍然诉诸自发的和短暂的抗议方式。例如，大马士革经历了一场罢工潮，在此期间，铁路工人、印刷工人、电车工人、玻璃和纺织工人、电力公司员工甚至独立工匠都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场所，要求发放更高的工资。[115] 1920 年春，“面包骚乱”在整个地区爆发。在哈马，暴徒们高喊：“当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把谷物提供给法国。”他们要求政府采取行动降低面粉价格、打破垄断，并禁止向西部占领区出口谷物。在阿勒颇，抗议者要求政府像贝鲁特市政当局那样建立粮食储备。[116] 阿勒颇也是七月起义前最血腥的对抗现

场。1919 年 2 月，当地的暴徒袭击了亚美尼亚社区，造成 48 人死亡，多达 200 人受伤。尽管后来的解释在屠杀由何引发上有所争议，而且阿勒颇在当时享有世界主义的声誉，但是这场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难民的涌入导致了高失业率和过度拥挤，而且据称阿勒颇人憎恨协约国、阿拉伯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对难民的特殊待遇，也害怕难民造成的竞争（仅一座难民营就有 4 000 台织布机）。[117]

毫无疑问，费萨尔政府制定的最令人痛恨和最具挑衅性的计划就是征兵，引起了规模最大的反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征兵法于 1919 年 12 月首次颁布，并在 1920 年 5 月和 6 月进一步扩大和加强，这是由于对法国意图的广泛担忧和大众日益增加的对军事抵抗的要求。[118] 但是，叙利亚人很快就发现自愿加入当地民兵和被迫加入装备简陋、薪水微薄的国家军队之间的差别。此外，因为人民委员会的领袖们正确地意识到阿拉伯政府打算利用征兵法来拉拢大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并通过建立一支军队来粉碎反对派，因此他们设法阻碍了征兵法的实施。[119] 征兵在整个东部占领区遭到了个人和集体的抵制。年轻人通过伪造出生证明来证明自己不符合征兵条件；其他人则逃离城镇，甚至国家。逃避兵役的现象如此频繁，以至于阿拉伯政府禁止符合征兵年龄的年轻人从东部占领区向外移民。被迫征募的士兵成群结队地出逃，非常猖獗，以至于费萨尔后来指出，逃兵的数量经常超过入伍军人的数量。在德拉（Dar'a）、哈斯拜亚和大马士革都爆发了反征兵骚乱。在大马士革，匿名海报将政府的政策和团结进步委员会的政策进行比较。为了平息暴乱，阿拉伯政府派出 400 名士兵进入麻烦不断的梅丹。[120]

显然，在 1920 年，似乎永无休止的一连串困扰叙利亚的危机几乎摧垮了埃米尔费萨尔和阿拉伯政府的道德和政治权威。随着政治活动的舞台越来越多地从埃米尔的宫殿转移到街头，人民委员会的组织者们开始填补政

府衰弱后留下的空隙。正如记者阿萨德·达吉尔（As'ad Daghir）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

> 事实上，叙利亚发生的政治现象很奇怪，因为知识分子、公共舆论的领导者和政府官员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煽动大众的激动情绪，使大众走向极端。然后，他们突然在最微不足道的障碍面前选择撤退。他们抛弃了困惑中的人们，不知道如何解释他们的立场。一方面，他们加紧准备抵抗法军，敦促大众通过阻断交通联系和设置路障来抵抗敌人。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采取了阿谀奉承和灵活的姿态，向法国政府承诺将引导国家走上他们曾煽动国家反对的道路。
>
> 这造成了局面的严重混乱，耗尽了大众对领导人的信任。领导人们被迫公开谴责他们中间的那些叛变者，以至于民众也渐渐丧失了对他们的信任。在大众对政府领导人丧失信心后，他们已经无法继续领导国家，沦为了民众的笑柄。[121]

3月初，费萨尔召开了叙利亚国民大会。1920年3月8日，国民大会宣布叙利亚独立，这与其说是对民意的主动塑造，不如说是对民意的顺应。协约国不出意外地拒绝承认该宣言的有效性，并在两个月后召开的圣雷莫会议（San Remo Conference）上将叙利亚的管辖权交给了法国。随着法国在海岸上严阵以待和大众民族主义在国内受到的广泛支持，冲突已不可避免。7月14日，亨利·古洛将军向阿拉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0天之后，法国军队越过边境，攻破了叙利亚在梅萨伦的防线，占领了大马士革，结束了阿拉伯统治的短暂实验，由此开启了法国对叙利亚长达25年的委任统治。

注释

［1］ 我将用“叙利亚”一词来代指几个不同的地理区域。通常情况下，它指的是东部被占领的敌对领土管理局（Occupied Enemy Territory Administration-East，缩写为 OETA-E）所管辖的领土。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在讨论当代地理划分概念时，叙利亚指的是“天然边界内的叙利亚”，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实体”、以色列占领区，以及托鲁斯山以南的土耳其共和国、亚历山大塔勒省和伊拉克西部的小部分领土。读者可根据上下文确定哪种界定是合适的。

［2］ 例如，参见 Malcolm Russell，*The First Modern Arab State：Syria under Faysal 1918—1920*；Khairia Kasmieh（Khayriyya Qāsimiyya），*al-Hukūma al-'arabiyya fī Dimashq bayna 1918—1920*；*'Alī Sultān*，*Tārīkh Sūriyya 1918—1920：Hukm Faysal b. Husayn*；Zeine N. Zeine，*The Struggle for Arab Independence：Western Diplomac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isal's Kindom in Syria*。

［3］ 桑贾克由一条悬挂在木梁上的宽横幅构成。横梁由一个人扛着，作为辅助，另外有两个人手持系在横幅底部的绳子，以确保人们能阅读横幅上印着的新闻或标语。桑贾克通常展示在交通密集处、清真寺附近或墓地。Hasan al-Amīn，*Dhikrayāt*，*al-Juz'alawwal：Min al-Tufūla ilā al-sibā*，27.

［4］ MD 4H114/695，“Renseignements，” n.d.；MD 4H114/4/691，Cousse to Gouraud，13 July 1920；MD 4H114/5/282—283，Cousse to Gouraud，15 July 1920；al-Amīn，*Dhikrayāt*，27；*Ihsān Hindī*，*Ma'rakat Maysalūn*，59—60.

［5］ MD 4H114/662，Cousse to Gouraud，8 July 1920；FO 371/5037/E8509/74，Mackereth（Beirut）to FO，16 July 1920；MD 4H114/5，Cousse to Gouraud，20 July 1920；FO 371/5037/E8880/80，Mackereth to FO，23 July 1920；MD 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270，” 23 July 1920. 根据贾里卜·伊亚希（Ghalib al-'Iyashi）所述，群众也要求打倒叛徒（murrāq）和奸细（muta'āmirūn）。*al-'Iyāshī*，*al-Īdāhāt al-siyāsiyya wa asrār al-intidāb al-faransī'alā Sūriyya*，105—106.

［6］ MD 4H114/5，Cousse to Gouraud，20 July 1920；MD 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266，” 20 July 1920；MD 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270，” 23 July 1920；IO L/PS/10/802/p5841，GHQ to WO，24 July 1920；Mahmūd al-Charkas，*al-Dalīl al-musawwar lil-bilād al-'arabiyya*，vol.1，119—121；As'ad Dāghir，*Mudhakkarātī 'alā hāmish al-qadiyya al-'arabiyya*，122，139—142；Muhammad 'Alī al-'Ajlūnī，*Dhikrayāt'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98；Hindī，*Ma'rakat Maysalūn*，59，61—62.

［7］ Jules Kersante，“Syrie：L'occupation d'Alep，” 172—173；Dāghir，Mudhakkarātī，139；MD 4H114/9/70SP，Cousse to GCC，21 July 1920；IO L/PS/10/802.P5841，GHQ to WO，24 July 1920；FO 371/5039/E10316/38，J.B.Jackson（U.S. Consul，Aleppo），30 July 1920；MAE L：SL/vol.33/107—305，Gouraud，“Note au sujet des rapports entre le haut commission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Syrie Cilicie et L'emir Fayçal，” 22 September 1920；*al-'Āsima*，13 November 1919，6；Sulaymān Mūsā，*al-Murāsalāt al-tārīkhiyya*，vol.3：1920—1923，114. 对大马士革伤亡人数更高的估计，请参见 FO 371/5040/E11756，Gertrude Bell，6 August，1920；John de Vere Loder，*the Truth about Mesopotamia*，Palestine and Syria，78。在霍姆斯和哈马也爆发了起义。关于前者的详情，参见 P.G. Angelil，“L'occupation d'Homs：Angoisses et délivrance”。

［8］ 对卡迈勒·哈提卜后代穆罕默德·里达·哈提卜（Muhammad Rida al-Khatib）（1990 年 1 月 6 日）、梅萨伦战役老兵卡米勒·达格穆什（Kamil Daghmush）（1989 年 11 月 2 日）和阿卜·里巴·贾扎伊里（Abu Ribah al-Jaza'iri）（1989 年 11 月 15 日）的采访。Hindī，*Ma'rakat Maysalūn*，113；Ilyās al-Fādil and Rāmiz Hīthāwī，*al-Kitāb al-dhahabī lil-mujāhidīn al-sūriyyīn*；Jān Alexān，“Zaynab fī Maysalūn，” *al-Jundī*，19 April 1960，32—33. 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当代观察家，他们都没有在参与梅萨伦战役的志愿者数量上达成一致意见。例如，埃米尔费萨尔认为数量为 2 000 人。参

见“The Case of Emir Feisal”。

［9］ 达根的演讲之后以《叙利亚及其复杂的问题》(Syria and its Tangled Problems) 为题发表。

［10］ 海登·怀特关于历史写作中使用“预设情节结构”的讨论，参见“Interpretation in History，”51—80。

［11］“Seferberlik”的字面意思为“陆路旅行”，此处指涉的是叙利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苦难，包括饥荒和流亡。参见 L. Schatkowski Schilcher，“The Famine of 1915—1918 in Greater Syria，”229—258。

［12］ 为了强调达根的概念方案，《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 的编辑给他的文章起了一个副标题：“Story of the Allies'Promises，Mustapha Kemal's Ambitions，Emir Feisal's Disappointment，the Franco-British Rivalry and the Zionists in Palestine-French Difficulties in Syria”。

［13］ T.E. Lawrence，“Emir Feisal II：The Sykes-Picot Treaty，Impatient Arabs，” *Times* (London)，11 August 1920，9；T. E. Lawrence，*Evolution of a Revolt*；*Loder Truth About Mesopotamia*；Hans Kohn，*A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the East*；Richard Coke，The Arab's Place in the Sun；Elizabeth P. MacCallum，“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爱德华·萨义德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但是得出了不同的推论，参见 *Culture and Iperialism*，252。

［14］ Anthony D. Smith，*National Identity*，19—42.

［15］ Zeine N. Zeine，*The Emergence of Arab Nationalism with a Background Study of Arab-Turkish Relations in the Near East*，129—130，133.

［16］ George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The story of 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 另见 Abert Hourani，“*The Arab Awakening* Forty Years After”。对安东尼厄斯的背景和动机更为深刻的描绘，请参见 Edward Said，“Third World Intellectuals and Metropolitan Culture”。

［17］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13.

［18］ C. Ernest Dawn，“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Hisham Sharabi，*Arab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The Formative Years 1875—1914*，58—60，64—65.

［19］ Bassam Tibi，*Arab Nationalism*：*A Critical Enquiry*，58—68；Sylvia Haim，*Arab Nationalism*：*An Anthology*，ix—x，25—27.

［20］ 最近纠正这种同质性归因的努力来自艾利泽·陶伯（Eliezer Tauber）的三卷本中东民族主义史，从早期民族主义社会的建立一直到 1920 年代。陶伯没有将“阿拉伯民族主义”置于优先地位，而是辨识出了四个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分支：“阿拉伯主义”“叙利亚主义”“黎巴嫩主义”和“伊拉克主义”。尽管陶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而且所著细节丰富，但是他的书仍然保持着前人的精英主义偏见。此外，他的分析不承认身份的条件性。因此，他用四个基本的民族主义分支取代了一个民族主义，这让人想起前哥白尼时代的天文学家试图通过提出额外的本轮来解释“不规则的”行星运动，以拯救托勒密的宇宙图。参见 Tauber，*The Emergence of the Arab Movements*；*The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yria and Iraq*。

［21］ 参见 C. Ernest Dawn，*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Philip S. Khoury，*Urban Notables and Arab Nationalism*：*The Politics of Damascus 1860—1920*。

［22］ Khoury，*Urban Notables*，67—68.“阿拉伯主义”一词由唐创造，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唐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是为了对抗“奥斯曼主义”的学说，他认为这是一种回应。虽然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根源于伊斯兰现代主义，但是唐追溯了从里法阿·泰赫塔维（Rifa'a al-Tahtawi）到穆罕默德·阿布杜（Muhammad 'Abduh）和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的阿拉伯主义的独特血统，将阿拉伯主义定义为主张阿拉伯人“是一个拥有特殊美德和权利的特殊民族”。参见 Dawn，*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122—123，133，136—140，142—144，147—148。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补充说，阿拉伯主义是一种“原始民族主义，而非成熟的民族主义”，奥斯曼主义和阿拉伯

主义并不相互排斥，而是被流动边界分开的两种“理想类型”。参见“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Introduction”，ix；“Ottomanism and Arabism in Syria before 1914：Areassessment，”51，61—63。

［23］ 参见 Rashid Khalidi，“Abd al-Ghani al-‘Uraisi and al-Mufid：The Press and Arab Nationalism before 1914”；“Society and Ideology in Late Ottoman Syria”（particularly 123）。

［24］ 参见 Elie Kedourie，*Nationalism in Asia and Africa*，80—92。

［25］ 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8.

［26］ 参见 Tom Nairn，“The Modern Janus”。

［27］ 例如，参见 Stuart Hall，“Ethnicity：Identity and Difference”；John L. Comaroff，“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55，65—66；Zdzislaw Mach，Symbols，*Conflict*，*and Identity：Essays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15—16。

［28］ 参见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Etienne Balibar，“The Nation Form：History and Ideology”。

［29］ 我从威妮弗雷德·巴尔·罗森博格（Winifred Barr Rothenberg）的 *From Marketplaces to a Market Economy：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Massachusetts，1750—1850* 中借用的这一词语。

［30］ 参见 Roger Owen，*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1800—1914*，153—179，244—272；Moshe Ma’oz，“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on Syr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during the Early Tanimat Period”；Shimon Shamir，“The Modernization of Syria：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Abdulhamid”；Gabriel Baer，“Village and Countryside in Egypt and Syria：1500—1900”；Linda Schatkowski Schilcher，*Families in Politics：Damascene Factions and Estates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60—86；James Anthony Reilly，“Origi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in the Damascus Region，1830—1914”。

［31］ 参见 Y. Eyup Ozveren，“Beirut”；Schilcher，*Families in Politics*，5—6；Owen，*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244。

［32］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马士革中心矩形的地图被特意重新绘制，修建了有轨电车、电报和电话系统，以及城市照明。沙里纳斯尔（Shari’ Nasr）是大马士革的主干道之一，在费萨尔时期被用来作为游行场地，由奥斯曼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同时，瓦克夫部下令拆毁倭玛亚清真寺周围所有的房屋及其他建筑，制造出适合举行仪式的大片场地。参见 *al-Qibla*，22 dhu al-hijja 1334，4；Muhammad Adīb Āl Taqī al-Dīn al-Husnī，*Kitāb muntakhabāt al-tawārīk Li-Dimashq*，1：286。关于其他物理变化，参见 Nazīh al-Kawākibī，“al-Mazhar al-‘umrānī Li-Dimashq fī al-muntasaf al-thānī Lil-qarn al-tāsi’ ‘ashr”；Qatība al-Shihābīm，*Dimashq：Tārīkh wa suwar*。

［33］ 参见 George L. Mosse，*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34］ Kemal H. Karpat，“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ttman State，1789—1908”；Selim Deringel，“Legitimacy Structure in the Ottman State：The Reign of Abdulhamid II（1876—1909）”.

［35］ 这些政策（及其失败）在诸如《希尔报》（*al-Shīr*）和《穆克塔巴斯》（*al-Muqtabas*）这样的叙利亚报纸上被讨论。

［36］ Mosse，*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2.

［37］ Friedrich Nietzsche，*The Will to Power*，40.

［38］ 参见 Leila Tarazi Fawaz，*Merchants and Migra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Beirut*；Khoury，*Urban Notables*；Khalidi，“Society and Ideology”；Ruth Roded，“Ottoman Service as a Vehicle for the Rise of New Upstarts among the Urban Elite Families of Syri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Ottoman Rule”。

［39］ Reilly，“Origi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174.

［40］ *al-'Āsima*，7 May 1919，1—2.

［41］ 例如，参见 *al-Kawkab*，13 January 1919，11；*al-'Āsima*，7 May 1919，1—2；*al-'Āsima*，16 June 1919，1—2；*al-'Āsima*，25 Agust 1919，1—2；*al-'Āsima*，28 August 1919，5—6；*al-'Āsima*，11 September 1919，1；*al-Kawkab*，30 September 1919，7—8；*al-Kawkab*，21 October 1919，7—8；*al-Kawkab*，28 October 1919，7—8；*al-Kawkab*，11 November 1919，11；*al-'Āsima*，5 February 1920，5；*al-'Āsima*，no.24（n.d.）。

［42］ Albert Hourani，*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343—344.

［43］ Reilly，"Origi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120，155—158；Sherry Vatter，"Militant Journey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Damascus：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ern Labor History Agenda"；Ahmad Hilmī al-'Allāf，*Dimashq fī matla' al-qarn al-'ishrīn*，137；Linda Schatkowski Schilcher，"Violence in Rural Syria in the 1880s and 1890s：State Centralization，Rural Integration，and the World Market."

［44］ Charles Tilly，Louise Tilly，and Richard Tilly，*The Rebellious Century，1830—1930*，50，253—254；E. J. Hobsbawm，*Primitive Rebels：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1—10，108—125.

［45］ Schilcher，"Violence in Rural Syria，" 76；James L. Gelvin，"The Social Origins of Popular Nationalism in Syria：Evidence for a New Framework."

［46］ MAE L：SL/12/32—38，Cousse to HC，6 April 1919；AD 2344/C1/305—306，Cousse to Picot，31 October 1919；AD 2344/C1/311，Cousse to Picot，3 November 1919；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325—326，Cousse（？）to HC，10 November 1919；AD 2375/chemise：division de la Syrie 1919—1920/442/2，Arlabosse to gen. cmdt. div. Syrie，25 January 1920；AD 2375/chemise：division de la Syrie 1919—1920/445/2，Haak to GCC，26 January 1920；MD 4H58/2，Haut Commissionaire et armée du Levant état-major（deuxième bureau），"Rapport hebdomadaire，" 503，29 July—4 August 1920；Schilcher，*Families in politics*，9，11，16；Philip S. Khoury，*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The Politics of Arab Nationalism*，1920—1945，180，191. 291—292；Albert Hourani，"Ottoman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Notables，" 53；Jean-Paul Pascual，"La à L'époque ottoman（le XIXe siècle），" 39.

［47］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mpire，1875—1914*，92—94.

［48］ FO 371/2771，"Aran Bureau Intelligence Survey 10，" 14 July 1916；F 371/3058/137867，"Internal Conditions，" 11 May 1917.

［49］ FO 861/63，Vice Consul，Aleppo to L. Mallet，31 August 1914；*al-Muqtabas*，23 June 1915，2；FO 371/2770/104598/296，"Internal Conditions：Enemy Countries（Athens），" 28 May 1916；FO 371/2770/104598/296，"Arab Bureau Intelligence Survey 10，" 14 July 1916；FO 371/2781/193557，"Information from Two Arab Officers Recently Arrived in England from the Caucasus and Examined by Sir M. Sykes，" 25 September 1916；*Arab Bulleti*n，4 December 1916，504—507；FO 371/3058/137867，"Internal Coinditions，" 11May 1917；FO 371/2783/221220，"Report of an Inhabitant of Athlit，Mt. Carmel，Syria，" n.d.；MAE L：SL/vol. 78/1840，Amiral Gauchet to president de la république，21 February 1919.

［50］ 参见 Shilcher，"Famine of 1915—1918"；FO 371/2771，"Arab Bureau Intelligence Survey 10，" 14 July 1916；FO 371/3050/142519，"Notes of an Interview with Mr. Edelman，" 6 July 1917；FO 371/3050/158286，William Yale，"Palestine- Syria Situation，" 10 July 1917；DU SA 493/15/85—98，G.B. Stewart（Treasurer，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to Sa'id Shuqayr，7 June 1919。

［51］ *al-Muqtabas*，15 March 1915，2；*al-Muqtabas*，13 June 1915，2.

［52］ *al-Muqtabas*，10 January 1915，2. The Near East，28 April 1916，701；Arab Bulletin，30 June 1916，2；*Arab Bulletin*，14 July 1916，3—4；FO 371/2779/165094，"Arabian Report N.S. No. V.（Week Ending August 16，1916）"；FO 371/2779/170425，Dr. Franklin Hoskins，29 August 1916；FO 371/3058/11773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Mr. Samuel Edelman，U.S. Consul at Damascus，" 10 June 1917.

［53］ *al-Muqtabas*，16 January 1915，1；*al-Qibla*，12 rajab 1335，2；*al-Qibla*，16 rajab 1335，3；FO 371/2783/221220，"Report of an Inhabitant of Athlit，Mt. Carmel Syria，" n.d.；MAEL L：SL/vol. 64/20，"Note sur les finances municipals，les travaux urbains，et la nécessité d'un credit communal，" 8 January 1920（？）；Schilcher，"Famine of 1915—1918，" 241. 根据《地球报》报道，在阿拉伯政府成立后，大马士革政府试图制定某种租金管控计划，因为"确实，在这个拥挤着成千上万人的城市，租金上涨已经成为广泛议论和八卦的话题"。*al-Kawkab*，28 October 1919，10.

［54］ *al-Muqtabas*，9 April 1915，2；FO 371/2889/165094，"Arabian Report N.S. No. V.（Week Ending August 16）"；FO 371/3050/161668，"Mr.（William）Hall's Report on Syria，" 1 August 1917；Schilcher，*Families in Politics*，17.

［55］ *al-Qibla*，15 safar 1335，2；*al-Qibla*，16 muharram 1336，3.

［56］ Muhammad Kurd 'Alī，*Khitat al-Shām*，4：255；FO 371/3050/161668，"Mr.（William）Hall's Report on Syria，" 1 August 1917；FO 371/3413/179133，"Translation of a Document Captured by Desert Mounted Corps During Operation 19th to 21st September 1918."

［57］ 关于《赛克斯—皮科协定》和之后的修改，参见 J.C. Hurewitz，*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A Documentary Record*，2：60—64，118—128，158—166。

［58］ 参见 ibid.，46—56。

［59］ USNA 165/112/2075—2088，U.S. Military Attaché（Cairo），"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yria，" 9 November 1918.

［60］ Russell，*First Modern Arab State*，19.

［61］ 对大马士革土耳其政府最后统治和 1918 年 9 月末发生事件的最佳描述，参见 Wajīh al-Haffār，"al-Hukūmat allaī ta'āqabat 'alā al-hukm fī Sūriyya，" *al-Shurta wal-amm al-'amm*1（2 ramadan 1372）：12—13 and（3 shuwwāl 1372）：18—19，47。另见 Muhammad Jamīl Bayhum，*Sūriyya wa Lubnān，1918—1922*，44—48；Elie Kedourie，"The Capture of Damascus，1 October 1918"；Anwar al-Rifā'ī，*Jihād nusf qarn：Sumūw al-amīr Sa'īd al-Jazā'irī*，96—104；'Abd al-'Azīz al-'Azma，*Mir'āt al-Shām：Tārīkh Dimashq wa ahlihā*，235；*Sultān，Tārīkh Sūriyya 1918—1920*，18；FO 882/7/352ff.，T.E. Lawrence，"The Destruction of the Fourth Army"；FO 371/3383/169562/559ff.，Clayton to FO，8 October 1918。

［62］ 19 世纪 30 年代，赛义德·贾扎伊里（Sa 'id al-Jaza'iri）的祖父阿卜杜勒·卡迪尔·贾扎伊里（'Abd al-Qadir al-Jaza'iri）领导阿尔及利亚抵抗法国殖民者。被捕后，他于 1855 年在大马士革定居下来。参见 John Ruedy，*Modern Algeria：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57—66。

［63］ 根据哈法尔（Al-Haffar）所述，撤离的奥斯曼军队领导人也指定阿尤比来保护城市。

［64］ 哈法尔声称，贾扎伊里在表面上支持哈希姆派，实际上却在准备内战。参见 al-Haffār，"al-Hukūmat allatī ta'āqabat" 1（3 shuwwāl 1372）：47。

［65］ FO 882/7/352ff，T.E. Lawrence，"The Destruction of the Fourth Army，" n.d.

［66］ 1919 年 1 月成立了第三个当局，即北部占领区政府。英国和阿拉伯政府都声称对巴勒斯坦拥有管辖权。参见 Russell，*First Modern Arab State*，17—21，26—27。或许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外交行动最具可读性的叙述来自戴维·弗罗姆金（David Fromkin）的《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A Peace to End All Peace：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关于占领领土划分的内容，参见第 338—339 页。

[67] *al-'Āsima*, 17 April 1919, 3; DU SA 493/16/13—15, Sa 'id Shuqayr, "Points to Be Discussed with Col. Waters-Taylor at Haifa on the 11th August, 1919"; *al-'Āsima*, 23 February 1920, 4; DU SA 493/15/5, n.d.

[68] FO 371/3412/180073/148. Clayton to FO, 28 October 1918; FO 371/3412/189713/184, Clayton to FO, 14 November 1918; FO 371/4143/104019, Major General Sir Walter Lawrence to Commander in Chief (Egypt), 13 May 1919; DU SA 493/15/28—9, General Director of Agricultural Bank to Minister of Finance, 9 July 1919; *al-'Āsima*, 1 December 1919, 7; *al-'Āsima*, 29 December 1919, 2; *al-'Āsima*, 10 June 1920, 2; Suhayla al-Rīmāwī, *al-Tajriba al-faysaliyya fī bilād al-Shām*, 41.

[69] 关于里卡比之行的完整叙述，参见 Khalīl Mardam Bek, *Dimashq wal-Quds fī al-'ishrīnāt*, 24—66。

[70] *al-'Āsima*, 5 April 1920, 5; MD 4H112/dossier 2b/68, "Renseignements d'officier liaison d'Alep," 10 June 1920; AD 2346/c1a/ sous-dossier 19: Voyage Fayçal à Alep/73, "Renseignements d'officier liaison d'Alep," 15 July 1920; AD 2346/c1a/sous-dossier 19: Voyage Faysal à Alep/77, "Renseignements d'officier liaison d' Alep," 22 July 1920; Angelil, "L'occupation d' Homs."

[71] DU SA 493/13/25—35, Shuqayr to Waters-Taylor, 3 September 1919.

[72] DU SA 493/14/31—32; DU SA 493/13/4, Appendix to letter from Shuqayr to Waters-Taylor, 3 September 1919; DU SA 493/14/33; DU SA 493/13/5, Appendix to letter from Shuqayr to Waters-Taylor, 3 September 1919; DU SA 493/9/19, "Statement of Estimated Expenditure Submitted to H.H. Emir Faisal on 5th June, 1919." 预估的收入包括来自英国政府的每月 150 000 埃及镑。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研究这些数据的英国专家用"荒唐"一词来形容阿拉伯政府的收入预测。FO 371/5032/990/93—97, "Report by Col. Waters-Taylor on his visit to Beirut, and interviews with General Gouraud and the Emir Feisal," 21 January 1920.

[73] *Arab Bulletin*, 11 July 1918, 200; FO 371/3385/199351/16, Sykes to FO, 2 December 1918; FO 371/3386/208324, Sir L. Mallet, Minutes to Telegram 11457 and 11513, 18 December 1918; FO 371/4143/39115, Lt. Col. R. W. Graves, "Finance in OETA-East," 27 December 1918.

[74] Kāmil Ghazzaī, *Nahr al-dhahab fī tārīkh Halab*, 3: 655—656; USNA 59/890D.00/9/473, J.B. Jackson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13 March 1920.

[75] FO 371/3383/169803, Adam Block and Mark Sykes, addendum to minutes for 17 October 1918; FO 371/3413/188081/Q.K.T. 4826, GHQ to WO, 10 November 1918; WO 106/189/75957, WO to GHQ, 7 March 1919; FO 371/4171/63664/395, India Office Bank to FO, 24 March 1919.

[76] FO 371/4140/104076/ E. A. 2588, GHQ to WO, 13 July 1919; AD 2347/12350/427, Adel Arslane [sic] to Cousse, 11 December 1919.

[77] DU SA 493/16/37/6/7762, Shuqayr, 7 July 1919.

[78] *al-Kawkab*, 4 November 1919, 10.

[79] DU SA 493/9/6, Proclamation of General Sir Edmud Allenby, 7 May 1918; FO 371/4143/39115, Lt. Col. R. W. Graves, "Finance in OETA-East"; MAE L: AH/vol. 3/98, Moulin, "Examen du budget de 1919. Zone Est," 7 February 1919; DU SA 493/6/71—2. "Revenues for 1919"; DU SA 493/6/35—41, Shuqayr 15 January 1920.

[80] Russell, *First Modern Arab State*, 142—146; FO 371/3412/177154/3222, Clyton to FO, 22 October 1918; MAE L: SL/vol. 78/1856, Paul Cambon, 28 December 1918; *al-'Āsima*, 26 April 1919, 7—8; FO 371/4143/104019, Major General Sir Walter Lawrence to Commander in Chief (Egypt), 13 May 1919; FO 371/4428/111406, Balfour to Curzon, 21 July 1919; FO 371/4428/120623/

EA2612，GHQ to WO，6 August 1919；FO 371/4228/156929/501，Meinertzhagen to FO，25 November 1919；MD 4H114/2/261，Cousse to Gouraud，3 April 1920；MD 4H112/2b/25，"Renseignements du 24 au 30 avril［1920］."

［81］ Hurewitz，*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2：191. See also Arthur S. 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56：116.

［82］ FO 371/2773/122968，Copy of report by Ronald Storrs，10 June 1916；IO L/PS/10/802/11—13，Gertrude Bell，"Syria in October 1919，" 15 November 1919. AD 2368/10/2，Rapports du capt. Pichon et du lt. col. Cousse 1919/66，Cousse to HC，9 January 1919. 根据一份报告，"扎伊德毫无悔意；毫不夸张，人们听说过无数关于他私生活的丑闻，在马扎（Mazza）令人发指的狂欢活动，妇女遭受折磨并被杀害，亲自要求一些商人和出口商颁发'执照'等。他给大马士革留下了一个真正野蛮人的印象。" MAE 4H114/5/no no.，Cousse to Toulat，1 August 1920.

［83］ Hurewitz，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2：113.

［84］ 参见 James L. Gelvin，"The Ironic Legacy of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 13—14。

［85］ 参见 Khoury，Urban Notables，86—88；Yūsuf al-Hakīm，*Dhikrayāt*，3：90—97；Safiuddin Joarder，*Syria Under the French Mandate*：*The Early Phase*，*1920—1927*，209—211。

［86］ MD L：SL/vol. 12/32—38，Cousse to HC，6 April 1919；AD 2430/no no.，Cousse to Dame，18 April 1919；MAE L：AH/vol. 4/237—238，Picot to Pichon 22 May 1919；MAE L：SL/vol.14/897，Picot to MAE，17 June 1919；MAE L：SL/vol. 44/3D，Minault（Latakia）to administrateur du vilayet de Beyrouth，18 July 1919；MAE L：SL/vol. 43/39—41，"Renseignements d'agent，" 10—20 July 1919；MD 7N4182/4/340，Picot to MAE，21 July 1919；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 depart/240，11 August 1919. 关于 1919 年 4 月 11 日和 18 日分发的布道词文本，参见 AD 2343/286，Cousse to HC，24 April 1919。

［87］ Russell，*First Modern Arab State*，99.

［88］ 关于谈判和协议条款，参见 ibid.，93—131。

［89］ IO L/PS/10/802/P967，Waters-Taylor，5 January 1920.

［90］ 参见 Eliezer Tauber，"The Struggle for Dayr al-Zur：The Determination of Borders Between Syria and Iraq，" particularly 366—371。

［91］ FO 371/4183/132831/EA2697，GHQ to WO，20 September 1919；FO 371/5149/E564/7，Meinertzhagen to FO，24 February 1920；FO 371/5149/EA3084，GHQ to WO，25 April 1920；FO 371/5036/E8177/7749/89，Faysal to Allenby，21 June 1920.

［92］ *al-'Āsima*，29 January 1920，2；*al-'Āsima*，2 February 1920，4；*al-'Āsima*，26 April 1920，4；WO 106/196/39—41，Shuqayr，"Memorandum Drafted by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in Damascus re：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Syrian Government for 1920，" 20 May 1920；Russell，*First Modern Arab State*，145.

［93］ MD 4H114/4/471，Cousse to Gouraud，18 May 1920；MD 4H112/2b/162，Riza Sulh［sic］to Gouverneur d'Alep，2 June 1920；MD 4H112/2b/167，Fares Khoury［sic］to Gouverneur d'Alep，5 June 1920；MD 4H58/1，"Rapport hebdomadarie 383/2：15 au juin［1920］"；FO 861/69，Dr. J. Bauer to J.B.Jackson，1 July 1920；MD 4H114/4/671，Cousse to Gouraud，7 July 1920；MD 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260，" 19 July 1920.

［94］ 这些清单出现在 Abdul-Karim Rafeq，"Arbism，Society，and Economy in Syria，1918—1920，" 16—17；Kasmieh，*al-Hukūma al-'arabiyya fī Dimashq*，233—247；Yūsuf al-Hakīm，*Dhikrayāt*，3：43—44。

［95］ FO 371/5040/E11756/152—153，"Note by Miss G. L. Bell，C.B.E.，" 6 August 1920. 另见

MD 4H114/dossier 5/277, Cousse to GCC, 14 July 1920。

[96] FO 371/4214/103277, Baghdad to IO, 26 June 1919; Sūriyya al-jadīda, 27 December 1919, 1; AD 2330/A1a, Gouraud, "Memorandum des principaux faits relevés depuis L'arrivée du general h.c. jusqu'à ce jour," 13 January 1920; WO 106/195/21, Wratislaw (Beirut) to FO, 4 March 1920; AD 2330/A1a/134, Roux (Baghdad) to GCC, 16 March 1920; FO 371/5034/E3182/FO41CPO31, Meinertzhagen, 31 March 1920; FO 371/5035/E5690/35, Wratislaw (Beirut) to FO, 13 May 1920.

[97] *al-'Āsima*, 15 December 1919, 3; *al-'Āsima*, 12 january 1920, 2; *al-'Āsima*, 1 March 1920, 2; *al-'Āsimcaonimaa*, 3 May 1920, 2—3; MAE L: SL/vol.64/731, Gouraud to MAE, 26 March 1920; *al-'Āsima*, 26 April 1920, 7—8; FO 371/5037/E8350, Gertrude Bell, 29 May 1920; Russell, *First Modern Arab State*, 168—169; al-Rīmāwī, *al-Tajriba al-faysaliyya*, 41.

[98] AD 2347/1, Le Président de la Chambr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 (Beyrouth) to Lt. Col. Nieger, 13 January 1920; AD 2347/3as/d2, "Extraits du bulletin de renseignements du 10 avril [1920]"; AD 2347/12, "Extraits du bulletin quotidien du 12 avril [1920]"; MAE L: SL/vol.64/823—826, Gouraud to MAE, 14 April 1920; MD 4H58/1, "Rapport hebdomadaire: 27 avril au 3 mai [1920]."

[99] MD 4H58/1, "Rapport hebdomadaire: 11—18 décembre [1919]"; IO L/PS/10/802/p967, Report of Waters-Taylor, 5 January 1920; WO 106/196/663G, GHQ to WO, 7 June 1920.

[100] IO L/PS/11/169/P1512/1920, Major C.A. Boyle, 3 December 1919.

[101] *al-'Āsima*, 1 January 1920, 2; AD 2380/5/21/184, Cdt. Rouchi to cdt. de la troisième brigade de cavalerie (Alep), 25 October 1919; MAE L: SL/vo.19/1573, Gouraud to MAE, 30 November 1919; AD 2372/837, TEO (zone ouest) to cabinet politique, 20 April 1920; MD 4H58/1, "Rapport hebdomadaire: 20 au 26 varil [1920]"; MD 4H112/2b/51, "Renseignements," 25 May 1920; MAE L: SL/vol.33, Gouraud to Millerand, 22 September 1920.

[102] *al-'Āsima*, 8 January 1920, 3.

[103] MAE L: SL/ vol. 64/3—39/ "Note sur les finances municipals, les travaux urbains, et la nécessité d'un credit communal," 8 January 1920. 根据《地球报》报道，大马士革的市政预算为 40 000 埃及镑。*al-Kawkab*, 6 January 1920, 11.

[104] 关于大马士革的信息，参见 *al-Kawkab*, 6 January 1920, 6。关于阿勒颇的信息，参见 IO MSS EUR F 152 (Frank Lugard Brayne Mss.) /16b。"Palestine and Syria Autumn 1918," 19—22 November 19918; IO MSS/ EUR F152 (Frank Lugard Brayne Mss.) /20, 9 February 1919; Mardam Bek, *Dimashq wal-Quds fī al-'ishrīnāt*, 44—45。

[105] *al-Kawkab*, 6 January 1920, 10.

[106] IO L/PS/10/802, Gertrude Bell, "Syria in October 1919," 15 November 1919.

[107] USNA 59/867.00/1036/1717, Young (Damascus) to Wallace (Constantinople), 5 December 1919; FO 371/4186/162128/495, Telegram from acting Spanish consul (Damascus), forwarded by Spanish ambassador (London) to Curzon, 11 December 1919; USNA 867.00/1045/1825, Young (Damscus) to Secretary of State, 13 December 1919; *The Near East*, 8 April 1920, 495; FO 371/5037/E8350/4, "Note by Miss G. L. Bell C.B.E.," 29 May 1920; Howard N. Sachar, *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East: 1914—1924*, 274.

[108] AD 2344/c1/août-décembre 1919/362, Cousse to HC, 21 November 1919; *al-Kawkab*, 27 January 1920, 11.

[109] USNA Aleppo Consulate RG84/121/800, J.B. Jackson to Adm. Mark Bristol (Constantinople), 9 February 1920; *The Near East*, 18 March 1920, 390; IO MSS Eur F152 (Frank Lugard Brayne

Mss.）/20，495；F.B. Hanano（YMCA，Aleppo）to Brayne（？），21 March 1920；*The Near East*，18 March 1920，495；FO 371/5076/E8007/74—79，"Note by Miss G.L. Bell-May 22，1920."

［110］ FO 371/4163/14536/ 74070，DMI to GHQ，17 January 1919.

［111］ 根据报告，1919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20 日期间，大约有 61 000 名亚美尼亚人从阿勒颇被遣返。在此期间，有 74 000 名亚美尼亚人从叙利亚和土耳其南部被遣返，另有 72 000 人等待重新安置。USNA Aleppo Consulate RG 84/vol. 112/840.1/395，23 August 1919.

［112］ FO 371/3058/137867，"Internal Conditions，" 11 May 1917；WO 95/4372/C374，Sykes to OGS，22 November 1918；FO 371/4143/32104/EA2135，GOC to WO，22 January 1919；FO 371/4143/32104/EA 2135，GOC to WO，22 January 1919；FO 371/4143/724011，Clayton to FO，9 May 1919；FO 371/4143/104019，General Sir Walter Lawrence to Commander in Chief（Egypt），13 May 1919；DU SA/493/6/46，Shuqayr to Faysal，20 March 1920. 在阿勒颇，一家英国人经营的施食处每天向 1 500 名亚美尼亚人发放食物，该市有 8 000 多名亚美尼亚人得到了其他形式的援助。此外，英国人开办的一家孤儿院收容了将近 2 000 名亚美尼亚儿童，有 4 000 多名亚美尼亚人住在营房里。参见 Paul Monroe et al.，R*econstruction in the near East*。

［113］ 参见 FO 371/4178/7094/264—268，Hogarth to Chief Political Officer，EEF，18 December 1918；FO 371/4214/103277/3814，Telegram from Baghdad to IO，26 June 1919；FO 371/4181/99833/512578，Col. French to WO，7 July 1919；*The Near East*，12 February 1920，210；*The Near East*，19 February 1920，244；AD 2209/dossier：Bagdad jusqu'au 31 décembre 1920/47，Roux to GCC，28 February 1920；FO 371/5034/E2539/18，British Consul General（Beirut）to Secretary of State，17 March 1920；AD 2348/C15As/d1/9，Hussein Moudir（Meskine）to directeur general des télégraphes，13 May 1920；AD 2348/c15as/d1/781，Gouverneur d'Alep to min. intérieur，Damas，12 May 1920；IO L/PS/10/802/P5172/3—4，French report for the period May 25—31；FO 371/5188/E6197，Arabic Press Extracts for Week Ended May 31 1920；MD 4H114/4/491，Cousse to Gouraud，3 June 1920；MD 4H58/2，"Rapport hebdomadaire 433/2：29 Juin à Juillet"。

［114］ AD 2380/5/21/184，Rouchdi（cdt. de la 3ème div.）to cdt. de la 3ème brigade de cavalerie（Alep），25 October 1919；AD 2330/A1a，Gouraud to Faysal，"Memorandum des principaux faits relevés depuis l'arrive du general H. C. jusqu'à ce jour，" 13 January 1920；FO 371/5035/5661/194—195，Faysal to Lloyd George，1 June 1920；FO 371/5036/E7772/808，Shahbandar to Col. Easton（British liaison，Damascus），5 June 1920. AD 2344/c1/août-décembre，1919/149—150—151，17 November 1919；FO 371/5035/E%690/35，Wratilaw to Secretary of State，13 May 1920.

［115］ *al-'Āsima*，16 June 1919，1—2；*al-Kawkab*，4 November 1919，10；*al-'Āsima*，3 May 1920，5—6.

［116］ *The Near East*，8 April 1920，495；MD 4H112/2b/23，"Renseignements，" 29 April 1920；Russell，*First Mordern Arab State*，142—143；Kasmieh，*al-Hukūma al-'arabiyya fī Dimashq*，231.

［117］ WO 106/189/30629/EA2269，GHQ to WO，3 March 1919；AD 2342，"Rapport sur les troubles survenus le 28 février 1919 à Alep，" 14 April 1919；MD 4H112，"Compte rendu du capitaine Gautherot sur la situation politique à Alep，" 6 May 1920；FO 371/4143/104019，General Sir Walter Lawrence to Commander in Chief（Eqypt），13 May 1919；*Arab Bulletin*，89（14 May 1918）：168—169；Kurd 'Alī，*Khitat al-Shām*，3：163—165；Ghazzī，*Nahr al-dhahan fī tārīkh Halab*，716—718；Monroe，*Reconstruction in the Near East*，12—13，34—35.

［118］ *al-'Āsima*，25 December 1919，3；*al-'Āsima*，19 April 1920，4；*al-'Āsima*，20 May 1920，1—2；*al-'Āsima*，24 May 1920，1—2；MD 4H58/2，"Rapport hebdomadaire：6 au 12 Juillet［1920］."

［119］ *al-Kawkab*，6 January 1920，10；MD 4H114/2/38，Cousse to Gouraud，18 January 1920.

[120] *Sūriyya al-jadīda*, 27 December 1919, 2; AD 2375/chemise: division de la Syrie, 1919—1920/349/2, Lamothe to GCC (telephone message), 6 January 1920; AD 2375/chemise: division de la Syrie, 1919—1920/355/2, Arlabosse to GCC, 9 January 1920; *al-Difā'*, 13 January 1920, 2; WO 106/195/1845s, GHQ to DMI, 9 March 1920; WO 106/196, "GHQ Intelligence Survey," 15 May 1920; AD 2374/1032, "Rapport," 18 May 1920; AD 2358/dossier: renseignements politiques/444, Cousse to HC, 24 May 1920; IO L/PS/10/802/P5172, "French Report for the period May 25—31 [1920]"; MD 4H114/4/478, Cousse to Gouraud, 3 June 1920; MD 4H58/1, "Rapport hebdomadaire: 1 au 7 juin [1920]"; AD 2374/dossier: TEO zone oust: adm., cabinet polituque/1193/CP. "Zone est: situation Générale," 15 June 1920.

[121] Dāghir, *Mudhakkarāt*, 122.

第一部分

费萨尔时期叙利亚的政治组织结构

第一章　从“爱国主义风潮”到大众政治的出现

正如在导言中所讨论的，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的经济和行政转型，尽管在分布和效果方面存在不均衡，但是引起了帝国大量居民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相关转变。这一转变的三个方面对理解叙利亚民族主义和大众政治的出现及演变路径尤为重要。首先，正如上文提到的，随着国家承担起新的职能，与独立于国家以外的各种制度争夺之前不属于国家控制的职能，这使得国家正式政治的领域扩大了。由于这一进程，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被国家或者其反对者动员起来，并通过新的媒体渠道获得信息（城市空间集中度的扩大、城市空间的重组及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引入确保了新的媒体渠道的效率），民众开始对越来越多的公共问题提出质疑。

与此同时，奥斯曼经济一体化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及行政革新的结构效应对帝国的文化凝聚力产生了双重影响。在最为抽象的意义上，经济活动的一体化、城市发展、政府干预的加强和现代公共领域的扩大导致文化规范和实践的标准化加速，大部分奥斯曼人口受到市场和国家力量的平衡。这种标准化扩大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民族主义的“文化体系”（“cultural system” of nationalism）领域。[1] 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标准化伴随着一个看似相反的过程：因为奥斯曼社会转型在分布和影响上是不均衡的，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作用方式存在差异，

所以实际上它将那些成功驾驭新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人置于那些没有成功驾驭的人的对立面。其结果是，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文化像其他帝国和欧洲外围的殖民地文化一样，分化成独立和日益不同的亚文化，表达着对社会经济变迁的不同回应。正如下文所述，这些亚文化中的每一支都通过制度本能地进行自我建构，并通过那些反映其对社会合理和诚实的安排的认知的范式活动来进行自我展示。

与此同时，经济、行政和环境的转变使许多叙利亚人的权力关系发生偶然性重构成为可能。更为明显的是，在叙利亚人的需要和关切超越或过度损耗严格限定的和纵向的个人依赖关系的时期，上述转变使权力关系沿着横向、协同、民族的方向重建成为可能。

这类时期中的一个始于 1919 年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影响，叙利亚大部分城市人口生活在不安之中，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利用（也因此削弱了）传统显贵及连接他们和城市大众的习惯性联系之外的渠道部分地动员了他们，开始面对新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由于无法缓解许多叙利亚人经历的混乱，传统的裙带关系变得越来越无用。在接下来的 8 个月里，大量叙利亚民众利用了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即人民委员会，它前所未有地扩大和制度化了横向、协同和民族的联系。由于失去了社会和象征资本，一些城市和农村的知名领袖也同样利用这一组织，在此过程中，他们掩盖这些人民委员会的革命性质，通过它们的结构和方案来展现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合法性架构。

人民委员会填补了无论是阿拉伯政府还是相关民族主义组织，诸如法塔特（或称阿拉伯青年协会，al-Fatat）和阿拉伯俱乐部（Arab Club），都没能填补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空隙。探索部分民族主义组织的无能和人民委员会所具有的创新特性背后的原因是本章及之后章节的主题。

“爱国主义风潮”

至今，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它产生的必要前提条件上。尽管民族主义在大众中的出现需要与“经典现代性”（classic modernity）相关的结构和关系的扩散，但是这并不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充要条件。民族主义需要民族运动，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民族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

阿拉伯中东的精英民族主义所遵循的演变道路并非该地区独有。相反，这一时刻发生的演变路径与之前那些米洛斯拉夫·赫罗赫（Miroslav Horch）研究的“前民族主义”（prenationalist）学者及其“爱国主义”继承者们相似，赫罗赫定义并阐述了欧洲“小民族”中的民族主义。根据赫罗赫所说，这些后来出现的（欧洲背景下的）民族，例如挪威人、弗兰芒人和波希米亚人，可能与较早出现的欧洲民族有所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于独立的门槛，即存在一个不完整的社会结构”。换言之，不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因为这些民族一直是附属民族，“他们部分或完全地缺少‘他们自己’的统治阶层，有时其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代表也具有非典型性”。[2]

赫罗赫将他所研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组织结构、目标支持者和具有特色的核心领导。在赫罗赫的模型中，最初的两个阶段与了解这些组织的起源和实践有关，本章将对其进行讨论。第一阶段，也就是 A 阶段，事实上是在民族主义运动前出现的阶段。赫罗赫将这一阶段称为文化复兴时期，“以一部分个人群体，通常是知识分子，对研究被压迫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热情关切为特征”。[3]在阿拉伯中东地区，这一阶段对应的是 19 世纪晚期纳达（nahda）运动

和萨拉菲（salafiyya）运动中的文学创作者和学者，他们的作品脱离了大多数民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没能觉察到他们所做研究的潜在政治影响。

赫罗赫这样描述 B 阶段：

> 一个以积极爱国主义风潮为特征的时代：民族意识发酵的过程……这一时期民族主义风潮的驱动力是一群爱国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对当地古迹、语言和文化范围的研究，将自己的使命视为传播民族文化。

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Muhammad 'Izzat Darwaza）既是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早期成员，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将阿拉伯的历史划分为类似于赫罗赫所描述的几个阶段，阿拉伯中东的 B 阶段约在 1908 年至 1915 年之间。从 1908 年到 1911 年，“开明的（阿拉伯）青年”将他们的注意力聚焦在地方问题上，例如废除在帝国的阿拉伯各省强制正式使用土耳其语的法律，扩大官僚中叙利亚人的比例，以及阿拉伯 / 奥斯曼认同的重构。据达尔瓦扎称，在接下来的 4 年中，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开始面临范围更广的问题，因此开始出现代际划分。一方面，达尔瓦扎声称“年龄较大”的群体更喜欢通过公共社团开展工作，例如奥斯曼行政权力下放党（Ottoman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Party），认为这样做可以吸引更广泛的群体。但是，这一策略最终失败了：尽管该政党组织志同道合的积极分子于 1913 年在巴黎召开了会议，要求在伊斯坦布尔统治奥斯曼帝国的联合与进步委员会进行改革，但是最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背弃了自己的改革承诺。结果，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平衡倒向了更为年轻和急躁的一代。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像他们的学者前辈一样，

通过法塔特和阿赫德（al-‘Ahd）这样的秘密社团将自己与广大群众隔离开来。[4]

尽管这些秘密社团的成员始终面临着被镇压的威胁，但是这并不是他们决定脱离和广大同胞联系的唯一原因。艾哈迈德·卡德里（Ahmad Qadri）是法塔特的创始成员之一，他的背景与达尔瓦扎相似，他在回忆录中抱怨道，他的同胞是组织民族主义的主要障碍。卡德里将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的潜在支持者分为三类：商人，“从政治和改革的角度看，他们是无关紧要的”；受过教育的阶层，“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并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以及军官、官僚、退休雇员和求职者。与前两类一样，最后一类也是无法组织的：根据卡德里的说法，军官完全没有政治经验，倾向于回避政治；退休雇员“像老太太一样，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满足，也没有什么工作能吸引他们”，在职官僚和求职者是希望保留住职位和获得职位。至于来自阿拉伯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卡德里认为叙利亚和伊拉克人屈服的时间太久了，除了“乞求和听天由命”之外，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的组织需要额外的努力，因为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还要避免“切断其组织者和文明之间的联系”。

> 因此，目前看来，在首都没有一个我们可以依靠或可以建立联系的阿拉伯人，除非是“某某人”；“某某人”说你渴求的兄弟将会到来，这是根本不存在的妄想。[5]

对卡德里和他的同事来说，民族主义风潮过去是、将来也继续是一个紧密、专业和自我认定的精英阶层的职权，他们拥有独特而统一的社会和文化经验。这种经验判断不仅使精英阶层成员区别于他们冷漠的同事，也区别于更为蒙昧的大众。

费萨尔时期叙利亚的法塔特：大众政治时代的阴谋家

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法塔特成立于 1909 年或 1911 年，是由一群在巴黎学习的阿拉伯学生组建的，不久之后，他们将总部迁至贝鲁特。[6] 虽然在组织规模上，1911 年至 1918 年间的成员还不足 70 人，但是它却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注意，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该组织的成员就像许多联合团体一样，主要是学者、记者和专业人士，这些人创作了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回忆录、社论和地方史。欧内斯特·唐分析了 1914 年前阿拉伯运动的构成，其中 67% 的法塔特和阿赫德成员及没有联合起来的“公开民族主义者”（overt nationalists）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 17% 的人接受过“西方教育”。此外，5% 为学者，11% 为记者，22% 为专业人员，30% 为军官。因为阿赫德的成员仅限于军队成员，所以很可能绝大多数被称为学者、记者和专业人士的人不是属于法塔特就是无组织的。[7]

法塔特之所以受到历史学家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该组织在早期经常作出的幸运的战术选择。法塔特不仅是第一个在战前呼吁阿拉伯省份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的阿拉伯主义组织，而且从 1916 年起，该组织将自己的命运和哈希姆家族和阿拉伯起义联结在了一起。因此，该组织的许多成员要么留在了叙利亚，要么在战争期间加入了阿拉伯军队或汉志朝廷，确保在战后叙利亚的阿拉伯行政部门任职。随着埃米尔费萨尔和阿拉伯起义的传奇在战后不断扩展，关于法塔特的神话也得到了扩展。甚至在安东尼厄斯断言“在民族运动史中，没有其他社团像法塔特那样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之前，作家们就一直认为法塔特是“最重要”或“最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组织，“在费萨尔统治大马士革的短暂时期，实际的政治控制权”掌握在他们手中。[8]

这样的断言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断言边缘化或忽视了参与“爱国主义风潮”的其他组织的影响，以及叙利亚民族主义演进过程中的其他路径。其中一条路径将生活在埃及的叙利亚人在战争时期组建的叙利亚联盟（al-ittihad al-suri）的自主活动与人民委员会联系起来，该委员会从1919年秋开始主导叙利亚的政治活动，第三章将对这种路径进行更详细的讨论。[9] 第二，聚焦在法塔特角色的叙事未能考虑到奥斯曼帝国后期以及后奥斯曼初期政治性质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政治影响力从自封的“文化人”（穆塔纳维尔）、地下“爱国主义风潮”专门组织结构或幕后操纵转移到以大众为基础的组织中。

尽管早期就呼吁阿拉伯独立，但是法塔特始终回避阐明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愿景。[10] 例如，即使决定与哈希姆领导的起义结盟，这也更多是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大马士革家族间政治的异常举动，而不是将叙利亚人与麦加人联系在一起的趋同的意识形态。[11] 1915年，埃米尔费萨尔第一次与法塔特建立联系是在大马士革巴克里（Bakri）家族的家中。尽管在城中的显贵家族里，巴克里家族属于新贵，但是他们在19世纪末与阿比德（Abid）家族组建了联盟，并且开始在地方政治中与更为老牌的阿兹姆家族（‘Azms）和尤素夫家族（Yusufs）进行竞争。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Sultan ‘Abd al-Hamid II）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争夺奥斯曼帝国控制权的时期，阿比德家族支持苏丹，而阿兹姆和尤素夫家族支持后者。谢里夫侯赛因出于对联合与进步委员会（C.U.P）集权政策的恐惧站在了委员会的对立面，随后他与朝圣指挥官（commander of the pilgrimage）阿卜杜勒·拉赫曼·尤素夫（‘Abd al-Rahman al-Yusuf）决裂，寻求同巴克里建立友谊，通过任命法兹·巴克里（Fawzi al-Bakri）为自己的私人保镖来巩固他们的联盟。法兹和他的兄弟纳西布（Nasib）、萨米（Sami）一样，是法塔特的早期成员。三个人在战争结束后都得到了谢里夫军的赦免。[12]

当然，巴克里兄弟并不是唯一因与哈希姆联盟在战后获得利益的法塔特成员，巴克里兄弟和他们同事的好运气也没有逃脱雄心勃勃的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的注意。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于 1918 年 9 月 /10 月在叙利亚被铲除，一个人想要获得政治权力、工作机会和政府资金取决于其与法塔特成员的关系或是否隶属于该组织，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因而大马士革人和最近来到首都的人都寻求加入这一组织。结果，随着以前管理招募工作的严格规则被废除，法塔特从一个秘密社团迅速转变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庇护组织。[13] 该组织的领导层不仅有权批准或者不批准一个微不足道的政府职位的竞选者任职，而且他们确保所有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人，诸如内阁级别的职位，都是自己的成员。在某些情况下，法塔特对政府职位的控制甚至导致了一些滑稽的事情出现，例如曾担任阿拉伯政府外交部部长的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Abd al-Rahman Shahbandar）在被宣布为外交部部长后匆忙宣誓加入法塔特。[14] 据达尔瓦扎所说，法塔特开始包括：

> 很多渴望获取工作的人……他们中有道德、精神、心灵和爱国情感模糊不清的人，也有机会主义者。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留守在自己的职位上，服从法国的占领。[15]

为了在应对新的情况的同时保住自己的特权，法塔特的领导人曾试图对该组织的结构进行彻底修整。起初，他们将成员分为两类，即穆阿辛佣（Mu'assiun，那些在战争结束前加入法塔特的成员）和穆赫塔萨布（Muhtasabun）或阿迪允（'aduyyun，新成员）。第一类成员每月举行会议，开展协商和批评，在必要时选出一个新的行政委员会来制定组织的总体政策，并通过其中一名特别代表将决策转达给穆赫塔萨布。[16] 尽

管其目的是保留“组织的一些尊严、重要性和秘密”，但是两级体系因法塔特领导层组建的特别委员会受到了破坏，特别委员会将一些穆赫塔萨布中的人擢升至穆阿辛佣之中。除了沙赫班达尔外，地位发生变化的人包括埃米尔费萨尔的政治顾问阿迪尔·阿勒斯兰（‘Adil Arslan）、叙利亚国民大会成员瓦斯菲·阿塔西（Wasfi al-Atasi）和苏布希·塔维勒（Subhi al-Tawil）；尤素夫·阿兹马将军、阿拉伯政府财政收入负责人穆罕默德·纳哈斯（Muhammad al-Nahhas）、叙利亚国民大会前主席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阿勒颇《阿拉伯报》编辑萨米·萨拉支（Sami al-Sarraj）、叙利亚国民大会书记赛义德·塔里阿（Sa ‘id al-Tali ‘a），以及短寿的赛义德·贾扎伊里政府的公共安全负责人阿明·塔米米（Amin al-Tamimi）。[17]

随着法塔特成员人数攀升至200多人，领导层担心那些认同脆弱和素质低下的成员会削弱组织为阿拉伯政府制定议程的能力。因此，1919年2月5日，法塔特行政委员会授权成立一个公共政党，即阿拉伯独立党（hizb al-istiqlal al-‘arabi），来吸纳新的素质较低的志愿者。根据其章程，该党将充当法塔特的公共阵线，“将阿拉伯国家提升到先进国家的水平”，并进行宣传，呼吁所有曾在奥斯曼统治下的阿拉伯领土的统一。[18]

然而，建立这一政党背后的理由存在根本的矛盾性。一方面，由于行政委员会将该党视为在叙利亚各地散播法塔特政治宣传的手段，该党的计划理应反映委员会的立场。另一方面，行政委员会认为该党是用来倾倒那些想要获得庇护但又不适合秘密组织的人的场所。因此，尽管在理论上阿拉伯独立党所有成员在加入前都要经过提名和挑选程序进行审查，但是所有法塔特成员，无论是穆阿辛佣还是穆赫塔萨布（他们被迫加入该党）都拥有提名新成员的权力。结果，许多因反对法塔特战略和目标而臭名昭著的人也加入了该党。这些人包括塔支丁·哈桑尼（Tajal-Din al-Hassani）、

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Abd al-Qadir al-Khatib）和拉希德·马勒达姆·贝克（Rashid Mardam Bek）（他们后来都加入了叙利亚爱国党［al-hizb al-watani al-suri］，这一组织主要是为了保护叙利亚本土人的政府职位）；图菲克·沙米亚（Tawfiq al-Shamiyya，后来像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一样，成为高级人民委员会的成员）；法里斯·胡里。然而，当所谓“保守主义”反对派的中流砥柱穆罕默德·法兹·阿兹姆和阿卜杜勒·拉赫曼·尤素夫要求加入时，该党的领导层产生了犹豫。在埃米尔费萨尔的建议下，这两个人被邀请加入一个没有实权的“咨询委员会”。[19]

总之，阿拉伯独立党在这一时期的叙利亚政治中发挥了极小的作用。根据一份英国的报告，埃米尔费萨尔在1919年春天从欧洲回来后就禁止该党参与任何公共活动，这证明了该党在当时极不重要。[20]特别是在金—克莱恩观察团在大马士革期间，阿拉伯政府依靠其他组织和机构进行宣传和民众动员，诸如那些阿拉伯俱乐部和忠诚的政府官员掌控的组织和机构。

然而，法塔特的困难远不止结构性问题。组织成员起初因为共同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团结在一起，因而派系政治处于潜伏状态，在战争结束后才开始出现，成员在对协约国的政策、阿拉伯国家的边界、国防、地方主义忠诚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使组织面临着分裂的问题。由于法塔特没有执行纪律的机制，因而成员们常常忽视或企图破坏他们不赞同的决定。[21]亚辛·哈希米（Yasin al-Hashimi，战争委员会主席，站在强硬军事政策一边）和阿里·里达·里卡比（'Ali Rida al-Rikabi，作为军事长官，主张对协约国采取更温和的政策）都企图利用他们作为法塔特行政委员会委员和费萨尔核心团队成员的身份将自己倾向的政治议程强加给组织。在不同时期，每个人都试图通过使行政委员会有利于自己来战胜对方。其他人组建或加

入了外部组织，这些外部组织享有更广泛的支持基础，所倡导的目标比法塔特的更为清晰明确。总的来说，在费萨尔时期，那些享有穆阿辛佣地位的法塔特行政委员会成员中有 5% 的人成为叙利亚爱国党的成员，7% 的成员成为叙利亚联盟（Syrian Union）的成员，7% 的成员成为阿赫德伊拉克分部的重要成员，8% 的成员成为国防委员会（Committee of National Defense）的成员，12% 的成员成为高级人民委员会（Higher National Committee）的成员。[22]

外部人士对法塔特内部事务的直接干涉也加剧了该组织内部的派系斗争。在大马士革阿拉伯政府成立后不久，整体上反对谢里夫军的叙利亚联盟（它的很多成员支持共和）就将其党员渗透进法塔特中，以试图影响其任命和政策。法国人也这样做了，他们的动机明显是破坏性的。[23] 阿拉伯政府和埃米尔费萨尔本人对该组织的个别成员进行游说和威逼，并通过操纵内部选举获取该组织对政府政策的支持。政府武器库中最有力的武器是财政；政府不仅对个别成员进行收买，还资助组织的日常活动。其结果是，根据阿明·赛义德（Amin Sa‘id）所说，当法国人进入大马士革时，他们在法塔特的财库中发现了 16 000 埃及镑。[24]

随着该组织内部凝聚力的瓦解，成员们放弃了在战略问题上团结的努力。达尔瓦扎报告称，法塔特在金—克莱恩观察团访问叙利亚前后分裂成了三个派系。第一个派系被称为异见者（rafidun），包括达尔瓦扎、赛义德·黑达尔（Sa‘id Haydar）、艾哈迈德·穆拉维德（Ahmad Muraywid）、拉菲克·塔米米（Rafiq al-Tamimi）、哈立德·哈基姆（Khalid al-Hakim）、卡米勒·卡萨布和易卜拉欣·卡西姆（Ibrahim al-Qasim）。这个派系的成员谴责英法双方推行《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和《贝尔福宣言》（Belfour Declaration）的计划，并拒绝支持任何一个国家作为受任国（mandatory power）。该派系的很多成员在后来加入了人民委员会。第二

个派系包括埃米尔费萨尔和他的兄弟扎伊德，以及其他那些相对于法国人更偏向英国人的人，但他们仍赞同应根据阿拉伯军的胜利对《赛克斯—皮科协定》进行修改。最后一个派系是由那些对美国成为受任国抱有希望的人组成。[25] 这一希望最后因美国不愿意承担对叙利亚的责任以及英法之间的“9 月 15 日协议”而破灭。

1920 年 1 月，费萨尔从欧洲返回叙利亚与法国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这时法塔特派系间的不和已经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为了获得该组织对《费萨尔—克列孟梭协议》的批准，埃米尔和阿里·里达·里卡比试图操纵新一届行政委员会的选举。[26] 虽然这一行为激怒了所有异见者派的人，但是没有人像高级人民委员会主席卡米勒·卡萨布那样愤怒。卡萨布指责行政委员会“懈怠”和“无视国家利益”，并断绝了高级人民委员会与法塔特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为了利用艾哈迈德·卡德里所说的“法塔特和大众民族主义构成之间的裂痕”，一群叙利亚显贵在法塔特内部和外部同时建立了叙利亚爱国党（Syrian Patrioptic Party），作为阿拉伯独立党和街头政治的替代选择。虽然叙利亚爱国党的规模仍然很小，但其对“天然边界内的叙利亚”独立国家的主张为卡萨布的人民委员会的要求增加了另一种声音。[27]

法塔特外部的同时期观察家忽视了限制组织效率以及导致在战略问题上产生令人生厌的争论、使成员间产生分歧的两个结构性缺陷。结果，他们对法塔特的实力进行了极为夸张的宣传。“受过教育的上层穆斯林……发现了他们对大量无知穆斯林所拥有的政治权力，”金—克莱恩观察团技术顾问威廉·耶鲁（William Yale）在结束叙利亚之行前写道，“正是这群人构成了阿拉伯青年党的脊骨，而且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28]。鉴于该组织的内部问题，它对幕后政治的偏好，以及对组织非“开明”大众积极参与政治的厌恶，法塔特的“实际权力”从未扩展到政府圈子以外也就不

足为奇了。在 1919 年 6 月举行的叙利亚国民大会选举中，法塔特推出的候选人代表被实力强大的“阿兹姆家族”家主、传统大马士革土地贵族领袖穆罕默德·法兹·阿兹姆推出的候选人代表彻底击败。[29] 约在同一时间，阿拉伯独立党通过的纲领的关键内容受到重挫：不仅“使叙利亚在其天然边界内完全独立”的大众要求压倒了该党支持的泛阿拉伯联盟（包括汉志）的要求，而且事态发展压倒了该党对美国或英国受托管理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撤离危机”爆发后，无论是法塔特还是阿拉伯独立党都没有支持甚至参与叙利亚首都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总而言之，随着叙利亚政治舞台的不断扩大，这两个组织在它们无法指挥或控制的政治风格下黯然失色。

阿拉伯俱乐部

阿拉伯俱乐部（al-nadi al-‘arabi）与法塔特有着共同的特征。大马士革的法塔特和阿拉伯俱乐部最初都是从人口中类似的阶层中吸收大部分主要领导和次级领导，这一阶层就是中产阶层成员和大马士革的二流显贵。[30] 此外，两个组织最初的成员不仅非常清楚他们与大多数同胞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差异使他们彼此之间割裂，而且他们接触阿拉伯政府的特权加强了他们对政治就是阴谋和操纵的看法。正如上文中所讨论的那样，法塔特的穆阿辛佣试图通过给自己赋予角色来使自己与穆赫塔萨布及大众阿拉伯独立党的成员相区别。同样，阿拉伯俱乐部的目标是让社会中的“开明”分子（自封的穆塔纳维尔）站在阿拉伯政府一边参与政治。俱乐部领导人将政治

视为少数精英将价值、目标及其支持的制度强加给落后和被动的大众的手段。阿拉伯俱乐部根据其对叙利亚人民的二分看法设计它的活动：举办茶话会和招待会，只邀请当地的穆塔维纳尔及他们的客人参加；策划了“促进民族进步”的演讲；赞助具有教育意义的喜剧作品，向大众灌输“民族主义价值观”；发起请愿活动和集会游行示威，向叙利亚人和外国观察员展示真正的“民族意志”。

另外，由于其混合结构，阿拉伯俱乐部可以被视为连接以法塔特为代表的早期密谋形式的民族主义组织和人民委员会的过渡一环。从许多方面看，阿拉伯俱乐部与阿拉伯独立党更相似，而不像法塔特。阿拉伯俱乐部和阿拉伯独立党有着相似的结构，并遵循一个由政治活动家组成的秘密团体的规定；两者都鼓励甚至有时要求大众参与他们的活动。[31] 此外，不仅阿拉伯俱乐部与阿拉伯政府之间的关系与阿拉伯独立党和法塔特之间的关系相同，而且它的职能，包括宣传产生它的机构的价值、定义并划分大众在政府和政治中的直接参与，都类似于阿拉伯独立党。因此，由于阿拉伯俱乐部的部分目的是扮演精英民族主义领袖和公众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所以像阿拉伯独立党那样，它开始吸收英国观察家所说的“叙利亚所有的愣头青”。[32]

一些现在寻求参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愣头青”的背景与战前加入封闭秘密社团的人相似。他们要么不愿意参与，要么因年轻或恐惧而裹足不前，直到阿拉伯政府成立后才参与政治活动。另一些人则来自以前在民族主义政治中不起作用的社会阶层。这两类政治新手都尝试在动员技巧上进行创新，例如在咖啡馆和其他当地场所部署机动小队，以及在以社区为基础的民兵组织中进行宣传。因此，阿拉伯俱乐部分会在叙利亚各地的扩散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使民族主义领导队伍变得开放，扩大了有组织的民族主义政治的民众基础。

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俱乐部

阿拉伯俱乐部最初是模仿另一个文化改革主义组织文学协会（al-muntada al-adabi）建立的。文学协会从 1909 年到 1915 年一直活跃在伊斯坦布尔，达尔瓦扎称其为战前时期“阿拉伯主义运动及其寄托最重要的表现之一”。[33] 协会的第一批成员是流亡的阿拉伯学生，他们创建该组织是为了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并讨论文化和历史问题。创始人包括阿卜杜勒·卡利姆·哈利勒（‘Abd al-Karim al-Kalil，经常被称为该协会的首席设计师）、拉菲克·里兹格·萨鲁姆（Rafiq Rizq Sallum）和阿卜杜勒·哈米德·扎赫拉维（‘Abd al-Hamid al-Zhrawi，来自霍姆斯）、贾米尔·侯赛尼（Jamil al-Husayni，来自耶路撒冷）、伊斯玛·巴西苏（‘Isma Basisu，来自加沙）、尤素夫·黑达尔（Yusuf Haydar，来自巴勒贝克）、伊扎特·阿兹马（‘Izzat al-‘Azma，来自巴格达），以及舒克里·阿萨里（Shukri al-‘Asali，来自大马士革）。此后，塔比特·阿卜杜勒·努尔（Thabit ‘Abd al-Nur）、阿里·阿齐兹（‘Ali ‘Aziz）、阿迪尔·阿勒斯兰（‘Adil Arslan）、贾法尔·阿斯卡里（Ja ‘far al-‘Askari）、图菲克·比萨特（Tawfiq al-Bisat）、阿卜杜拉·达姆鲁支（‘Abdallah al-Damluji）、哈立德·哈基姆、赛义德·黑达尔、阿卜杜勒·瓦哈卜·因克里兹（‘Abd al-Wahhab al-Inklizi）、萨利姆·贾扎伊里（Salim al-Jaza’iri）、赛义夫丁·哈提卜（Sayf al-Din al-Khatib）、尤素夫·穆哈伊巴尔·苏莱曼（Yusuf Mukhaybar Sulayman）、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Abd al-Rahman Shahbandar）、拉马丹·沙拉什（Ramadan Shallash）、纳吉布·舒贾伊尔（Najib Shuqayr）、舒克里·古瓦特里（Shukri al-Quwwatli）、鲁什迪·沙马（Rushdi Al-Sham ‘a）和阿里夫·什哈比（‘Arif al-Shihabi）加入协会。文学协会举办会议和讲座，参加

者包括出席奥斯曼议会的阿拉伯代表、学生、政客和官僚，并且以自己的名义出版杂志。[34]

起初，文学协会的成员回避民族主义政治。事实上，该组织的创始人兼第一任主席阿卜杜勒·卡利姆·哈利勒以及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他一同返回大马士革的几名同事，曾一度是臭名昭著的叙利亚总督贾迈勒帕夏（Jamal Pasha，外号“屠夫”[al-saffah]）的支持者和亲信。根据阿萨德·达吉尔所说，正是通过哈利勒，贾迈勒帕夏第一次知道了阿拉伯运动的存在，随后他试图铲除这个运动。[35]但是，随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对阿拉伯运动的态度在战争前夕变得强硬，协会成员不得不卷入政治争论。即使在那时，该组织的政治姿态也与法塔特不同，许多社会参与者反对阿拉伯独立运动，认为这将削弱奥斯曼帝国并使其遭受欧洲侵略，他们成为温和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代言人。[36]达吉尔在回忆录中回顾了该组织内部争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内容如下：

图菲克·比萨特	我们想要一个伊斯兰联邦吗？我们为什么试图传播阿拉伯主义的思想？
阿卜杜勒·卡利姆·哈利勒	相对于增强我们的实力，伊斯兰联邦的理念更多地将削弱我们。拒绝西方并不能为东方提供力量。
贾拉勒·布哈里（Jalal al-Bukhari）	怎么能调和我们对伊斯兰主义的拥抱和日益对哈里发国家的反对？

除了它们之间的差别，文学协会和法塔特享有共同的成员。尽管文学协会一直在伊斯坦布尔，而法塔特在巴黎，但是后来法塔特吸纳了诸如赛

义夫丁·哈提卜、尤素夫·穆哈伊巴尔·苏莱曼和拉菲克·里兹格·萨鲁姆这些文学协会的成员担任两个组织之间的中间人。[37]

对于后续事件更为重要的不是文学协会与法塔特之间的联系，而是它与英国人之间的联系，以及通过英国人与阿拉伯起义建立的联系。1916年10月，英国阿拉伯事务局开始资助一家设在埃及的报纸《地球报》(*al-Kawkab*)，以推动该协会（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俱乐部）在脱离奥斯曼统治、随后被英国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的活动。英国阿拉伯主义者背后的动机似乎是双重的。首先，阿拉伯事务局的成员试图利用《地球报》传播“温和的”、亲英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寻求与西方的妥协，而不是排斥西方。其次，该事务局致力于推广在文学协会成员中流传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学说。这些学说告知了《地球报》应该采用的编辑政策，不仅与阿拉伯事务局支持的民族主义相一致，而且将这一民族主义置于一个更为全面的概念框架之中。此外，阿拉伯事务局的成员相信，通过支持伊斯兰现代主义，他们可以安抚两类不同的批评者。一方面，事务局希望消除传统者的疑虑，他们认为阿拉伯起义不过是西方针对伊斯兰教特别是哈里发的阴谋。另一方面，事务局需要平息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的恐惧，因为他们厌恶麦加谢里夫的政治，认为这一政治建立在对伊斯兰法律的保守解释之上，并不适合黎凡特。[38]

英国首先任命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和谢赫穆罕默德·贾尔吉里（Shaykh Muhammad al-Qalqili）作为《地球报》的编辑。沙赫班达尔博士毕业于贝鲁特美国大学，是叙利亚联盟的成员，也是著名的1918年6月《七人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Seven）签名人之一，这份文件由在埃及流亡的叙利亚人提交给英国政府，要求澄清英国战争的目的。[39]沙赫班达尔也与英国阿拉伯事务局局长戴维·霍加思（David Hogarth）关系密切，后来担任费萨尔与英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和沙赫班达尔一样，谢赫贾尔

吉里在埃及经历了战争，并且与叙利亚联盟关系密切，在战争前夕代表联盟秘密前往贝鲁特。[40]

1971 年 1 月，英国入侵巴勒斯坦南部。随着英国军队向北行进，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即通过费萨尔和法塔特）资助了仿照文学协会成立的政治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后成为该地区阿拉伯俱乐部分支机构的核心。与此同时，他们招募了巴勒斯坦难民营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后来在阿拉伯俱乐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经常在阿拉伯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包括来自图勒凯尔姆（Tulkarm）的萨利姆·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只·易卜拉欣（Salim ‘Abd al-Rahman al-Hajj Ibrahim）后来领导了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俱乐部；来自纳布卢斯（Nablus）的穆罕默德·阿里·贝伊·塔米米（Muhammad ‘Ali Bey al-Tamimi）成为费萨尔时期大马士革的总警察长；来自采法特（Safed）的苏布希·哈德拉（Subhi al-Khadra）成为费萨尔时期的宪兵总长；以及来自纳布卢斯的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41]

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俱乐部在谢里夫军进入城市不久后成立，其目的是帮助新来的人融入首都，并且开展支持谢里夫和民族主义的宣传活动。[42] 尽管军事长官阿里·里达·里卡比成为该组织名义上的领袖，但是该组织的日常事务由会长和执行委员会进行管理。对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最为杰出的 24 名成员（俱乐部的创立者和 1919 年 2 月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的背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产生秘密社团主导人物的环境相似。[43] 其中包括叙利亚一些最显赫的家族代表，包括阿兹姆家族、穆阿亚德家族（the Mu’ayyads）和马勒达姆·贝克家族的代表，也包括诸如欧麦尔·沙奇尔（‘Umar Shakir，工程师）、穆罕默德·阿里·塔米米（律师）、塔比特·阿卜杜勒·努里（纯文学作者）、哈耶尔丁·兹利可里（Khayr al-Din al-Zirikli，诗人和记者）、图菲克·纳图尔（Tawfiq al-Natur，律师和报纸编辑）和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这样

的专业人士。

埃米尔费萨尔亲自选定了该组织的第一任主席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扎法尔（Shaykh ‘Abd al-Qadir al-Muzaffar）。穆扎法尔曾是驻扎在纳布卢斯和巴尔卡的奥斯曼第八军团的穆夫提。在战争的最后几日，军队指挥官贾迈勒·帕夏·梅西尔尼（al-Mersini）被任命为叙利亚最后一任奥斯曼总督。穆扎法尔随他前往大马士革。[44] 虽然他被任命为阿拉伯俱乐部主席是因为他是一个受欢迎的海推布（khatib），但是穆扎法尔作为民族主义分子和知识分子的资历却很薄弱。根据后来英国的评估，

> 他是来自耶路撒冷、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支持阿拉伯主义的宣传者。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他鼓吹反对英国人和谢里夫，但现在却诅咒土耳其人，赞美谢里夫。他是阿拉伯独立党中大量无原则的趋炎附势者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45]

然而，穆扎法尔并不是阿拉伯俱乐部中唯一一位相对较晚进入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的领导人。例如，在该俱乐部执行委员会的 15 名成员中，只有 5 人曾是法塔特或任何其他战前民族主义团体的成员，这 5 人分别是易卜拉欣·哈希姆、法兹·巴克里、纳西布·巴克里、莫因·马迪和艾哈迈德·穆拉维德。此外，其他 4 人——阿兹姆、尤素夫·黑达尔、里达·马尔达姆·贝克和海伊尔丁·兹利克里（Khaye al-Din al-Zirikli）——只是在谢里夫军占领大马士革后才加入法塔特。督导俱乐部日常活动的许多领导人都是政治新手，这影响了阿拉伯俱乐部的效率：政治和个人争吵造成领导层的分裂，这种分裂扩散至组织的普通成员中间，其中部分原因是领导层缺乏展开政治和行政活动的经验，以及由于不断遭到迫害的威胁而缺乏凝聚力。

英国和阿拉伯政府希望阿拉伯俱乐部可以凌驾于政治之上。事实上，一个写着“禁止讨论政治”的标示最初张贴在阿拉伯俱乐部大楼的墙上。但是，这样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我们可以想象 1920 年 1 月埃米尔费萨尔在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的愤怒，他提请人们注意标示已经被移除。[46] 毕竟，阿拉伯俱乐部最初建立是为了宣传阿拉伯主义背后的价值，进而宣传阿拉伯政府是阿拉伯主义的化身。因此，不仅政府官员参加了阿拉伯俱乐部（反之亦然），而且一直到费萨尔时期，政府都直接和间接地继续资助俱乐部的活动，正如赛义德·舒贾伊尔保存的记录所证明的那样。[47] 作为交换，阿拉伯俱乐部与阿拉伯政府分别承担提供某些公共服务的责任，这些服务通常由国家独家控制，例如组建一支与地方政府官员和各社区领导人直接联络的大马士革辅助警察部队，并且对工匠行会和教育业进行整顿。[48] 此外，阿拉伯俱乐部在为阿拉伯政府组织请愿活动和示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活动是为了向大马士革和巴黎的协约国代表展示叙利亚人民的团结、对埃米尔费萨尔和阿拉伯政府的信任，以及叙利亚对于独立的适应能力。

阿拉伯政府在后奥斯曼时代的叙利亚政治权力斗争中并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相反，它只是几个竞争者中的一个，这使得阿拉伯俱乐部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计划被削弱。此外，由于界定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质的竞争与争夺政治权威的斗争同时进行，有关西式的进步、阿拉伯文化的本质和阿拉伯统一的基础、三大一神教的共同根源，以及可以从个人经济倡议获得利益的讨论和讲座，几乎都没有规范的内涵。事实上，它们代表了费萨尔时期政治辩论的本质。因此，阿拉伯俱乐部远远没有成为“民族”的代言人，它必然会卷入每一个争端之中，这些争端不仅导致民族主义者与非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裂，而且也分裂了那些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

1918 年 12 月中旬，在费萨尔在欧洲期间，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举

行了一系列会议，试图形成一个政治纲领。根据法国的资料，这些会议的参会者包括大约30名穆斯林和5名基督徒，其中包括阿迪尔·阿尔斯兰、萨米·阿兹姆、穆罕默德·塔米米、萨姆·马尔丹·贝克、纳吉·贝伊·苏韦迪、赛义德·黑达尔、阿萨德·黑达尔、伊斯玛仪·什哈比、阿明·贝伊·哈希姆、拉希德·塔利亚（Rasid al-Tali'a）、舒克里·库瓦特里、沙吉尔·汉巴里、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扎法尔、纳西布·巴克里、法里斯·胡里、尼古拉斯·沙古里、哈利勒·马图克、伊扎特·沙维和尤素夫·沙巴。他们的讨论非常激烈。马图克和沙维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反对将叙利亚与谢里夫侯赛因或汉志联系在一起，并主张由法国来保护叙利亚。[49] 穆扎法尔和苏韦迪作为另一方提出了由英国单独保障叙利亚独立的方案。虽然苏韦迪是伊拉克人，但他寻求建立一个泛阿拉伯国家，这个国家将包括伊拉克和谢里夫侯赛因统治下的汉志，巴克里寻求将所有宗教问题置于一边，敦促俱乐部在其天然边界内（例如，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部分地区）组建独立的叙利亚。

总而言之，尽管阿拉伯俱乐部的领导人有着共同的世界观和对未来的展望，但他们一开始就在政治战略的具体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同时也在未来阿拉伯或叙利亚国家的边界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因此，虽然一些人支持建立一个广泛的阿拉伯联邦，将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和谢里夫侯赛因统治下的阿拉伯半岛，而另一些人则坚持建立从汉志和其他阿拉伯地区完全分离出来的叙利亚。虽然前一群体的成员保证他们不会支持在伊斯兰教法下建立阿拉伯哈里发国，但据称他们在其他问题上仍在继续讨价还价，这些问题包括：边界；叙利亚走向独立上应该由英国、法国还是四个协约国（英、法、美、意）的意志引导实现；被选中的西方国家是只提供技术援助，还是会被允许承担更具干涉性的监督作用。[50]

阿拉伯俱乐部中的唇枪舌剑愈演愈烈，但是那些被政府和外国观察家

视为“极端分子”[51]的人在竭力谋取对该组织的政策和策略的控制。一些起义成员非正式地联合在一起，破坏了阿拉伯俱乐部的活动。例如，1919年3月，由阿拉伯俱乐部执行委员会成员萨德丁·穆阿亚德（Sa ‘ad al-Din al-Mu’ ayyad）和法里斯·胡里的弟弟法伊兹·胡里领导的“阿拉伯俱乐部中的一半年轻人”破坏了由阿里·里达·里卡比和埃米尔扎伊德主办的为以色列联盟（Alliance israélite）筹款的活动，据一份法国报告称，该组织打断了

> 他们判定不符合他们合理原则的聚会……事件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但它表明了事态的发展，一个小团体正在一点一点地接管俱乐部，并打算把叙利亚事务引向他们喜欢的方向发展……[52]

然而，阿拉伯俱乐部中持不同政见的成员的争论并不是仅局限在非公开的会议活动中。由于阿拉伯政府推动俱乐部成为弥合政府与本地居民之间距离的工具，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委托俱乐部执行指挥和动员居民的任务，所以当俱乐部成员将他们与组织或阿拉伯政府的分歧带到大街上时，内部的裂缝穿透了俱乐部的墙壁。例如，一位阿拉伯俱乐部成员、剧作家和报纸编辑马鲁夫·阿勒纳乌特（Ma ‘ruf al-Arna’ ut）非常成功地开创了在咖啡馆间传播新闻以及“极端主义”和“反基督教”政治宣传的创新戏剧性技巧，以至于英国当局要求将他逐出大马士革，之后他又因为在阿勒颇犯下同样的罪行被逮捕。[53]

阿勒纳乌特和其他人的活动可以被视为阿拉伯政府和阿拉伯俱乐部在费萨尔统治第一年后出现的人民委员会面前丧失对政治争论和街头的控制的重要一步。虽然加入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或进行独立行动的年轻的“愣头青”们也利用了新近出现的政治化空间，但是他们带来了完全不同

的政治议程，并且越来越多地与大马士革民众建立了有机联系。松散的俱乐部成员，如里达·哈利利（Rida al-Hariri）、阿布·穆罕默德·哈桑·哈拉特（Abu Muhammad Hasan al-Kharrat，一个来自沙古尔［Shagur］区的暴徒，后来在1925年的大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54]）、舒克里·胡萨里（Shukri Khusari）、哈桑·马鲁夫（Hasan Ma ‘ruf）、迪布·赛义德（Dib Sa‘id）和他的兄弟们、阿明·特拉布尔西（Amin Trabulsi）、穆斯塔法·扎加特（Mustafa al-Zaght）和哈利勒·兹拉比里（Khalil Zirabli），在哈米迪耶（Hamidiyya）和马德哈纳特·沙赫姆（Ma’dhanat al-Shahm）集市以及在沙古尔、巴布·萨利加（Bab Sarija）和苏瓦伊加（Suwayqa）街区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55]“没有华丽的演讲、没有浮华的聚会，”一位大国观察员抱怨道：

> 相反，却有大量的私人会议……这些人号召勇敢的叙利亚人在没有保护或监督的情况下为完全独立的事业牺牲自己。随着他们的到来，关于我们的谎言越来越多。在咖啡馆里，精心排演的故事讲述者编织着独立和伊斯兰教的话题。卡拉库兹（Karakuz）自己在阿拉伯俱乐部的简单邀请下已经成为一名热忱的爱国者。[56]

因此，在埃米尔费萨尔旅居欧洲初期（他于1919年5月初返回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控制权的争夺战在阿拉伯政府的支持者和俱乐部中所谓“极端主义”的反对者间来回拉锯。在埃米尔回国后，作为英国和法国人对阿拉伯俱乐部抱怨的回应，他和他的军事顾问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一起监督俱乐部的重组。费萨尔之后在阿勒颇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解释了他的动机：

我必须重申，在（金—克莱恩）观察团离开后，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确保我们的集会是科学的和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这不会是一项不可企及的任务。而我将鼓励所有努力建立学术社团的同胞；我将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名字登记在他们中间。

你们想让我多谈谈政治，但我想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我现在说的是学习。我希望我面前的这个俱乐部成为知识的仆人和文化的源泉。这些人可能会满足地深思他们的未来。

我们必须是兄弟，不允许任何一方分裂我们或影响我们的未来。任何人受到伤害，都要耐心地忍受下来，并将所发生的事情通知负责的官员。也许有骗子想让你们互相争吵，就像过去发生的那样，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世人面前玷污我们的名声，说我们不配自治。我警示你们这些事情的后果——愿真主保佑你们，使你们听不到也看不到（这些后果）。[57]

虽然打算完全取缔该组织，但协约国和埃米尔费萨尔都对其改组感到满意。特别是英国人感觉到这个组织“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取缔它只会导致地下的、危险的阴谋”，费萨尔则担心解散俱乐部会导致一个有组织的反对党的出现。[58] 因此，埃米尔在阿拉伯俱乐部的委员会中置满了阿拉伯政府的盟友，在这个过程中，他用似乎更值得信赖的萨利姆·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只·易卜拉欣替换了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扎法尔。与穆扎法尔一样，哈只·易卜拉欣也是巴勒斯坦人，与阿拉伯俱乐部前任主席不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法塔特成员，在战争期间代表谢里夫工作。[59]

然而，俱乐部的活动和持有异见的成员有意或无意地扩大了被动员参加政治行动的叙利亚人的数量及其政治活动的范围，这使得该组织不能仅

发挥“知识的仆人、文化的源泉”的作用了。一些组织者的努力得到了改组后的阿拉伯俱乐部的领导人的支持，他们将活动的范围扩展至有控制的大众动员以外，并寻求公共舆论的支持，与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公开辩论。例如，在阿拉伯俱乐部重组后不久，执行委员会授权在大马士革全境散发亲谢里夫和亲协约国的宣传单，上面写着“剑、火和青年的热情”。其中一份有代表性的传单内容如下：

> 你们当中有一些缺乏道德的人，他们把自己的荣誉出卖给那些想把殖民主义枷锁套在我们脖子上的人。这些人散布虚假的谣言，散布流言蜚语，以争取某些势力的代表的支持，希望通过这些卑鄙的阴谋来实现他们的欲望。
>
> 他们已经宣布，并将持续宣称法国将占领叙利亚。他们通过这样做来无视自己的错误：因为高贵的法国曾与盟国一起为国家的解放和人民的独立而战，这将使他们的卑鄙行为被忽略。
>
> 对于这些寻求黄金作为奖赏的人，我们要说，英国和法国是自愿同意叙利亚独立的，这些骗子真可耻！那些无视这些谎言的同胞知道，叙利亚终将独立！
>
> 祝福那些追随真理的人。[60]

这份传单中的习语和逻辑都揭示了包括阿拉伯俱乐部的持异见成员在内的阿拉伯政府的反对者早在1919年春就开始定义并最终主导政治争论中的术语。例如，俱乐部成员哈伊尔丁·兹利克里、图菲克·穆法里支（Tawfiq al-Muffarij）和哈比卜·卡哈拉（Habib Kahala）分别担任《有益与支持者报》（*al-Mufid and al-Mu'ayyad*）、《和谐报》（*Harmun*）和《新叙利亚报》（*Suriyya al-Jadida*）的编辑，持续通过组织地下反对谢里夫的团体，诸

如“黑手”（Black Hand）和名字颇为不祥的“不可逃避的命运”（Inescaple Fate）来继续进行异见活动。在同一时期出现的海报中，有一张是谴责费萨尔在西方帝国主义面前分裂穆斯林世界。这张海报还将阿拉伯政府的懦弱与凯末尔主义者在安纳托利亚与法军作战的决心做比较：

> 那些出卖祖国的人将会遭到报应！醒来吧，叙利亚人，警惕起来！你们的祖国已经被出卖了，你们必须向那些卖国者复仇！[61]

阿拉伯俱乐部继续组织游行活动，甚至在“撤离危机”和《费萨尔—克列孟梭协议》签署之后仍通过宣传活动来推动阿拉伯政府的政策，那时政府权威持续削弱，因为它通过外交方式谋求叙利亚统一的策略破灭了，经济也崩溃了。政权权威的削弱使其盟友在阿拉伯俱乐部的穆塔纳维尔中的政治资本贬值。随着国防问题成为政治讨论中的主导问题，军事准备逻辑推动了能够进行大规模动员的大众组织的建立，以及这些大众组织越来越多地控制民族主义日程，阿拉伯俱乐部定义民族轮廓并塑造与这些轮廓相符的公共舆论的目标变得越来越渺茫。

大马士革以外的阿拉伯俱乐部

在 1918 年秋夏之交，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的未来领导层不仅巩固了阿拉伯俱乐部在整个巴勒斯坦和大马士革的分支，而且组织或鼓励在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建立新的分支。在之后一年中，阿拉伯俱乐部的组织者们在

整个叙利亚及其以外的地方建立了分会，从南部的萨勒特（al-Salt）到北部的伊斯坦布尔，那里仍然居住着叙利亚侨民。[62] 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型的和位于中心的分会组建其周围的其他分支，并维持这些分支机构的发展。大马士革俱乐部负责监督周围村庄的成员；阿勒颇的阿拉伯俱乐部在东部的富拉特（al-Furat）、巴格达和摩苏尔建立附属分会；纳布卢斯的阿拉伯俱乐部将大马士革总部的资金和指示转交给巴勒斯坦其他分支机构，包括设在耶路撒冷的规模较大的分会。[63]

阿拉伯俱乐部在整个区域内的分支机构与设在大马士革的中央机构有着联系。地方分会承认首都的阿拉伯俱乐部为它们的领袖，有时会参与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组织的区域性政治运动。尽管如此，每个大型分支机构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这使得合作充其量只是零星的。例如，在1919年春，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扎法尔代表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访问巴勒斯坦，在金—克莱恩观察团到来前说服当地阿拉伯俱乐部的领导们配合他们的证词，支持大马士革分支呼吁英国对叙利亚提供援助和技术支持。虽然埃米尔费萨尔本人支持穆扎法尔的立场，而且根据达尔瓦扎称，穆扎法尔向巴勒斯坦领导人行贿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但是当地的阿拉伯俱乐部断然拒绝了他的示好。[64]

在“撤离危机”前夕，协约国“背叛”的谣言四处传播，对社区民兵的组织正式开始，此时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也完成了重组。只有在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完成重组后，可能是为了回应大众的不安情绪，它才试图加紧对其分支机构的控制。1919年9月初，《首都报》的一篇报道宣布计划在大马士革召开一次会议，为所有的俱乐部制定通则。一个月后，来自各阿拉伯俱乐部分支机构的代表在首都举行会晤，并且同意出版名为《俱乐部》（*al-Andiya*）的杂志，以及在每一座叙利亚城市建立由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成员组成的阿拉伯俱乐部“小队”（arhat al-nadi al-‘arabi），负

责监督志愿者们采取“慈善的行为”。“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计划曾经实现过。事实上，如果阿拉伯政府和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的领导人旨在通过成立‘小队’来分散叙利亚人对军事行动的注意力，使他们转而投入道德斗争，那么他们的计划是失败的，不久之后，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自己联系了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的俱乐部”，邀请志愿者们立刻加入前线部队。[65]

因此，阿拉伯俱乐部在大马士革以外的分支机构的活动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关切和现实情况。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模式对阿拉伯俱乐部各个分会的影响或许在巴勒斯坦体现得最为突出，例如，在纳布卢斯和耶路撒冷的俱乐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巴勒斯坦以外城市的俱乐部，而且彼此之间也有很大差异。

一个相当同质的商业精英阶层，通过与黎凡特其他城市的商业联系，在纳布卢斯的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6] 因此，在职业和社会背景方面，创建并维持对该市阿拉伯俱乐部控制的个人联盟与构成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俱乐部骨干力量的中产阶级和地主社会活动家的联盟在职业和社会背景上具有相似性：哈菲兹·坎安（Hafiz Kan ‘an）是一名医生，也是法塔特的早期成员；哈只·图菲克·哈马德（al-Hajj Tawfiq Hammad）是一名地主、前奥斯曼议会的代表、当地穆斯林—基督教协会主席；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受过官僚训练，但在一生大部分时间中都是政治活动家。与之相反，耶路撒冷的精英更为孤立，更少依赖于贸易和工业，更少与更广泛的叙利亚问题相联系，而且更容易采用反映高层家族之间竞争的“显贵政治”模型所描述的组织策略。由哈只·阿明·侯赛尼（al-Hajj Amin al-Husayni）、黑勒米·侯赛尼（Hilmi al-Husayni）、易卜拉欣·侯赛尼（Ibrahim al-Husayni）、贾米尔·侯赛尼（Jamil al-Husayni）、谢赫哈桑·阿布·沙乌德（Shaykh Hasan Abu Su ‘ud，耶路撒冷沙斐仪教派的穆夫提）和

阿拉伯俱乐部的拉乌达特·马阿里夫学校（Rawdat al-Ma ‘arif School）校长谢赫穆罕默德·萨利赫（Shaykh Muhammad Salih）领导的耶路撒冷阿拉伯俱乐部几乎变成了强大的侯赛尼家族的工具。虽然纳布卢斯的组织者有意识地通过与其他民族主义政治组织，例如法塔特和穆斯林—基督教协会，建立联盟来超越对宗教和部族的忠诚，但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俱乐部仍然困在与耶路撒冷文学协会分会的争夺之中，后者由敌对的那沙希比（Nashashibi）部落所主导。[67]

极少的记述这两个阿拉伯俱乐部日常活动文献似乎可以证实这些根本差别。虽然这两个分会都鼓励举办许多相似的活动，但是纳布卢斯分会似乎更专注于如何推行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俱乐部相似的活动，例如，纳布卢斯分会组织慈善活动、讲座和公益剧场聚会，邀请当地穆塔纳维尔参加。[68] 耶路撒冷分会毫无疑问地受到在军事上的相互竞争的鼓舞，聚焦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上。据另一位英国观察家说，该分会用小型武器武装其成员，准备了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支持者的姓名和地址清单，在安曼组织效忠者，培训并任命特工搜集有关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情报，在警察和宪兵中进行渗透和宣传，以及“（教育）……儿童泛阿拉伯的理念，特别是那些在雷希迪（Residieh）和拉乌达特·马阿里夫学校的儿童们”[69]。

像对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俱乐部一样，阿拉伯政府起初鼓励甚至帮助组建首都以外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俱乐部[70]——阿勒颇的阿拉伯俱乐部。然而，在费萨尔统治的 22 个月中，对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俱乐部来说，当地情况在决定俱乐部的构成和活动方面比大马士革的指示更为重要。

导言已经讨论了阿勒颇人在战后所面临的许多困难。作为面向安纳托利亚和伊拉克腹地的商业中心，阿勒颇的经济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了严重扰乱，甚至在大马士革阿拉伯政府上台后，其商业状况仍持续

恶化。例如，在战争期间，奥斯曼军队不仅没收了商人的货物和陆路贸易所需的驮畜，而且还破坏了连接城市与外部市场的重要铁路，以防止它们落入不断推进的英阿军队（Anglo-Arab army）的手中。战后，其他铁路线路也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由于贝都因和车特（Chete，土耳其的非正规军）的掠夺，商人和旅客无法进入阿勒颇的内陆地区，商业受到影响。最后，战后时期施加的关税壁垒限制了其与土耳其、伊拉克和沿海商业重镇之间的贸易。[71]

格特鲁德·贝尔于1919年10月对伊赫桑·贾比里（Ihsan al-Jabiri）进行的一次采访揭示了阿拉伯精英在经济上的焦虑和他们的政治偏好之间的关系。贾比里是一个显赫地主家族的后裔、阿拉伯俱乐部的成员，曾任阿勒颇市市长，他体现了阿勒颇民族主义潮流中的所有内在矛盾性。一方面，他在战后作为埃米尔费萨尔的管家加入法塔特。在阿拉伯政府的授意下，他参加了“阿拉伯兄弟会委员会”（Arabian Brotherhood），该组织于1919年2月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之后成立，旨在促进族群间和谐，并以此向协约国证明，这次大屠杀是一次异常行为，不能真实地反映叙利亚的文明层次。另一方面，在敌对活动结束几个月后返回叙利亚时，贾比里不仅在奥斯曼政府任职，而且像很多从他成长的社会环境中脱离出来的阿勒颇人一样，在战后一直怀有亲土耳其（pro-Turkish）情绪。[72]在采访中，贾比里表达了对阿勒颇通往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港、巴格达铁路的未来以及提议将叙利亚从伊拉克分离对经济造成的“灾难性”影响的担忧。根据贝尔所述，“他更喜欢的解决方案是名义上土耳其对所有阿拉伯省份的宗主地位，加上英国保护下的分权式的阿拉伯行政管理，他的这一意见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响应，例如乌里玛（ulama）和阿什拉夫（ashraf）群体”[73]。法国的资料表明，贾比里对叙利亚分裂的经济后果的担忧并非个别现象：例如，在法国占领叙利亚内陆的一个月前，据说众多商人给驻贝

鲁特的法国高级专员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将亚历山大勒塔、阿勒颇和奇里乞亚（Cilicia）统一在法国的控制下。[74]

但是，经济并不是阿勒颇人与阿拉伯政府疏远的唯一原因，一些观察家认为，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这座城市中土耳其人的党羽可能比谢里夫军的人数更多，经济也并非上述观点的唯一成因。[75]一些亲土耳其的情绪可以归因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将阿勒颇人与他们北方的邻居联系起来。此外，凯末尔主义者成功地开展了反法抗争，这是一场充满活力的抵抗运动，与阿拉伯政府采取的犹豫不决的外交策略形成鲜明对比，参与土耳其游击队发动的袭击所提供的有利机会也增强了这座城市的亲土耳其热情。此外，尽管许多人公正或不公正地将阿勒颇城市环境的恶化归咎于阿拉伯政府的疏忽或其政策，但另一些人则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愤怒，即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职位似乎都是为参与阿拉伯起义或表现出对政权忠诚的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保留的。不管他们是不是“认为‘贝都因人’（例如谢里夫家族）过于下等，不能对阿勒颇的贵族施加统治”，一位法国观察家报道称，这座城市中的许多精英对来自大马士革的统治感到反感。[76]

阿勒颇阿拉伯俱乐部的历史必须置于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观察。1918 年 10 月 23 日夜间，埃米尔费萨尔的侄子谢里夫纳斯尔（Sharif Nasr）率领阿拉伯军队进入阿勒颇。根据历史学家卡迈勒·高兹（Kamil Ghazzi）的说法，一周半多一点后，一群“阿拉伯青年”接管了当地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之前的总部，将其改名为“阿拉伯俱乐部”，并且开始发行《阿拉伯报》（*al-‘Arab*）。[77]不论这些年轻人的身份是什么，阿拉伯俱乐部的领导层很快就从这个城市的一些最显赫的家族和政界人物中脱颖而出。阿勒颇阿拉伯俱乐部的第一任主席是马苏德·卡瓦奇比（Mas ‘ud al-Kawakibi），他来自一个备受尊敬的宗教家庭。[78]协助他的哈只·纳吉布·巴吉（al-

Hajj Najib al-Baqi），是当地一个富有且有影响力的家族的后裔，他成为分会的第一任书记。拉希德·塔里阿（Rashid al-Tali 'a，阿勒颇省省长）、易卜拉欣·哈纳努（Ibrahim Hananu，省议会主席）、鲁什迪·贝伊·萨法迪（Rushdi Bey al-Safadi，阿勒颇阿拉伯军队司令）、纳比赫·阿兹马（Nabih al-'Azma，阿勒颇总警察长、梅萨伦的英雄尤素夫·阿兹马的兄弟）、塔希尔·卡亚里（Tahir al-Kayyali，该城中最显赫的地主家族成员）和萨米·萨拉支都在俱乐部的管理层中占据了有影响力的职位。[79]

最初，阿勒颇阿拉伯俱乐部的活动与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的穆塔纳维尔策划的活动差别不大。因此，在埃米尔第一次访问北方期间，俱乐部安排了接待，为阿里·里卡比和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cois Georges-Picot）举办了招待会，并在该市及其周边地区组织请愿活动，支持任命费萨尔为巴黎和会的叙利亚代表。[80]但是，尽管阿勒颇阿拉伯俱乐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在职业和身份范畴上与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相同，并且一些人对阿拉伯政府的政策保持了忠诚，但是俱乐部中仍有一些人没有这种倾向。结果是，1919 年秋的危机削弱了阿拉伯政府的权威和信誉，造成了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的分裂，许多该俱乐部的支持者感到慌乱，他们鼓动阿拉伯俱乐部内的商人和知名人士结成新的联盟，开展非常规的政治活动。

因此，在“撤离危机”之后，阿勒颇阿拉伯俱乐部的成员在与该地区活动的库米塔吉斯（comitajis，党派团伙成员）和地方国防委员会成员一道，在阿勒颇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秩序。正如下一章将详细介绍的那样，易卜拉欣·哈纳努和国防委员会一道成为叙利亚北部抗击法国的军事行动的主要组织者，这种军事行动一直持续到 1921 年。在这场起义的早期阶段，哈只·纳吉布·巴吉充当哈纳努和地方委员会之间的中间人，为游击队活动筹集、分发财物和武器。拉希德·塔利亚和鲁什迪·贝

伊·萨法迪同样对阿勒颇国防委员会的活动进行了支持。在担任阿勒颇阿拉伯俱乐部主席期间，萨法迪不仅使该俱乐部与国防委员会结盟，而且亲自参与组织社区民兵。塔希尔·卡亚里在萨法迪之后成为该俱乐部的主席，他也是当地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担任一个亲凯末尔主义游击队的首领。该游击队的活动集中在附近的伊德利卜（Idlib）。其他卡亚里家族成员——阿卜杜勒·拉赫曼·卡亚里博士（Dr. ‘Abd al-Rahman Kayyali）、阿卜杜勒·瓦哈卜·卡亚里（‘Abd al-Wahhab al-Kayyali）、谢赫卡迈勒·卡亚里（Shaykh Kamil al-Kayyali）、穆罕默德·达勒维什·卡亚里（Muhammad Darwish al-Kayyali）、萨米·卡亚里（Sami al-Kayyali）——和塔希尔·卡亚里一样，不是阿拉伯俱乐部的成员，就是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或两者都是。[81] 总之，在1919年大危机和本地关切的推动下，城市中最有名望的市民把阿勒颇阿拉伯俱乐部变成了地区武装团体和大众政治社团的核心。

虽然阿勒颇阿拉伯俱乐部在特殊的条件下建立了其政治联盟，但是该俱乐部的重新定位背离了这一时期叙利亚政治的大方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近一年里，民族主义精英通过阿拉伯政府和阿拉伯俱乐部等组织进行活动，将政治权力据为己有。作为交换，他们宣称有能力建立有效的治理机构，引导国家走向独立，确保其安全和繁荣。直到1919年秋天，他们仍然没能实现这些目标。相反，他们无意中完成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由于阿拉伯政府和阿拉伯俱乐部的动员，民族主义精英扩大了大众对政治的期望以及大众在政治活动中的参与。结果，这些精英发现自己现在不得不与新的政治领导人和新形式的政治组织进行竞争。

注释

［1］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12.

［2］ Miroslav Horch，*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Patriotic Groups Among the Smaller European Nations*，9.

［3］ Ibid.，22—23. 因为我对大众民族主义的分析与赫罗赫的分析存在很大不同，所以我在这里不讨论赫罗赫所说的 C 阶段。

［4］ 根据达尔瓦扎所述，最后一个时期（1915—1920 年）是大众政治的时期。然而，由于达尔瓦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偏见，他将法塔特及其衍生的阿拉伯独立党置于这一时期的政治中心，轻视了人民委员会的作用。Muhammad 'Izzat Darwaza，*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1：21—79.

［5］ Ahmad Qadrī，*Mudhakkarātī '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27. 关于卡德里生平和活动的更多信息，参见 MD 4H114/dossier 4/471，Cousse to Gouraud，1 June 1920；Khālid al-'Azm，*Mudhakkarāt Khālid al-'Azm*，1：94—95；Amīn Sa'īd，*Thawrāt al-'Arab fī al-qarn al-hadītha*，99，112，259。

［6］ Darwaza，*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1：27；Qadrī，*Mudhakkarātī*，12；Suhayla al-Rīmāwī，*Jam'iyyat al-'arabiyya al-Fatāt al-sirriyya：Dirāsa wathā'iqiyya*，1909—1918，65—69. 达尔瓦扎和卡德里的叙述在细节上各不相同。

［7］ Dawn，*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177—178. 最后一个统计数据，即战前民族主义运动中军官的百分比，存在偏差，因为这一数据依据的 11 个主体中有 10 个属于阿赫德。

［8］ Antonius，*Arab Awakening*，111；Russell，*First Modern Arab State*，72；Kasmieh，*al-Hukūma al-'arabiyya fī Dimashq*，20；Muhammad Y. Muslih，*The 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120. Muslih 在做最后陈述时，不仅提到了法塔特及其衍生的阿拉伯独立党，奇怪的是，他还提到了派系林立的秘密军事组织阿赫德。在阿拉伯军队进入大马士革后，阿赫德分裂为叙利亚和伊拉克两支。虽然伊拉克分部积极参与政治，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伊拉克的未来上，但是叙利亚分部作为一个组织在费萨尔时期对政治没有任何直接影响。

［9］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叙利亚联盟由奥斯曼行政权力下放党的残余势力组成。其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拉菲克·阿兹姆、哈立德·哈基姆（Khalid al-Hakim）、瓦赫巴·以萨（Wahba 'Issa）、米歇尔·鲁特法拉赫、卡米勒·卡萨布、拉希德·里达、萨利姆·萨尔基斯（Salim Sarkis）和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Darwaza，Mudhakkarāt wa tasjīlāt，2：130—131. 关于其计划（阿拉伯语和英语），参见 FO 371/4178/16051，10 January 1919。

［10］ al-Rīmāwī，*Jam 'iyyat al-'arabiyya al-Fatāt al-sirriyya：Dirāsa wathā'iqiyya*，285.

［11］ 关于法塔特和谢里夫侯赛因的成员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参见 Dawn，*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69—86。

［12］ William Ochsenwald，"Ironic Origins：Arab Nationalism in the Hijaz，1882—1914，" 194—196；Schilcher，Families in Politics，153，160；Khoury，Urban Notables，87；Antonius，Arab Awakening，149，188—91；al-'Azm，Mudhakkarāt Khālid al-'Azm，1：90；Al-Charkas，al-Dalīl al-Musawwar lil-bilād al-'arabiyya，1：66；Mary Wilson，"The Hashemites，the Arab Revolt，and Arab Nationalism，" 207—208；FO 882/24/128—134，"Who's Who in Damascus，" 14 May 1919. 年轻的巴克里们（纳西布、法兹、萨米）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追求并非牢固地根植于意识形态，他们之后的行动凸显了这一点。虽然纳西布·巴克里是埃米尔费萨尔领导下的首席官员，并且经常被列为法塔特的政治分支阿拉伯独立党的第一任主席，但他后来退出了该党，和他的兄弟法兹和安瓦尔一道建立了叙利亚本土主义政党叙利亚爱国党。恶毒反对哈希姆家族的尤素夫家族和巴克里家族也尝试联姻结盟，1919 年萨米·巴克里与阿卜杜勒·拉赫曼·尤素夫的女儿订婚。al-'Azma，*Mir'āt al-Shām*，245；Muhammad 'Izzat Darwaza，*Mudhakkarāt*，2：143—144.

［13］ Darwaza，*Mudhakkarāt*，2：80，111；Qadrī，*Mudhakkarātī*，72.

［14］ Darwaza，*Mudhakkarāt*，2：196.

［15］ Darwaza，*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1：75—76.

［16］ Ibid.，1：78.

［17］ al-Rīmāwī，*Jam 'iyyat al-'arabiyya al-Fatāt al-sirriyya：Dirāsa wathā'iqiyya*，89.

［18］ Darwaza，*Mudhakkarāt*，2：141. 另见 Sultān，*Tārīkh Sūriyya 1918—1920*，102；al-Rīmāwī，*Jam 'iyyat al-'arabiyya al-Fatāt al-sirriyya：Dirāsa wathā'iqiyya*，97。穆罕默德·穆斯里认为成立日期为 1919 年 12 月 17 日。*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132. 资料对委托创建该党的行政委员会的名单提出了异议。最常被提及的名字有图菲克·纳图尔（Tawfiq al-Natur，巴黎法塔特的最初创始人之一，*al-Fajr* 报纸的编辑）和纳西布·巴克里，他们受到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和赛义德·加兹（Sa'id al-Ghaz）的帮助。参见 al-'Azma，*Mir'āt al-Shām*，245；Qadrī，*Mudhakkarātī*，82；Darwaza，*Mudhakkarāt*，2：142。

［19］ Darwaza，*Mudhakkarāt*，2：142；Qadrī，*Mudhakkarātī*，110.

［20］ FO 371/4181/89850/117—120/24，Clayton to Curzon，17 June 1919.

［21］ Darwaza，*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1：81—88.

［22］ 一些法塔特成员（如卡米勒·卡萨布）不只隶属于一个政党。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高级人民委员会是由法塔特建立的，但是该委员会在成立后三个月内进行了改组，并采取了与法塔特不同的政策。

［23］ Darwaza，*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1：81—88，91；AD 2429/131，Mercier（？）to Picot，13 December 1918.

［24］ Darwaza，*Mudhakkarāt*，2：164，180—181；Darwaza，*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1：74，80；Amīn Sa'īd，*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Tārīkh mufassil jāmi' lil-qadiyya al-'arabiyya fī rub' qarn*，2：36，126. 虽然赛义德·舒贾伊尔的记录显示政府没有直接向法塔特付款，但是它确实表明向行政委员会成员亚辛·哈希米和纳西布·巴克里等支付了大笔原因不明的款项。

［25］ Darwaza，*Mudhakkarāt*，2：76—77，81—82.

［26］ Sa'īd，*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2：126.

［27］ Qadrī，*Mudhakkarātī*，172—173；al-'Azma，*Mir'āt al-Shām*，245；Darwaza，*Mudhakkarāt*，2：143—144；Sa'īd，*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2：42. 叙利亚爱国党的确切历史令人感到困惑。虽然大多数资料表明它是在 1920 年 1 月创建的，但一些其他资料指出它是在 1920 年 6 月创建的，或是它是在 1 月创建，之后处于休眠状态，然后在 6 月重新创建。尽管大多数阿拉伯语资料（实际上，该组织本身的章程）同样表明该党除了其坚定的本土主义外，完全属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的主流，但该时期的法国资料表明该党是亲法国的，而当时它又与“极端主义”高级人民委员会结盟。在这种情况下，穆罕默德·哈勒卜·法勒扎特（Muhammad Harb Farzat）关于存在两个同名政党的说法具有可信度。第一个政党成立于 1920 年 1 月，具有上述特点。第二个政党成立于 1920 年 6 月（根据法勒扎特和穆罕默德·库尔德·阿里所述），也是代表显贵的一个政党，并且是亲法国的，或至少在费萨尔政权的最后几天试图与法国达成妥协。参见 Harb Farzat，*al-Hayā al-hizbiyya fī Sūriyya：Dirāsa tārīkhiyya li-nash'at al-ahzāb al-siyāsiyya wa tatawwurihā bayna 1908—1955*，77。其他观点参见 *First Modern Arab State*，147，185；al-Rīmāwī，*al-Tajriba al-faysaliyya*，98。

［28］ Yale Papers，Boston University，“A Report on Syria，Palestine and Mount Lebanon for 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prepared by Captain William Yale，Technical Advisor to the American S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ndates in Turkey，” 24.

［29］ 根据哈立德·阿兹姆所述，贾米尔·马勒达姆·贝克和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告诉穆罕默德·法兹·阿兹姆，他们代表一个名叫“隐藏人”（al-rijāl al-ghuyyab，达尔瓦扎的回忆录用这一词描述法塔特的核心圈）的年轻人群体，决定提名阿兹姆作为叙利亚大会的代表。为了表

明谁在大马士革真正掌握了权力，阿兹姆整理了自己的选举名单，其中包括他自己、阿卜杜勒·拉赫曼·尤素夫、塔支丁·哈桑尼（Taj al-Din al-Hasani）、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谢赫穆罕默德·穆智台希德（Shaykh Muhammad al-Mujtahid）、法兹·巴克里、艾哈迈德·古达曼尼（Ahmad al-Qudamani）、乔治·哈尔福什（George Harfush）、尤素夫·林亚都（Yusuf Linyado）和伊扎特·沙维（'Izaat al-Shawi）。（在阿兹姆死后，穆萨利姆·胡斯尼［Musallim al-Husni］接替其位，就任国会议员。）上述七人成为叙利亚爱国党的重要成员。尽管对手支持埃米尔费萨尔并得到阿里·里达·里卡比的支持，但是这份名单中的代表还是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穆罕默德·法兹·阿兹姆后来在叙利亚国民大会主席选举中击败了"隐藏人"的候选人哈希姆·阿塔西。al-'Azm，*Mudhakkarāt Khālid al-'Azm*，1：94—95.

［30］ 菲利普·库利将20世纪初大马士革的政治领导分为两类：一群大约12个处于社会顶层的家族（例如阿兹姆、阿比德、尤素夫等家族）和一群大约50个相对不那么显赫的家族。第一个群体更强大，因为它有能力垄断最高的行政职位及拥有更多的土地财富。根据库利的说法，大多数战前活动家都与第二个阶层有关。*Urban Notables*，44—45.

［31］ 毫不奇怪，阿拉伯独立党第一执政委员会的三名成员法兹·巴克里、萨利姆·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只·易卜拉欣（Salim 'Abd al-Rahman al-Hajj Ibrahim）、达尔瓦扎也是阿拉伯俱乐部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此外，图菲克·纳图尔（根据卡德里称，他是法塔特委托建立该党的成员）也是阿拉伯俱乐部执行委员会的成员。Darwaza，*Mudhakkarāt*，2：142；Qadrī，*Mudhakkarātī*，82；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161s，21 February 1919.

［32］ FO 882/24/100/6890，Director，Arab Bureau to Major G.W. Courtney，11 May 1920.

［33］ Farzat，*al-Hayā al-hizbiyya fī Sūriyya*，65；Darwaza，*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1：23—24，91.

［34］ Qadrī，*Mudhakkarātī*，11；Dāghir，*Mudhakkarāī*，35；Darwaza，*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1：23—24.

［35］ Dāghir，*Mudhakkarāī*，86.

［36］ Ibid.，86. 另见 Darwaza，*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1：23—24；Tawfīq Birrū，"al-Muntadā al-adabī wa dawruhu fī al-nidāl al-'arabī，" 35—44。

［37］ Qadrī，*Mudhakkarātī*，12—13.

［38］ DU Wingate Files 143/2/167（Ab202），Arbur（Cairo）to Sirdar（Khartoum），13 November 1916；FO 371/2781，"Report of the Arab Bureau for November 1916，" 31 October 1916；AD 2326/dossier du Hedjaz，Extraits de la letter 94M de M. Bensaci，envoye du government de la république à la Mecque，16 May 1919；FO 371/4206/139468，"Note on the Accounts of the Arab Bureau，" 17 September 1919.

［39］ 为了巩固英国对民族主义运动所有成员的控制，甚至是对那些怀疑或敌视阿拉伯起义的人的控制，驻开罗的英国阿拉伯事务局成员奥斯蒙德·沃尔龙德（Osmond Walrond）要求埃及的叙利亚民族主义社团选出7名代表，事先将流亡者的关切交送给英国。参见 FO 371/4217/69267，"Note by the Arab Bureau，Cairo，" 6 May 1919；Fromkin，*A Peace to End all Peace*，331。关于英国的回应，参见：Hurewitz，*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2：110—112。

［40］ Khoury，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121；Antonius，Arab Awakening，433；MAE L：SL/vol.8/64—70，Lutfallah to Pichon，23 January 1919；FO 371/3397/83621，"Arab Bureau Report for March 1919，" 1 April 1918；al-Rīmāwī，*Jam 'iyyat al-'arabiyya al-Fatāt al-sirriyya：Dirāsa wathā'iqiyya*，223. 战前，拉希德·里达和拉菲克·阿兹姆这两个以埃及为基地的奥斯曼行政权力下放党和叙利亚联盟的成员，派谢赫贾尔吉里前往贝鲁特，来确认是否有可能从叙利亚发起一场反对奥斯曼的起义。

［41］ Anne Mosely Lesch, *Arab Politics in Palestine, 1917—1939: The Frustration of a Nationalist Movement*, 83; al-'Azma, *Mir'āt al-Shām*, 244; Darwaza, *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 1: 74; Yehoshua Pora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Arab National Movement, 1918—1929*, 77. 由于波拉思集中关注巴勒斯坦，并且依赖犹太复国主义的档案材料，因此他像穆罕默德·穆斯里一样，可能夸大了巴勒斯坦的串联作用在大马士革俱乐部形成和活动中的重要性。

［42］ Sultān, *Tārīkh Sūriyya 1918—1920*, 107; al-'Azma, *Mir'āt al-Shām*, 244. 根据苏丹所述，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成立的日期是 1918 年 11 月 18 日。

［43］ 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161s, 21 February 1919; Pora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Arab National Movement*, 77. 事实上，24 个人中的 9 个——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萨利姆·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只·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哈希姆、穆因·马赫迪（Mu'in al-Mahdi）、艾哈迈德·穆拉维德（Ahmad Muraywid）、图菲克·纳图尔和穆罕默德·阿里·塔米米——已经在此前或在战争期间加入了法塔特。塔比特·阿卜杜勒·努尔和尤素夫·黑达尔（Yusuf Haydar）也早就是文学协会的成员。

［44］ al-'Azma, *Mir'āt al-Shām*, 244; Darwaza, *Mudhakkarāt*, 2: 146; AD 2371, Cousse to Gouraud, 10 February 1920.

［45］ FO 882/24/128—34, “Who's Who in Damascus,” 14 May 1919.

［46］ Qadrī, *Mudhakkarātī*, 163.

［47］ 舒贾伊尔的记录包括 1918 年 10 月至 1919 年 7 月 31 日期间的下列开支：

1.“特勤局”名目下（总支出：46 645 埃及镑）：向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扎法尔提供 500 埃及镑；

2.“捐款”名目下：1919 年 9 月向阿拉伯俱乐部成员尤素夫·伊思提凡（Yusuf Istifan）提供 50 埃及镑；1919 年 1 月和 6 月，向俱乐部成员兼公共安全主管哈达德帕夏（Hadad Pasha）提供 200 埃及镑；向俱乐部成员塔比特·阿卜杜勒·努尔提供 350 埃及镑；1919 年 4 月和 7 月，向阿拉伯俱乐部直接提供 265 埃及镑；1919 年 6 月向文学社提供 100 埃及镑；以及于 1919 年 7 月向“36 名俱乐部成员”提供 1 117 埃及镑；

3.“非常规支付”名目下：向贝鲁特阿拉伯俱乐部提供 50 埃及镑；向大马士革埃及俱乐部提供 150 埃及镑；向萨利姆·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只·易卜拉欣提供 60 埃及镑；向巴勒斯坦文学协会提供 100 埃及镑；

4.“超常支出”名目下：向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扎法尔提供 600 埃及镑；向穆因·马迪和赛义德·塔里阿（Sa'id Tali'a）提供 100 埃及镑。

鉴于每个类别中只有少数支出被逐一记载，上述记述仅显示的是向已查明的个人和群体支付的最低额度的款项。DU SA 493/13/25—35, Shuqayr to Waters-Taylor; DU SA 493/13/1—6, Appendices to letter from Shuqayr to Waters-Taylor; DU SA 493/14/31—38; DU SA 494/2. 另见 al-'Azma, *Mir'āt al-Shām*, 244; Darwaza, *Mudhakkarāt*, 2: 72。

［48］ Mustafā Balāwī, “al-Ahzāb al-siyāsiyya fī Sūriyya (1920—1939),” 26; FO 371/4181/89850/24, Clayton to Curzon, 17 June 1919. 阿拉伯俱乐部参与组建一支大马士革辅助警察部队可能与大马士革警察局长穆罕默德·阿里·塔米米和宪兵司令苏布希·哈德拉加入俱乐部有关。

［49］ 这三人似乎在重复本月早期“青年天主教社团”（Circle of Young Catholics）的论点。阿拉伯俱乐部合并该社团的尝试失败了，因为后者反对该俱乐部宣称效忠于谢里夫侯赛因及其亲英反法的立场。AD 2429/dossier 1918/115, Mercier to HC, 9 December 1918.

［50］ AD 2429/144, Mercier to HC, 16 December 1918; AD 2429/161, Mercier to HC, 26 December 1918.

［51］“极端主义”一词在英国、美国，特别是法国（特别是驻大马士革的法国联络官库斯

[Cousse] 中校）的急件中的各种语境被广泛使用，其含义也随之改变。它通常适用于那些不愿在下列任何一个问题（叙利亚的分裂、叙利亚主权的性质、托管政府的权力或身份）上与协约国妥协的个人或政治潮流，它们有暴力倾向，鼓励非精英人士参与民族主义政治。这个词也被用来指那些整体被认为是本土主义尤其是穆斯林 / 反基督教的组织或个人。狂热分子、布尔什维克、年轻阿拉伯人（即所谓由法塔特领导的阴谋的参与者）和泛伊斯兰主义等词语经常被（尤其是法国观察家）用作极端主义者的同义词。参见 MAE L：SL/vol. 12/32—38，Cousse to Gouraud，6 April 1919；WO 106/191/MI2B，"Report from GHQ-EEF，" 22 April 1919；FO 371/4181/8950，Clayton to Curzon，"Report by British Liaison Officer（Cornwallis）on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rabiia，" 17 June 1919；AD 2358/dossier：mystification chérifienne，Gautherot，13 September 1919；MD 4H58/1，"Rapport hebdomadaire：9 au 16 février 1920"；FO 371/5035/E4858，Wratislaw to FO，15 May 1920；MD 4H114/4/594，Cousse to Gouraud，24 June 1920。

[52] MAE L：AH/vol.4/66—67，Cousse to Gouraud，21 March 1919.

[53] MAE L：SL/vol. 12/32—38，Cousse to HC，6 April 1919；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634，Cousse to HC，24 October 1919.

[54] Khoury，*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174—176.

[55] 1989 年 11 月 15 日对阿卜·里巴·贾扎伊里的访谈；MAE L：SL/vol. 12/32—38，Cousse to HC，6 April 1919；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945，Lt. Col. F.L.O.（DCPO Damas），26 September 1919。

[56] AD 2430，Cousse to Dame，18 April 1919. 卡拉库兹是咖啡馆和咖啡屋上演的受欢迎的皮影戏中的人物。

[57] 援引自 Abu Khaldun Sati' al-Husri，*The Day of Maysalun：A Page from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Arabs*，112—114；*al-'Āsima* 35，n.d.，3。

[58] FO 371/4181/89850/24，Clay to Curzon，"Report by British Liaison Officer（Cornwallis）on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rabia，" 17 June 1919；FO 882/24/100/6890，Director Arab Bureau to Major G. W. Courtney，11 May 1920.

[59] Sa'īd，*Thawrāt al-'Arab*，258—259；Darwaza，*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1：27. 不幸的是，关于阿拉伯俱乐部日常管理的详细信息，特别是在其重组之后的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会议记录罕见，现存的记录大多来自法国档案。尽管法国拥有高效的间谍网络，甚至设法招募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招募局的秘书尤素夫·萨尤菲（Yusuf Sayufi），但是传递的信息却是随意的，自然会偏向于反映法国人的关切。例如，虽然关于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主席人选的确切信息并不存在，但在穆扎法尔之后，主席职位似乎不止一次易手，这一方面反映了阿拉伯政府与俱乐部之间易变的关系，另一方面反映了执行委员会成员之间易变的关系。萨米·阿兹姆和法兹·巴克里在各种文件中被引为阿拉伯俱乐部的主席。参见 FO 882/24/128—34，"Who's Who in Damascus，" 14 May 1919；AD 2324/dossier a-1：politique，25 June 1919；MD 7N4182/4/340，Picot to MAE，21 July 1919；AD 2430/696，Sayufi to Cousse，22 August 1919。

[60] MAE L：AH/vol. 4/48（in Arabic and French）；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Cousse to HC，17 May 1919.

[61] AD 2343/c1：Janvier-juillet 1919，Cousse，n.d.；AD 2324/dossier a-1：politique，25 June 1919.

[62] *al-Kawkab*，29 July 1919，9—10；FO 371/5168/E6631，"Weekly Summary of Intelligence Reports Issued by M.I.1C，Constantinople Branch，for Week Ending 20th May 1920."

[63] Balāwī，"al-Ahzāb al-siyāsiyya fī Sūriyya，" 26；AD 2358/dossier：emir Fayçal，"Mystification chérifienne，" 13 September 1919；Darwaza，*Mudhakkarāt*，2：25—26；Muslih，*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167—168.

[64] Darwaza, *Mudhakkarāt*, 2: 59.

[65] *al-Kawkab*, 28 October 1919, 9; *al-'Āsima*, 4 September 1919, 3; MD 4H114/1, Cousse to Gouraud, 29 November 1919.

[66] Muslih, *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98—100. 参见 Beshara Doumani, *Rediscovering Palestine: Merchants and Peasants in Jabal Nablus, 1700—1900*。

[67] Darwaza, *Mudhakkarāt*, 2: 20—26; Porath,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nent*, 76. 一位英国观察员对耶路撒冷阿拉伯俱乐部与文学协会的竞争进行了如下描述：“几乎所有（耶路撒冷阿拉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都属于侯赛尼家族，其中许多人与文学协会的主要人物关系并不好。文学协会的目标与阿拉伯俱乐部的目标大致相同，但文学协会的成员并不那么激进。也就是说，他们在阿拉伯独立问题的立场上并不那么强硬，只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移民。” FO 371/4182/125609/M56, J. N. Camp (Jerusalem) to CPO (Cairo), “Arab Movement and Zionism,” 24 October 1919.

[68] 这些活动定期被《地球报》报道。例如，参见 *al-Kawkab*, 31 December 1918, 10—11; 14 January 1920, 12。

[69] FO 371/4182/125609/M56, J.N. Camp (Jerusalem) to CPO (Cairo), “Arab Movement and Zionism,” 24 October 1919.

[70] 例如，参见 MAE L: SL/vol. 10/151Y154, “Rapport du capitaine Pichon, officier français de liaison à Alep sur la société de Nadi-el-arabi,” 4 March 1919。

[71] 参见 FO 371/3412/187713/184, Clayton to FO, 14 November 1918; FO 371/4214/103277, Baghdad to IO, 26 June 1919; FO 371/4237/137623, “Middle East Political Situation: Notes by Col. Brayne, P.O., Aleppo,” 1 August 1919; FO 371/4228/120623/EA26121, GHQ (Egypt) to WO, 6 August 1919;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17。

[72] Darwaza, *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 1: 77—78; Joarder, *Syria Under the French Mandate*, 207—209; MAE L: SL/vol. 25/285—290, Extrait du journal Difah, 9 March 1920; MD 4H112/2A/38/R, “Renseignements,” 20 February 1920; USNA 59/890d.oo/9/473, Jackson (Aleppo) to Sec. of State, 13 March 1920; AD 409/dossiers de principe: Congrès syriens 1920—1938, 21 December 1929.

[73] IO L/PS/10/802, Gertrude Bell, “Syria in October 1919,” 15 November 1919.

[74] MD 4H114/4/562, Cousse to Gouraud, 16 June 1920.

[75] IO Curzon Papers 112/265, Notes in Curzon's hand, 27 (?) November 1918.

[76] MAE L: SL/vol.13/171—81, Pilley to Picot, 22 May 1919; AD 2358/dossier: emir Fayçal, Gautherot, “Mystification chérifienne: Récit d'un témoin oculaire,” 13 September 1919; MD 4H112/2A, Agent 1, 2 February 1920; FO 371/5129/E5005, “Precis of an Interview with Mr. Sassoun Hezkail,” 10 March 1920; MD 4H112, “Compete rendu du capitaine Gautherot sur la situation politique à Alep,” 6 May 1920.

[77] Ghazzī, *Nahr al-dhahab fī tārīkh Halab*, 3: 654.

[78] Mardam Bek, *Dimashq wal-Quds fī al-'ishrīnāt*, 47, 52.

[79] 担任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和阿勒颇阿拉伯俱乐部中间人的萨米·萨拉支也是“牺牲社团”(Circle of Sacrifice) 的成员，该社团是一个恐怖组织，其唯一目的是“消灭”每一个支持亲法政策的人。参见 MAE L: SL/vol. 10/151—154, “Rapport du capitaine Pichon, officier français de liaison à Alep, sur la société de Nadi-el-arabi,” 4 March 1919; AD 2342, “Rapport sur les troubles survenus le 28 février 1919 à Alep,” 14 April 1919; MD 4H112/1, “Compte rendu du capitaine Gautherot sur

la situation politique à Alep," 6 May 1920;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422; Darwaza, *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 1: 77—78。

[80] Ghazzī, *Nahr al-dhahab fī tārīkh Halab*, 654—656; Mardam Bek, *Dimashq wal-Quds fī al-'ishrīnāt*, 47, 52; Adham al-Jundī, *Tārīkh al-thawrāt al-sūriyya dī 'ahd al-intidāb al-faransī*, 63.

[81] al-Jundī, *Tārīkh al-thawrāt al-sūriyya dī 'ahd al-intidāb al-faransī*, 63, 116; Darwaza, *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 1: 77—78; Darwaza, *Mudhakkarāt*, 2: 148—149; al-Amīr Mustafā al-Shihābi, *Muhādarāt fī al-isti'mār*, 2: 96; Qadrī, *Mudhakkarātī*, 133;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10; AD 2429/144, Mercier to HC, 16 December 1918; AD 2429/161, Mercier to HC, 26 December 1918; AD 2375. Cousse to HC, 19 October 1919; FO 371/4186/163275/139—141, Meinertzhagen to Curzon, 19 December 1919; MD 4H112/2A/38R, "Renseignements," 20 February 1920; FO 882/23/221—223,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Commander (Aleppo), "Personalities: Arab Government of Syria," March 1920; MD 4H112/2B/2, Rapport politique (période du 16 au 30 avril 1920); AD 2346/c1a, 25 May 1920; MD L: SL/vol.33, Gouraud to Millerand, "Note au sujet des rapports entre le haut commission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Syrie-Cilicie et l'emir Fayçal," 22 September 1920.

第二章　人民委员会

英国政府单方面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以及随后的英法协议，是费萨尔统治叙利亚的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和真正的转折点。由于这一决定和协议都是在没有与阿拉伯政府协商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阿拉伯政府通过向协约国证明叙利亚已经准备好来赢得独立的战略失败了。阿拉伯政府及其在法塔特和阿拉伯俱乐部中的支持者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于守势，不仅要面对由政治精英领导的重新振兴的反对，还要面对他们部分授权、现在已经对其失去控制的大众动员。

在作出撤军决定后，英国政府过去一直支付给阿拉伯政府的补贴减少了一半，然后通过扣留或延迟每月的支付来惩罚阿拉伯政府的各种违法行为。由于英国的吝啬，阿拉伯政府再也无法对其政治对手进行收买。更为糟糕的是，政府再也无法给贝都因人支付“保护”费以确保他们的支持和良好表现。农村安全的崩溃蔓延到城市地区，使本已困难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叙利亚内陆的经济一落千丈，随之而来的是阿拉伯政府权力及对其认可的丧失。

随着贝卡谷地和其他冲突地区的难民进入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其他城市，本已拥挤的居民区变得更加拥挤。随着农民寻求庇护以逃离不受惩罚的抢劫团伙，叙利亚不断步入一场又一场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传统政治模式和社会组织的崩溃不断加快。然而，新出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模式根据不同

情况，或将先前的关系纳入新的框架内，或直接绕过这些关系，使叙利亚人更有效地应对变化的环境。

“撤离危机”爆发不久后，形形色色的叙利亚人群体开始建立一个个环环相扣的委员会，表面上看，它们成立的目的是组织对叙利亚的保卫或承担阿拉伯政府放弃的职责，但是它们也可以被视为新政治和社会组织模式的制度化表达。虽然成立这些新组织的最初倡议部分来自一小撮政治活动家，他们来自显赫的家族，参加过法塔特或叙利亚联盟的活动，或两个都参加过，但是领导权并没有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相反，出现了一种新型地方领导人，通常是通过大量成年叙利亚男性参与的选举产生的。由于地方委员会的组织和活动责任下放，小商人、乌里玛、商人乌里玛、贾巴达亚特（qabadāyāt，社区领袖）*、新近城市移民，以及之前被排除在民族主义政治外的人或浅层参与者得以在现在的公共生活中发挥中心作用。他们分发紧急救济品，派人进行地方巡逻，装备和训练民兵开展国防，为他们的街区和城市获取食物，评估和征收税款，在某些情况下伸张正义和进行立法。此外，由于他们带来了与他们出生环境相适应的价值观和符号，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参与改变了叙利亚民族主义的特性。

人民委员会的起源

英国和法国政府批准了英国于 1919 年 9 月 15 日从叙利亚撤军的协议。

---

* qabadāyāt 为 qabadāy（贾巴达亚）的复数形式，其本意为“勇敢的人”“坚强的人”。在此处，贾巴达亚特指的是一群拥有社会控制权的人，也就是“社区领袖”“街区领袖”。——译者注

此后不久，阿拉伯政府战争委员会主席亚辛·哈希米呼吁招募 12 000 名志愿者保卫叙利亚。[1] 虽然爱国主义可能是影响哈希米的一个因素，但是肯定不是唯一因素。作为一个来自伊拉克中下层家庭的专业士兵和一个法塔特的早期支持者，哈希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却拒绝了指挥阿拉伯军，并且继续为奥斯曼帝国服役。他不信任英国人和哈希米家族，对阿拉伯大起义不屑一顾。战后，哈希米接受了阿拉伯政府的委任，尽一切可能将阿拉伯军队整合到自己的指挥下。“他接受的土耳其训练给他打上了土耳其的烙印，他是军事化的、突厥化的土耳其人，而不是一位阿凡提（Effendi）*”，一名观察家在一份根据英国政府指示撰写的个人传略中抱怨道，“他野心勃勃，志在个人扩张，并不真正同情叙利亚人或费萨尔亲王”。哈希米认为谢里夫军缺乏纪律，他们的任务在大马士革的占领后已经结束，他下令解散谢里夫军，有时也会强行解除效忠于埃米尔费萨尔的部队的武装。[2]

哈希米经常与阿拉伯政府核心集团的其他成员发生冲突，他借费萨尔不在之机（埃米尔出国仅三天，他就开始招募志愿者），以及利用费萨尔代理人埃米尔扎伊德的年轻和天真，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结构，即国防委员会（lajnat al-difa’al-watani）。根据哈希米的计划，当地显贵作为志愿者通过“征兵委员会”加入军事部队，该部队将在国防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因此只忠诚于哈希米。[3] 在英国的施压下，阿拉伯政府在一周内解散了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及其公共活动没有得到官方批准”，政府刊物《首都报》的一则声明中写道，“也不存在义务兵役制”。[4] 在阿拉伯政府解散了国防委员会的两个月后，英国人绑架了哈希米，并将他流放到巴勒斯坦。

哈希米的国防委员会的解散并没有影响招募志愿者的行动，甚至在“9 月 15 日协议”达成之前，反对阿拉伯政府与协约国谈判和妥协政策的

---

*　在土耳其，“阿凡提”是对高学识学者和高级官员的一种尊称。——译者注

人就开始招募军事部队。在协议签署后，随着各种政治社团和城乡显贵争相组建志愿者连队，招募规模得到扩大。例如，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俱乐部委托法塔特战时成员纳西布·巴克里组织和装备志愿者部队。根据记录，巴克里的团队大约有 300 人，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骑兵。[5]

在某种程度上，恐惧是显贵加入志愿者分队的动机：因为一些显贵武装了他们的侍从，出于谨慎，其他人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尤其是在保障城市和乡村安全的正式结构崩溃之后。根据一位驻阿勒颇的美国外交官透露，

> 当地和国家周边的情况日益恶化。阿勒颇已经成为整个地区数百个村庄首领的聚集地，他们与阿勒颇几乎所有的重要地主一道，正在用现代化步枪和弹药武装农民。各位首领在看待他们的邻居甚至他们的自己人时都有一定的怀疑。[6]

然而，除了恐惧之外，追随和支持志愿部队带有身份象征的动机。在《首都报》关于阿拉伯俱乐部从其成员中招募的一个团的报道最后略带讽刺地解释说："许多受人尊重的乌里玛、作家和显贵的儿子们正在等待他们的裁缝为他们的军装做最后的修饰。"[7] 根据该报社的另一篇报道，保守地主穆罕默德·法齐·阿兹姆（上一章中叙述了他对埃米尔费萨尔和法塔特的态度）的儿子哈立德·阿兹姆（Khalid al-'Azm）经常在晚上出门时穿上军装。这种兴奋甚至席卷了易受影响的埃米尔扎伊德，他"作为军人"加入了阿拉伯俱乐部组建的兵团，并且向该部队捐赠了 25 套军服。[8]

这些兵团很难被认为是"大众民兵"，其建立也不能被视为大众政治运动出现的指标。尽管那些直接或通过诸如阿拉伯俱乐部这样的组织加入兵团的显贵和忠于哈希米的军官都从下层阶级中招募志愿者，但是每个民兵单位都是自主的，可以独立行动，就像封建领主的军队一样。虽然鼓动和

征募国防军引起的兴奋促进了动员过程，但是每个民兵单位的自主性和垂直组织结构阻碍了能够推动更广泛忠诚的制度框架的出现。但是，在卡米勒·卡萨布等人的努力下，这样的框架确实已经成形。作为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创始人，卡米勒·卡萨布设想了一种与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所支持的运动截然不同的民族运动。

卡米勒·卡萨布和许多其他与高级人民委员会有联系的活动家一样，背景普通。他的父亲是一名来自霍姆斯的商人，在儿子出生前就搬到了大马士革，并在儿子7岁时去世。他的母亲（年轻时姓卡利姆）是大马士革乌贾伊巴（Uqayba）区的卡利姆家族成员，这个家族不仅包括商人，而且也有贾巴达亚特。[9] 卡萨布25岁时在埃及爱资哈尔（al-Azhar）完成教育，在那里他与伊斯兰现代主义者阿利姆·穆罕默德·阿卜杜（'alim Muhammad 'Abduh）等人一起学习。回到大马士革后，他创办了一所学校，即海伊布祖里亚（Hayy Buzuriyya）的乌瑟曼尼亚伊斯兰学校（Madrasa al-'Uthmaniyya，之后改名为卡米里亚伊斯兰学校［al-Kamiliyya］）。[10]

根据艾哈迈德·席勒米·阿拉夫（Ahmad Hilmi al-'Allaf）所说，他曾是乌瑟曼尼亚伊斯兰学校的学生，学校课程和教学方法体现了传统主义和现代影响的混合。一方面，学校以吸引高质量的教师和教授非传统学科而闻名，如戏剧、数学和地理。另一方面，学校继续重视传统科目，如语法和阿拉伯语词形变化（sarf），阿拉夫称之为“陈旧和枯燥方式”的记忆和重复。卡萨布亲自教授阿拉伯语词形变化（“他让我记住以下形式，'你们要知道有35种词形变化……'并以这种不求理解的方式结束”），他对预习不够或不守纪律的学生进行严厉惩罚：

> 对于没有一字不差掌握功课的学生，等待他的是夹在卡萨布胳膊下的竹杖。他一个个地听班上学生朗读。学生读着要求部分，看着谢

赫卡米勒流露着恶意和愤怒的眼睛、阴森的脸庞、胳膊下面的竹杖和手中的语法书。他密切留意着我们读的内容，如果我们读错了、犹豫了，或者出现停顿，那根竹杖就会高高抬起……

值得注意的是，谢赫卡米勒打学生并不为了引导他们，而是因为他和他的妻子或其他人之间发生了争吵。他竭尽全力地与犯了错的学生进行斗争，不断地击打他，直到快将他打成碎片。有时候，仅打腿是不够的，事先还要先涂上水。他用尽全力打他们，有时甚至多达20下。[11]

根据阿拉夫所说，在这一时期，体罚在学校并不常见，因此他认为，乌瑟曼尼亚伊斯兰学校使用体罚是教员高替换率和学校声誉恶化的原因。跟很多其他学生一样，阿拉夫也离开了伊斯兰学校，进入一所官办学校，他称这所学校相对并不那么老式。[12]

卡米勒·卡萨布1913年从巴黎搬到贝鲁特时加入了法塔特。战争期间，他在组织中承担了两项使命。1915年，法塔特派他去埃及，以摸清流亡在埃及的叙利亚人的政治态度和判断英国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卡萨布在亚历山大被捕，之后在两名奥斯曼行政权力下放党成员拉希德·里达和拉菲克·阿兹姆（Rafiq al-'Azm）的请求下得以释放。[13]同年年末，卡萨布再次代表法塔特前往汉志，担任出访谢里夫侯赛因的特使。直至1918年初，他都留在谢里夫身边，这给予他足够的时间形成对汉志领导人和阿拉伯起义的看法，并将这些看法在战后带回叙利亚。正如记者和政治牛蝇姆西布丁·哈提卜（Muhibb al-Din al-Khatib）所报道的：

姆西布丁·哈提卜和谢赫卡米勒·卡萨布都希望为侯赛因国王和他的儿子们争取一切最好的。条件是他们要为所领导的国家谋取最大

的利益。但是侯赛因国王和他的儿子们终生都遵封建时代的信仰，相信国家即是国王的领土。[14]

有证据表明，在英国当局和汉志谢里夫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卡萨布在麦加时组织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委员会。驻扎在该市的十几名叙利亚人（其中大部分是奥斯曼军队的前军官）签署了一份致卡萨布的请愿书，其内容如下：

> 致卡萨布（1918 年 7 月 15 日）：我们，麦加的叙利亚人，谨告诉您的人民委员会（lajna qawmiyya），我们支持它、它的原则和它的行动，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它。我们的国家把它的青春之花和最优秀的人作为宝贵的（这些原则的）牺牲者，牺牲在绞索和战壕前。这些原则，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会支持，为了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团结，为了它的统治是由基于自由、平等和其子民间的兄弟情谊，无论他们个人和宗教信仰如何的公民结构而努力。我们支持你们为实现这些原则而采取的每一项行动。我们希望真主将使你和我们成功地实现国家前进和子民幸福的目标。[15]

虽然签字者指的可能是“法塔特”或“阿赫德”，但是考虑到卡萨布对阿拉伯大起义的恐惧及其对埃及的英国官员和流亡民族主义者关系发展的担忧，为汉志的叙利亚流亡者组建一个独立的“人民委员会”并非难以置信。卡萨布利用他在国外的时间，在他的叙利亚网络和流亡埃及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建立联系，以及建立一个这样的委员会是很符合他个性的。[16]他建立这样的委员会也并不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对谢里夫家族幻想破灭的并不仅有卡萨布，一些人追随卡萨布的脚步，在占领大马士革前就放弃了

谢里夫的事业。

有时候，英国人把流亡在外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活动视为麻烦，有些时候又视为对他们下注一方的威胁。因此，他们对流亡群体采取了一种双管齐下的策略：如果他们不能拉拢流亡者（就像他们试图鼓励成立起草《七人宣言》委员会那样），至少他们可以阻止在埃及的民族主义者与其叙利亚同胞建立联系。直到1918年12月中旬，美国驻开罗的武官抱怨说，英国不仅审查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寄往埃及的私人信件，而且禁止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印刷的报纸进口到埃及首都并流通。

> 在埃及的叙利亚领导人一直以来都对叙利亚的事态一无所知。法国人和英国人都没有告诉这些杰出的叙利亚人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黎巴嫩和沿海地区外，在整个叙利亚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一个谢里夫政府（Cherifean Government）！这似乎是故意让叙利亚人闭嘴的一种手段，使他们无法在巴黎和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
> 《默卡塔姆》（*el-Mokattam*）报的编辑尼姆勒博士（Dr. Nimr）说，他一再请求允许发表表达叙利亚人对其国家未来期望的社论和文章。审查员告诉他，他可以对叙利亚和叙利亚问题发表任何他喜欢的言论，但是他不能写任何触及英国、法国、麦加的谢里夫或他们在叙利亚利益的东西！[17]

不仅英国的封锁阻止了叙利亚的消息传入埃及，英国还有意阻止那些生活在埃及、希望返回家园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结果，卡萨布从汉志前往埃及后，被迫在那里停留至1919年4月。[18]

总之，卡米勒·卡萨布的生活充满了一些看似不一致的东西。他的背景和早期接受的教育比较一般，他母亲那边的血统有点不够体面，而且他

拥有社区领袖、小资产阶级商人和乌里玛的忠心。尽管如此，他与背景更杰出的民族主义者交往密切，他们支持的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他们作为“崛起精英”的地位。他师从当时伊斯兰现代主义领袖穆罕默德·阿卜杜，并且在法塔特战后得到扩张之前就开始支持其活动。然而，他领导了一场传统主义的社会运动，拒绝接受阿卜杜学说中鼓励其他民族主义活动家支持现代主义的观点，也拒绝接受从欧洲借鉴的理念的内容。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不一致可能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塑造卡萨布生活和其世界观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使他处于导言中所描述的文化差异的结合点。虽然卡萨布和他在人民委员会中的一些同事习惯了民族主义精英的文化习惯用语，但是他们的经历和社会地位的模糊和不稳定所造成的限制妨碍了他们融入精英的世界，并使他们承担起调节文化差异的作用。因此，他们在有选择地从民族主义精英的论战中汲取语言和符号的同时，也把民族主义精英用来维持这些论战的许多意识形态观念斥为异己。在选择和语境重构的过程中，卡萨布和他的同事们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其在表面上重申“传统价值”，但实际上是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制度和话语框架下进行的。

高级人民委员会

与许多关于人民委员会的资料一样，关于高级人民委员会起源的资料，特别是其他政治组织在其成立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资料，不仅贫乏，而且互相矛盾。有几个资料来源证实，该委员会一开始是法塔特和其分支阿拉伯

独立党中其中一个的项目，或两者共同的项目。艾哈迈德·卡德里在战前是法塔特的成员，之后成为埃米尔费萨尔的私人医生，他声称是他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防止费萨尔屈服于那些鼓动埃米尔与法国达成协议的人的压力。“当我注意到埃米尔身边的所有人都鼓动他批准与克列孟梭的条约时，”卡德里解释说，

> 我写信给大马士革法塔特中央委员会，目的是阻止这一想法，并利用谢赫卡米勒·卡萨布的急性子和对大众（jamahir）思想的影响力来拒绝这一条约。卡萨布接受了这一请求，并于11月17日在卡纳瓦特（Qanawat，大马士革的一个区）出席在巴鲁迪家中举行的一次会议。在那里，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要求完全独立，呼吁所有与会者签署一项公约，拒绝任何侵犯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协议。与会者签完字才能离开。因此，卡萨布在高级人民委员会中抢得先机。[19]

相反，姆西布丁·哈提卜在他的著述中忽略了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展示出了一个类似神话的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建立过程。哈提卜在很多年后回忆，当费萨尔前往欧洲时，埃米尔转向卡萨布并告诉他：“我希望你和你的爱国兄弟们建立一种大众运动，武装国家，把大马士革和叙利亚的其他城市变成军营，把国家变成武装营地。”[20]

撇开分歧不谈，两种叙述都认为，成立高级人民委员会是为了应对“撤离危机”后笼罩叙利亚的新的政治氛围。面对民众对英、法行为不断增加的愤怒，既有的政治组织设法疏导民众情绪，并通过倡议国家防御来获得对运动的控制。虽然这些组织的作用尚不清楚，但从高级人民委员会的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0月下旬开始，一直在各自地区组织民兵的显贵开始举行会议，协调他们的行动。[21] 其中一场可能在高级人民委员会

成立前夕举行的会议的记录披露了参与制定委员会最终方案的成员的姓名及其关切。在会议记录中，参会者被分为两类，一类未作任何标记，一类标记为“显贵”（a ‘yan）。在第一份名单中，清晰可辨的名字有：“谢赫卡米勒”（卡萨布）、宰因·穆尔塔达（Zayn Murtada，尊贵什叶派家族成员）、亚辛·迪亚卜（Yasin Diab，一名杰出商人）、阿萨德·达吉尔（As ‘ad Daghir，阿拉伯独立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神父米哈伊勒·沙哈达（Father Mikhail Shahada）和穆罕默德·哈姆迪·萨法尔扎拉尼（Muhammad Hamdi Safarjalani）。“法兹贝伊*”（Fawzi Bey，巴克里?）、艾哈迈迪·侯赛因阿凡提（法塔特的成员，之后成为叙利亚爱国党成员）、图菲克·沙米亚贝伊、萨利姆·安胡里贝伊（Salim Bey al-Anhuri，一名基督教商人）、赛义德·马哈伊尼阿迦**（Sa ‘id Agha Mahayini，一名与社区领袖有联系的商人）和法赫里贝伊（Fakhri Bey，巴鲁迪?）出现在第二份名单中。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组织发展早期阶段，与高级人民委员会有关的人员名单中，来自学者（‘alim）和商人职业范畴的人的比例远多于诸如法塔特中的穆阿辛佣和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俱乐部创建人。

会议记录如下：

在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后，宣读了章程，与会者讨论了团体名称，并且多数投票决定成立人民委员会（al-lajna al-wataniyya）。

第一项：十名出席者建议增加一句有关叙利亚各方的句子。

犹太复国主义（qawmiyya yahudiyya）：决定增加一句：“抵制一切导致形成威胁国家政治存在和叙利亚统一的民族主义（qawmiyya）的

---

* “贝伊”或“巴伊”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一种头衔，有“老爷”“先生”“总督”等含义。——译者注

** “阿迦”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一种称谓，有“主人”“首领”“长官”等含义。——译者注

原则”。

十位出席者建议增加一段，表明我们的工作与在阿拉伯国家其他地方开展的所有其他类似活动有联系，但是被多数否决。

谢赫卡米勒提出关于选举哈只·以撒·迪亚卜（al-Hajj ‘Issa Diab）的事宜。[22]

会议记录中的两个议程特别令人关注。第一，与一些历史学家的猜测相反，反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仅仅因为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俱乐部等民族主义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成为叙利亚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正如所料，反对“除阿拉伯民族主义外的所有民族主义”（对抗犹太主义被委婉地贴上了标签[23]）斗争的重要性，对于区分叙利亚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和阐明其本质至关重要。第二，这些会议记录显示，至少有一些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创始人一直计划切断委员会与其他政治组织的联系，并建立一个完全自治的组织。这一点格外重要，因为最初成立的委员会不过是一个与大马士革政治党派和社团代表组成的松散联盟。比如，最初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赛义德·黑达尔和图菲克·沙米亚在委员会中代表阿拉伯独立党的利益，而哈桑·哈基姆（Hasan al-Hakim）、胡斯尼·巴拉兹（Husni al-Barazi）、穆斯塔法·瓦斯菲（Mustafa Wasfi）和穆赫伊丁·萨迪克（Muhyi al-Din Sadiq）则代表阿赫德的利益。[24]

据一些人说，1919 年 11 月 1 日星期六，高级人民委员会发起了选举，目的是从大马士革的 48 个街区（ahya）中选出 4 名代表参加委员会。4 天后，代表们在阿里·里达·里卡的姐夫、大马士革市政府主席艾哈迈德·哈希比（Ahmad al-Hasibi）家中开会，从每个社区中选举出一名有资格投票选举委员会 27 名领导人的人。[25] 从 11 月中旬到 1920 年 2 月初，每个来自苏曼（thuman，大马士革最初 8 个、后来的 9 个行政区之一）的代表和包括

一名秘书、会计和司库在内的 3 名官员共同监督委员会的活动。这些会议没有常任主席主持。相反，根据章程，出席的人要从他们自己中选出一人主持每次会议。因此，尽管卡米勒·卡萨布很快成为该组织的卓越领导人，但是他的官方身份同他的同事萨利赫·卡勒丰地（Salih al-Kalfundi）和姆西布丁·哈提卜一样，是来自卡伊马利亚（Qaymariyya）的代表。[26]

高级人民委员会的章程规定，在选举委员会地方代表时，大马士革的所有居民（毫无疑问，所有成年男性）都有投票权。随着委员会组织工作从大马士革扩展到远在安曼的其他城镇，委员会的选举活动也在扩大。这些选举并不是骗局。与阿拉伯俱乐部组织的请愿活动不同，这些请愿活动是为了向外国听众展示民众支持阿拉伯政府及其政策，不仅高级人民委员会从选举中获得合法性，而且选举是委员会重新界定叙利亚民族共同体的尝试。委员会章程这样宣称："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因国家利益而合法地受到人民委员会的约束，因为这个国家从来没有一致参与过这样的任务，因为它的目标是经一致同意确定的，代表们是认真有序地选出的。""由于高级（人民）委员会与个人之间的这种法律联系，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是高级（人民）委员会的选举人并支持其既定目标。"[27]

因此，高级人民委员会的组织者和委员会成员都非常认真地对待选举。在卡伊马利亚，支部委员会公开表彰在选举高级人民委员会代表时使用无记名投票的做法，以证明选举过程的可靠性。[28] 在其他案例中，那些提名人和当选人的名字出现在支持他们的报纸上。[29] 开罗萨拉菲亚图书馆（Salafiyya Library）是存放人民委员会资料的地方，其中多数人民委员会档案主要由选举人自己确认的地方选举结果报告组成。这些选举人签名的宣誓书如下：

> 我们，马德哈纳特·沙赫姆街区的居民（ahali），我们中的阿凡

提、商人、年轻和老年人再次选举赛义德·塔拉特·贾布里阿凡提（Sayyid Tal ‘at Effendi Jabiri）为我们的人民委员会代表。他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值得信赖的。我们在此作为正式执行的备忘录上签名。

在这份宣誓书后面大概有100个签名。[30] 保存的其他宣誓书包括选举获胜者的宣誓书，他们证明自己有权作为其社区的代表行事，也有一些宣誓书来自那些显然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选出的代表，他们通常声称由于健康原因无法任职。其中一封更耐人寻味的信函来自记者穆罕默德·库尔德·阿里，他是《穆克塔巴斯报》（*al-Muqtabas*）的编辑，后来成为（亲法）叙利亚爱国党创建者之一。他的信函证实了英国对他是“无耻的江湖骗子”的评价，其内容如下：

> 我收到了我当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的消息。我很感激您对我这个无用之人的关心，如果我身体状况最近没有恶化的话，我从内心深处非常希望对这一要求作出积极回复。请接受我的道歉。愿真主保佑委员会的成功。[31]

库尔德·阿里于1953年逝世。

在这些选举的基础上，高级人民委员会、其分支机构和国防委员会声称有权作为叙利亚人民的真正代表行事。“叙利亚全国都成立了国防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与首都的人民委员会保持着联系”，《地球报》报道称，

> 创建这些委员会的方法是通过真实、合法的选举，所以他们合法地代表国家……委员会在职能上取代了叙利亚国民大会，不，甚至可以说它的职能更加全面，因为从阿勒颇到卡拉克（Karak）的整个叙利

亚境内都有其常设分支机构。[32]

当然，这一论断并非无可争议。埃米尔费萨尔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请愿活动，显贵、教士和部落首领宣誓效忠（mubaya ‘a）的仪式等——以此确认其作为叙利亚人民唯一代表的权利。同样，基于其成员由选举产生，叙利亚国民大会也声称其代表叙利亚，如果不是埃米尔扎伊德在 1919 年 12 月初中止了它的工作，国民大会可能也会挑战高级人民委员会的自诩。[33] 但是因为高级人民委员会像之前的叙利亚国民大会一样，不能在英国或法国托管的领土上发起选举——也就是在巴勒斯坦和今天的黎巴嫩——委员会的政敌质疑其所称的只有它才真正代表“天然边界内的叙利亚”及其权威已经取代国会的权威。“不久我们就听说（高级人民）委员会只召集了东部地区一些城市的某些知名人士，忽略了沿海和巴勒斯坦的代表”，一位《新叙利亚报》主笔抗议道：“我们如何在不顾整个运动都在要求建立一个包括沿海地区的叙利亚王国的事实下，解释没有邀请来自沿海地区的代表参加委员会？”[34] 为了回避委员会中为什么没有巴勒斯坦代表的问题，并确保其在巴勒斯坦的影响力，高级人民委员会与大马士革的其他团体和国民大会代表共同合作，成立了巴勒斯坦大学，并立即推动通过决议，宣布巴勒斯坦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移民。[35]

人民委员会举行的选举加速并验证了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其他地区新一代民族主义活动分子的出现。这些活动分子与最初组建法塔特和阿拉伯俱乐部的人有很大不同。根据在萨拉菲亚图书馆找到的选举名单和其他书面资料，可以对大马士革人民委员会 45 名二级领导人的背景进行追溯，各分支委员会主任、来自高级人民委员会分支委员会的代表以及与各委员会协同工作的组织者中的三分之一来自商人，另外三分之一来自乌里玛，后者中的约三分

之一也从事商业活动。与之前提到的组织不同，人民委员会的二级领导人中只有四分之一是政府雇员，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受到过专业培训。

选举活动带来的代表制原则的传播和经常性地广泛参与高级人民委员会及其分支机构发起的活动，标志着在叙利亚城市人口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关系，并预示着一种不同类型的地方政治领导在叙利亚的出现。尽管如此，人民委员会并没有忽视之前既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甚至对它们直接发起挑战。如下文所述，高级人民委员会、其分支机构和各国防委员会在一个单一框架内吸收了现有和新出现的权力结构。这种新与旧的暂时共存并不独特。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描述了19世纪末欧洲的“大众政党—连同—运动”的类似情景，这在导言中已经做了讨论。对于霍布斯鲍姆而言，这些运动的意义并不在于庇护人或领袖的消失，而在于他们在一个更大政治机器中角色的转变。这日益“使显贵，至少……免于孤立和政治无能，而非相反的结果”，霍布斯鲍姆补充说，

> 年长的精英们为了适应民主而改造自己，很可能对地方庇护和影响与民主进行了各种组合。事实上，旧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充满了旧式的“显要”和新式政治经营者、当地老板或控制当地政党命运的其他关键人士之间的复杂冲突。[36]

高级人民委员会及其成员以四种方式重塑传统的权力结构。第一，他们主张各级代表机构的特权，这一做法削弱了那些在选举程序外的人的优先地位。第二，人民委员会的存在刺激了既有名门望族成员与政治新贵和下级官员之间的权力竞争。第三，委员会以“国家”的名义，通过控制资源和执行他们自己之前赋予权威的职能来削弱城市权贵的权力和威望。最后，委员会通过支持选举出权限范围超出城区并延伸到整个国家的政治领

导人来削弱传统社区政治掮客的重要性。总而言之，通过将传统的权力结构纳入更大的框架，人民委员会削弱了这些结构，并加速了其崩溃。

高级人民委员会通过分支委员会（lijan far 'iyya）在大马士革的街区保持自身的持续存在。按照其章程的规定，这些委员会将包括从每个街区选出的6—12名男子，他们将充当居民与高级人民委员会之间的调解人。一方面，分支委员会负责执行高级人民委员会的政策；每个支部选举一个"监督委员会"（lajna taftishiyya）来"监督街区或城镇的人民，引导他们走上符合大众利益的道路，敦促他们实现人民委员会的目标，并向他们灌输一种和谐和秩序的精神"。另一方面，分支委员会向高级人民委员会传达人民的关切。这在每月一次的全体大会上进行，所有的居民都被邀请参加。此外，每个分支委员会还应随时了解高级人民委员会的政策，派出4名成员作为观察员参加上级组织每两个月一次的会议。[37]

虽然不确定分支委员会是否完全遵守了高级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指示，但报告证实，这些委员会的确在整个地区派驻了人员。在地方自发组织下，分支委员会出现在大马士革街区，诸如梅丹、沙古尔、马德哈纳特沙赫姆（Ma'dhanat al-Shahm）和巴布扎比亚（Bab al-Jabiya），也出现在霍姆斯、哈马，甚至远至巴勒斯坦的杰宁（Jenin）以及今天约旦的安曼和阿杰隆（'Ajlun）。[38] 马德哈纳特沙赫姆分支委员会在寻求高级人民委员会的承认时，发出以下电报说明其成立情况，并恳请委员会批准：

> 致人民委员会办公室：愿真主赐予你成功。
>
> 我们想让你们知道一群人已经在马德哈纳特沙赫姆的街区指定了一个办公处，作为贵委员会的一个分支，他们已经开始讨论国家的问题，（并且已经开始）争取附近民众的爱国贡献，并记录志愿者的名字来保卫我们热爱的祖国。为了使我们获得法律地位，使我们有权开会

讨论志愿活动和捐助问题，我们分发了这份请愿书，以待批准。

愿真主赐予你成功。[39]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防委员会可能会承担大马士革以外分支委员会的作用。在有些地点，这些委员会的活动和分支委员会的活动会出现重叠，包括行政管理、难民和贫困群体救济，在马德哈纳特沙赫姆分支组织的案例中还包括对“捐助”进行估价和收集。最重要的是，地方国防委员会有责任（用《地球报》的话说）“组织和准备防御运动，使它能以一个强有力的、坚定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以合理的方式提供物资和金钱，以支持志愿者及其家属；购买任何它们所需的供给品、军火和衣物；以及团结爱国运动和一切伟大的事业，与政府并肩追求国家的利益和幸福”[40]。

虽然目击者的陈述证明，在大马士革附近地区举行的会议常常吸引数百人参加，[41]但是并没有记录展现这些地方组织的日常运作情况，也没有记录表明这些组织产生了忠诚。由此看来，在最初的大众热情爆发之后，对高级人民委员会及其分支机构活动的支持随着政治事件的展开而出现波动。例如，1919 年 12 月的记录显示，大马士革高级人民委员会主办的军事演习的参加人数令人失望：尽管该委员会计划从其在大马士革的追随者中招募 1 000 名民兵，但地方分支委员会只承诺提供 527 名志愿者。即使如此，也只有一半的人参加了第二天清晨的训练。[42]当然，我们不能全然相信这些数据，这些数据确实没有考虑到专业人士和商人在被要求参加清晨穿越城市的演习时必须面对的后勤困难，也没有考虑到大马士革居民对任何类似义务兵役的臭名昭著的活动的反感，但是这些数据确实支持了《地球报》记者的观察，这份报纸一般对委员会并无同情态度，

人民委员会继续开展工作，并继续在整个地区建立分支机构，但

我不能否认我们几周前看到的严重忧虑已经完全消散。也许，这种局部的停滞是由于希望推迟到能够了解到埃米尔费萨尔抵达后的想法。因为这一原因，也许可以找一些借口……[43]

在《费萨尔—克列孟梭协议》签订和埃米尔于 1920 年 1 月从欧洲返回后出现的政治两极化似乎打破了叙利亚短暂的政治平静，促使高级人民委员会进行重振和改组。费萨尔对他与克列孟梭签订的临时协议引发的首都的爆炸性局势做回应时，试图分裂和拉拢那些反对协议的人，以削弱高级人民委员会重新出现的声望。他惩罚了那些参与训练志愿民兵的阿拉伯军队军官，组建了一个忠诚的反对派政党，并下令流放卡米勒·卡萨布等人民领袖。[44] 高级人民委员会领导层的回应是使其结构合理化，并强化该组织反对派的角色。

东部占领区高级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 月的第三周举行，以规划筹资等活动的集中与协调。[45] 2 月 1 日，与会代表选举了高级人民委员会第一个行政理事会（al-lajna al-idariyya），该理事会计划对所有人民委员会活动拥有广泛监督权。此前，成立一个行政理事会的想法在全国委员会领导层中流传了几个月。1919 年 12 月，同时作为高级人民委员会和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成员的欧麦尔·沙奇尔曾建议组建一个行政理事会，

其唯一职能是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组织委员会及其分支机构的活动。（行政理事会）除了秘书、会计和司库外，还将有 7 名成员。其工作将是准备会议议程的要点。它还将有权在其认为必要的时候召集人民委员会开会。

与此同时，沙奇尔还提议成立一个新闻局，该新闻局不仅将散播宣传

信息和行军命令，而且还将“惩罚那些传播背叛行为的人”。[46] 在第一个行政理事会成立一周后，卡萨布发表声明，宣布高级人民委员会高于所有党派，不会屈从于任何外部团体。[47]

记录显示选举出了两个行政理事会，第一个在 1920 年 2 月，第二个在同年 6 月。两个行政理事会的成员保持得相当稳定：从 1920 年 2 月至法国托管，在分别由 11 名和 12 名成员组成的两个理事会中，有 6 名成员长期在其中任职。除了卡米勒·卡萨布之外，成员还包括 4 名商人（经营纺织品生意的艾哈迈德·迪亚卜［Ahmad Diab］；经营大米生意的梅丹人阿萨德·莫哈伊尼［As ‘ad al-Muhayini］和阿卜杜勒·卡迪尔·苏卡尔［‘Abd al-Qadir al-Sukkar］；经营烟草和其他生意的舒克里·塔巴［Shukri al-Tabba ‘］）、3 名商人乌里玛（伊德勒·哈拉比［‘Id al-Halabi］、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阿卜杜拉·库兹巴里［‘Abdallah al-Kuzbari］）、2 名乌里玛（贾米·吉斯尔［Jami‘］的伊玛目和讲道者穆罕默德·塔吉［Muhammad al-Taji］；大马士革市政府前主席和地主纳西布·哈姆扎［Nasib Hamza］）、4 名具有政治经验的职业人士和军官（医生阿萨德·哈基［As ‘ad al-Haki］；工程师哈立德·哈基姆［Khalid al-Hakim］；前奥斯曼军队军官阿萨德·马利基［As ‘ad al-Maliki］；奥斯曼军队陆军前少校和奥斯曼议会成员阿乌尼·库达马尼［‘Awni al-Qudamani］）和 3 名政客或有经验的政治鼓动家（贾米尔·马勒达姆·贝克［Jamil Mardam Bek］；他的堂亲萨米·马勒达姆·贝克［Sami Mardam Bek］，曾是奥斯曼议会、大马士革上诉法院和费萨尔时期大马士革行政理事委员会成员；大马士革前税务副主任和阿拉伯政府税务主任穆罕默德·纳哈斯［Muhammad al-Nahhas］）。[48]

因此，行政理事会一些成员的职业和家庭背景与那些参加战前秘密社团或组建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的民族主义者相似。事实上，卡萨布、阿萨德、哈基姆和贾米勒·马尔达姆·贝克都曾是法塔特的早期成员。然而，

与大马士革人民委员会的二级领导人一样，行政理事会的总体构成与前面所讨论的民族主义团体有很大不同。17 名理事会成员中有 6 人接受过乌里玛的培训或受雇于乌里玛，7 人曾做过商人，其中 4 人（卡萨布、穆哈伊尼、苏卡尔和塔巴）与贾巴达亚（qabadāy）有联系。尽管行政理事会中有 4 名成员加入过战前的阿拉伯主义政治组织，但是其他几名成员一直是阿拉伯主义的公开反对者。贾迈勒帕夏曾提名萨米·马尔达姆·贝克在议会中作为大马士革代表，他曾代表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像纳西布·哈姆扎那样抨击奥斯曼行政权力下放党。阿乌尼·库达马尼也是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坚定支持者，在阿拉伯军队 1918 年 10 月进入大马士革之间，他在 1914 年毫无挑战的选举中获胜，进入奥斯曼议会。其他人则在 1918 年 10 月阿拉伯军队进入大马士革前建立短暂本土政府的尝试中发挥了作用：除了前面提到的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在赛义德·贾扎伊里的后奥斯曼政府中所扮演的角色，穆哈伊尼和苏卡尔家族都在梅丹招募了“国民卫队”（civil guard）志愿者部队，代表贾扎伊尔政府来维持秩序。有趣的是，那些在萨拉菲运动中（salafiyya movement）找到“阿拉伯民族主义”独一根源的人，都知道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是萨拉菲主义的著名反对者，他曾谴责拉希德·里达是“瓦哈比主义”（Wahhabism）的支持者。[49]

至少有一些行政理事会的成员应该支持在大马士革建立本土政府的努力，这并不奇怪。与法塔特和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不同的是，行政理事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大马士革人。他们对外来者一律持有怀疑和怨恨，无论外来者是加入阿拉伯政府的伊拉克人、巴勒斯坦人和汉志人，还是似乎决心分裂叙利亚的协约国，并体现在以下事实上：3 名叙利亚联盟前成员（卡萨布、哈立德·哈基姆和萨米·马尔达姆·贝克）从在埃及时就没有放下对埃米尔费萨尔和阿拉伯大起义的疑虑，以及 5 名成员（哈姆扎、哈提卜、库达马尼和马丹贝伊父子）同属高级人民委员会和本土主义的叙利

亚爱国党。根据一些报告，由于高级人民委员会和叙利亚爱国党的领导人都对谢里夫军感到不满，因此两方在 1920 年初夏联合起来组成了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50] 该党以叙利亚国民大会中与委员会有联系的集团命名，其行动纲领使传统主义社会议程与叙利亚社会相信的伴随谢里夫统治产生的外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统治有机论相对立。

另一个使高级人民委员会行政理事会的成员和大多数战前的阿拉伯主义者和自称与阿拉伯政府结盟的穆塔纳维尔相区别的差异是他们的年龄。尽管只有 5 位行政委员会的领导人的出生日期是可以确定的——伊德勒·哈拉比（1863 年）、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1874 年）、贾迈勒·马勒达姆·贝克（1869 年）、卡米勒·卡萨布（1873 年）、舒克里·塔巴（1865 年）——这些都是早于民族主义者的政治世代成员，属于上述两个类别中的一个或两个。行政委员会 5 名成员的出生年份的中位数为 1869 年，唐汇编的数据显示，“1914 年以前的民族主义者”和“1919 年至 1920 年的民族主义者”的出生年份中位数分别为 1886.5* 和 1883 年。[51] 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将看到的，自我标榜为穆塔纳维尔的人，他们自己通过在话语中强调和具化两个政治世代之间的经验差异，尤其是通常将“青年”与“老年”、“进步”与“停滞”常规并置，制造了一个代际团结的议题。

行政理事会成员的独特背景和广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是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幸事，他们往往是委员会发起项目获得成功的保障。艾哈迈迪·迪亚卜和舒克里·塔巴利用他们多年来建立的商业关系为委员会供应枪支；艾哈迈迪·迪亚卜和他的堂兄亚辛·迪亚卜利用他们的关系向首都提供其所需的进口食物。[52] 塔巴从他在卡纳瓦特的部下中组织了一个 50 人的部队，对法国人发动“圣战”。阿卜杜勒·卡迪尔·苏卡尔在梅丹拥有一个烤馕店，他经常把面包分给那些有困难的穷人，在梅萨伦战役前夜，他对追

---

* 1886.5 可能指的是 1886 年 5 月。——译者注

随者进行了动员。作为商人和学者，伊德勒·哈拉比同时与两个世界保持着联系：作为大马士革中心市场哈米底亚集市的一个布料商人，哈拉比作为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商业代表”在委员会和其他商人之间进行斡旋，以确保他们得到财政支持，并遵守委员会提出的定价安排。此外，作为卡伊马利亚区一个著名学者家族的代表，他与其他参与政治的乌里玛，诸如塔支丁·哈桑尼和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一直保持着联系。

然而，行政理事会对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地方分支机构日常活动的控制能力似乎极弱。从报纸上对该组织的报道和记录来看，行政理事会更多起到的似乎是装饰门面的作用，而不是真正的执行机构。此外，行政理事会的权力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分支委员会成员质疑该组织的活动，甚至质疑其领导人的个人信用。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曾被英国称为“趋炎附势的、狂热的骗子”，在一张高级人民委员会附属组织所发放的传单中也有对他的类似谩骂，一些地方附属组织成员甚至给卡米勒·卡萨布打电话，公开指责他涉嫌挪用资金——这些指控可能是阿拉伯政府和法国人发出的。[53]

尽管行政理事会的不同成员都可以获取资源，尽管存在腐败指控，但是在委员会重组后，权力似乎仍然掌握在卡米勒·卡萨布手中，卡萨布通过他的几个亲密伙伴，例如伊德勒·哈拉比，开展工作。成员、同情者、分支组织和阿拉伯政府写给高级人民委员会的许多信件，要么是写给“人民委员会主席”，要么直接写给卡萨布本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委员会中掌控着类似的权威或激起可以与之媲美的忠诚：即使在1920年6月阿乌尼·库达马尼公开指控卡萨布腐败后——这一指控曾迫使卡萨布辞去了高级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拥有个人魅力的谢赫在不久之后又重新成为领导人，在行政理事会选举中击败了所有其他候选人[54]。这是卡萨布从大马士革小资产阶级商人和乌里玛那里得到的唯一奉献，这些人构成了组织的次级领导层，这在一个有关谢赫卡迈勒·哈提卜的故事中有所展现。在

法国入侵前夕，

> 乌里玛和布道者（Khutaba）在敏拜尔上呼吁民众对法国人进行圣战，卡迈勒·哈提卜是其中最狂热的人之一。在他讲话的那一天，一名提问者问："您为圣战做了什么准备？您是用武器作战，还是用演说来战斗？"这些话激发了他，之后他买了一把奥斯曼步枪和十发子弹……他将步枪和子弹放在他的店铺门口，并且准备好战斗。在这时候，谢赫卡米勒·卡萨布骑马穿过城市的街道和集市，鼓动民众与法国作战。当（卡萨布）看到他时，他叫卡迈勒过来，对他说："你在哪里，谢赫卡迈勒？"谢赫卡迈勒指着他的枪，表示已经准备好了。[55]

卡迈勒·哈提卜在这些事情发生不久后的梅萨伦战役中去世。

当然，将民众对高级人民委员会及其分支机构的认可仅仅归因于卡米勒·卡萨布的个人属性有些过于简单化。这些委员会之所以得到民众的支持，部分原因是它们将以前存在的各种非正式网络结合在了一起，将居住在其街区和村庄中的个人联系在了一起。例如，许多来自同一个大家族的男子积极参加人民委员会；仅在大马士革，至少有4名哈基姆家族成员（阿萨德、哈希米、哈桑、哈立德）、5名哈拉比家族成员（阿卜杜拉、哈希米、伊德勒、卡迈勒、纳兹［Nazih］）、9名哈提卜家族成员（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卜杜勒·拉扎克［'Abd al-Razzaq］、哈桑、哈立德、穆罕默德·里达、姆西布丁、萨拉赫丁［Salah al-Din］、扎齐［Zaki］）和5名库达马尼家族成员（艾哈迈德、阿乌尼、米罕默德、里达、苏布希）在高级人民委员会担任主要或次要领导职务。此外，不止一名阿齐勒（'Aqil）、迪亚卜、哈伊尔、拉哈姆（Laham）、马尔达姆·贝克、莫苏里（Mosuli）、穆哈伊里（Muhayri）、卡巴尼（Qabbani）、萨曼（Samman）、谢

赫阿尔德（Shaykh al-Ard）和斯巴伊（Siba ‘i）家族的成员是次级领导。家庭网络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层和次要领导层之间提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联系，尽管是非正式的联系。在姆西布丁·哈提卜的自传中，他描述了在法国占领大马士革之前的日子里，这些家族如何帮助了委员会指挥的动员：

> 这些回忆录的作者所居住的街区是卡伊马利亚，与基督教社区为邻。由于担心在混乱时期（1920年7月）发生团体冲突，他召集了大批属于哈提卜家族的亲属，特别是其中的乌里玛，向他们提供步枪……哈提卜家族的谢赫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高级人民委员会的成员……驻扎在街道和基督徒街区的各个地方，维护着和平，并且威吓着任何想找麻烦的人。[56]

血缘关系与其他纽带相互重叠并相互加强，将街区居民彼此联系起来，并与委员会联系起来。所谓“商人乌里玛”在委员会组织扮演的角色，或许提供了高级人民委员会及其附属组织是如何从家庭、职业和市场纽带中获利的最显著的例子。乌里玛商人主要是零售商，他们经营诸如纺织品的商品。虽然他们是宗教教育的受益者，但他们往往缺乏适当的家族联系，缺乏这种联系使他们无法定期被委任为布道者、伊玛目或者穆夫提。在日常生活以外，他们时而学习，时而受雇成为宗教工作人员，时而在教学间隙从事商业活动，将一天的时间在集市和清真寺间进行分配。[57] 因为商人乌里玛来自小资产阶级背景的家族，来自那些家道中落的显赫家族或显赫家族中的贫穷分支，他们留守在了大马士革拥挤的街区，此时地主官僚中地位较高的人则越来越多地从中迁出。因此，商人乌里玛继续依据所在街区、当地市场和传统教育的轮廓来构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58]

哈提卜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这个家族自19世纪早期以来在

大马士革事务中一直很重要，但委员会的活动分子来自家族的一个分支，根本排不到社会顶层。来自哈提卜家族的成员虽然越过了高级民族委员会的二级领导层，并得到了邻里的尊重，但是他们的地位并不是通过培育个人依赖关系获得的。相反，他们的权威来源很是平淡无奇：因为至少有 5 名哈提卜家族成员是乌里玛，他们同时在布祖里亚和卡勒巴克吉亚（Qalbaqjiyya）的集市从事小生意，他们为广大日常所接触的大马士革人所熟知，并受到这些人的尊重。[59]

商人、商人乌里玛和乌里玛之间互相重叠和相互关联的网络的存在，也许是大马士革各地的集市和清真寺在费萨尔时期成为政治组织温床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在卡勒巴克吉亚集市，哈提卜与其他商人乌里玛，如纳吉布·齐万（Najib Kiwan）和塔哈·齐万（Taha Kiwan）交往密切。与哈提卜家族成员一样，民族主义政治也是齐万家族成员的家族事业：亚辛·齐万与谢赫哈姆迪·祝瓦扎尼（Shaykh Hamdi al-Juwajani）组建了在梅萨伦作战的民兵部队，他和阿卜杜勒·卡迪尔·齐万（'Abd al-Qadir Kiwan）曾是伍麦叶清真寺的伊玛目，都在战役中牺牲。同样，在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ha）集市，政治上活跃的谢赫马哈茂德·阿布·沙马特（Mahmud Abu Shammat）和他的 10 个儿子与来自塔巴家族商人乌里玛交往密切。[60]

来自同一社会环境的其他乌里玛加入了大众民兵，并 / 或利用其职位动员周围的人。贾米·图巴（Jami' al-Tuba）的赛义德·巴勒哈尼（Sa 'id al-Barhani）、卡勒巴克吉亚宗教学校（Madrasat al-Qalbaqjiyya）的穆罕默德·法赫勒（Muhammad al-Fahl）和穆罕默德·阿什马尔（Muhammad al-'Ashmar），他是一名社区领袖，有 40 人至 50 人的手下，[61] 他们和阿卜杜勒·哈米德·卡利姆（'Abd al-Hamid Karim）一样都在梅萨伦作战。卡利姆是一名警察出身的学者，也是卡米勒·卡萨布的亲戚。梅萨伦战役后，法国人迫使卡萨布流亡，卡利姆接管了学校。图菲克·达拉（Tawfiq

al-Darra）是一位商人，曾是奥斯曼第五军团的穆夫提，在法国入侵前夕他宣扬“圣战”，并在战役中牺牲。萨达特清真寺（Masjid al-Sadat）和息南帕夏清真寺（Masjid Sinan Pasha）的阿里·达卡尔（‘Ali Daqqar）更为幸运，他在梅萨伦战役中得以幸存，宣扬反对法国统治的学说。[62] 这些乌里玛拥有一种道德权威，激励着他们的邻里和同伴，使他们与人民委员会的联系特别有价值。因此，为北非侨民和商人子女创办宗教学校的穆罕默德·谢里夫·亚库比（Muhammad al-Sharif al-Ya ‘qubi）领导了一支由自己学生组成的队伍，在法国入侵叙利亚内陆的前夕，大马士革“乌里玛组织”（munazzamat ‘ulama’ al-din）的一个分支也在附近的杜马村聚集，当他号召发起对行进中的敌人的圣战时，据说有 500 名志愿者作出回应，汇集在大马士革。[63]

有相当一部分较富裕的商人，包括以谷物贸易为生的莫哈伊尼家族和苏卡尔家族的人也与乌里玛和乌里玛商人有着相似的基本特征，因此，他们参与高级人民委员会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也是非常宝贵的。正如菲利普·库里所指出的，将大马士革富裕的“穆斯林商业资产阶级”与更低社会阶层的商人联合起来的是“传统”的街区教育经历。这自然使他们不同于那些在西方或奥斯曼职业学校受过先进教育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者。[64] 因此，他们不仅具有大众的偏见，而且由于其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在市场的迫切需要和当地居民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因此，他们对大众冲动保持着回应，他们对呼吁国防的回应就表明了这一点。此外，通过家庭和职业关系以及基于地位产生的义务，他们得以与一系列社会关系相联结，包括与更为贫穷的同胞之间建立联系，这一关系网络促进了大众动员。

出于其他原因，高级人民委员会也将商业阶层视为天然的支持者群体。如导言所述，所有类别的商人，从参与零售贸易的小资产阶级商人学者到从事长途或大规模贸易的企业中的商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憎恨谢里夫政权

并且对协约国做出最坏的预期。他们的敌意并非无缘无故：阿拉伯政府将东部占领区的财政困境归咎于商人，试图通过统统没收他们的货物、限制奢侈品贸易、颁布严厉的商业法规来防止囤积、结束垄断和降低价格，以此对付他们。高级人民委员会对商业阶层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一部分原因是商人被纳入了其领导层，另一部分原因是委员会政策的成功执行需要商人的合作和财政支持，高级人民委员会通过建立一个与商人合作的商业部门、认可下属委员会的商人建立垄断和组织一场抵制可能具有破坏性的法国货币和贸易政策的政治运动，来积极争取商人的支持。[65]

将商人、商人乌里玛和乌里玛联系在一起的社团和家庭纽带也将这些团体与当地的贾巴达亚特（社区领袖）联系起来，高级人民委员会正是依靠这些领袖来动员城市人口。社区领袖通常从下层和中下层家庭中招募，他们在社区中享有的声望有两个来源：他们提供的服务和自我夸张的神话。由于20世纪初的大马士革政府很少提供有效的警察保护，每个街区有20名至40名贾巴达亚特夜间在街道巡逻，并为那些支付了著名的“一千里拉”（thousand lira）的商人的店铺提供护卫。为社区提供保护，使其免受来自其他街区犯罪分子或捣乱团伙的伤害，这加强了他们作为保卫弱者免受外来者和强权掠夺的保护者形象，并确保了与从事商业活动群体的密切关系。[66]

将贾巴达亚特与祖朗（zu ‘ran，普通罪犯）相区分的是与前者相关的神话。就像他们可能模仿的古老的福图瓦兄弟会（futuwa brotherhoods）成员们一样，贾巴达亚特发誓要维护一种骑士准则，其中不仅包括对弱者的人身保护，也包括保护穷人免受富人的掠夺。例如，他们保障粮食和面包的“合理价格”，并监督向该地区的贫困者发放福利。因此，贾巴达亚特了解并负责司法和道德行为的活动与乌里玛群体出现了重叠。贾巴达亚特利用当地清真寺举行会议和仪式，至少在理论上讲，他们负责履行乌里玛的请求。因此，商人、学者和贾巴达亚特之间既有功能上的联系，也有家族

的联系。就人民委员会而言，贾巴达亚特的合作是封锁街区和集市、招募民兵志愿者、防止宪兵和其他政府代理人对街区的渗透和筹集继续开展活动所需的“捐助”的先决条件。[67]

尽管商人和贾巴达亚特之间的联合可能是相互获益的，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摩擦的。相反，这种关系的维持主要是通过勒索保护费、暴力威胁，以及选举或家庭关系来实现的。高级人民委员会在其筹款活动中利用了贾巴达亚特的名声和才干。尽管高级人民委员会和分支委员会的章程规定，该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为捐款，而且清真寺还为委员会的代表留出了房间来收取“参与费”（ishtirak），但很快便入不敷出。[68] 因此，委员会授权地方代理来收取 2% 的个人财富税。然而，征税是困难的：根据一份英国报告，该委员会征税并不平等，而且在征收时“主要是通过威胁和勒索向邻里的富商和地主征税”[69]。

大马士革的高级人民委员会及其在首都以外的附属机构也依靠其他筹款策略。外国观察家援引了有关粮食投机买卖和军火走私的传闻，以及凯末尔主义者的资助，他们希望叙利亚人利用他们的补贴开辟对抗法国的第二战场。[70] 总的来说，高级人民委员会似乎允许其附属机构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来尝试各种筹资办法。例如，在阿杰隆（‘Ajlun）设立的委员会分支，“固定捐款”的比率是从该地区农村所征税收的 50%。阿杰隆的委员会还声称已经从（政府）雇员那里征收了 3 万库升（qurush），分别从地区妇女协会和地方显贵那里收到 350 马吉迪斯（majidis，一种银币，值 20 库升）和 30 000 库升捐款。在积累了相当于 60 万库升的资金来装备和供养一支民兵队伍后，阿杰隆委员会开始招募志愿者，并登记了所有年龄在 20 岁至 40 岁之间的男子。“付款是不间断的”，该城区的地方长官（qā’immaqām）在给《首都报》编辑的信中夸张地写道：“大多数人都充满了爱国热情。人们宣称，只要有必要，他们愿意献出自我和金钱。”[71]

高级人民委员会还要求阿拉伯政府支付报酬，理由是该委员会提供了阿拉伯政府应当提供但是没有提供的国防和救济等公共服务。委员会重组后不久，卡萨布就要求政府交出代服兵役费的所有收益，“来帮助招募士兵并增进现役士兵的福利”。费萨尔拒绝后，卡萨布又要求从阿拉伯政府的战争税（wīrkū）收益中获得 5%，但也没有成功。[72] 他后来的请求可能取得了更多成效：在法国入侵前夕，法国驻大马士革联络官报告说，该委员会从国防部收到了价值 2 万埃及镑的贷款，其中一半用于建立民兵组织，另一半自由支配。[73]

卡萨布认为，高级人民委员会、其附属机构和国防委员会为政府提供了必要的服务或掌握了政府的权力，这并非虚张声势：政府成员和大多数民众不仅指望委员会提供服务，而且指望它在国家和公民之间进行调解。当附近一个被法国烧毁的村庄的难民涌入哈马时，内政部呼吁高级人民委员会为难民提供临时住所和食物。[74] 应首都居民的请求，高级人民委员会与市政府进行交涉，要求以低价供应充足的大米，然后，该委员会依靠设在叙利亚和国外的商人网络，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从埃及进口大米和其他谷物（盈利）的授权。[75] 同样，1920 年 6 月《基纳纳报》报道称：“许多人（在大马士革）向卡萨布抱怨目前的城市管理，所以他去找政府，要求政府考虑他们的要求。”[76] 最终，阿拉伯政府自己不得不承认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影响力：为了确保国民对国家贷款的支持，阿拉伯国家政府任命卡萨布为监督政府公关活动的九人委员会主席。这场运动的结果之一是，1920 年夏天在大马士革的报纸上出现了整版广告，例如：

> 你想要一个拥有国防、独立、自由、受外国人尊敬的政府吗？你想在自己的国家和家里成为主人吗？参加叙利亚国家贷款（Syrian National Loan）——因为独立是靠武力获取的，不是作为礼物被给予的！[77]

然而，高级人民委员会存在的理由是国防，委员会组织了1 000名民兵保卫大马士革，这只是其一小方面的成就。除了支持国防委员会的活动（将在下一节讨论）外，高级人民委员会还帮助组织游击队，动员车特和部落支持民族主义事业，并向各种军事和准军事编队提供援助，以对法国人进行持续的进攻。

由于农村安全和东部占领区经济的崩溃，游击队数量在阿拉伯政府的第二年出现了激增。贝都因人和车特的劫掠活动使大部分乡村陷入混乱，并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劫掠的自生经济：他们的家园和收成被毁，商业活动陷于停顿，农民、难民及奥斯曼和阿拉伯军队的逃兵通过加入武装组织和洗劫邻居的家和收成来避免挨饿。反过来，这些遭到劫掠的人几乎没有选择，同样通过在农村进行掠夺来维系生活，以此不断循环。高级人民委员会向游击队领导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以招募逃离家园的人，特别是在拥挤的叙利亚城市中寻求庇护的人。[78] 格特鲁德·贝尔采访的一位线人称："所有从阿勒颇、乌尔法（Urfa）、安泰普（Ain Tab）、比雷吉克（Birjik）、马拉什（Marash）、拉斯艾因（Ras al-Ain）、杰拉布鲁斯（Jarabulus）等地周边的村庄来的进入阿勒颇的农民，将自己登记为'查塔'（Chattah），获得了来自大马士革的武器和弹药……比动员时期要好得多（Kan al-safarbaaliq ahsan bi kathir）。"[79]

各种各样的部落、教派和乡村领导者也加入了高级人民委员会。从库奈特拉（Qunaytra）可以俯瞰戈兰高地，法德尔（Fadl）部落的马哈茂德·法乌尔（Mahmud Fa'ur）在这里指挥着一支由近2 000名部落骑兵和步兵及400名梅丹地区志愿者组成的武装力量。[80] 艾哈迈德·穆拉维德作为法塔特中异见者派的成员和叙利亚国民大会的代表，辞职后回到盖泰纳（Qatana）组织了一支由70名骑兵组成的队伍。穆拉维德的骑兵与库尔德人、切尔克斯人和部落征兵（包括来自法乌尔的法德尔部落中的约1 000

人）一道，在今天黎巴嫩境内的迈尔季欧云、拉谢亚、什图拉（Shtura）和穆阿拉格与法军作战。[81] 黎巴嫩南部有 6 个大封建地主（Muqāta ‘jī）家族，卡米勒·阿萨德来自其中的一个家族，并且是多达 4 万名穆塔瓦里们（Muttawallis，一个叙利亚什叶派分支）的领袖。他率领 2 000—6 000 名追随者攻击靠近巴勒斯坦边境的艾因埃贝尔（‘Ayn Ibl）的一个信仰基督教、亲法国的村庄，造成 50 人至 80 人伤亡。[82]

虽然这些群体居住在分隔东西两区的边境附近，但委员会也将目光投向了阿拉伯政府管辖之外的领土。委员会中的积极分子计划组织对巴勒斯坦、约旦和沿海地区的出访，并列出了居住在那里的支持委员会的领导人的名单，指出他们可以召集的武装支持者人数。一名委员会成员抱怨说：“这里（大马士革）的那些巴勒斯坦人不代表（他们的）国家。”他提交了一份为期 32 天的去巴勒斯坦走访的行程表。拟议中的行程从库奈特拉出发，包括吉斯尔贝纳特雅库布（Jisr Banat Yacub）、提比利亚（Tabariyya）、拿撒勒（Nazareth）、采法特（Safed）、海法（Haifa）、图勒凯尔姆、纳布卢斯、耶路撒冷（Jerusalem）、拉姆拉（Ramleh）、加沙（Gaza）、希伯伦丘陵（Jabal Khalil）、贝尔谢巴（Beersheba）、萨勒特、古勒（Ghur）、拜勒加（Balqa’）和安曼。他断言，这次出访将使委员会能够确保被列入名单中的部落首领（umarā）和显贵（wujahā）的忠诚，他们将通过召集约 10 万名战士参加高级人民委员会来“点燃这个国家”。最终，委员会似乎只是批准了一个删减版的计划。另外一名积极分子提出要穿越黎巴嫩，敦促地方领导人“开始从男性中组建游击队（‘isābāt）。（这些领导人）将拥有绝对的权力来进行爱国革命（al-thawra al-wataniyya），并在叙利亚西部点燃反对外国占领的战火”。他在提出建议的同时还附上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 40 位知名人士，声称他们可以募集 30 000 人。[83]

除了爱国主义外，还有一些因素促使部落和游击队领导人组织、加入

或与高级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们进行通力合作。对于一些人来说，政府对农村缺乏控制提供了解决宿怨或抢劫问题的机会。例如，在卡米勒·阿萨德率领穆塔瓦里们袭击艾因埃贝尔期间，“女人们敦促并（帮助）他们带走战利品，包括家具、窗框、扫帚，甚至木材”。对于其他人，如定居的法德尔部落，乡村的军事化剥夺了其他选择。还有一些人憎恨政府的干预，或者担心法国或英国占领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例如，根据一位观察者的说法，阿拉维派（Alawite）的领导人萨利赫·阿里（Salih al-‘Ali）在法国给予与他们合作的村民打折的土地之后发起起义，这是第一次针对法国人的反抗活动。[84]

就其自身而言，高级人民委员会从农村动员中获得的不仅仅是反复侵扰法国人的机会。一旦地方领导人对法国前哨或（通常是基督徒的）邻居进行了“英勇的”突袭，委员会领导人就会邀请他们参加大马士革的会议，让他们出席游行或带上他们进行巡游，在此过程中激发城市民众对传说中贝都因部落军事能力的幻想。[85] 1920 年 7 月，在法国人向阿拉伯政府发出第一次最后通牒之后，卡米勒·卡萨布在民主党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其中宣称：

> （克列孟梭）已经要求发起保卫荣誉和祖国的运动的国家领导人们投降。我们应该交出丹达什（Dandashi）部落的埃米尔们、埃米尔马哈茂德、卡米勒·阿萨德、谢赫萨利赫·阿里和其他领袖吗？
>
> 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从一位领导人那里得知一个可靠的消息，谢赫萨利赫·阿里召集了3 000人，他们宣誓效忠民主党，他对我说，他将服从于民主党在大马士革的理事会。
>
> 啊，兄弟们！我们的父辈并不懦弱。他们带着信心和坚定的信念与强大的敌人作战。让我们效仿我们的先辈，把我们的血与泪融进我

们从他们那里继承的土地……要知道，民主党是叙利亚最强大的政党，因为丹达什人和浩兰人（Hawranis）、浩兰的德鲁兹人（Druze）和阿拉维人（Alawites）都已经加入了民主党。做一个独臂之人，割断那只想要给你们带来伤害的手臂，与所有那些渴望我们幸福与进步的人和平相处。[86]

高级人民委员会利用其与贝都因人和游击队的联系，为城市店主和作为其主要支持者的下层阶级谋福利。在把小规模的袭击当作伟大的军事胜利来庆祝的过程中，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宣传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法国进入东部地区的任何行动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在一群高贵的阿拉伯战士面前的失败。[87]

国防委员会

除了向车特和部落提供支持外，高级人民委员会还与地方国防委员会进行合作。虽然这些委员会最初是出于军事目的建立的，但是对动员的迫切需要迫使它们也承担了许多其他职能。因此，地方国防委员会的扩散产生了范围广泛且常常无法预见的后果。这些委员会将地方领导人彼此联系起来，并与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机器联系在一起[88]，使连接城镇和农村的纽带政治化，扩大了流行的民族主义习语的影响范围，在某些情况下促进了新的地方领导层和新的治理机构的出现。

虽然高级人民委员会鼓励这些委员会的扩展（虽然大多数似乎是由当

地团体自行建立的），并为它们的日常运作提供各种援助，但这些委员会和高级人民委员会之间的确切关系很模糊。法国领事馆档案中保存的一份传单提到了“国防委员会大会”（Congress of Committees of National Defense），但是在萨拉菲亚图书馆的资料中并没有提及这一机构。大会可能是临时的、非正式的存在。[89] 图书馆中的一份文件确实阐明了高级人民委员会与“国防委员会行政委员会”（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f National Defense）之间的关系。这份文件赋予了行政委员会五项职能：

1. 执行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制定全体成员大会议程，并召开特别会议；

2. 监督分支委员会的工作，并与它们就涉及高级人民委员会的事务进行协商；

3. 每日报告各分支委员会在防御方面所做的工作；

4. 与首都之外的委员会进行协商，并协调它们的活动；

5. 与当地领导人就国防问题进行沟通，协调他们的活动，向他们提供信息，向国外传播他们活动的消息，并向高级人民委员会报告地方发展状况。[90]

从这份文件和其他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除了与大马士革不断进行个人、电报和电话间的联系，地方委员会仍然享有很大的自主权。根据一份叙述称，地方委员会甚至与高级人民委员会就重要的政策问题进行了争论，例如对法国向阿拉伯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作出适当反应的问题。[91]

因此，如第一章所讨论的阿拉伯俱乐部的地方分支机构一样，地方国防委员会经常在小规模的地区政治和社会结构中被复制并不足为奇。例

如，北部贝卡山谷的巴勒贝克（Ba ‘albek）国防委员会分支由该地区黑达尔家族的苏莱曼（Sulayman）分支成员主导，是当地最有权势的穆塔瓦里（Mutawalli）地主家族。该委员会的政治领导人包括图菲克·贝伊·苏莱曼（Tawfiq Bey Sulayman）、他的两个儿子（法里德和穆斯塔法）和穆罕默德·黑达尔博士，负责监督在巴勒贝克周围的村庄分发武器和金钱，以及组织反法示威。他们也监督与大马士革高级人民委员会之间进行的联系，高级人民委员会为其提供军事顾问、财政支持和后勤供应。苏莱曼 / 黑达尔的显赫地位方便了地方国防委员会在当地进行筹款：这个家族不仅从当地其他权贵和家臣那里“征集捐款”，还从对临近村庄和穿过贝卡谷地铁路的袭击中获得战利品。对于委员会来说，袭击是特别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农民袭击火车”，一位法国观察员抱怨道，“因为他们受到战利品的诱惑”。[92]

尤素夫·穆哈伊巴尔·苏莱曼曾接受过律师培训，战前曾参加文学社的活动，他领导了委员会的军事活动。根据法国的消息来源，他的游击队的核心成员来自他在贝特纳伊勒（Bayt Na’il）老家的家臣和家属，其中包括“中等收入者、失业的工匠、来自农村的村民和职业土匪”。巴勒贝克的国防委员会在山谷中发起了针对法国人的军事行动，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些最血腥的战斗。从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说的 1919 年 12 月发生在里亚格（Rayaq）的“无关紧要的斗争”开始，对抗在叛军强行将法国联络官从巴勒贝克带走后开始升级。在 12 月余下的时间里，法国军队试图通过占领穆阿拉格、里亚格和巴勒贝克来重申他们对该谷地的控制，在所谓“服务于大马士革极端主义政党的土匪”手中造成了“相当多的伤亡”。[93]

因此，国防委员会受益于将农村和城市显贵与那些耕种他们的土地、向他们借钱的普通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而且一般来说，国防委员会依赖于他人提供的资源。有时，由城市显贵监管的家臣和客户网络可以延伸到

遥远的乡村。举例而言，在霍姆斯最富有的家族中，每个家族都拥有 45—60 个位于周边平原的村庄，其中部分有贝都因人定居。[94] 尽管他们的游牧或半游牧亲属称他们为农民（fallāhin），但种植者并不是唯一与城市显贵家族保持密切关系的部落民。城市居民充当着部落领袖的银行家和商人，有时通过婚姻关系加强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结合将霍姆斯强大的阿塔斯和里法伊（Rifa ‘i）家族分别与巴努·哈立德（Banu Khalid）和阿赫萨纳（Ahsana）部落联系起来，并将同在霍姆斯的杜鲁比（Durubi）家族和未勒德·阿里（Wild ‘Ali）、乌卡达亚特（‘Uqaydat）和马瓦里（Mawali）联系在一起。[95] 来自阿塔斯和杜鲁比家族的代表在霍姆斯国防委员会中占有突出地位：欧麦尔·阿塔斯（‘Umar al-Atasi）和穆赫伊丁·杜鲁比（Muhyi al-Din al-Durubi）分别担任过委员会主席，欧麦尔和瓦斯菲·阿塔斯（Wasfi al-Atasi）从大马士革获得补贴，用于管理委员会的活动。[96] 与“阿塔斯们”（atasiyyūn）和“里法伊们”（rifa ‘iyyūn）一道，部落征兵不仅于 1919 年 12 月在贝卡谷地的泰勒凯莱赫（Tall Kalkh）与法军作战，而且在霍姆斯国防委员会于 1920 年 7 月开始准备抵抗入侵的法军后，预计有 15 000—16 000 名来自泰德穆尔的贝都因人在两天之内来到这座城市。[97]

国防委员会不仅能够广泛召集部落成员和家臣网络，而且彼此之间还定期通过相互协作加强其力量。塔勒最显赫的地主家族丹达什部落的成员，在看到该镇居民抵制法国在当地建立军事存在的努力后，成立了一个国防委员会。随着该城镇的战斗升级，霍姆斯和的黎波里的国防委员会派出增援部队，与德鲁兹酋长苏丹·阿特拉什（Sultan al-Atrash）率领的大马士革特遣队并肩作战。[98] 以同样的方式，萨利赫·阿里不仅率领追随者袭击法国在塔尔图斯的仓库和该地区信仰基督教的村庄，而且在霍姆斯和哈马国防委员会及大马士革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协助下，在叙利亚西部的卡德姆斯（al-Qadmus）镇建立了一个训练志愿战士的基地。[99]

阿勒颇的国防委员会提供了相当详尽的关于城市显贵、地方国防委员会、部落和游击队之间权力分配的情况描述。该委员会是一群阿勒颇杰出人士的努力结果，这些人自称是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的安萨尔（ansār，意为党派），他们受到亲土耳其的感情、对英法意图的不信任与对大马士革的疏远的鼓舞。[100] 1919 年 8 月，也就是“撤离危机”爆发前 1 个月、高级人民委员会成立前 3 个月，凯末尔的安萨尔开始策划一场以叙利亚为基地的针对法国的军事行动，以便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相配合。但是，这些安萨尔在整个 8 月里不过是创办了一份报纸，并为该市的其他显贵举行会晤。[101]

随着“撤离危机”的爆发，那些响应安萨尔宣传的人的圈子得到了扩大，因为阿勒颇人对英国撤军的反应与大马士革人基本相同。在驻扎在阿勒颇的阿拉伯军师长、当地阿拉伯俱乐部成员、亚辛·哈希米的亲信鲁什迪·萨法迪的催促下，一些显贵开始在各个城区和公共区域组织志愿民兵。每位组织者都被授予少校军衔，并受命指任自己的上尉和中尉。[102] 例如，在卡西勒区（Qasila），艾哈迈德·卡德鲁·马斯里（Ahmad Kadru al-Masri）组织了一支 680 人的民兵队伍，帮助该市维持秩序，并与当地阿拉伯俱乐部的哈只·纳吉布·巴吉一道工作，在调动他所在地区的资源为哈纳努起义（Hananu Revolt）提供后勤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03] 巴布·尼拉卜（Bab al-Nayrab）是一个有 12 000 名居民的街区，与大马士革的梅丹相似。坎朱·哈马达和阿卜杜拉·法特赫·贝塔尔（‘Abd al-Fath al-Baytar）都是显赫家族的首领，加上同样显赫的巴里（Barri）家族成员和几个次要人物，他们建立了一支由机枪营、步兵和骑兵组成的民兵队伍。在此之前，这一地区的居民与梅丹的居民一样，曾极力抵制阿拉伯政府的征兵政策。“如果敌人到来，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守住自己的阵地，不需要让他们的儿子穿上制服，不用让他们更爱国或更勇敢，”驻扎在城市的法国联络

官在向巴黎的上级报告时说。“此外，他们意识到，招募人员只不过是试图加重大马士革国库的亏空，官员将得不到薪金，士兵得不到供给。”尽管如此，该地区的居民参加了志愿部队，这些部队后来构成了4 000名起义分子的核心，他们于1920年7月21日袭击了阿勒颇要塞。[104]

11月初，民兵领导人、安萨尔及地方和省级行政人员将民兵并入全市国防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名单读起来就像阿勒颇的“名人录”。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政府领导人（市长伊赫桑·贾比里；行政委员会成员法西勒·贾比里［Fakhir al-Jabiri］；土地登记处主任沙菲克·贝伊［Shafiq Bey］）、阿拉伯俱乐部活动家（阿卜杜勒·拉赫曼·卡亚里、阿卜杜勒·瓦哈卜·特拉斯［‘Abd al-Wahhab Tlas］和苏布希·巴勒卡特［Subhi Barakat］）、安萨尔（夫阿德·阿德里［Fu’ad al-’Adli］和法特赫·马尔阿什里［Fath al-Mar ‘Ashli］）和民兵领袖（里达·里法伊和萨迪克·里法伊）。此外，《观点报》（*al-Rāya*）的编辑穆尼布·纳图尔（Munib al-Natur）和两个富商阿卜杜勒·卡迪尔·贾斯马提（‘Abd al-Qadir al-Jasmati）和哈只·艾哈迈德·穆亚萨尔（al-Hajj Ahmad Muyassar）也加入了委员会。[105]由此组成的阿勒颇省国防委员会在正规军士兵的监督下每周进行两次军事演习，每周四下午在市中心举行民兵和部落士兵的武装示威。[106]

促成阿勒颇一些杰出公民参与组建委员会的因素是多样的。一些人的动机无疑是因为有机会参加一个承诺在动荡时期提供权力的组织。其他人可能是被民族主义情绪所吸引，或者相反，希望他们在委员会中可以缓和民族主义的目标。从来自贾比里家族的成员们看，家族竞争对他们参加委员会可能也发挥了作用：贾比里家族陷入了与富有和实力强大的沙巴尼家族（Sha ‘banis）的竞争中，后者参加了支持凯末尔主义的运动。除去别的原因，参与委员会也使贾比里家族的成员显示出他们的民族主义资历。也

有可能是一些不太知名的委员会活动家为寻求市政府要员的支持，将这些杰出公民置于重要位置，以扩大该组织的吸引力、合法性和筹款基础。

然而，到1920年春天，一群有影响力的阿勒颇家族，包括贾比里家族，开始与这一越来越民粹化的组织保持距离。不仅阿卜杜勒·哈米德·贾比里辞去委员会主席一职，而且贾比里家族及其盟友还向阿勒颇省省长和叙利亚国民大会递交请愿书，抱怨该组织的活动。[107] 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的领导人的出现，其中包括法特赫·马尔阿什里，他是安萨尔的初始成员，曾亲自与穆斯塔法·凯末尔谈判；萨迪克·沙辛·哈塔姆（Sadiq Shahin al-Khattam），据称他特别善于从商人那里获取资金；还有里达·里法伊，他和卡米勒·卡萨布、阿卜杜勒·库兹巴里、哈基姆家族、伊德勒·哈拉比、舒克里·塔巴及其他少数人一道，创建了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108]

使委员会分裂的两个重要原因是筹款问题和对游击队武装的支持问题。随着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给委员会的自愿捐款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凯末尔主义者同意与法国停战，并暂停了对其南方盟友的财政支持。为了资助其军事行动和维持对全职游击队员家属的付款，该委员会越来越多地依靠勒索、强迫征税、发放垄断许可证（如大米和其他谷物的垄断许可）和武装走私（据称，马尔阿什里从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109] 一份特别带有敌意的筹款呼吁书由马尔阿什里、里法伊和哈塔姆共同签署，开头这样说：

> 我们不要求任何能使你获得回报的救济或施舍。
>
> 相反，我们邀请你为保卫家园尽到自己的职责。
>
> 如果响应我们的呼吁，你就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你表示拒绝，我们将继续监督你的行动。[110]

大地主们对游击队掠夺行为的抱怨加剧了争端。促进游击活动是阿勒颇国防委员会最重要的职能。国防委员会在示威活动、政治集会、剧院和电影院中为游击队招募新兵，并向游击队领导人及其追随者提供物资。据一位法国人士称，该委员会向新车特提供 5 个金镑、一支步枪、一百发子弹，有时还提供一匹马。委员会还协调游击队进行突袭，并为来访的战士提供安全住所。[111]

委员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游击队领袖可能是易卜拉欣·哈纳努。哈纳努的父亲是一名富有的乡村显贵，在阿勒颇担任过各种政府职位。易卜拉欣·哈纳努从他的家乡卡夫尔塔赫里姆（Kafr Takhrim）村当选为叙利亚国民大会的代表，他辞去了职务，回到家乡参加了对法国的军事行动。起初，他组织了对苏布希·巴勒卡特行动的后勤支持，巴勒卡特是活跃在安条克周边地区游击队的队长。然而，在阿勒颇国防委员会的支持下，哈纳努很快就掌控了自己的游击队网络。[112] 委员会的支持对哈纳努的战役至关重要：委员会不仅向哈纳努提供武器和财政援助，还推动了他在当地乌里玛中的活动，通过号召对法国人的圣战，说服乌里玛支持他的运动。委员会还争取到了阿拉伯军第二师领袖易卜拉欣·沙古里（Ibrahim al-Shaghuri）的支持。在易卜拉欣·沙古里的帮助下，哈纳努开始在卡夫尔塔赫里姆监督四个班的部署，每个班有 10 名战士（mujāhidūn）。到 1920 年 4 月，军事上的成功使哈纳努直接领导的战士人数增加到了约 400 人。

哈纳努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军事领导人，他协调的游击队的规模通常在 300—600 人之间。然而，“哈纳努起义”最引人注目的是为了管理解放区和保证起义能够自我维持而建立的组织。战士们首先重组了阿尔玛纳兹（Armanaz）村的政府，通过前任政府主席向土地所有者、农民和牲畜所有者征收新税，以支持他们的活动。其行政和财政权力从阿尔玛纳兹延伸到了哈里姆（Harim）的区域中心。在组织的鼎盛时期，哈纳努协调着

远至伊德利卜、卡夫尔塔哈里姆、吉斯尔舒古尔和哈里姆的游击队和市政活动。哈纳努部队占领的领土上的地方政府虽然仍然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但进行了改组，以确保符合起义分子的军事需要和社会忠诚。在区域层面，卡夫尔塔赫里姆立法委员会（lajna tashrī ‘iyya）为战士从部落募集资金和武器。权力高于地方的革命委员会（majlis al-thawra）则负责监督司法事务。事实上，哈纳努的游击队建立了一个从阿勒颇延伸到地中海的独立国家。[113]

阿勒颇国防委员会进行的最后动员发生在法国入侵前夕，当时阿拉伯俱乐部和委员会领导人如拉希德·塔里阿、纳比赫·阿兹马、穆尼布·纳图尔和萨米·萨拉支，与阿拉伯正规军的军官一起工作。在委员会领导人和军官的监督下，志愿者通过挖战壕来守卫通往城市的道路，袭击并占领巴格达火车站和要塞。[114] 刊登在穆尼布·纳图尔的《观点报》上的标题为《抵御、抵御》（To Defense，to Defense）的整版宣言，转载了阿拉伯政府给阿勒颇市政府的电报全文：

> 背信弃义的法国人已经越过他们本应停留的区域，向首都进军。国王陛下已经下达命令，敦促你们准备一切可能的防御手段，号召全国人民献出最后一滴血……依靠真主和先知的精神……防御已经成为法令。国家要求你们、宗教邀请所有人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份报纸以单页印刷，以大报的形式在阿勒颇全境分发；袭击阿勒颇要塞的起义者高喊的口号呼应了报道的措辞。[115]

然而，尽管做了这些准备，阿勒颇对法国人侵的抵抗是短暂的。进入这座城市的大约 3 000 名部落民在市民中引起的恐惧不逊于正在逼近的法国人。当法国人逼近这座城市时，阿勒颇人已经把街道的控制权让给了这

些外来者：清真寺被关闭，与此同时，阿勒颇人开始对产生威胁的物资短缺作出反应。7 月 21 日晚，一个军火库发生爆炸，造成了 500—600 名平民的死亡，这耗尽了群众的精力，也驱散了他们对战争的热情：委员会动员的志愿者放弃了防御阵地，聚集在现场寻找受害者。同时，面对法国的进攻，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逃离了这座城市，将他们最近获得的权力交给了一小群文职和军事官员。在美国领事的鼓励和协助下，新当局组织了武装巡逻以维持秩序，并准备向法国人投降。7 月 23 日，法军进入城内，没有受到任何抵抗。

大众政治和政治权威

随着法国军队的到来和害怕被捕或更坏情况的群众领袖们的逃离，大多数公开的抵抗在高级人民委员会、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分支和国防委员会活动集中的城市都结束了。在大马士革梅丹和阿勒颇巴布尼拉卜地区继续进行的零星武装抵抗似乎与不久之前描述人民委员会带来的抵抗热情的说法并不相符。在外国观察家看来，抵抗运动的崩溃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甚至在法国人侵叙利亚内陆之前，他们的报告就提到了两个时期，一个是 1920 年 1 月上半月（费萨尔返回大马士革和改组高级人民委员会之前），另一个是 1920 年 5 月下半月（“圣雷莫协议”刚签订之后），在这两个时期，多数城市居民似乎对人民委员会的活动漠不关心。[116] 那么，当代观察家该如何理解人民委员会的重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消除了支配性的政治结构，该结

构曾将新兴的西方化精英阶层与大部分剩余人口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战争结束与法国入侵叙利亚内陆之间的两年间歇是一个激烈的竞争期，在此期间，对叙利亚未来的不同愿景之间直接相互竞争。

如果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阿拉伯政府及其民族主义精英中的所有人都有可能会逐步争取其余人口的支持。然而，英国决定将其对阿拉伯政府的补贴减少一半，并从叙利亚撤军，这削弱了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的经济和政治能力，并导致了一场危机，他们一直未从中恢复。阿拉伯政府的外交政策可谓一团糟，无法保证经济稳定，无法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也无法阐明让大多数人响应的叙利亚未来的愿景，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不仅疏远了自己试图绕过、拉拢和威胁的本地显贵，也疏远了商人、工匠、受欢迎的乌里玛和贾巴达亚特。正是这些群体构成了人民委员会的骨干。

委员会的出现证明了 19 世纪改变奥斯曼帝国进程的成效。这些进程使许多叙利亚人得以能够“想象”一个民族共同体，他们期待人民委员会来实现这一想象。但是，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对权力关系结构造成了影响，人民委员会提供了一种替代传统权力结构的办法，这种传统结构已被证明不适合 20 世纪初叙利亚的许多居民所面对的局势。虽然人民委员会经常利用当地的庇护网络，但同时它们也破坏了这些网络，因为它们通过使政治权力联系理性化，组织了超越地方范围的网络，并绕过地方网络为支持者提供服务。曾经赋予地方显贵的职能现在成了广泛界定的政治领域的责任，被庇护者成了“民族”的成员，服务的提供与一种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种意识形态以公平（equity）这一流行的符号和概念为人所知。

注释

［1］ AD 2430/dossier comfidentiel-départ/263, Cousse to HC, 15 September, 1919.

［2］ FO 882/23/221—223, “Personalities: Arab Government of Syria,” Military Intelligence, March 1920; FO 882/24/128—134, “Who’s Who in Damascus,” 14 May 1919; MAE L: SL/vol.15/324,

Picot to Pichon, 18 July 1919; Sa' īd, *Thawrāt al-'arab fī al-qarn al-'ishrīn*, 258; al-'Ajlūnī, *Dhikrayāt*, 72—73, 83; Qadrī, *Mudhakkarātī*, 81.

［3］ Richard Meinertzhagen, *Middle East Diary, 1917—1956*, 48. al-Haffār, "al-Hukūmāt allatī ta'āqabat" 1（15 tishrīn al-thānī 1372）: 10; 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263, Cousse to HC, 15 September 1919; IO L/PS/10/801/P6132/450, Meinertzhagen to FO, 23 September 1919. 不要将这一国防委员会与其他之后建立的、隶属于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同名的组织相混淆。

［4］ *al-'Āsima*, 22 September 1919, 3.

［5］ AD 2344/c1/août-décembre 1919/305—306, Cousse to Picot, 31 October 1919; AD 2430, Letter from Cousse, 1 November 1919; AD 2344/c1/310, Cousse to Picot, 3 November 1919; AD 2325/a1, "Journaux de l'intérieur"（extract from al-Urdunn 47）, TEO zone oust-Bureau de la presse, 24 November 1919; AD 2334/dossier E/1/50/S.R, TEO zone oust, 9 December 1919.

［6］ USNA Aleppo Consulate RG84/vol.121/800, Jesse Jackson（Aleppo）to Mark Bristol（Constantinople）, 9 February 1920.

［7］ *al-'Āsima*, 15 September 1919, 44. 另见 *al-'Āsima*, 4 September 1919, 3。

［8］ *al-'Āsima*, 15 September 1919, 4; Yūsuf al-Hakīm, *Dhikrayāt*, 3: 123.

［9］ 1989 年 11 月 8 日，对阿德南·哈提卜（'Adanan al-Khatib）的访谈；1990 年 1 月 2 日，对谢赫穆罕默德·穆拉德·塔巴（Shaykhs Muhammad Murad al-Tabba'）、阿卜杜勒·加尼·达卡尔（'Abd al-Ghani Daqqar）和亚辛·乌鲁法（Yasin 'Urufa）的访谈；Samīh Hamūda, *al-Wa'ī wal-thawra: dirāsa fī hayāt wa jihad al-Shaykh 'Izz al-Dīn al-Qassām, 1868—1935*, 119—120. 卡萨布的号召力部分在于他中下层的阶级出身，由此产生了关于谢赫朴实的传说。在几次访谈中，我听到了一个关于卡萨布的故事。根据这个故事，卡萨布在法国托管叙利亚后回国的路上和一名法国军官及其家人乘坐一辆火车。这名军官递给卡萨布酒，但他谢绝了。后来军官注意到卡萨布在吃葡萄，就问他为什么只吃水果而不喝酒。卡萨布指着军官的随行同伴，问她们是不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当这名军官确认后，卡萨布用同样的逻辑问他为什么只和妻子睡觉，而不和女儿睡觉。

［10］ Muhammad Mutī' al-Hāfuz and Nizār Abāza, *Tārīkh 'ulamā' Dimashq fī al-qarn al-rābi' 'ashar al-hijrī*, 657; Khayr al-Dīn al-Ziriklī, *al-A'lām: qāmūsa tarājim li-ashhar al-rijāl wal-nisā' min al-'Arab wal-musta'ribīn wal-mustashriqīn*（n.p., 1984）, 13.

［11］ al-'Allāf, *Dimashq fī matla' al-qarn al-'ishrīn*, 202.

［12］ 在学校，卡萨布培养了一个教员网络，他们后来在民族主义政治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拉希德·巴格杜尼斯（Rashid Baqdunis）是一名数学教员，后来成为阿赫德叙利亚分支的成员。该组织从巴黎搬到贝鲁特后，剧院医生和指导阿萨德·哈基姆博士加入了法塔特。战后，他成为了高级人民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和民主党的创始成员，民主党是高级人民委员会的政治分支。阿卜杜勒·瓦哈卜·因克里兹和阿米尔·阿里夫·什哈比（Amir 'Arif al-Shihabi）分别是地理和阿拉伯历史教员，前者是伊斯坦布尔文学协会的创始人，后者是法塔特的成员。贾迈勒帕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将两人绞死。其他教员包括萨利姆·君迪（Salim al-Jundi，语法），他是阿拉伯独立党全国委员会的最初成员之一，以及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Abd al-Rahman Shahbandar，演讲）和哈伊尔丁·兹利可里（al-Din al-Zirikli，阿语写作）。参见 al-'Allāf, Dimashq fī matla' al-qarn al-'ishrīn, 203; Darwaza, *Mudhakkarāt*, 2: 130—131; 139; Dāghir, *Mudhakkarātī*, 35; 1989 年 11 月 6 日对谢赫艾哈迈德·卡西米（Shaykh Ahmad al-Qasimi）的访谈；*al-'Āsima*, 10 March 1919, 4; *al-'Āsima*, 7 November 1919, 5; al-Kināna, 26 june 1920, 2; AD 2323/A-1/91, M.P. Lefévre Pontalis to Picot, 26 November 1919; FO 371/4217/69267, Note by Arab Bureau, Cairo, 6 May 1919; FO 371/4183/136154, Lutfallah to Lloyd George, 16 September 1919; FO 882/24/209—210, Major G.W. Courtney, 21 May 1920。

［13］ Sa'īd, *Thawrāt al-'Arab*, 38—39; Qadrī, *Mudhakkarātī*, 37; Khoury, *Urban Notables*, 64. 从埃及返回后，卡萨布被贾迈勒帕夏逮捕。在声称自己是去埃及购买学校用品后，他被释放。

［14］ Sa'īd, *al-Thawra al-'Arab*, 56, 241—243; al-Hāfiz and Abāza, *Tārīkh 'ulamā' Dimashq*, 659; Fā'iz al-Ghusayn, *Mudhakkarātī 'an al-thawra*, 213; Muhibb al-Dīn al-Khatīb, autobiographical manuscript kept in the Salafiyya Library in Cairo and in Markaz al-wathā'iq al-tārīkhiyya in Damascus, 43. 另见 al-Khatib's autobiographical series in al-Thaqāfa（Algiers）, serialized between January 1972（1：6）and December/January 1973（3：18）。姆西布丁·哈提卜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主编了谢里夫侯赛因的报纸《吉布拉》(*al-Qibla*)，而根据他后来的著述，他已经对“阿拉伯起义”失去了幻想，并在担任高级人民委员会秘书期间为阿拉伯政府的报纸《首都报》进行编辑和写作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他看似矛盾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复刻了萨拉菲主义内在的矛盾，后者试图平衡启蒙运动的理想和伊斯兰正统。尽管他的真实观点可能永远不为人所知，但他的著作提供了有关当时争论的宝贵信息，历史学家应当感谢他保存了与早期民族主义运动有关的档案。关于哈提卜民族主义活动的另一种观点，参见 Muslih, “Rise of Local Nationalism,” 174—175。

［15］ Document contained in SL: LW.

［16］ MAE L: SL/vol.7/179, Service des informations de la marine dans le Levant à marine, Paris, 24 December 1918; FO 882/24/85—90, Walrond to Cornwallis, 13 January 1919.

［17］ USNA 165/2075—108/173, U.S. Military Attaché（Cairo）, “Fac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yrian Question Which Have Recently Been Learned,” 16 December 1918. 根据拉希德·里达所述，直到 1919 年夏天金—克莱恩观察团离开前，埃及的英国人一直对来自叙利亚的消息进行审查。*al-Manār*, June 1920, 428—429.

［18］ 除了卡萨布外，必须等待几个月才能获得从埃及前往叙利亚旅行许可证的人包括阿萨德·达吉尔（他于 1918 年 12 月底获准返回大马士革）、法兹·巴克里、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卡里德·阿兹姆和拉希德·里达（直到 1919 年夏末才获准返家）。Dāghir, *Mudhakkarāī*, 100—101, 106; *al-Manār*, June 1920, 428—429; Yūsuf al-Hakīm, *Dhikrayāt*, 3: 83.

［19］ Qadrī, *Mudhakkarātī*, 149—150. 另见 Dāghir, *Mudhakkarātī*, 107; Kasmieh, *al-Hukūma al-'arabiyya fi Dimashq*, 144—145。

［20］ Muhibb al-Dīn al-Khatīb, “Mudhakkarāt Muhibb al-Dīn al-Khatīb,” al-Thaqāfa（Algiers）3（June-July 1973）: 92; al-Rīmāwī, *Jam'iyyat al-'arabiyya al-Fatāt al-sirriyya: Dirāsa wathā'iqiyya*, 104.

［21］ Sa'īd,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 2: 101—103.

［22］ 会议记录包含在 SL: LW。

［23］ 例如，参见 *al-'Āsima*, 17 November 1919, 3—4。

［24］ Darwaza, *Mudhakkarāt*, 2: 154—155; Dāghir, *Mudhakkarātī*, 107; Sa'īd,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 2: 103—105.

［25］ Sa'īd,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 2: 101—3; Kasmieh, *al-Hukūma al-'arabiyya fi Dimashq*, 144; *al-'Āsima*, 1 November 1919, 5; SL: LW, “Nizām al-lajna al-wataniyya al-'ulyā fī al-'āsima al-s ū riyya,” 17 November 1919. 高级人民委员会的章程在 Ihsān 'Askar, *Nash'at al-sihāfa al-sūriyya: 'Ard lil-qawmiyya fī tawr al-nash'a min al-'ahd al-'uthmāni hattā qiyām al-dawla al-'arabiyya*, 500—506 中被翻印。（注：上述引用的《首都报》的实际出版日期可能是 1919 年 11 月 6 日。）萨拉菲亚图书馆中一份没有标明日期的档案列出了参加一次高级人民委员会 41 名代表的名字和他们出身的区域。来自阿拉克德（al-Akrad）、穆哈基林（Muhajirin）和梅丹的代表缺席了会议，一些地区来了不止一名代表，其他一些地区共享了一些代表。有趣的是，名单中包括至少一名犹太代表（尤素夫·阿拉里）来自哈拉特亚胡德（Hārat al-Yahūd）和至少一名基督徒代表（图菲克·沙米亚）来自

图马门街区。

［26］ SL：LW，al-Qassab et al. to al-Rikabi，13 November 1919；SL：LW，"Nizām al-lijān al-watraniyya al-far'iyya fī bilād Sūriyya，" 17 November 1919. 委员会分支的章程在 'Askar，*Nash' at al-sihāfa al-sūriyya*，507—513 中被翻印。

［27］ SL：LW，"Nizām al-lijān al-watraniyya al-far'iyya fī bilād Sūriyya，" 17 November 1919.

［28］ 这一次，谢赫穆萨·塔维勒当选。SL：LW，Secretary of branch committee of Qaymariyya to the president and members of the［Higher］National Committee，16 December 1919.

［29］ SL：LW，一封写给姆西布丁·哈提卜的信的内容如下："我写信请求获得那些在昨天委员会会议上当选并被提名为高级人民委员会成员的人的姓名，以便我能在《有益与支持者报》上刊登。如果您乐意，请您加上赛义德·马里赫阿凡提（Sa'id Effendi al-Malih）和卡米勒·伊雅斯阿凡提（Kamil Effendi Iyas）两个人的名字，因为这是一些成员希望看到的。"

［30］ 有趣的是，本宣誓书后面的签名可分为两类：成员（约占签名者的五分之一）和非成员。SL：LW，17 December 1919.

［31］ SL：LW，Muhammad Kurd 'Ali to［Higher］National Committee，7 December 1919；FO 882/24，"Who's Who in Damascus，" 14 May 1919.

［32］ *al-Kawkab*，6 January 1920，10. 关于奈卜克（Nabk）委员会的建立，参见 SL：LD，Catholic metropolitan，mufti，president of the municipality et al. to Kamil al-Qassab，18 December 1919。

［33］ 到 3 月初大会重新召开时，高级人民委员会已经强大到足以定义民族主义议程。参见 Russell，*First Modern Arab State*，114，132。

［34］ *Sūriyya al-jadīda*，27 December 1919，1.

［35］ AD 2372/dossier：propaganda anti-française/5—8，3 March 1920；FO 371/5034/E2915/2/44，CPO，EEF to Curzon，27 March 1920；Russel，*First Modern Arab State*，132—133.

［36］ Hobsbawm，*Age of Empire*，94.

［37］ SL：LW，"Nizām al-lijān al-watraniyya al-far'iyya fī bilād Sūriyya，" 17 November 1919.

［38］ Sa'īd，*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2：101—103；*al-'Āsima*，18 December 1919，3—4；SL：LW，Letter 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from Bab al-Jabiya，21 December 1919；SL：LW，Letter to Muhibb al-Din［al-Khatib］，22 jumādā al-ūlā；SL：LW，Sa'id al-Halawa et al. to Presidency，Higher National Committee，16 December 1919；SL：LW，Sa'id Khayr et al. to Presidency，Higher National Committee，3 March 1920；MD 4 H114/4/539，Cousse to Gouraud，13 June 1920.

［39］ SL：LW，26 November 1919.

［40］ *al-Kawkab*，6 January 1920，10.

［41］ 例如，参见 Darwaza，*Mudhakkarāt*，2：154。

［42］ 参见大马士革国民卫队指挥官（qā'id al-liwā' al-mulkī［？］bi-Dimashq）给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信：8 December 1919，10 December 1919，13 December 1919，19—20 December 1919 in SL：LW。

［43］ *al-Kawkab*，13 January 1920，12. 虽然只有很少的梅丹和沙古尔居民参加了这些军事演习，但其他一些人自愿为参加演习的人准备演习场地和搭建帐篷。参见 Sa'īd，*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2：101—103。

［44］ MD 4H114/1/434，Cousse to Gouraud，28 December 1919；MD 4H114/2/ no no.，Cousse to Gouraud，1 January 1920；MD 4H114/2/38，Cousse to Gouraud，18 January 1920；AD 2375/chemise：division de la Syrie，1919—1920/406/2，Record of telephone message from Arlabosse to GCDS，19 January 1920；AD 2347/seroe：c admin. personnel/dossier b/65，Cousse to HC，20 January 1920；FO 371/5032/E990/93—97，"Report by Col. Waters-Taylor on his visit to Beirut，and Interviews with General Gouraud and the Emir Feisal，" 21 January 1920；Sa'īd，*Thawrāt al-'Arab*，62.

［45］ 此外，出席会议的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提议派一名摄影师到被法国摧毁的村庄，并在必要时将照片作为文件提供给“高级国际审查员们”。*al-Kawkab*, 27 January 1920, 11.

［46］ SL: LW, Shakir to presidency of the Higher National Committee, 2 December 1919. 同一档案中未署名的信，日期为赖比尔·敖外鲁月（伊斯兰教历 3 月）30 号，写给人民委员会成员，敦促成立“一个可以连续会晤并向该委员会负责的行政委员会，以便委员会能够根据优先事项研究并加快提交上来的工作”。另见 FO 371/4183/136154, Lotfallah［sic］to Lloyd George, 16 September 1919; 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325, Cousse to HC, 10 November 1919; Sa'īd,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 101—103; al-Haffār, “al-Hukūmāt allatī ta'āqabat,” 1（tishrīn al-thānī 1372）: 10。

［47］ Farzat, *al-Hayā al-hizbiyya fī Sūriyya*, 73—74. 法尔扎特声称卡萨布宣言的目的是证明与社会保守的民主党结盟。

［48］ 高级人民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的所有传记资料均从以下来源获得：1989 年 11 月 6 日对谢赫艾哈迈德·卡西米的访谈；1989 年 11 月 15 日对阿卜·里巴·贾扎伊里的访谈；1990 年 1 月 3 日对谢赫阿卜杜勒·里扎克·哈拉比（Shaykh 'Abd al-Rizaq al-Halabi）的访谈；1990 年 1 月 4 日对谢赫亚辛·乌鲁法的访谈；*al-'Āsima*, 6 May 1920. 5; *al-Kināna*, 26 June 1920, 2; DU SA/493/7/33; AD 2323/a-1/91, M.P. Lefévre Pontails to Picot, 26 November 1918; MAE L: SL/vol.8/64—70, Lutfallah to Pichon, 23 January 1919; AD 2367/10/1/146, Cousse to HC, 14 February 1919; MAE L: SL/vol.12/32—38, Cousse to HC, 6 April 1919; FO 371/4217/69267, Note by Arab Bureau, Cairo, 6 May 1919; FO 882/24/128—134, “Who's Who in Damascus,” 14 May 1919; FO 371/4183/136154, Lotfallah［sic］to Lloyd George, 16 September 1919; 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634, Cousse to HC, 24 October 1919; FO 882/24/209—210, G. W. Courtney, 21 May 1920; AD 2347/500, Cousse to HC, 5 June 1920; MD 4H60/1, “Bulletin quotidien 1260,” 19 July 1920; FO 317/5040/E13211/1171, Ernest Scott to Curzon, 18 October 1920; al-Husnī, *Kitāb muntakhabāt al-tawārīkh li-Dimashq*, 2: 829, 871—872, 873, 876, 883, 910; al-'Allāf, *Dimashq fī matla' al-qarn al-'ishrīn*, 203; Darwaza, *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 1: 27, 77—78; Zāfir al-Qāsimī, Maktab 'Anbar: suwar wa dhikrayāt min hayatina al-thaqāfiyya wal-siyāsiyya wal-ijtimā' iyya, 23; Dāghir, *Mudhakkarātī*, 106; Darwaza, *Mudhakkarāt*, 2: 76—77; 81—82; 110—111, 130—131, 142—144, 188; al-Ghusayn, *Mudhakkarātī 'an al-thawra*, 38; al-Jundī, *Tārīkh al-thawrāt al-sūriyya*, 172; Khoury, *Urban Notables*, 34, 41, 44, 63, 66—67, 73, 114, 130, notes 60—61; Sa'īd,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 2: 101—103; al-Haffār, al-Hukūmāt allatī ta'āqabat 1（3 shawwāl 1372）: 19,（tishrīn al-thānī 1372）: 10; al-Hāfiz and Abāza, *Tārīkh 'ulamā' Dimashq*, 460—464; al-'Azm, *Mudhakkarāt Khālid al-'Azm*, 1: 94—95; Yūsuf al-Hakīm, *Dhikrayāt*, 3: 19; Schilcher, *Famillies in Politics*, 214。

［49］ 参见 David Dean Commins, “Religious Reformers and Arabists in Damascus, 1885—1914,” 414。

［50］ 这个党早在 1920 年 4 月和 7 月中旬便已成立。MD 4H114/5/700, Cousse to Gouraud, 16 July 1920; FO 371/5188/E4829/36, “Arabic Press Abstracts for Week Ending May 3,” 28 April 1920.

［51］ 参见 Dawn, *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 176。

［52］ SL: LW, Ahmad Diab to Higher National Committee, 19 December 1919.

［53］ FO 882/24/128—134, “Who's Who in Damascus,” 14 May 1919; MD 4H114/4, Leaflet signed “The Eye That Watches,” 6 July 1920; MD 4H114/4/241, Cousse to Gouraud, 14 June 1920; FO 371/5038/E9625, Lt. Col. Easton, “Haut Comité National, Damascus,” 23 June 1920; *al-Kināna*, 26 June 1920, 2; MD 4H114/4/613, Cousse to Gouraud, 28 June 1920; AD 2372/no no., “Note du colonel Cousse du 1er juillet 1920: Damas.” 无论它们在本案例中的有效性如何，腐败指控在此期间被普遍用来抹黑政治对手。例如，埃米尔费萨尔本人就试图利用这些武器来对付备受欢迎的亚辛·哈希米。

参见 FO 371/5032/EA2989, GHQ (Egypt) to WO, 4 February 1920。

[54] 在 1920 年 6 月 24 日举行的行政委员会选举中，卡萨布获得了最多的选票（47 票），之后是阿乌尼·库达马尼和舒克里·塔巴（每人 46 票）、哈立德·哈基姆（45 票）、阿卜杜勒·卡迪尔·苏卡尔（43 票）、阿卜杜拉·库兹巴里（39 票）、穆罕默德·塔吉（38 票）、伊德勒·哈拉比（35 票）、艾哈迈德·迪亚卜（33 票）、萨米·马勒达姆·贝克（30 票）、阿萨德·哈基姆（29 票）。*al-Kināna*, 26 June 1920, 2; MD 4H114/4/493, Cousse to Gouraud, 4 June 1920.

[55] al-Hāfiz and Abāza, *Tārīkh 'ulamā' Dimashq*, 381—382. 另见 Nasūh Bābīl, *Sihāfa wa siyāsa: Sūriyya fī al-qarn al-'ishrīn*, 18。

[56] Unpublished autobiographical manuscript found in Markaz al-wathā'iq al-tārīkhiyya (Damascus) and the Salafiyya Library, 47—48.

[57] 1989 年 11 月 6 日对谢赫艾哈迈德·卡西米的访谈；1989 年 11 月 10 日对伊赫桑·哈基（Ihsan Haqqi）的访谈；1990 年 1 月 2 日对谢赫塔巴、达卡尔和乌鲁法的访谈；1990 年 1 月 4 日对谢赫亚辛·乌鲁法的访谈；al-Hāfiz and Abāza, *Tārīkh 'ulamā' Dimashq*。

[58]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296—297.

[59] 1990 年 1 月 4 日对谢赫亚辛·乌鲁法的访谈；Schilcher, *Families in Politics*, 191—193; al-Hāfiz and Abāza, *Tārīkh 'ulamā' Dimashq*, 535。

[60] 1989 年 11 月 6 日对谢赫艾哈迈德·卡西米的访谈；1989 年 11 月 10 日对 Ihsan Haqqi 的访谈；1990 年 1 月 2 日对谢赫塔巴、达卡尔和乌鲁法的访谈；1990 年 1 月 4 日对谢赫亚辛·乌鲁法的访谈；Schilcher, *Families in Politics*, 191—193; al-Hāfiz and Abāza, *Tārīkh 'ulamā' Dimashq*, 535。

[61] 根据谢赫艾哈迈德·卡西米所述，穆罕默德·阿什马尔作为一名宗教学者的资格并非没有受到挑战。1989 年 11 月 6 日访谈。

[62] 1989 年 11 月 6 日对谢赫艾哈迈德·卡西米的访谈；1989 年 11 月 10 日对伊赫桑·哈基的访谈；1989 年 11 月 15 日对阿卜·里巴·贾扎伊里的访谈；1990 年 1 月 2 日对谢赫塔巴、达卡尔和乌鲁法的访谈；1990 年 1 月 4 日对谢赫亚辛·乌鲁法的访谈；1990 年 1 月 6 日对穆罕默德·里达·哈提卜的访谈；al-Hāfiz and Abāza, *Tārīkh 'ulamā' Dimashq*, 409, 420, 535, 540—543, 579—585, 588, 794—802, 878—891, 917, 963; al-Jundī, *Tārīkh al-thawrāt al-sūriyya*, 160。

[63] al-Hāfiz and Abāza, *Tārīkh 'ulamā' Dimashq*, 597—598; al-Jundī, *Tārīkh al-thawrāt al-sūriyya*, 160.

[64]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209.

[65] 关于高级人民委员会针对商人的活动，参见 SL: LW, Letter, 20 November 1919; MD 4H114/2/155, Cousse to Gouraud, 9 April 1920; MD 4H114/2/157, Cousse to Gouraud, 10 April 1920; AD 2347/12, "Extraits du bulletin quotidien du 12 avril 1920"; MAE L: SL/ vol.64/823/6, 824/6, Gouraud to MAE, 14 April 1920。

[66] Michael Johnson, "Political Bosses and Their Gangs: Zu'ama and Qabadayat in the Sunni Muslim Quarters of Beirut," 207—224 (particularly 211); al-'Allāf, *Dimashq fī matla' al-qarn al-'ishrīn*, 41; 1989 年 11 月 15 日对阿卜·里巴·贾扎伊里的访谈。

[67] 1989 年 11 月 8 日对法赫里·努里·凯拉尼的访谈；1989 年 11 月 15 日对阿卜·里巴·贾扎伊里的访谈；1990 年 1 月 2 日对谢赫塔巴、达卡尔和乌鲁法的访谈；1990 年 1 月 4 日对谢赫亚辛·乌鲁法的访谈；al-'Allāf, *Dimashq fī matla' al-qarn al-'ishrīn*, 244—245;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302—303, 316—317。

[68] SL: LW, "Nizām al-lijān al-wataniyya al-far'iyya fī bilād Sūriyya," 17 November 1919; SL: LW, "Nizām al-lijān al-wataniyya al-'ulyā fī al-'āsima al-Sūriyya," 17 November 1919; 1989 年 11 月 8

日对阿德南·哈提卜的访谈。根据第一份文件，各分支委员会 10% 的收入将交给高级人民委员会，在特殊情况下，所有地方收集的收入都将交给高级人民委员会。

［69］ 该报告补充说："大马士革较富有的人组成了一个青年党，以抵制委员会的敲诈，相当成功。" FO 371/5038/E9625, "Haut Comité National, Damascus," 23 June 1920; Sa'īd,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 2: 101—103.

［70］ 参见 MAE L: SL/vol.121, "Rapport de renseignments hebdomadaire 7," 10—17 November 1919; MD 4H114/4/483, Coussse to Gouraud, 3 June 1919; MD 4H114/4/493, Cousse to Gouraud, 4 June 1919; AD 2211/693—94/6, Gouraud to Diplomatie Paris, 3 March 1920; AD 2345, Leaflet, "Le Cri du Droit," 5 March 1920; AD 2345/C1A5/221, Cousse to HC, 15 March 1920。根据法国资料，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叙利亚的代理人图菲克·沙尔卡斯（al-Sharkas）为高级人民委员会和民主党募捐，理由是需要阿拉伯—土耳其泛伊斯兰联盟对抗"殖民者"。

［71］ *al-'Āsima*, 18 December 1919, 3—4.

［72］ MD 4H114/2/132, Cousse to Gouraud, 19 February 1920.

［73］ MD 4H114/4/241, Cousse to Gouraud, 14 June 1920.

［74］ SL: LW, Advisor to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o al-Qassab, 18 April 1920.

［75］ 要求高级人民委员会进行干预的正式请求是由行政委员会成员艾哈迈德·迪亚卜的兄弟、大马士革商会成员亚辛·迪亚卜代表请愿者提出的。SL: LW, Yasin Diab to [Higher] National Committee, 19 December 1919; MD 4H114/4/493, Cousse to HC, 4 June 1920. 另见 Kasmieh, *al-Hukūma al-'arabiyya fī Dimashq*, 231—232。

［76］ *al-Kināna*, 26 June 1920, 2.

［77］ *al-Kināna*, 26 June 1920, 4. 另见 AD 2347/500, Cousse to HC, 5 June 1920。

［78］ SL: LW, 'Umar Shakir to LW, 2 December 1919; SL: LW, Qā'id fawj al-mill (?) Dimashq to the presidency of LW, 15 December 1919; SL: LW, Fawzi and Nasib al-Bakri to LW, 19 December 1919; SL: LW, Letter to LW, n.d.; SL: LW, Ra'īs al-baladiyya [Duma] to LW, n.d.; MD 4H58/dossier 1, "Rapport hebdomadaire," 26 Janvier au 2 février 1920; MD 4H58/dossier 1, "Rapport hebdomadaire," 23 Janvier au 29 mars 1920; USNA 59/890d.00/17/507, Jackson (Aleppo) to Adm. Bristol (Constantinople), 19 May 1920; MD 4H114/dossier 4/483, Cousse to Gouraud, 3 June 1920.

［79］ FO 371/5076/E8007/74—79, "Note by Miss G.L. Bell," 22 May 1920.

［80］ MD 4H114/2, "Tribus de la Syrie intérieur," 16 December 1919; MD 20N171/2, "Rapport hebdomadaire 18—25 janvier 1920"; AD 2375/chemise: division de la Syrie, 1919—20/442/2, Arlabosse to général commandant division de la Syrie (Telephone message), 27 January 1920; MD 4H114/4/491, Cousse to Gouraud, 3 June 1920; FO 371/50337/E9014, "Extracts from French Report for Week 8th to 14th June 1920"; MD 4H114/4, Cousse, "Renseignements," 13 July 1920; MD 4H114/8, Arlabosse to Catroux, 13 October 1920; FO 317/5040/E13211/1171, Report by Col. G.L. Easton, sent by Ernest Scott (Acting High Commissioner, Ramleh) to Curzon, 18 October 1920; Ahamd Wasfī Zakariyyā, *'Ashā' ir al-Shām*, 396.

［81］ AD 2375/dossier: Division de la Syrie/259, Arlabosse to général commandant en chef l'AFL, 18 December 1920; MD 4H114/2/12, Cousse to Gouraud, 6 January 1920; FO 371/5188 E4829/36, Arabic Press Abstracts for Week Ending May 3 (1920); MD 4H114/4/491, Cousse to Gouraud, 3 June 1920; MD 4J114/4/no no., "Renseignements," Cousse, 13 July 1920; MD 4H114/8, Arlabosse to Catroux, 13 October 1920; Darwaza, *Mudhakkarāt*, 2: 76—77; al-Jundī, *Tārīkh al-thawrāt al-sūriyya*, 157, 394.

［82］ *al-Kawkab*, 6 January 1920, 5; AD 2375/chemise: division de la Syrie, 1919—1920/406/2,

Arlabosse to general commandant division de la Syrie (telephone message), 19 January 1920; *The Near East*, 19 February 1920, 244; FO 371/5120/E6193, Military Governor Safed to Military Governor Galilee, "Attack on Ain Ibl," 11 May 1920; IO L/PS/10/802/P4953/40, Wratislaw (Beirut) to FO, 25 May 1920; Meir Zami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Lebanon*, 85—86.

[83] SL: LW, Author unknown, n.d.; SL: LW, "Palestinian Qahtani" to presidency LW, 15 December 1919; SL: LD, "ahad al-wataniyyīn" (one of the patriots), 20 November 1919.

[84] Qadrī, *Mudhakkarātī*, 133. 另见 WO95/4373/EA2613, Egypforce (Cairo) to Troopers (London), 6 August 1919。

[85] *al-'Āsima*, 25 March 1920, 5; FO 371/5188/E4829/36, "Arabic Press Abstracts for Week Ending May 3 1920"; MD 4H112/2b, "Habib Bey Estephane."

[86] *al-Kināna*, 15 July 1920, 3.

[87] 参见 AD 2375/chemise: division de la Syrie, 1919—1920/406/2, Arlabosse to general commandant division de la Syrie (telephone message), 19 January 1920; MD 4H112/2b, "Habib Bey Estephane"; *al-'Āsima*, 27 November 1919k, 6; *al-'Āsima*, 25 March 1920, 5。

[88] 根据一份霍姆斯和大马士革之间地区显贵们发给卡米勒·卡萨布的电报，在诸如代尔阿提耶（Dayr al-'Atiya）、耶卜鲁德（Yabrud）、奈卜克（al-Nabk）和卡拉（Kara）这样的地方，名人们在 1919 年 12 月合作建立了一个地方国防委员会。SL: LD, Letter to al-Qassab, 18 December 1919.

[89] AD 2372/dossier: propaganda anti-française, 17 January 1920.

[90] SL: LD, "Purpose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f National Defense," n.d.

[91] Jamīl Ibrāhīm Pāshā, *Nidāl al-ahrār fī sabīl al-istiqlāl*, 20.

[92] MAE L: SL/vol.33/167, "Rapport du lt. Sol, sur l'ensemble des faits qui se sont déroulés dans la region de Baalobeck, entre le depart des troupes anglaises et l'occupation de la ville par les troupes française," 6 January 1920; AD 2375/chemise: division de la Syriem 1919—1920/361/2, Arlabosse to G.C.C., 11 January 1920; AD 2375/ chemise: division de la Syrie, 1919—1920/361A, Col. Sousselier to GCC, 7 February 1920.

[93] FO 371/4186/174490, Meinertzhagen to GHQ, EEF, 13 January 1920. 对这些事件的其他描述，参见 *al-Kawkab*, 6 January 1920, 4—5。

[94] 例如，根据法国的一份报告，金达里家族和君迪家族"大约有 60 个家庭使他们手下众多的农民处于绝对服从的状态"。贾里卜（Gharib）、萨德拉阿（Sa'dallah）和萨利赫·金达里（Salih Jindali）都是霍姆斯国防委员会的重要成员。SL: LD, Muhyi al-Din al-Durubi et al. to Committee of National Defense, Damascus, 21 November 1919; AD 2372/dossier: affaires militaires et politiques, J. Jacottet, "Renseignements sur les villes de Homs, de Hama, et les regions qui en dependent," 10 July 1920. 另见 Ihsān Hindī, *Kifāh al-sha'b al-'arabī al-sūrī*, 1908—1948, 89。

[95] AD 2372/dossier: affaires militaires et politiques, J. Jacottet, "Renseignements sur les villes de Homsm, de Hama, et les régions qui en dépendent," 10 July 1920; AD 4H114/2/n.d., "Tribus de la Syrie intérieure." 关于这些部落的信息参见 Zakariyyâ, *'Ashā' ir al-Shām*, 404—409, 434—442, 444—449, 449—500, 507—521。

[96] SL: LD, Muhyi al-Din al-Durubi et al. to Committee of National Defense, Damascus, 21 November 1919; AD 2375/chemise: division de la Syrie 1919—1920/384/2, Arlabosse to GCC, 15 January 1919; MD 4H112/1/84/6, Gouraud to Lt. Dejean, 19—24 February 1920; AD 2372/dossier: affaires militaires et politiques/ no no., "Renseignements sur les villes de Homs, de Hama et les regions qui en dependent," 10 July 1920.

［97］ *al-Kawkab*, 6 January 1920, 5; MD 4H58/1, "Rapport hebdomadaire: 24 février au 1 mars 1920"; MD 4H60/1, "Bulletin quotidien 1266," 21 July 1920; Angelil, "L' occupation d' Homs."

［98］ *al-Kawkab*, 6 January 1920, 5; MD 4H114/4/no no., "Renseignements," Cousse, 13 July 1920; Darwaza, *Mudhakkarāt*, 2: 160; Hindī, Kifāh al-sha'b al-'arabī al-sūrī, 89;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9; Sa'īd,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 2: 111; Zakariyyâ, *'Ashā' ir al-Shām*, 477—478, 485—487.

［99］ MD 4H58/1, "Rapport hebdomadaire: 24 février au 1 mars 1920"; FO 371/5034/E2539/18, British Consul General (Beirut) to Secretary of State, 17 March 1920; MD 4H58/1/ "Rapport hebdomadaire: 23 au 29 mars 1920"; MD 4H58/1, "Rapport hebdomadaire: 20 au 26 avril 1920"; MD 4H58/2, "Rapport hebdomadaire: 13—19 juillet 1920"; MD 4H60/1/1327/cp., "Bulletin quotidien," 12 August 1920; Hindī, *Kifāh al-sha'b al- 'arabī al-sūrī*, 56—57.

［100］ 他们之中有加米勒·易卜拉欣帕夏（Jamil Ibrahim Pasha）、沙基尔·沙巴尼（Shakir Sha'bani）、哈只·法特赫·马尔阿什里（al-Hajj Fath al-Mar'ashli）、穆斯塔法·巴尔马达（Mustafa Barmada）、巴德尔丁·纳萨尼（Badr al-Din al-Na'sani）、夫阿德·阿德里（Fu'ad al-'Adli）、卡西姆·斯巴伊（Qasim al-Siba'i）、阿卜杜勒·卡迪尔·基赫亚（'Abd al-Qadir al-Kikhya）和夫阿德·穆达里斯（Fu'ad al-Mudarris）。

［101］ IO L/PS/10/802, Gertrude Bell, "Syria in October 1919," 15 November 1919; MD 4H112/2a/38r, "Renseignements," 20 February 1920; USNA 59/890d.00/8/468, Jack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13 March 1920; MD 4H112/2b/2, "Rapport politique: période du 16au 30 avril 1920"; MD 4H112/2b/51, "Renseignements," 25 May 1920; al-Jundī, *Tārīkh al-thawrāt al-sūriyya*, 62—63, 74; Ibrāhīm Pāshā, Nidāl al-ahrār 3, 6, 11—14; Ghazzī, *Nahr al-dhahab fī tārīkh Halab*, 2: 136—137, 156, 177, 215, 335;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10, 113.

［102］ MD 4H112/1/84/6, Gouraud to lt. Dejean, February 1920. 地区指挥官名单参见 MAE L: SL/vol.33/120—121, Gouraud, "Note au sujet des rapports entre le haut commission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Syrie Cilicie et l'emir Fayçl," 22 September 1920。萨法迪在后来写给战争部的信中说："虽然志愿者们准时到演练场报道，但是我们不应指望他们中 20% 的人在危机时刻与我们合作，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产业所有者、有实权的人，或者可以通过他们的家族得到认可的人。"

［103］ MAE L: SL/vol.33/119, Gouraud, "Note au sujet des rapports entre le haut commission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Syrie-Cilicie et l'emir Fayçal," 22 September 1920; Ibrāhīm Pāshā, *Nidāl al-ahrār*, 6; al-Jundī, *Tārīkh al-thawrāt al-sūriyya*, 62.

［104］ *al- 'Āsima*, 13 November 1919, 6; MD 4H112/2b/55, "Renseignements," 29 May 1920; MAE L: SL/vol.33/119, Gouraud, "Note au sujet des rapports entre le haut commission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Syrie-Cilicie et l'emir Fayçal," 22 September 1920; Ghazzī, *Nahr al-dhahab fī tārīkh halab*, 2: 356, 372. Kersante, "Syrie: L'occupation d'Alep," 172.

［105］ MD 4H112/2A/38R, "Renseignements," 20 February 1920. 报告还包括下列与"库米塔吉斯"有联系的成员：易卜拉欣·哈纳努 、图菲克·比萨尔（Tawfiq al-Bissar）、萨努西·贝伊（Sanussi Bey）、萨米·萨拉支、萨米·卡亚里、贾里卜·贝伊（Ghalib Bey）和谢赫努尔·吉斯里（Shaykh Nur al-Jisri）。

［106］ MAE L: SL/vol.33/120—21, Gouraud, "Note au sujet des rapports entre le haut commission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Syrie-Cilicie et l'emir Fayçal," 22 September 1920.

［107］ MD 4H112/2b/2, "Rapport politique: période du 16 au 30 avril 1920"; MD 4H112/2b/26, "Renseignements," to Trenga, 1 May 1920; MD 4H112/2b/31, "Renseignments," to Trenga, 5 May 1920; MD 4H114/4, Cousse to Gouraud, 14 May 1920.

［108］ MD 4H112/2a/38r, "Renseignments," 20 February 1920; MD 4H112/2b/2, "Rapport politique: période du 16 au 30 avril 1920; FO 882/24/209—210, Major G.W. Courtney, 21 May 1920;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10."

［109］ Ibrāhīm Pāshā, *Nidāl al-ahrār*, 6. 另见 MD 4H112/2b/51, "Renseignements," 25 May 1920; MAE/vol.33/125—126, Gouraud, "Note au sujet des rapports entre le haut commission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Syrie-Cilicie et l'emir Fayçal," 22 September 1920。

［110］ MD 4H112/2b/2, "Rapport politique: period du 16 au 30 avril 1920"; MD 4H112/2b/51, "Renseignements," 25 May 1920; MD 4H114/4/483, Cousse to Gouraud, 3 June1920; al-Jundī, *Tārīkh al-thawrāt al-sūriyya*, 76, 80.

［111］ USNA 59/890D.00/17/507, Jackson to Bristol, 19 May 1920; MD 4H112/2a/38r, "Renseignements," 20 February 1920.

［112］ al-Jundī, *Tārīkh al-thawrāt al-sūriyya*, 74—76; Hindī, *Kifāh al-Sha'b al-'arabī al-sūrī*, 70.

［113］ al-Jundī, *Tārīkh al-thawrāt al-sūriyya*, 62—63, 74—79; Ibrāhīm Pāshā, *Nidāl al-ahrār*, 6, 70.

［114］ 塔里阿作为哈马地区的区长，曾向萨利赫·阿里输送援助。根据一个消息源，是塔里阿说服哈纳努实施起义。参见 al-Jundī, *Tārīkh al-thawrāt al-sūriyya*, 62—63; Qadrī, *Mudhakkarātī*, 133; Hindī, *Kifāh al-sha'b al-'arabī al-sūrī*, 70。

［115］ USNA 890d.oo/34, Jackson (Aleppo) to Bristol (Constantinople), 21 July 1920; FO 371/5039/E10316/38, J.B. Jackson, 30 July 1920; Kersante, "Syrie: L'occupation d'Alep."

［116］ 参见 MD 4H114/2/NO NO., Cousse to Gouraud, 1 January 1920; *al-Kawkab*, 13 January 1920, 12, 12; MD 4H114/2/28, Cousse to Gouraud, 14 January 1920; AD 2374/dossier: TEO zone oust: adm., cabinet politique/103/cp., 18 May 1920; MD 4H114/4/451, Cousse to Gouraud, 25 May 1920; MD 4H114/4/459, Cousse to Gouraud, 27 May1920; Russell, *First Modern Arab State*, 147, 180。

第二部分

话语中的民族主义共同体

第三章　竞争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场的象征性成分

1920年1月27日，《地球报》刊登了对大马士革举行的庆祝埃米尔费萨尔从欧洲回国的游行活动的报道：

> 埃米尔费萨尔殿下今天在宫殿会见了一些祈福者，他们组织了一次有12万人参加的大游行，要求统一和完全独立。殿下宣布，他坚定地致力于统一，只接受完全的独立。他赞扬征兵制度对维持秩序的作用……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参加游行，整个城市都被封锁起来，人们的热情很高。[1]

这是《地球报》的读者可能希望看到的那种报道。就像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英国当局建立《地球报》是为了“支持阿拉伯运动，促进英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良好关系”[2]。因此，该报纸定期报道阿拉伯起义，报道其领导人埃米尔费萨尔在战时和战后的活动，报道亲费萨尔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文学协会和政治俱乐部的活动，诸如文学社和阿拉伯俱乐部。

然而，读者可能会对刊登在第一篇文章正下方的文章感到困惑，这篇文章是卡米勒·卡萨布写的，对同一次游行活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 今天举行了一次伟大的爱国游行，聚集了来自所有阶层的10多万

人。其中包括叙利亚国防委员会、各政治党派、乌里玛、显贵们、城市委员会、公务员和军人、农民、医生、药剂师、记者、阿拉伯俱乐部、帝国法律和医学学校（the Imperial Schools of Laws and Medicine）、中学教师师范学校、阿米里亚（Amiriyya）和公立学校、所有宗教派别的成员、商人、工匠、行会、街区和临近村庄的领导人。

这次游行是一个国家的宣言，呼吁彻底独立、叙利亚团结和埃米尔对兵役的支持，国家计划将其作为国家的盾牌来使用。人民聚集在政府总部前，演讲者们发言，之后埃米尔走下来和他们讲话，说他只为彻底独立而奋斗，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他和国家相分离，即从根本上说同意建立一个独立、不可分割的叙利亚。他称赞国家对兵役的要求。

把第一篇报道与第二篇报道进行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这两篇文章使用了许多相同的短语，强调了很多共同的现象：要求“完全独立”和“统一”的口号；征兵的要求；对群众热情和游行规模庞大的描述。另一方面，这两篇报道又有明显的区别。其中最明显的是，第一篇报道的关注中心是费萨尔，以及与他存在关系的“祈福者”群体，即他慷慨馈赠的被动接受者。对于卡萨布来说，大众或“国民”才是主动积极的，费萨尔是必须对他们的意愿作出回应的陪衬者。除了关注点的差别，两篇报道还有更为微妙的一些差别。例如，第一篇报道的作者可能不会对群众进行分类，或将叙利亚社会分成各个阶层，也不可能将国民与统治机构相分离。

这两篇报道之间的差异凸显出导言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在理想主义框架下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的一种倾向，即在描写中东民族主义情绪演进时强调统一性，淡化多样性。使用阿拉伯民族主义（Arab nationalism）这一术语来表示所要研究的东西，明显局限了参照体系。一位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写道：

> 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起源和思想的学术研究很丰富，但是，很少有作品探讨本土的民族主义（wataniyya）和使本土民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东阿拉伯世界生根的条件。本研究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对多种阿拉伯因素的分析，*有助于削弱阿拉伯民族主义分析框架在叙利亚的应用，因此有助于进入多种存在的本土民族主义力量这一存在。*[3]
>
> （斜体为笔者所加）

然而，奥斯曼帝国解体初期的证据并不能证明“阿拉伯”身份较其他身份的历史优越性，也不能将其他身份视为“真正”阿拉伯身份的反常误差。1918 年 10 月至 1920 年 7 月间，在大马士革散发或张贴的传单和海报中，“阿拉伯人”的称呼不到三分之一，这些传单和海报可以在欧洲和中东的各种档案馆或在同时期出版的报纸中找到。其他称呼有“叙利亚人”，或者使用多种或更多模糊的称呼（“公民”“公民同胞”）。对于叙利亚居民来说，“阿拉伯”身份代表的不仅是几种可能身份中的一种，而且在下文中还将看到，它还代表着一组对社区间关系、团结社区成员纽带的性质、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关系、谢里夫家族在叙利亚未来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与汉志、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关系及其他各种问题的态度。

此外，在赋予“阿拉伯民族主义”优越性的过程中，历史学家赋予了他们挑选出的一群知识分子和活动家、政治协会和机构以优越性，事实上，这些人不一定代表费萨尔时期民族主义政治中大多数参与者的志向，更不用说大多数叙利亚人的志向。虽然民族主义阵营中的一些人（阿拉伯政府成员与随阿拉伯军进入大马士革的埃米尔费萨尔、汉志人、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结成的联盟）自诩为来自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社区的知识分子和专

业人士，但是他们的经历使他们有别于大多数叙利亚人，他们的民族主义可能根植于哲学思考，或者更通俗地说，根植于政治权宜之计或协约国战时所作出的民族自决承诺。其他人（包括许多非精英的叙利亚穆斯林，他们支持诸如卡米勒·卡萨布领导的人民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意志则根植于一套截然不同的经验和习俗。

因此，在后奥斯曼时代的叙利亚，民族主义场域包含不同的活动家、组织和支持者，他们通过不同的话语来表达各自的民族主义志向。[4] 如果奥斯曼帝国是同质的、不存在阶级和教派差异的，如果扩大市场关系的影响和奥斯曼行政改革的成效是统一和一致的，在假定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来回应变化的条件时，历史学家的描述可能才是合理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这两个过程是不均衡的，对不同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既不同步，也不平等。因此，尽管所有民族主义言论都反映了在中东产生作用的全球进程，但是其程度和方式却不尽相同。此外，由于奥斯曼帝国和埃米尔费萨尔的阿拉伯政府的软弱，也因为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幅度，没有一个单一主导的民族主义话语可以被劝诱或威胁。

这并不是说政治话语的组成部分没有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许多或所有民族主义团体共同的财产。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组织，甚至那些呼吁或试图动员截然不同的支持者的组织，都有一些共同的口号（“我们要求完全独立”）、物理符号（阿拉伯国旗，埃米尔费萨尔）、词汇（用来形容帝国主义者的单词“贪婪者”[tāmi ‘ūn]）和比喻。没有一个民族主义组织不受其他组织活动的影响。例如，卡米勒·卡萨布和他的同事利用其中间地位将民族主义的习语与流行符号和话语实践进行调和，民族主义精英也意识到这些象征和实践对他们组织工作的制约。

战后叙利亚热情四溢的政治气氛也促进了民族主义团体之间的交流。阿拉伯政府联合各种政治协会组织游行（如上述报纸中所报道的游行），这

些游行有数万人参加。政府创立了新的世俗爱国节日，纪念阿拉伯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协约国一方参战，哀悼被贾迈勒帕夏处决的阿拉伯“烈士”，并庆祝独立日。从阿勒颇到安曼，政治海报不仅被装饰在城市建筑物的墙壁上，而且在许多村庄的建筑物上也可以看到它们。活动家们重新定义了流行文化活动的概念，改写了戏剧、历史叙述和卡拉库兹（karakūz）皮影戏，以将民族主义信息纳入其中。学校反复灌输爱国主义的信条，并把学生集中起来参加示威。阿拉伯政府及其在非政府组织中的盟友和人民委员会在国家节日和指定的游行日关闭露天集市，在当地官员、贾巴达亚特和警察的帮助下分发请愿书，并勒令富商为国家贷款（National Loan）捐款。简言之，新的政治公众既被创造出来，又被动员起来。

然而，尽管有这些共同点，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组织显然各自为国家和未来阐明了不同的愿景。因此，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初期，各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成为叙利亚多数人口表达他们对共同体的理解的方式，这一时期也是“话语共同体”之间激烈竞争的时期。

一般而言，话语共同体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属性。第一，每个共同体内的个人通过共同的制度和一致同意的社会实践参与互动。这些制度和实践使社会关系的适当秩序具化，因为它们是由共同体成员所理解的，并通过共同的意识形态加以阐述。制度化确保了话语共同体及其组成的话语场域的自主性：通过制度，例如共享的宣传运动和仪式，共同体内的个人之间不断保持接触，加强并一再履行他们对社区的承诺。第二，虽然同时代但相互竞争的话语共同体经常使用相同的符号，但每个共同体的成员都从最为重要的符号（如下文将讨论的“核心符号”）和符号性行动（如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指出的“暴力仪式”［rites of violence］或 E.P. 汤普森［E.P. Thompson］的“对抗剧院”［countertheater］）中获取相同的或共同体特有的意义。第三，共同体成员共享一个离散的话

语场，即一个包含、编排和整合共同体重要符号的“空间”。因为话语场的作用是限定它所包含的符号可能衍生出的意义的范围，它塑造了类别并划分了边界，这些类别和边界包含并引导着共同体的思想、活动和讨论。[5]

一方是阿拉伯政府、法塔特（在费萨尔时期的大多数时候）和阿拉伯俱乐部，它们受到穆塔纳维尔（文化人）的主导，另一方是人民委员会及其盟友，两方有着不同的体制框架，是后奥斯曼时期的叙利亚持续竞争的话语共同体。因为这些政治协会的组成和结构是第一部分的主题，本章和下一章将只对区分这两个话语共同体的符号和话语场域进行比较。

这里和后面章节提出的奥斯曼帝国解体初期叙利亚存在的在根本上二元分裂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基于导言中讨论的两个假定。第一，假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特性之外的因素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成败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尽管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出现了其他民族主义话语共同体，但是下文所描述的两个共同体享有的人力、媒体和政治结构等资源使它们能够边缘化或整合其本土竞争者，从而主导民族主义场域。[6] 第二，尽管想象的身份界限通常是“柔软的”，即相对灵活、非排他和不自觉的，但在动员和危机时期，当其中的个人和共同体直接将它们的对应方视为“他者”时，这些身份界限会被具体化。现在应该很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22 个月，特别是从 1920 年 1 月到 7 月这段时间，就构成了这样一个时期。

关键符号与口号

在对费萨尔时期主导民族主义话语的符号进行分析之前，首先有必要界

定本章将要讨论的两类符号："关键符号"和口号。内尔斯·约翰逊（Nels Johnson）将人类学家谢里·奥特纳（Sherry B. Ortner）的研究应用到他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中，他将关键符号定义为"那些依靠其相对强大的概括或阐述社会秩序的能力而支配一个概念系统的（符号）"。[7] 根据奥特纳的研究，关键符号"不止符合（以下）一个指标"：

1. 当地人告诉我们X在文化上很重要；

2. 当地人似乎对X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反应，而不是持冷漠态度；

3. X出现在许多不同语境中；

4. 围绕X有更广的文化阐释，例如单词的阐释或对X的性质的详细阐释，与文化中类似的现象进行比较；

5. 围绕X有更大的文化限制，无论是在规则的数量上，还是在对其使用时批准的严厉程度上。[8]

本章分析的符号符合部分或全部上述属性。

奥特纳并不局限于讨论那些书面和口头沟通中的关键符号，就像她证明的那样，物件也可以作为关键符号。虽然这一章聚焦在书面和口头符号，但是费萨尔时期的物件也具有关键符号的特征。服装就是这样一种物件，由于其地域性差异，服饰最初也是作为地理标志的。由于地域性的刻板印象，地理本身并没有从其他内涵中脱离出来。甚至在1918年10月协约国部队占领大马士革前，战争期间留在国内的本土叙利亚人与参与阿拉伯起义的汉志人和伊拉克军官之间就已经出现了分裂。尤其是汉志人，他们因为缺乏教养而被嘲笑，到1918年11月，大马士革人轻蔑地称他们为"贝都因人"（badw）。[9] 由于受到民众的嘲笑，阿拉伯军队的成员放弃了以前喜欢的阿拉伯头巾库菲亚（kaffiyeh），戴上了后来被称为费萨里亚（faysaliyya）的欧

洲风格的头盔。一名青年见证者描述了费萨尔本人的转变：

> 当我到家的时候，我告诉我的祖父我（在1920年春天国王访问霍姆斯那天）所看到的，上次的访问比这次更加华丽。那时国王还是埃米尔，他穿的是一件飘逸的白色阿拉伯长袍（fadfād），上面套着一件精致、柔软的黑色薄斗篷（上有褶皱），细长的白色库菲亚上套着一个黑色的头箍（'iqāl）。这使他看起来像一个纯正的贝都因人。今天，他穿着军装。他的肩上和胸前佩戴着肩章和徽章，头戴一顶军官（现在被称为费萨里亚）帽子（sidāra）。他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一名重要的军官。[10]

费萨尔的弟弟扎伊德和表弟纳斯尔也换上了欧洲的服装来“回应暗示”[11]。通过在服饰上的转变，汉志人实际上是在宣布他们拥有与大马士革更为城市化的穆塔纳维尔相同的“文明的”意志。

然而，早在1919年5月，在叙利亚首都的英国观察家就报道了一场旨在阻止在公共场合穿欧式服装的运动。[12] 1919年秋撤离危机期间及之后，协约国在“天然边界内”分割叙利亚的计划越来越明显，计划将沿海区域和东部区域都置于法国的管辖之下，这使得大马士革民众的反西方情绪变得特别强烈。社会下层青年对爱国热情进行回应，并因获得人民委员会赋予他们的权力更加大胆地公开表达其阶级仇恨，侮辱甚至攻击在公共场合穿着欧式服装的妇女。作为回应，阿拉伯政府颁布了一份公告，不仅威胁要惩罚袭击者，并且还警告妇女经过训练的公务员以后将在街上巡逻，并对每一位“超越服饰界限、背离习俗”的妇女的监护人提出告诫。[13] 因此，在费萨尔时期，服装从一个地理标志转变为一个政治标志，承担了奥特纳所谓“总结性符号”（summarizing symbol）的角色，即一种被视为“以感情强大和相对无差别的方式总结、表达、代表系统对参与者的意义”的符号。[14]

本章要讨论的另一类符号是口号，它与关键符号有双重关系：口号可能包含关键符号，也可能成为关键符号。[15] 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和诸如人民委员会这样的竞争团体都试图通过发明和传播口号来吸引尽可能广泛的民众。其中有些口号被证明是受欢迎的，但有些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广泛传播。阿拉伯政府积极阻止一些口号的传播，例如指责政府背叛或带有反犹太复国主义色彩的口号。[16] 一些口号缺乏丰富的象征意义，无法吸引许多支持者。有效的口号驱逐无效的口号，在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没有或没能够通过有效的标语和关键符号展现自己或其纲领的政治派别无法获得或维持民众的支持。[17] 那些能够展现其纲领的派别取代了那些不能展现自己纲领的派别。因此，口号可能是民众志向与政治事业组织要求之间的结合点。

下面对代表性符号和口号的讨论基于各种资料来源，包括宣传手册、演讲稿、大报和涂鸦副本、诗集，以及对示威游行或起义中口号的记述、报纸文章、社论、电报和回忆录。从各种档案馆收集的大约 50 份原始传单对这项研究特别有价值。由于传单的目的大致相同，因此它们受到相同惯例的约束，而且因为收集传单的外交官、旅行者和间谍都记录了散发传单的日期和情况，它们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手段，可用来查明和评估一种前后一致、目的独特的媒介中符号用法的演变情况。[18]

从《大马士革议定书》到“叙利亚完全独立”

1915 年 5 月，在阿拉伯起义开始前，埃米尔费萨尔两个月内第二

次来到大马士革，会见那些躲避贾迈勒帕夏的法塔特和阿赫德的领导者们。据安东尼厄斯称，他们向埃米尔提交了一份名为《大马士革议定书》（Damascus Protocol）的草案，其中列出了为换取秘密社团向协约国的帮助英国必须满足的条件。[19] 次年7月，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的次子埃米尔阿卜杜拉（Amir 'Abdallah）代表他父亲向英国在埃及驻地的东方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递信开启谈判，这场谈判最终引发了阿拉伯起义。在信中，阿卜杜拉要求英国准许建立一个阿拉伯哈里发国，并承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其范围北至梅尔辛（Mersina）和阿达纳（Adana），直到北纬37度，东至波斯边境，南至印度洋（不包括亚丁［Aden］），西至红海和地中海。这一边界与秘密社团在议定书中所要求的相同。[20]

大约4年之后，在金—克莱恩观察团出访大马士革之前和访问期间，首都被数以千计的传单所淹没。[21] 其中有一份的标题是"不独立，毋宁死！"，并载有以下段落：

> 今天，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要求独立和自由，并为此奉献鲜血和金钱。难道我们阿拉伯叙利亚共同体不应该团结为一个单一的集团，要求彻底独立、不受任何保护或托管的玷污吗？真主之手与我们的共同体同在。（保护和托管是同义词，是兼并的前兆。）
>
> 我们不否定盟友为帮助我们实现目标所做的一切，但是用我们的国家作为对这些援助的回报是否公正和公平？将我们的国家置于保护的枷锁之下或托管给他们中的一个，这是合理和恰当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
> 叙利亚的所有地区——包括南部、北部和西部——都寄希望于你们，巴勒斯坦（叙利亚南部）也是如此。观察团首先征求了巴勒斯坦人的意见，他们要求彻底独立，不分裂叙利亚，拒绝一切保

护、监护和托管。毫无疑问，叙利亚其他地区的爱国热情并不亚于巴勒斯坦人民，他们的团结和意见一致令观察团惊叹。难道我们不应该意见一致、团结一心，以从祖国根除耻辱和殖民主义，并拒绝一切保护、监护和托管或任何旨在奴役我们的意图？因此，我们必须要求：

1. 叙利亚和其他被解放的阿拉伯土地的彻底独立，诸如伊拉克。

2. 拒绝所有保护、监护、托管及其他类似措施。我们强烈抗议《国际联盟宪章》（Charter of League of Nations）第二十二条。

3. 叙利亚各地的完全统一（北至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东至哈布尔河［Khabur］和幼发拉底河、南至阿拉伯沙漠和迈达因萨利赫［Mada'in Salih］、西至红海和亚喀巴［Aqaba］—拉法赫［Rafah］一线及地中海）。我们拒绝一切犹太复国主义者。

4. 历史不容否认我们的伟大王朝通过完全独立所取得的地位，如倭玛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既然我们在某些事情上需要专家，我们会像最文明的国家那样，用我们的钱来购买他们的服务。

作为在1919年春夏两季所散发传单的典型代表，这份传单展现了在4年中关于独立的讨论取得了多么大的发展。虽然传单针对的对象是“阿拉伯人、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署名为“一名阿拉伯爱国者”，虽然传单要求“叙利亚和其他被解放的阿拉伯土地，诸如伊拉克”的独立，但它显然将其作者和受众视为一个独特的“叙利亚阿拉伯”集体（Ma'shar, Jamā'a），由位于叙利亚所谓“天然边界”内领土上的居民组成。此外，传单的作者用几种不同的形式替代了这个令人尴尬却更为明确和流行的口号——“我们要求叙利亚在其天然边界内完全独立，没有保护、没有监护，而且没有托管（lā himāya，lā wisāya，wa lā intidāb）”，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模

糊的对“阿拉伯国家独立”的呼吁，这一要求同时包含在《大马士革议定书》和阿卜杜拉的信中。

从传单样本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民族主义讨论中术语的演变。从 1918 年 10 月到 1919 年 4 月，在法国、英国、叙利亚和美国的档案中，55% 的传单受众是阿拉伯人，16% 是叙利亚人。此外，16% 的受访者呼吁阿拉伯的统一，9% 的人呼吁“彻底独立”，没有人提到叙利亚的天然边界。在接下来的 5 个月里，只有 5% 的传单是针对阿拉伯人的，23% 是写给叙利亚人的[22]，没有呼吁阿拉伯统一的要求，45% 的传单提到了叙利亚的天然边界，68% 的传单包含“彻底独立”（istiqlāl tāmm）的要求。

根据法国的资料源，“我们要求彻底独立”的口号单独或共同出现在上述传单列出的要求中（其他两个口号为“为了天然边界内的叙利亚”和“不要保护、不要监护、不要托管”）。到 1919 年夏天金—克莱恩观察团抵达大马士革时，民族主义传单、涂鸦和大报已经无处不在，这在费萨尔时期是绝无仅有的。[23] 尽管这一口号包含了对两个主题——独立性质和国家边界的划定——的声明，但是这两个话题一直是战争期间和后奥斯曼时期头几个月的争论焦点。这一口号的出现并未获得人民委员会的帮助，尽管它们是民族主义口号的制度支持，但是其建立是在数月之后。

虽然这一口号的迅速传播妨碍了对其起源和历史的还原，但是并非完全不可能。相反，口号的谱系仍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确定。第一，这一口号包含了一些要素，即使用 istiqlāl tāmm 来表示完全独立，使用 lā himāya、lā wisāya、wa lā intidāb 来表示对协约国管控决定的否定，这些要素非常独特，可以相当精确地追溯到其最初的表述。第二，由于口号通常被嵌入或伴随着其他文本，其组成的句子和短语往往有明确的界定。这使得有可能将这些句子和短语与具体的民族主义组织、组织者或政治主张联系起来。例如，上述传单中列举了一组特定的地理参考资料，将这一口号与以前确

定民族共同体外部范围的努力联系起来。因此，总体而言，重建要求“叙利亚彻底独立”的历史是有可能的。

如前几章所述，阿拉伯起义及其支持者是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叙利亚 / 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几个团体中的一个。事实上，在埃及政治上活跃的叙利亚流亡社区中的大派系对阿拉伯起义的支持充其量也只是勉强。这一派系质疑促成英国人和谢里夫家族结盟的动机，怀疑麦加人指导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能力，担心将运动与阿拉伯或哈希姆哈里发的支持者联系起来会疏远黎巴嫩和叙利亚信奉基督教的人。英国陆军首席政治官员吉尔伯特·克莱顿（Gilbert Clayton）在给陆军部（War Office）的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叙利亚人非常害怕一个麦加教权主义主导下的政府。”

> 他们认识到，麦加的谢里夫无法摆脱的极端保守原则与现代路线的进步是不相容的。叙利亚信奉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和穆斯林知识分子与麦加日益增多的接触，揭示了谢里夫政府的无知和无能，不仅没有减弱上述认识，相反加强了这种认识。[24]

此外，叙利亚流亡者在埃及的独特地位可能促使他们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叙利亚人，因此可能会劝阻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阿拉伯起义和“阿拉伯”独立的前景。虽然许多流亡者在埃及社会中拥有特权地位，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被同化，在政治上也受到孤立。埃及被一个欧洲大国占领的经历，迫使本土民族主义者面对的问题不同于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北方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互独立发展，大多数情况下对寻求共同的阿拉伯身份无动于衷。许多流亡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被排除在埃及的民族主义政治之外，并因其“叙利亚属性”而受到埃及民族

主义者的不信任，因而很多叙利亚民族主义流亡者转而寻求将共同的自我定义作为归属。[25]

有直接证据表明，协约国的口是心非进一步助长了民族主义流亡者对阿拉伯起义的疑虑。1918 年初，新成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开了协约国缔结的秘密协定文本。同样，在《泰晤士报》(伦敦）上公布的《贝尔福宣言》也广为人知。[26] 针对这些被披露的信息，埃及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发表了《七人宣言》，并且从宣言的签名者和奥斯曼行政权力下放党残余党员中组建了叙利亚联盟。[27]

在 1919 年 6 月发表在埃及期刊《灯塔》(*al-Manār*）上的一篇文章中，拉希德·里达描绘了联盟创始成员在纲领上的激烈争论。[28] 流亡的民族主义者在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包括流亡者应该组建的国家边界以及叙利亚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尤其是与汉志之间的关系。英国在其战后计划上的含糊其辞引发了联盟成员间分歧最大的争论。例如，英国对《七人宣言》的回复可谓一部模棱两可的杰作。虽然英国人对“战前自由和独立的阿拉伯地区”和“战时阿拉伯人自己解放的奥斯曼土耳其控制的地区”作出“彻底主权独立”的承诺，但是却在其他领土的安排计划上含糊其辞。[29] 在无法确定英国真实意图的情况下，联盟在如何回复上无法达成一致，出现了两派。一派愿意支持协约国中的一国对叙利亚的临时占领，以换取财政和技术援助，这一举措后来在《国际联盟公约》第 22 条中被表述为“文明化”使命。相反，独立派要叙利亚的即刻和完全独立。[30]

联盟最终的解决方案揭示了两派的争论结果。如上述传单所述，叙利亚联盟的方案在第一条将叙利亚的范围界定为北至托罗斯山脉、东至哈布尔河和幼发拉底河、南至阿拉伯沙漠和迈达因萨利赫、西至红海和亚喀巴—拉法赫一线及地中海。根据第二条，“叙利亚将享有国际联盟保证的完

全独立”。最后，在第 14 条宣布“在阿拉伯民族实现民族团结的情况下，叙利亚将加入这一联盟，但条件是加入联盟不会以任何方式破坏叙利亚民族团结和叙利亚政府”。[31]

至少有两名叙利亚联盟的创始人留下了他们在讨论方案时的立场的记录。拉希德·里达暗示他同意那些寻求减少协约国在战后阿拉伯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的观点，并提到他对谢里夫家族和英国之间的联系感到怀疑，他声称最初他是反对切断叙利亚与汉志和伊拉克间的直接联系的。他写道，说服他妥协的是他意识到必须在叙利亚基督徒加入叙利亚联盟（该组织创始人中有几个基督徒）和叙利亚并入一个包括汉志人的国家间作出选择。他为自己的妥协意愿进行了辩护，他的结论是由阿拉伯领土组成的松散联邦（这是联盟赞同的解决办法）不会妨碍叙利亚和汉志在争取独立的共同斗争中相互援助。[32]

姆西布丁·哈提卜则拒绝考虑放弃他对谢里夫和叙利亚 / 汉志合并的敌对立场。在 1919 年春天接受法国驻麦加代表的访谈时，哈提卜将叙利亚反对谢里夫的斗争与反对协约国托管的斗争相提并论：

> 我保证，叙利亚必须有它的天然边界，并且将成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我们不想与汉志分子有任何接触，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我同胞的意见。叙利亚人现在必须团结起来，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祖国的独立。他们必须同等地斗争，一方面反对某些国家的要求，这些国家想把叙利亚置于它们的监护之下，另一方面，反对国王活跃的欲望，他正在寻找一种方法，将《古兰经》作为叙利亚的法律。如果国王坚持他的想法，我们就完了，（我们会）完全脱离他。[33]

叙利亚联盟在认可这个方案不久后就开始对外进行传播工作。然而，

一个流亡组织就议程作出决定与该议程在叙利亚赢得广泛支持仍相去甚远。如上所述，阿拉伯政府不仅从一开始就支持与叙利亚联盟截然不同的方案（即埃米尔费萨尔在 1934 年 1 月 29 日和 2 月 6 日巴黎和会上宣布的阿拉伯统一方案）[34]，而且还获得了英国的财政资源，协助这一方案的传播。相比之下，英国驻埃及当局得知叙利亚联盟的方案和该组织在叙利亚的计划后，企图通过审查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通信及推迟遣返许多在政治上活跃的流亡者来破坏其行动。[35] 那么，叙利亚联盟的方案是如何如此迅速地主导费萨尔统治下的叙利亚的政治辩论的？

明确要求叙利亚在其天然边界内完全独立的口号在叙利亚赢得广泛支持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尽管英国对叙利亚联盟的成员和宣传进行了封锁，但是该联盟仍然能够在叙利亚发起一场有效的运动来宣传其方案。虽然能够详细说明叙利亚联盟成功进入叙利亚的证据并不充分，但它们确实表明流亡者认为传播联盟方案是当务之急。他们的努力得到了战时留在叙利亚的活动分子的协助。根据拉希德·里达的说法，甚至在联盟正式成立之前，就有一批组织者，包括阿拉伯军队的军官（及卡萨布和哈提卜？）在埃及、汉志和叙利亚之间往返，并“指示其他人继续进行宣传”。

> 结果，许多叙利亚人知道了真相，他们最热切的希望是完全独立。他们把悲观情绪和矛盾心理指向叙利亚和阿拉伯政府之间的联系，没有一个了解真相的人支持这种联系。[36]

在战争结束时，叙利亚联盟计划向叙利亚部署一些组织人员：哈立德·哈基姆被派往霍姆斯和哈马；拉希德·里达被派往拉塔基亚和的黎波里；哈桑·哈立德被派往阿勒颇和代尔祖尔；穆赫塔尔·苏勒赫（Mukhtar al-Sulh）被派往贝鲁特；哈桑·哈马达（Hassan Hamada）被派往浩兰；拉

菲克·阿兹姆、卡米勒·卡萨布和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被派到大马士革；瓦赫巴·以萨（Wahba al-'Issa）、什布里·贾迈勒（Shibli al-Jamal）、阿兹姆和沙赫班达尔被派往巴勒斯坦。虽然这项计划最后失败了，但是组织者们确实成功地进入了叙利亚，包括米歇尔·鲁特法拉赫（Michel Lutfallah）和他的兄弟乔治斯（Georges），他们以组织饥荒救济为由前往叙利亚。以乔治斯的2 000埃及镑作为启动资金，鲁特法拉赫两兄弟在叙利亚对行政、翻译和转录文本的活动进行资助。据报道称，他们在向欧洲和美国发送叙利亚寻求帮助的电报上花了大量资金。[37] 两兄弟及其同伴在叙利亚散发的材料来自埃及，是奥斯曼行政权力下放党前副主席、叙利亚联盟创始人之一的伊斯坎达尔·阿姆（Iskandar 'Ammun）寄给他们的。例如，1919年1月，一名法国线人报告说，阿姆向叙利亚运送了“数千份”材料，其中包括1915年保卫法国海外利益的参议院委员会成员埃蒂安·弗朗丹（Etienne Flandin）发表的一份挑衅报告。这份报告中包括诸如“叙利亚将成为法国光荣的殖民地”和“我们能放弃宝贵的手段（即叙利亚）来对伊斯兰教的核心地带进行渗透吗?”的表述。这份报告最终服务于阿姆和叙利亚联盟的利益，而不是殖民党（parti colonial）的利益。[38]

在到达叙利亚后，叙利亚联盟的组织者就与同该联盟无关的常驻民族主义者一起工作。根据英国的一份报告，大马士革的一群民族主义者将要求叙利亚在其天然边界内的独立作为自己的主张，并散发宣传材料，其中包括联盟宪章中所划定的明确边界。该组织与贝鲁特的同伴在行动上相互协调，派组织者前往阿勒颇、霍姆斯、哈马和拉塔基亚为其方案进行宣传。报告补充说：“乘坐毛驴或马车而来的代理人们正在萨伊达（Saayda）和纳布卢斯进行游说，他们正前往南方的巴勒斯坦开展工作。”[39]

除了叙利亚联盟的直接组织外，呼吁叙利亚在其天然边界内完全独立的口号之所以受欢迎，可能是因为该口号所蕴含的情感力量。为了取得成

功，民族主义者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必须使民众能够产生共鸣，虽然民族主义者在建构叙事方面有充分的回旋余地，但是他们不能在整体上完全编造这些叙事。最终，呼吁叙利亚独立的要求获得了成功，因为叙利亚人认为这一要求很有说服力，至少在费萨尔短暂的统治时期里是这样的，多数人明显发现这一主张比谢里夫倡导的泛阿拉伯远景更有说服力。

叙利亚作为一个统一单位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40] 尽管奥斯曼人将这片领土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单位，抹去了叙利亚（在其天然边界内）的政治标记，但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大叙利亚一直作为社会经济空间在发挥作用，例如，通过市场、移民甚至精英联姻来加强其作用。在危机或饥荒时期，来自浩兰的农民和部落成员经常向北迁移到大马士革或向西迁移到巴勒斯坦，在同样的情况下，巴勒斯坦的农民和部落成员则向相反的方向迁移。从 18 世纪开始，区域分工（伴随着劳动力交换和作物专业化）整合了从北部阿勒颇到南部黎巴嫩山和巴勒斯坦的地区。贸易网络遍布整个区域，将来自贝鲁特、雅法（Jaffa）、纳布卢斯、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商人联系在一起。19 世纪最后 10 年建成的铁路系统，将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以及内陆城市与其腹地连接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一位学者所说的“新兴国家政治经济学”（emergent 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41]

将该地区居民彼此绑定在一起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以及对“叙利亚”这一所指的文化习惯，激发了民族主义者对诸如叙利亚和叙利亚—阿拉伯等术语的挪用，并证明这是有效的。在世纪之交，这些术语开始出现在各种民族主义文本中，包括 1913 年在巴黎召开的阿拉伯大会（Arab Congress）的宣言中（奥斯曼行政权力下放党中的叙利亚人，包括伊斯坎达尔·阿姆在内，发挥了关键作用）和叙利亚联盟的方案中。[42]

这里并不是说，天然边界内的叙利亚的理念相对于其他民族符号在获取大众情绪支持上更具合法性，也不是说这种情绪是原始的、不可改变的，

甚至是排他性的。也没有人认为，公众对叙利亚在其天然边界内的整体性的支持产生于上述不断加强的进程。相反，这里认为，叙利亚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的概念在这一时期很容易被理解，而且偶然的政治事件及叙利亚联盟和人民委员会成员的努力（包括传播一个全面的话语场域，使“在其天然边界内的叙利亚”具有新的含义和特点）使这一民族符号在民族主义趋势中居于首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天然边界内实现叙利亚完全独立的口号得到广泛传播可能最终是因为埃米尔费萨尔和阿拉伯政府的活动。在战争结束时，埃米尔的政治地位很难令人羡慕。一方面，叙利亚联盟的成员及其同盟在叙利亚的组织活动和民众对其方案的反应，存在在民族主义趋势中制造分裂的威胁，埃米尔担心这会削弱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另一方面，英国的犹豫不决、法国在叙利亚的野心、英国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野心、两国政府之间的公开和秘密安排，以及费萨尔在和会上的模糊地位所带来的限制等外部因素，限制了埃米尔在应对国内不满时的选择。结果，费萨尔不得不铤而走险，发表迎合民众情绪的言论，以统一民族运动、联合那些怀疑他独立性和诚意的人，同时进行保全面子的、务实的外交活动。毫不奇怪，他那模棱两可、妥协和模糊的方式使他遇到了挑战。[43]

表面上看，费萨尔在接受关于阿拉伯统一问题的妥协方案前的几个月里，就采纳了“完全独立”的要求。虽然“完全独立”一词的流行肯定有助于他认可这个词的使用并与其倡导者保持一致，但是仍有两个因素影响了他采纳这一口号的决定。第一，他最初对英国人的信任和英国人在战时对他父亲作出的承诺；第二，他渴望通过将实现“完全独立”描绘为完全属于阿拉伯起义的遗产来获得民族主义凭证。因此，埃米尔不仅在他向叙利亚人民发表的第一份声明（1918 年 10 月 5 日）中宣布成立的“叙利亚的阿拉伯宪政政府（是）完全独立的”（mustaqilla istiqlālān lā shā’iba fīhi），

而且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即使在他决定支持英国对叙利亚的托管后，他也支持继续宣传这一口号。[44]

因此，受到鼓励的各级政府以及与之结盟的政治组织采纳并传播了“完全独立”的呼吁。例如，在费萨尔于1918年11月第一次启程前往欧洲前不久，法国驻大马士革联络官向其上级抱怨说，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的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扎法尔在埃米尔的协助下，每天组织游行活动，以纪念“叙利亚的解放者和解除监管的完全的阿拉伯独立”。[45] 1919年4月，在亨利·丘吉尔·金（Henry Churchill King）和查尔斯·克莱恩（Charles R. Crane）被任命领导联合调查委员会不到一周，另一名驻扎在大马士革的法国外交官报告称，可能与阿拉伯俱乐部有关的一伙人正在全城的墙上涂画“阿拉伯完全独立”的字样，商人们“被建议制作印有同样口号的招牌，并将其放在商店的橱窗里”[46]。在随后的一个月，大马士革市政府指示那些加入阿拉伯政府准许的欢迎费萨尔从欧洲旅居回国的游行的商会，让他们漆上或绣上“阿拉伯独立万岁”的标语，并高呼“埃米尔万岁和完全的阿拉伯独立”。[47] 不久之后，费萨尔受到巴黎事件的惩罚，此后他寻求穆罕默德·法兹·阿兹姆（Muhammad Fawzi al-‘Azm）的帮助来说服叙利亚人民接受英国托管，阿兹姆这位老人把煽动民众要求“完全独立”的情绪的责任完全推到了费萨尔身上。[48]

考虑到费萨尔所处的困境，“完全独立”的概念为他提供了相对于叙利亚联盟成员或其他多数人口更多的灵活性，这一点并不奇怪。例如，法国驻大马士革代表写到游行群众向“叙利亚解放者和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实现阿拉伯完全独立的捍卫者们”致敬，埃米尔在那天给他的父亲发了一封电报，其中他调和了“完全独立”和他所谓与英国的“决定性联系”（irtibāt nihā’i）；

> 我将批准授权英国与阿拉伯人结成明确的联盟，但条件是除英国

外，任何外国势力不得与宗教少数群体有联系。作为交换，我们将给予英国人使用一切有益于他们的东西的权利。我们将要求（英国）提供我们所缺少的一切，包括行政人员、顾问、资金和武器，条件是“不丧失任何独立性，叙利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那我将以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任何条款，给予他们想要的一切。[49]

费萨尔的慷慨提议实际上是将阿拉伯人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其根本原因是担心法国在中东的野心，他还认为英国和阿拉伯的利益是一致的，都想要阻止这些野心的实现：

我拒绝了法国向我提供的一切帮助，因为我看到了他们占领这个国家的欲望。与英国的联系必须是决定性的联系，因为阿拉伯人只能在正直和爱中生存。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权宜还是出于真心。但是，我们将遵守他们的政策，因为我们的利益是相互关联的。

费萨尔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保护之下的“完全独立”）来平衡国内民众的要求以及巴黎谈判桌上协约国强加的条件。

让协约国承认“完全独立”并不是费萨尔向与会外交官提出的唯一要求。例如，费萨尔 1919 年 1 月 29 日在和会上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宣称他代表他的父亲和阿拉伯起义的领袖，寻求承认亚洲所有讲阿拉伯语人的独立，这个范围从北部的亚历山大勒塔—迪亚巴克尔（Alexandretta-Diyarbaker）一线到南部的印度洋，包括汉志和亚丁。[50] 一周后，费萨尔重申了这些要求，显然他相信协约国在《对七人的宣言》和 1918 年 11 月 7 日《英法联合声明》（Anglo-French Declaration）中作出的承诺。此外，他还相信伍德罗·威尔逊断言的自决“从此以后是一项必

要的原则，政治家忽视它将是很危险的”[51]，并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以确定原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居民的意愿。

费萨尔要求协约国在自决原则基础上承认一个阿拉伯国家，这是对外交现实的公然挑衅。首先，费萨尔在会议中的角色本身就有争议，法国抵制由他代表所有阿拉伯人的主张，此后埃米尔的地位被降低为汉志国王的代表。此外，法国政府不仅不愿意放弃《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基本原则，而且协约国代表在巴黎召开会议后不久，他们原则上接受了托管制度的建立。1919 年春，埃米尔别无选择，离开了和会，回到大马士革，放弃了坚持承认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家和抵制托管的立场，对糟糕的局面做出了最好的处理。[52]

通过比较埃米尔在第一次欧洲之行前后发表的两份声明，可以看出费萨尔在建立一个包括叙利亚的阿拉伯国家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转变。费萨尔在 1918 年 10 月到达大马士革一个月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回应了叙利亚对汉志统治下的泛阿拉伯国家的担忧：

> 就地区而言，阿拉伯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阿勒颇人不同于汉志人，叙利亚人不同于也门人。我父亲把国家划分成不同地区。每个地区会根据条件和当地群众的进步所需制定和实行专门的法律。[53]

在巴黎之行后，费萨尔开始谈及一个“去中心化”的阿拉伯国家，一个更加接近叙利亚联盟和前述传单作者主张建立的国家。部分重印在《首都报》上并且广泛传播的一份讲话中称：

> 叙利亚、汉志和伊拉克是阿拉伯（民族）的不同部分，那里的所有居民都想要独立。内志和其他与汉志地位平等的地区受汉志人管辖；

> 至于叙利亚，它必须在其天然边界内独立。伊拉克也是一样，有必要在伊拉克建立一个独立于叙利亚和阿拉伯其他地方统治的政府。[54]

为了确保读者明确费萨尔所作声明的含义，报纸附加说："从这一法令看，埃米尔殿下批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成立独立的政府，并与独立的汉志在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上保持团结。"1919 年 6 月，阿拉伯政府在大马士革和东部地区的其他城市分发传单，不仅重申了埃米尔对"叙利亚在其天然边界内实现完全独立"的呼吁，并且表达了他对"其他一些领土独立的希望"。[55]

同样，1919 年春天，外交环境的变化加上对法国长期以来的恐惧，促使费萨尔支持英国托管下的"叙利亚完全独立"。[56] 数月之前，在和会上，伍德罗·威尔逊主张建立一个国际观察团，协助协约国来决定叙利亚的未来。然而，所建立的观察团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费萨尔所期待的观察团。第一，法国和英国都没有参加该观察团的活动，从而使其调查结果的有效性无法确定。此外，威尔逊没有授权委员会决定是否应该在叙利亚实施托管制度，而是责成观察团"阐明意见以及任何一个托管者将要处理的土地的状况"。在观察团成员选定后，威尔逊的指示甚至更加直截了当。"和会的目的，"他写道，"是将某些地区从土耳其帝国中分离出来，例如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奇里乞亚，也许还有小亚细亚的其他地区，并将其人民的发展置于在国联中担任托管国的国家的指导之下。"[57] 通过接受观察团的角色和托管制度的原则，阿拉伯政府很容易就被那些愿意接受外国顾问但将托管制度描绘成欧洲列强帝国主义野心的遮羞布的人所攻击，置于守势。正如诗人哈伊尔丁·兹利可里（Khayr al-Din al-Zirikli）当时所写的那样，

敌人将他们自己包裹在伪善之下，怀抱着敌意与憎恨。

他们宣誓忠诚，却不忠诚，你将其中一些人作为盟友信任，但这些人是背信弃义者……

那些怀抱着指引天秤却没能辨别出真相的人有什么毛病？

如果他们不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不能将成功带给那些应该得到它的人，那么就让他们打破这些天秤。[58]

或者，用上文重现的话说，“保护和托管是同义词，是兼并的前兆”。

费萨尔愿意接受英国的托管，这使民族主义运动两极化。正如上一章节所述，法塔特行政委员会分裂成三个群体，所谓异见者拒绝任何托管监护。据称，卡米勒·卡萨布是发声最多的异见者，他在呼吁“叙利亚在其天然边界内完全独立”的口号中附加了“不要保护、不要监护、不要托管”（lā himāya，lā wisāya，wa lā intidāb）等字样，以防止“完全独立”在任何意义上被打折扣。[59] 在观察团抵达前夕，阿拉伯政府认为在大马士革举行抗议费萨尔立场的示威活动是非常危险的，因而禁止进一步的公众集会，并下令在街头架设机关枪。[60]

在这场危机后，费萨尔放弃了英国托管的主张，先是在金—克莱恩观察团到来之前支持“有限托管”，之后在米歇尔·鲁特法拉赫组织的一次宴会上，他完全放弃了托管的想法。[61] 然而与此同时，叙利亚国民大会制定了一项递交给观察团的方案，该方案综合了叙利亚联盟在民族主义争论中提出的许多主张和话语。从审议记录和决议中可以确定，大会的举动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因而《大马士革方案》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当然是不精确的）晴雨表来衡量叙利亚的公共舆论。这一方案尤其能说明问题，因为大会的意见范围超出了民族主义范畴：例如，非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法兹·阿兹姆不仅是大马士革代表团的团长，而且据说在起草方案

和推动方案通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2]

《大马士革方案》否认了《国际联盟宪章》第 22 条对叙利亚的适用性，指出“生活在叙利亚民族中的阿拉伯人在智力上不低于其他先进民族……例如独立之初的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罗马尼亚人”。此外，它还包含以下要求：叙利亚的完全独立，领土北至托罗斯山脉、南至拉法赫—亚喀巴一线（直到焦夫［al-Jawf］）、东至幼发拉底河和哈布尔河以及地中海以西一线；“无保护或监护”的独立；“广泛权力下放的”叙利亚政府，埃米尔费萨尔为国王；拒不承认法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张；伊拉克的完全独立。最后，该文件建议，如果协约国坚持向叙利亚提供援助，叙利亚将接受美国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条件是这种援助不损害叙利亚的“完整的政治独立”和统一，而且这种援助不能持续超过 20 年。如果事实证明美国无法提供这种援助，叙利亚将接受英国的援助，但必须遵从同样的条件。[63]

因此，尽管一位历史学家称赞这一方案“巧妙地融合了各种观点”[64]，但是这份被安东尼厄斯称为“阿拉伯人对当今各种问题态度的权威声明”[65]的方案，在事实上展现了民族主义争论的中心在人民委员会形成之前已经发生的转变和聚焦的程度。

阿拉伯起义、叙利亚革命者和“殉难者”

上文提到的费萨尔向叙利亚人民发表的第一份宣言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措辞：他通过宣布“一个完全独立的阿拉伯宪政政府已经在叙利亚成立”，实际上是在宣称随着阿拉伯军队进入大马士革，实现阿拉伯独立的斗争已经结

束。埃米尔的声明是以《对七人的宣言》中所记录的担保为前提，在该宣言中英国承诺在“阿拉伯人自己解放”的领土上的居民享有“完全的主权独立”。不管是否属实，费萨尔称因为首先进入大马士革，“阿拉伯人”满足文件规定的独立条件。[66] 因此，正如费萨尔在 1919 年 1 月 29 日巴黎和会上的讲话中所宣称的那样，协约国代表的唯一任务就是正式承认既成事实。

考虑到英国为确保阿拉伯军队先于任何其他军队进入大马士革付出的努力，费萨尔在和会上要求遵守《对七人的宣言》的条款是合乎逻辑的外交战略，而且埃米尔相信，在阿拉伯—英国关系上，“我们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相关”。[67] 但是，费萨尔的表态不能完全归因于外交上的迫切需要，因为即使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协约国已经明显另做打算之后，埃米尔和他的盟友仍坚持向阿拉伯的听众强调已经取得“完全的独立”。[68] 对于费萨尔及其政府内和政府外的支持者而言，坚持强调 1918 年 10 月 1 日已经取得阿拉伯独立的假象至关重要，因为这样做他们可以提高为赢得独立而战的军事斗争的地位。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统治的运动是谢里夫家族声称其卓越民族主义倾向和要求对大马士革统治权的唯一合法性依据，因此成为谢里夫合法性的核心标志。

由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对这一标志的承认和欢迎程度，因此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积极展开行动，在叙利亚各地传播阿拉伯起义及其相关英雄的传说。一副被暗中挂在贝鲁特一个公园大门上的标语写道：“忠诚的叙利亚人声称心怀感激，他们将通过尊敬把叙利亚人从土耳其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人来证明这一点。”“这位解放者是我们敬爱的埃米尔费萨尔。正直的人都希望他幸福。”[69] 塔比特·阿卜杜勒·努尔是伊斯坦布尔文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在从亚喀巴到阿曼的路上一路分发明信片，上面画着一位挥舞着谢里夫旗帜的身份不明的谢里夫军官（与埃米尔费萨尔非常相似）。这张明信片展现出两个传奇故事：“烈士们（fidā’iyyīn）向被解放的阿拉伯

人的问候”和“他手中的挥舞的旗帜”。[70] 图勒凯尔姆（位于巴勒斯坦）当地的一个民族主义俱乐部义演了一出名为《塔菲拉之战》（*The Battle of Tafila*）的话剧，重现了埃米尔扎伊德领导的阿拉伯军队和土耳其之间的战斗。[71] 政府甚至将 1920 年 4 月“起义日”（‘īd al-thawra）（也是阿拉伯政府建立后一年半）确立为节假日，来纪念阿拉伯军队的功绩，并庆祝“起义第四年的结束”。[72]

英国在叙利亚的军事领导人，出于对谢里夫统治内部和外部挑战的担心，也鼓励传播阿拉伯起义的神话。在费萨尔第一次欧洲之行前，法国驻大马士革联络官致电上级，批评英国人散布的宣传“树立了埃米尔费萨尔一个人的军队解放了包括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内的所有阿拉伯领土的传奇”。他哀叹阿拉伯起义的“神话”事实上是由自私自利的报纸对起义领袖的采访和协约国军队将军埃蒙德·艾伦比子爵（General Sir Edmund Allenby）发给费萨尔的电报所滋养的，在电报中艾伦比对费萨尔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的大加称赞使埃米尔的名声传遍欧洲。[73]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拉伯政府和其他方面的努力并非毫无成效：所有民族主义派别，甚至包括那些在战争期间故意避免参加阿拉伯起义的个人，或那些因讨厌谢里夫侯赛因的政策或担心其外国关系而抛弃他的派别，都感到不得不向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阿拉伯起义致敬，或至少承认阿拉伯起义。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英国和法国实际上已经绕过叙利亚内陆而直接控制的地区），作为起义象征的谢里夫侯赛因和埃米尔费萨尔通常被认为包含着反帝国主义的含义。法国禁止沿海地区的海推布（布道者）在周五聚礼期间以谢里夫侯赛因的名义进行布道，一位备受欢迎的海推布在违反这一法令后受到了驱逐，抗议随后在贝鲁特爆发并蔓延到两个占领区。[74]

在东部占领区，阿拉伯起义的意义更为微妙，它与谢里夫合法化的关系密切，而不仅仅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这可以再一次归因于阿拉伯政府

的有效宣传：由于阿拉伯政府及其联盟协会通过雄辩的和战略性的报纸文章和戏剧性的场景重现，提供了对起义的权威解读，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对起义进行自主和不同的重新解读的可能。然而，因为对该符号的重新解读确实发生了（通常是在非谢里夫或反对谢里夫的文本中进行的语境重构），所以起义所唤起的回忆不仅仅局限在谢里夫家族和他们支持者的话语社区（discursive community）中。

埃米尔费萨尔本人于 1919 年 5 月 5 日向叙利亚显贵发表的讲话中阐述了阿拉伯起义的含义，这也许是最全面的阐述。费萨尔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让出席会议的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代理人授权他继续“指导政府的内外政策”。正是因为这次会议如此重要，阿拉伯政府不仅广泛宣传了他的演讲（有一次是向一家报纸提供补贴，刊发一份特别版报纸，重印费萨尔的演讲稿），而且在转写稿中加入了听众支持费萨尔的叹词。[75]

从根本上讲，费萨尔的演讲是对谢里夫主张的辩护，巧妙地融合了两个主题。首先，费萨尔断言汉志人值得阿拉伯人持续的信任和效忠，因为在“大多数显贵”保持沉默或指控他们叛国时，他们对奥斯曼当局的统治进行了反抗，只有他们表现出对国际事务的真正理解。由于他们的先见之明，汉志人，特别是谢里夫侯赛因至少使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免遭不可避免的失败和解体：

> 我的父亲在国际大冲突期间奋起反抗，因为他看到土耳其人被德国人的洪流裹挟着前进，把奥斯曼民族推向灾难。他认为，如果阿拉伯人在战争中继续与土耳其人和德国人结盟，将会和他们的结局一样。他看到了阿拉伯民族希望摆脱专制统治的束缚，渴望复兴过去的历史，希望摆脱敌人的圈套。[76]

作为第二个主题，费萨尔将阿拉伯起义置于包括叙利亚在内的更广泛的阿拉伯民族运动的背景下。虽然他承认是叙利亚人最先构想出阿拉伯主义学说，但他把早期理念转化为行动的成就归功于汉志和阿拉伯起义。因此，阿拉伯起义成了阿拉伯独立的必要条件，作为阿拉伯的拯救者，谢里夫们理应在民族主义的万神之殿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 毫无疑问，首先是我的父亲，然后是参加运动的汉志人，对这场运动，也就是阿拉伯革命，负有责任。至于叙利亚人，他们负有概念上的责任，因为他们激发了汉志人发动战争的欲望。赞美真主，最初属于汉志人的荣耀是每个人的荣耀。因为这次起义是民族主义的起义，如果没有全体民族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
> 在我到达大马士革并会见了那些支持起义的人之后，我回到汉志，告诉我父亲他们是如何挺身而出支持他的。但原因你们都知道，当时的情况——土耳其向他们施压——不允许叙利亚人支持汉志人。尽管如此，历史将使他们的行为永垂不朽，并将在这一时期被屠杀的叙利亚人的名字用金字写在碑文上。我的父亲发动了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完全不顾对汉志和汉志人的影响。他对结果并不确定，因为真主并没有就这些事给出启示。但是，土耳其人撤出了整个叙利亚。

然而，就在费萨尔在叙利亚的一些显贵面前庆祝阿拉伯起义胜利的那一刻，各种民族主义团体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散发传单，这些传单中很少或只是偶尔提到阿拉伯起义或《对七人的宣言》。作为对阿拉伯起义的替代，这些传单基于历史先例或/和自决权要求叙利亚的独立。“哦，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先祖通过流血牺牲解放了这个国家，”一份传单上写道，“我们的祖先不是被殖民者，而是自由的阿拉伯人，他们痛恨压迫，蔑视奴役。”[77]

政府官员发现，或许在阿勒颇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愿意接受阿拉伯起义的传说，在那里的一个有吸引力的神话中，汉志人作为反对奥斯曼压迫者的领导形象与他们明显的亲土耳其情绪相矛盾。来访的阿拉伯政府官员承认，阿勒颇有持极度怀疑态度的观众。例如，当1918年11月费萨尔第一次来到阿勒颇时，为应对怀疑，他称因为阿勒颇“处于阿拉伯领土的末端”，使其与阿拉伯起义疏远，并使他们之中“头脑简单的人”倾向于相信奥斯曼人散播的反谢里夫的宣传。[78]

因此，在庆祝宣布独立和费萨尔就任叙利亚国王的加冕典礼的讲话中，阿勒颇阿拉伯俱乐部的前主席、当地国防委员会成员阿卜杜勒·拉赫曼·卡亚里只是简单提及了阿拉伯起义。相反，他关注的是叙利亚人在历史上经历的集体磨难（collective suffering），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经历的磨难，他将其作为叙利亚独立的基础。对于卡亚里而言，反抗奥斯曼的斗争并不是叙利亚历史中一个独特的决定性事件，而是叙利亚居民（“征服者的护身符……他们的土地成为士兵的墓地和他们毁灭的原因”）反抗“法老、波斯人、恺撒、鞑靼苏丹、土耳其人、法国和英国的王子”的广泛冲突中的一个片段，“他们（入侵者们）在这里发现的是坟墓，而不是通往东方的桥梁”。对于费萨尔，卡亚里认为这位新国王是一位“在（叙利亚）太阳照耀下”的战士，叙利亚人选择将王位授予他不是因为他领导了起义，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他是合适的、合格的、值得长久信任的、忠诚的、坚定的、精力充沛的、知识渊博的、身世高贵的和正直的”。卡亚里讽刺性地颠覆了阿拉伯起义的传说，将维护叙利亚独立的责任从费萨尔转移到叙利亚人自己的身上，他宣称：“我们是他（费萨尔）的士兵、他的剑和他的臂膀。”[79]

卡亚里的演讲只是叙利亚人为自己的解放集体承担责任的众多例子之一。类似的事情还体现在谢里夫以及非谢里夫或反谢里夫的人在赋予革命（thawra）和革命者（thā'ir/thuwwār）这两个词意义上产生的争夺。“革

命”（包括 inqilāb 和 nahda）是演说家和记者用来描述阿拉伯起义最常用的词。[80] 例如，在 1919 年 5 月 5 日的演讲中，费萨尔自己不少于九次使用 thawra、thuwwār、al-haraka al-thawriyya（革命运动）等词描述起义或起义参与者。尽管这个词通过政府渠道得到了广泛宣传，但是其含义发生了变化，因为各群体将其据为己有，这些群体包括人民委员会及其在记者群体中的同情者、在法国和英国占领区开展袭击活动的非正规军。这些团体和他们的支持者将自己的活动置于“革命”的外衣之下，以谋求获得不被他们对手承认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也因他们经常从事或支持的抢劫、袭击和勒索行为看起来像是假象。

“阿拉伯起义”一词所指涉的“对象”的扩大与谢里夫们宣称阿拉伯起义是一起独特事件的企图背道而驰，因此它削弱了谢里夫家族合法性的象征基础，特别是在对谢里夫家族幻想破灭的背景下，因为谢里夫们首先默许了英国的托管，然后在 1920 年 1 月签订了《费萨尔—克列孟梭协议》。例如，1920 年 1 月 13 日发行的代表人民委员会立场的报纸《防御》（*al-Difā’*）在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埃米尔是否同意法国对叙利亚的托管？有可能吗？》（“我们知道，就跟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一样，埃米尔费萨尔殿下不能以我们的名义与法国政府就一件我们没有授权给他的事情签订协议。”）的文章，猛烈抨击法国哈瓦斯新闻通讯社（Havas）称“我们的革命者为盗贼（lusūs）”。同样，该报在报道反法游击队活动的新闻中也不断地使用“革命者”这一术语。[81] 该术语的普及甚至导致通常支持谢里夫的阿拉伯独立党（Arab Independent Party）也采用了人民委员会的命名法，称游击队的活动“只不过是人民的革命”（thawrat al-sha’b）。[82]

但是，人民委员会及其同情者并没有将“革命”一词的使用局限于针对英法的游击活动。在“撤离危机”后，随着协约国计划的轮廓日渐清晰，人民委员会开始用“革命”这一词来指反对埃米尔费萨尔、他领导的政府

和其支持者的行动，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准备通过权宜之计或背信弃义来损害国家利益。例如，在 1919 年 11 月，高级人民委员会在大马士革街头传发了题为《叛国和愤怒》（Treason and Outrage）的传单：

> 既然我们的盟友背叛了我们，嘲弄了我们，我们只有敲开革命的大门，让火焰熊熊燃烧，冲天而起。市民们：为革命做好准备。革命，如果他们背叛我们，我们就革命。革命，如果他们不遵守他们的诺言，我们就革命。打倒奸细！打倒叛徒！火焰会焚烧他们。在那个可怕的日子打倒他们。[83]

令人惊讶的是，费萨尔在和他的兄弟扎伊德的通信中也采用了“革命”的这一用法。当费萨尔在国外的时候，扎伊德在发给费萨尔和其父的电报中警告了可能即将到来的反谢里夫的革命：“我无法阻止革命”“革命已经到了家门口”。他写信恳求他们的帮助。[84] 在了解到对代尔祖尔的袭击后，费萨尔说，像拉马丹·沙拉什这样的人是“应该受罚的革命者”。[85]

尽管包括人民委员会及其同盟在内的话语共同体勉强接受了作为谢里夫家族合法性象征的阿拉伯起义，但是他们赋予它的意义并不是谢里夫们最初想要纳入的不同的话语场。阿拉伯政府及其支持者鼓励并用来证明他们在叙利亚社会中地位的另一关键象征符号也出现了类似命运：“烈士们”——当今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因政治罪而被倒数第二位叙利亚的奥斯曼总督和奥斯曼第四军团的指挥官贾迈勒帕夏（年长的）处决的居民。

多年来，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眼中，贾迈勒帕夏的处决令是“阿拉伯运动”演变史上一个关键分界线的神话已经司空见惯。毕竟，处决正是在埃米尔费萨尔访问大马士革时执行的，据称这使埃米尔确信有必要发动阿拉伯起义，必须让大马士革人从土耳其暴政的枷锁中脱离出来。

正如乔治·安东尼厄斯所描述的，在处决之后，

> 举国震惊。没有人料到会有如此严厉的判决，即使那些知道贾迈勒天性中隐藏着野蛮因子的人也是如此。更骇人听闻的是，这些判决同时针对有罪者和无罪者，因为其中许多受害者是众所周知对叛国行为避而远之的人。给广大群众的直接影响是一种恐惧。为数不多的未被发现的领导人被吓坏了：在他们对最可怕的情况的想象中，也不会失去如此多的同盟者；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怀着沉重的心情转而思考自己被扼杀的自由和获取自由的任务，这些不再是唯一的目的，也是复仇的手段。费萨尔深受影响……他心中那些对与土耳其人决裂是否明智的顾虑现在都被一种强烈的厌恶所驱散，他听到处决消息时的哭声变成了阿拉伯起义的战吼。[86]

然而，在这个和其他类似的叙事中没有提及的事实是，即使在处决发生之后，贾迈勒帕夏也经常受到大马士革人的赞扬和庆贺，其中的许多人在后来的民族主义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1918年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化身哈伊尔丁·兹利可里也为奥斯曼帝国总督写了一首赞歌，其中包括这样的诗句：

> 低下你的头并偏转你的目光，
> 这是一幅让人欣慰的肖像。[87]

最初试图从贾迈勒帕夏处决令中创造意义的是那些与阿拉伯政府合作参与阿拉伯起义的人及其支持者。在英国/谢里夫军进入大马士革的一周内，贝鲁特的阿拉伯军队代表举行了庆祝两个地区统一的活动。庆祝活动的

中心剧目是在城市上空升起阿拉伯旗帜，升旗的是被贾迈勒帕夏处以绞刑的两名“烈士”穆罕默德（Muhammad）和马哈茂德·马赫马萨尼（Mahmud al-Mahmasani）的姐妹。[88] 费萨尔政府在大马士革组织的第一次公共活动是1918年10月19日举行的纪念烈士的追悼会，距离埃米尔费萨尔率领阿拉伯军队进入大马士革仅三周之久。同时，法塔特派大马士革的代表前往贝鲁特来督管类似的仪式。[89] 烈士的家属获得了政府的补贴，他们的子女就读于阿拉伯政府管理的特别学校，在国家悼念活动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90]

或许最为奢侈的“致力于颂扬烈士神圣记忆”的悼念活动是1920年5月6日举行的那场。悼念活动在大马士革和其他城市的“烈士广场”举行，阿拉伯政府下令在这些地方竖起用花环装饰并刻有烈士名字的柱子。活动策划者下令在柱子旁边放置平台，贵宾可以站在这些平台上发表悼词。根据《首都报》提供的详细说明，仪式由以下步骤组成：

> 纪念活动以唱烈士之歌开始，随后是对民族烈士的悼念。在此之后，所有人将前往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墓地，在那里向烈士的墓前献上花圈；一个代表团将去看望他们的家人。大马士革以外的委员会也会向他们发去吊唁电报。
>
> 晚上，阿拉伯俱乐部组织了纪念集会。在第二天（周五），他们高贵灵魂出生的故事将被宣读，我们的基督徒兄弟将供奉被处决兄弟的灵魂。此时，悼念委员会将作为悼念者们的代表发表一份忠诚的宣言，支持国民对统一和独立的要求，国家儿女们正是为这些要求牺牲的。[91]

费萨尔国王和埃米尔扎伊德出席了在大马士革举行的各种悼念

活动。[92]

作为纪念和活动的回报，阿拉伯政府及其支持者从国家支持的圣人崇拜中获得了互惠利益。根据阿拉伯政府的宣传，土耳其之所以处决这些烈士，是因为他们的民族主义活动。因此，这些烈士与那些参加过阿拉伯起义的人一样，是同一场斗争的组成部分，而针对他们的悼念活动是对将汉志人、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断头台和战壕中的烈士”——的庆祝，“在受人爱戴的殿下（埃米尔费萨尔）庇护下”“为了共同的目标”。[93] 对于法塔特而言，对烈士的纪念让这个日益官僚化的组织得以保留其革命的外衣：烈士的象征符号使组织中的特权阶层合法化，其存在的理由已经变为分配庇护。此外，由于烈士既来自基督徒社区，也来自穆斯林社区，他们被安置在民族主义的万神殿中有助于颂扬社区间合作的美德（正如口号“宗教属于个人，国家属于全体”的口号），并向协约国证明阿拉伯人已经摆脱了宗教狂热，因此做好了独立的准备。[94]

虽然阿拉伯政府的动员和宣传活动使烈士这一象征符号被广泛接受，就像他们为阿拉伯起义所做的那样，但是在与人民委员会有联系的话语共同体中，这一象征符号却有着一套不同的含义。其结果是，即使是那些在民族主义场域中强烈反对阿拉伯政府的人——他们谴责非叙利亚人（特别是法国人和汉志人）干涉叙利亚事务，反对穆塔纳维尔（文化人）在叙利亚复制欧洲民族国家的渴望，批评阿拉伯政府对协约国的绥靖和安抚策略——都援引“烈士的精神”来为自己的民族主义品牌争取支持。

例如，在上文中提到的独立日讲话中，阿卜杜勒·拉赫曼·卡亚里呼吁他的听众们“记住你们的昨天！”

> （记住）曾在这里居住的人，他们被判绞刑、监禁和无限期流放不是根据法律，而仅仅是因为国籍。不要忘记那些被压迫者和婴儿与

被掠夺者的哭声，这些声音仍然在耳畔回响……那些死于饥饿、疾病、战争、绞刑和流放的人的灵魂仍然在你们的眼前，必须做些什么来净化这片土地和安抚这些灵魂。

同一天发言的其他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如果西方人幻想叙利亚人在牺牲了便宜的和昂贵的、新获得的和继承的一切之后，在流出了同胞的鲜血和牺牲了自己的儿女之后，对屈辱和屈从于帝国主义保持沉默，那么这种幻想对于他们将是灾难性的。当叙利亚人以平静的、有判断力的、深思熟虑的态度听到和会的决定时，他们无法不宣布用孩子的鲜血换来的独立。[95]

在这两个演讲中，烈士都起到了转喻的作用，象征着整个叙利亚民族在战争中的牺牲。

还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些主张武装抵抗协约国计划的人民委员会和游击队，烈士给他们的启示不是因为他们的牺牲叙利亚就应该获得独立，而是应该哀悼牺牲者，烈士是革命斗争的榜样。1920 年 5 月，在阿拉伯政府指定的悼念烈士的日子，经常代表人民委员会发声的《基纳纳报》刊登了以下呼吁：

阿拉伯祖国的呐喊（The Cray of the Arab Fatherland）

叙利亚人民！请记住，这一天，你们失去了最高贵的自由之子，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让你们与伟大和自由的国家站在一起。他们为这一崇高的目标献身，他们号召你们记住他们，谨记他们的原则……

> 叙利亚民族！如果你们为对高贵的孩子的记忆所感动，并且为他们流下了宝贵的眼泪，你们要知道，除非你们跟随他们的脚步并按照他们的模子塑造自己，否则就无法支付他们所应得的回报。急于殖民你们、篡夺你们财富、扼杀你们孩子灵魂的（法国）政府不想授予你们明确的权利。他们渴望奴役民族的孩子。他们渴望使巴勒斯坦变成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他们已经将一根致命的刺植入我们民族的身体，破坏了我们的团结，破坏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繁荣和我们的灵魂。他们希望让外国人控制我们，以便在我们之间播撒下不和的种子，我们的种族和语言受到损害，未来还会从我们身边带走士兵为外国人而战。
>
> 高贵的先祖号召你们保卫他们的遗产，为他们的荣誉而战。那些只爱惜自己生命的人，必将受到羞辱。[96]

这篇文章是在卡亚里演讲发表近三个月后刊印的。此时，协约国签订了将叙利亚划为独立托管领土的《圣雷莫协议》，这表明期待这些大国会因叙利亚人在战争中的牺牲或展示出的叙利亚文明已经达到协约国“完全独立”的标准被打动为时已晚。此外，此时英国政府已经减少对阿拉伯政府的补贴，削弱了后者压制其竞争对手和散播持续性宣传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政府之前赋予烈士象征符号的意义不可避免地在许多叙利亚人眼中失去了可信度。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费萨尔政府解体后，烈士的象征符号仍然保留着它的情感力量（而且对于后来的政府保留了其用处）。在法国入侵叙利亚内陆后，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将费萨尔被逐出大马士革的故事和在外来人（土耳其人、西方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牺牲的阿拉伯军队烈士混为一谈。其影响之一是，烈士的受难和死亡在教科书和通俗史学中被详细叙述，

在仪式中被纪念，仍然是被广泛颂扬的当代阿拉伯民族神话中的关键举证部分。[97]

“宗教属于真主，国家属于全体”

在1919年2月下旬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举行的致敬子爵埃德蒙·艾伦比将军的一场会议上，东叙利亚礼教会（the Eastern Syrian rite）的大主教谈到了阿拉伯主义的含义。他宣布：“我宣扬一种新的高于其他一切的宗教。”“它是阿拉伯团结的宗教，将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团结在一起，不论他们的信仰如何。”[98] 虽然这可能来自一个宗教人士不同寻常的情绪，但在费萨尔时期，叙利亚东部地区这样的言论并不少见。例如，1919年11月，另一位演说家对同一群听众宣称：“信仰不同宗教和来自不同故乡的我们都信奉爱国主义宗教，我们公开宣称自己都是阿拉伯人，语言和爱国主义的共同性使我们团结在一起。”[99]《首都报》的头版社论《让我们回归宗教》（Let Us Return to Religion）宣称，三大一神论宗教都在为相同的目标而奋斗——“改造人类，并用美德照亮他们的内心”。社论继续讨论道，三大宗教在几大原则上达成了一致：对真主的信仰，对审判日、道德、美德以及“一国孩子之间民族纽带（和）共同的爱国热情”的信念。[100] 巴希尔·亚姆特（Bashir Yamut）发表在《首都报》的题为《爱国兄弟情》（*The Patriotic Brotherhood*）的诗中也包含着同样的情感：

宗教属于真主。真主下令说，

所有的宗教都来自一个源头……
在真主看来，耶稣和穆罕默德是一体的，
为什么你认为我能区分他们？
他们不带仇恨和恶意，
不要以他们的名义制造仇恨，
他们（例如外部观察者）指责我们没有因为对祖国的热爱而团结起来。
所以，作为对这些的指控的回答，
我们除了兄弟情义，不接受任何避难所。[101]

尽管两个民族主义话语共同体都支持共同体之间的和谐进程，并带着或多或少的热情传播“宗教属于真主，国家属于全体”的口号，但是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所属的话语共同体却带着一种特殊的信仰和热情在做这件事。[102] 阿拉伯政府和阿拉伯俱乐部分发了一个以村庄和街区内所有宗派（tawā'if）、教派（madhāhib）和宗教（adyān）群体的名义签署的请愿书；批准了由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社区精神领袖领导的游行和计划的示威，在游行中，《旧约》《新约》与《古兰经》被摆放在一起；社论家在阿拉伯政府资助或代表其立场的报纸上对三大一神教的共同根源和美德进行颂扬。

叙利亚拥有大量非穆斯林和非逊尼派穆斯林，这一事实自然鼓励了人们努力建设一个对宗教归属不感兴趣的政治共同体。但是，促进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在国内外产生了政府计划之外的效果。在国内，阿拉伯政府渴望平息宗教少数群体的恐惧，宗教少数群体质疑汉志人对世俗主义的承诺，并猜疑谢里夫想成为哈里发的野心。埃米尔费萨尔本人担心宗教少数群体对加入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担忧可能会导致他们请求法国提供保护，这一行为当然会对叙利亚的统一产生破坏性后果。[103] 在国际上，

确保对少数群体的保护及其充分的政治参与是服务于那些希望通过向协约国展示叙利亚是“一个值得生活和独立的国家”来赢得独立的人的战术目的。[104] 因此，正如《首都报》在致“我们最崇高的穆斯林兄弟”的公告中说的，“我们希望欧洲和全世界都知道，古老的宗教间斗争已经死去和终结，我们现在是同一个民族和同一个祖国的孩子”[105]。在对叙利亚人民的讲话中，费萨尔始终把叙利亚的宗教宽容与和会上的有利决定联系在一起。他对阿勒颇的一位听众说：“如果我们分裂成政党和教派，（文明世界）会鄙视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不对人进行区别。”[106]

然而，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并不只是出于功利的考虑而支持少数民族的权利，对 1919 年 2 月在阿勒颇发生的屠杀亚美尼亚人这样的事件所表现出的明显厌恶，也不只是为外国消费者设计的玩世不恭的阴谋。[107] 相反，因为他们偏爱实证主义思想和现代主义护教学，那些支持阿拉伯政府并阐述了政府纲领所依据的理念的穆塔纳维尔认为，现代社会强加的自由和限制已经使“宗教信仰在建立社会和政治国家方面的影响力逐渐减弱”[108]。《首都报》上发表的一则公告说：“我们现在是 20 世纪，真正的爱国主义高于一切，不管愿不愿意，穆斯林都是基督徒的兄弟。”[109] 穆塔纳维尔认为，随着叙利亚社会的现代化和与当前时代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身份认同（较为原始时代的残余）将自然消失。[110]

穆塔纳维尔在促进这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不仅是通过建立相应的制度，而且是引导叙利亚人接受其现代民族国家的愿景。因此，“宗教属于真主，国家属于全体”这一口号的传播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进程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进程，穆塔纳维尔试图向人民灌输一种“公民”国家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公民身份的纽带、共同的法律实践和政治理念将取代种族和宗教的纽带。[111] 有这样一种观念：国家脱胎于历史性事件和紧急外交状况中。自觉的政治精英将这种观念强加于人民，用埃米尔费萨尔的话说，这些人

民“就像儿童一样……不理解民族主义、自由或独立的含义”。[112]

正如各种非官方文本所表明的那样，从涂鸦到传单再到未经授权的示威游行中高呼的口号，穆塔纳维尔倡导的公民民族主义计划以及加入“文明国家”行列的目标对许多叙利亚人都缺乏内在吸引力。文本证实，阿拉伯政府及其支持者在与叙利亚民众沟通时使用的大部分话语（以“宗教属于真主，国家属于全体”为代表的话语）是米哈伊尔·巴赫金（M.M. Bakhtin）所说的“专制的”（authoritative）话语。与“有内在说服力的话语”（internally persuasive discourse）相比，专制的话语不能通过顺从（concurrence）或逐渐同化来整合先前为人们所持有的信念。[113] 相反，因为专制的话语与宣扬这一话语的当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话语获得支持仅仅是因为它和当局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基于其内在优势），因此这一话语能否为民众所接受，取决于其观点说服力之外的情境或与先前持有观念的关联性。相对来说，这种由国家支持的话语不受期待中的顺从和逐渐同化的影响：正如爱弥尔·涂尔干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Professional Ethnic and Civic Morals*）中的观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得国家发布的最为模糊或最为老套的陈词滥调才能在异质性的人群中赢得广泛的认可。[114] 因此，随着通过证明叙利亚是一个“值得生活的独立”的文明国家来实现独立的策略的明显失败，人民委员会作为权威的可信要求者出现，内部情况开始分化，阿拉伯政府及其穆塔纳维尔盟友垮台，诸如“宗教属于真主，国家属于全体”这样的残留口号，只是出现在政治演说（通常是官方的）中，在街头是缺失的。[115]

与穆塔纳维尔试图通过口号来灌输非传统的现代主义价值观的努力相比，人民委员会及其支持者不断重申大多数叙利亚人熟悉的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可以调动一些已经存在的集体归属的情感”。[116] 同时，通过将这些象征符号置于民族主义话语场域中，赋予它们新的含义。值得注

意的是，与穆塔纳维尔话语中出现的过多的欧洲原产的象征符号一样，人民委员会及其支持者所使用的象征符号是没有经过选择的，但仍是自觉的。讽刺的是，在《首都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卡迈勒·哈提卜批评穆塔纳维尔不仅没有使用能够引起民众共鸣的象征符号和口号，而且还使用了实际上与他们目标背道而驰的象征符号。他写道，公共舆论源于历史传统和暂时的事件的整合，“人们被迫与他们的传统相兼容”。

> 叙利亚的公共舆论结合了永恒与新鲜的东西，因为它借鉴了过去的传统并忠诚于永恒的目标。它根据时代的需要，把新鲜的与传统的联系起来，试图以此来平衡新的迫切需要和古老的传统；只要新的不与旧的相矛盾，它就会令人满意，如果两者之间是矛盾的，它将被抵制至死。这就是叙利亚人对新事物乐观的秘密，这一乐观态度从早期一直持续至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对希望维护的一切持悲观态度的原因。[117]

在金—克莱恩观察团离开后，劝说共同体之间和谐相处的内容在大马士革街头传单上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圣战和伊斯兰团结、向穆斯林或“捍卫伊斯兰者”致敬的号召，以及《古兰经》中的引文和“真主与我们同在”的口号。[118] 1919 年秋天在大马士革散发的如下传单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 致宗教捍卫者
>
> 请记住真主的话：斗争并发动圣战。这场圣战在哪里？请听从真主的指令：准备好所有能够用来反抗他们的力量。你用来捍卫宗教和国家的力量在哪里？受够了他们的谎言和欺骗。受够了你们的容忍和不作为。他们对你们说谎，欺骗了你们，背叛了你们。即使在他们向

你们做出承诺后，他们也想要瓜分你们的国家。他们宣誓忠诚之后，却会吞噬你们。不要相信那些自称相信你们的宗教的人。拔出你们的剑，打磨它们。准备好你的枪和弹药。我向真主发誓，敌人将无法与你们抗衡，因为真主与我们同在，真主是信徒的支柱。[119]

到了1920年春天，甚至埃米尔费萨尔也默认了在阿拉伯政府颁布的文本中使用伊斯兰象征符号。例如，1920年4月，埃米尔主持了一场为阿拉伯军队中第一个步兵旅授予军旗的仪式。旗帜的一面写着：

以至仁至善的真主之名
在真主的道路上奋斗
真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胜利将会显现

旗帜的另一面写着：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第一步兵旅
年份：1338年

费萨尔在军队举旗穿过大马士革街头后发表了讲话，宣称："此时，被授予这面旗帜的部队有责任证明他们是值得拥有这份礼物的，他们知道如何通过奉献自己的鲜血捍卫军队的荣誉并保卫祖国，使它变得神圣。"[120]

欧美观察家将政治话语的伊斯兰化归因于叙利亚民众中返祖（atavistic）特征的重新抬头，以及受呼吁伊斯兰世界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

基督教敌人的凯末尔主义宣传的影响。虽然有证据表明土耳其起义者确实向人民委员会和隶属人民委员会的游击队提供了财力和宣传方面的支持，[121]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符号的使用并不是返祖的。伊斯兰符号并没有将民族主义符号从大众文本中剔除；相反，在大多数文本中，两种符号是充分结合的。因此，在法国入侵叙利亚内陆的前夕，《基纳纳报》发表了一篇完整的呼吁叙利亚人“进入军营”的公告，公告中同时使用了两种符号。

> 你们的荣誉、独立、神圣的宗教仪式和自由都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如果不站起来捍卫它们，它们将受到压迫，将消失，将被敌人的部队——真主和祖国的敌人——所践踏。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呼吁你们奉献出你们的精神和金钱来拯救祖国。记住真主和他的先知的诫命，并以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id Ibn Walid）、奥卡巴·伊本·纳菲（‘Uqba Ibn Nafi）、阿姆鲁·本·阿斯（Amr Ibn al-‘As）、欧麦尔·本·赫塔卜（‘Umar Ibn al-Khatāb）……为榜样，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进入军营入伍，信靠真主——因为他是最好的帮助者。如果你们支持真主，真主是不会抛弃一个信仰他的民族的。[122]

当伊斯兰符号置身在流行的民族主义话语中，这些符号就从它们之前的语境中解脱出来了，它们成了使叙利亚人之间团结在一起的“民族”纽带，并且使他们与“真主和祖国”的帝国主义敌人相区分。因此，叙利亚人的认同并没有从民族认同“倒退”（retreat）到宗教认同；相反，在“后圣雷莫叙利亚”（post-San Remo Syria）的疯狂氛围中，[123] 随着参与政治的叙利亚人的数量急剧增加，伊斯兰纽带开始成为民族纽带的例证，而不是对它的否定和取代。对捍卫伊斯兰的呼吁意味着对民族和共同体纯洁性

的捍卫[124]：

> 如果我们叙利亚勇敢的儿子不敢为了祖国面对死亡
> 我们的女儿该如何保护她们的荣誉？
> 我们的人民该如何保护他们的灵魂？
> 民族怎样才能从敌人的污秽中得到解放呢？[125]

因此，正如导言中所描述的那样，直到1920年春天，那些自愿在梅萨伦参展的“勇敢的叙利亚的儿子”奔赴前线，宣称保卫他们的国家是“al-jihād Al-watanī”（爱国圣战），是受宗教和民族主义责任所驱使。

民主与进步

1920年春，就在重新召开的叙利亚国民大会就独立和立宪问题进行讨论时，国民大会的代表们分成了三个集团。尽管当代观察家和历史学家对于每个集团的确切成员人数存在争议，但多数观点认为，多数成员属于自称为进步党（hizb al-taqaddum）的联盟，其余成员要么加入了民主党（al-hizb al-dimuqrātī），要么加入了第三个不太一致的群体（被认为是温和［hizb al-hurr al-mu ‘tadil］或“独立者”［istiqlāliyyūn］，因为他们不属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126]进步党的成员一般是法塔特的坚定拥护者，支持阿拉伯政府的政策。民主党的成员要么是高级人民委员会的成员，要么是人民委员会目标的支持者。独立者在投票倾向上与进步党接近。

由于阿拉伯政府和人民委员会提供了两个主要的民族主义话语共同体的制度框架，它们的竞争自然地延续到叙利亚国民大会中。但是关于大会内部竞争最有趣的一点是两个集团所选择的名字。代表们绝对不是出于偶然分别决定将自己的党团会议称为“进步”和“民主”。存在竞争的集团之所以选择这些名称，是因为每一个名称都在其共同体内作为关键符号发挥着作用，概括并代表着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参与该共同体民族运动成员的基本目标。

在导言中，我回溯了“进步”这一概念在中东地区引起的共鸣，主要是对新生阶级以及既有阶级的重组的回应，他们是在19世纪市场关系和国家能力扩张的背景下建构（或重建）世界观的。在奥斯曼帝国后期，来自这种背景的个人制造了符号和话语场域，并塑造了战争刚结束后两个主要的主导民族主义政治的话语共同体中一个的制度环境。对于这个共同体内的人来说，普世性的进步唤起的共鸣不仅与在欧洲类似人群中唤起的共鸣相同，而且与世界其他地区具有相同背景的民族主义者一样，这一概念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主要的合理性：在穆塔纳维尔及其政治干事的领导下，民族运动将为叙利亚人民带来与文明相关的物质利益，并且通过提供相应的文化支持，叙利亚将会与“文明的”（civilized）民族和现代性的普世项目联系在一起。

穆塔纳维尔的写作和演讲中贯穿着令人熟悉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进步和人类进步关联的主题。例如，阿拉伯政府于1919年4月在大马士革各地的清真寺进行布道，用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惯用语向周五礼拜者展现了进步和文明的案例：

> 独立包括训练思想来解释真理。这是所有人为所有人的利益所做的努力，是对真正有用的科学的诉求，以便思想得到扩张并抛开无知

的面纱，以便人们可以完全谦卑和顺从地敬拜真主，并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体现进步和文明的理念。正是通过独立，人们才能为追求他们的利益而努力，这也是他们国家的利益。其中包括改善通信、建设铁路以及促进商业、农业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这是先知所认可的独立，是伊斯兰教所提倡的独立。[127]

其他文本包含通过投资或应用工业和农业技术来保障叙利亚光辉未来的愿景，[128]赞扬阿拉伯政府和谢里夫家族（“今天的王子们，就像昨天的王子们一样，崇尚知识并努力扩张它”[129]），以表彰他们致力于科学和知识的进步，宣布成立科学和文学社团，创设系列讲座，建立学校，创立诸如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博物馆等公民机构。所有这些同时作为叙利亚文明进步的典范和证据（为回应协约国和国内怀疑论者）。

对于穆塔纳维尔而言，为使国家与实现普世进步的迫切需求相协调，就需要从根本上对社会生活进行重组，包括调整妇女在叙利亚社会中的角色。《首都报》《地球报》等报不断刊文，讨论妇女在建设新叙利亚中的重要性，敦促她们通过学习和效仿西方更为自由的女性来为独立做好准备。在这些文章中，穆塔纳维尔号召妇女投身文化艺术，从事慈善事业，摒弃浮华，为国家献身：“大马士革妇女拥有价值超过一百万里拉的财富……如果所有这些钱都被聚集起来存入储蓄账户，它就可以被用来建立一所学院。”[130]但在这些呼吁的背后，是对定义了19世纪欧洲（非女性主义者）资产阶级理想性别角色的两个领域的复制，即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及对其进行支持和培养的家庭女性的领域（sphere of domestic femininity）：

如果女性不选择退缩，她将成为知识和人文艺术宝库。然而，她

> 不希望利用神圣的资质成为一名工程师、律师、海推布或记者，她希望成为母亲，成为家庭的女主人，照顾婴儿和孩子。相反，那些试图用各种科学和艺术填充她头脑的人，却使她们与为她们所创造的事务相分离，并让她们不再执行自己的天生的功能。[131]

由于叙利亚民族主义者面临着与欧洲不同的情况，穆塔纳维尔指派给妇女的活动既包括允许欧洲妇女所从事的活动，也包括禁止她们所从事的活动。例如，一些穆塔纳维尔（其中最著名、最令保守派苦恼的是教育部部长萨推尔·胡苏里［Sati' al-Husri］）认为叙利亚的女孩应该像欧洲女孩一样接受教育，毕竟如果妇女被期待能够养育有能力建设未来叙利亚的孩子，她们就需要接受科学和民族文化方面的培训，这样她们才能辅导自己的后代。《首都报》的一位编辑写道："阿拉伯女性需要意识到，东方的觉醒需要资本，即知识。"

> 正如伊玛目安萨里（Imam Ghazali）所说：从影响你们（母亲们）的思想看，你们的孩子在出生前就已经成长了50年。因此，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妇女就必须用知识和美德的奶水喂养，这样才能培养她们孩子的美德。[132]

但进步党成员用同样的理由主张叙利亚妇女也应该接触政治。因此，该党在叙利亚国民大会内支持妇女获得选举权。根据一些说法，将选举权扩大到女性的提议加速了对立集团之间的进一步分裂：民主党和他们在国民大会外的盟友不仅反对妇女获得选举权，而且反对胡苏里扩大女性教育的努力。此外，在法国入侵叙利亚内陆的前一周，国民大会因出席者之间的争论而瘫痪。[133]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人在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

也没有赋予妇女选举权。

对于民主党及其在叙利亚国民大会外的盟友而言，“进步”并不像对他们的竞争对手那样具有吸引力，他们也不认为对这一原则的坚持是衡量合法性的一个标准。有时，民主党及其盟友甚至会嘲笑进步的理念及这一理念的支持者。一位作家曾在《基纳纳报》中宣称：“在叙利亚的法国人不在乎叙利亚的领土是否被摧毁，经济生活是否陷入停滞，民众是活是死，以及村庄和人口是否被消灭”，“他们只关心那里的当局应该占有财富的来源，并以进步的名义将自由人口变成奴隶，而只有叙利亚人才能感受到这一切对他们的影响。”[134] 作为对不确定进步的祝福的替代，民主党及其所属的人民委员会将他们的合法性建立在主张代表“民族意愿”之上。

这一主张构成了人民委员会散播的文案中的中心主题。例如，1920 年 3 月初，在叙利亚国民大会重新召开的前夕，高级人民委员会在大马士革全境张贴大报，题为《民族向叙利亚国民大会表达其愿望》(The Nation Dictates Its Wishes to the Syrian Congress)。宣言首先以问候为开场白，来提醒代表认识到他们的使命，“崇高的叙利亚国民大会在政治风暴中召开，以响应民族意愿”。在简短的介绍之后，宣言罗列了民族的要求，大会必须通过满足这些要求来“获得民族的信任并成为其真正的代表”。用重复的“民族想要”的强硬陈词作为句子开头，宣言强调管理独立的叙利亚的民主原则：

> 民族想要（大会）建立一个文官制的、民主的、代议制的政府。
>
> 民族想要当（大会）宣布威严的埃米尔为国家的国王时，宣布他是一个公正的、符合宪法和民主的国王。
>
> 民族想要（大会）将基本法建立在代议、民主、分权君主制……的原则上。

这一通告由卡米勒·卡萨布“以叙利亚民族的名义”签署。[135]

为了强化他们代表“民族意愿”的主张，人民委员会开始传播自己理想化的建国神话，就像阿拉伯政府在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这个神话将人民委员会描述成为“撤离危机”激起的大众热情的必然产物。根据高级人民委员会章程的序言：

> 如果民族中的个人没有准备好，为民族采取的公共行动就不可能成功。（公共行动）要求相互协助，这是促进它所必需的。爱国组织在叙利亚首都出现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个社区的家庭和每个人的心中都感受到对它们的需要。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实现这一行动，每一条战线和（每一）街区的民众都在爱国责任感的驱使下毫无共谋地各司其职。这一光荣的创造，被命名为“高级人民委员会”，和分支委员会一样，是所有成员努力的成果。[136]

由此产生的人民委员会承担了巩固和渲染叙利亚人未成熟志向的责任，将“整个民族转变为一个感同所感并为同一强大利益而努力的单一强大集团”。[137]

因此，对于那些与人民委员会有联系的人或其同情者而言，民主的象征与叙利亚作为一个有机社会的总体代表相一致，这个有机社会拥有源于共同历史和认同的共同意愿。尽管穆塔纳维尔也关注民主，但是他们将民主置于一个非常不同的话语场域——一个将“进步”置于首位的场域。因此，虽然他们同意民主在理论上符合“时代精神”，但他们认为国家尚未为民主做好充分准备，因此必须在民主原则适用于叙利亚前（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大量的准备：

民主在其他国家造成的所有痛苦都因为没有为它的建立做好准备；我们对未通过第一阶段就到达第二阶段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因此，我对穆塔纳维尔中的每个兄弟说：如果我们为民族服务的主张是值得信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好准备，改革教育，唤醒今天孩子们的精神，以便他们明天成人。[138]

穆塔纳维尔所倡导的民主训练，甚至他们对未来民主社会的形态的见解，[139] 使他们能够保持在看待叙利亚社会时极为不同的观点，并完善了他们对专家和技术官僚治国的主张。正如在下一章将看到的，这种观点渗透到穆塔纳维尔的话语之中，其吸引力受到限制，而在群众政治的参与扩大时，则需要能够被更广泛听众接受的话语。

注释

［1］ *al-Kawkab*, 27 January 1920, 5.

［2］ DU, Wintage Files 143/2/167（AB202）, Arbur（Cairo）to Sirdar（Khartoum）, 13 November 1916.

［3］ Muhammad Muslih, "Rise of Local Nationalism," 167.

［4］ 关于类似"政治场域"概念的定义，参见 Victor Turner, "Hidalgo History as Social Drama," 127。

［5］ Robert Wuthnow,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Ide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Reformation, the Enlightment, and European Socialism*, 13—15, 553, 555; François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37—38, 52, 130, 173—176; Coenelius Castoriadis,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124; Clifford Geertz,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Fate of Nationalism in New States," 249—254;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ites of Violence: Religious Rio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E.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 64—69. 尽管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我对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的《话语共同体》（*Communities of Discourse*）的借鉴越来越明显，但是我已经冒昧地修改了伍斯诺的分析框架。

［6］ 和后奥斯曼时代的其他所有社会一样，叙利亚社会中从事特殊活动并为"重点担忧"感到焦急的往往是规模较小且相互重叠的群体。参见 John Clark et al., "Sub Cultures, Cultures, Class," 56。尽管对市场关系和现代国家制度扩张的不同反应是划分叙利亚社会的主要因素，但是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不能被小觑，这些因素包括地域、代际、经历、宗教、"阶层"和职业。例如，由人民委员会维持的话语共同体包含若干亚共同体和地方变体。其中可能包括一个巴勒斯坦变体，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发挥了轴心作用，以及一个阿勒颇变体，其对土耳其/阿拉伯民族和语言差异的态度相对

冷漠。

［7］ Nels Johnson, *Islam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in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66.

［8］ Sherry B. Ortner, "On Key Symbols."

［9］ IO L/PS/11/140 P497/1918（P1171）, Sir Marks Sykes, "Appreci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Syria, Palestine, and Lesser Armenia," 15 November 1918; FO 371/4178/7094, Hogarth to CPO, EEF, 18 December 1918; AD 2358/dossier: emir Fayçal, "Mystification chérifienne," 13 September 1919; MD 1H112/1, "Compte rendu du capitaine Gautherot sur la situation politique à Alep," 6 May 1920.

［10］ Ridā Sāfī, *'Alā janāh al-dhikrā*, 1: 234.

［11］ IO L/PS/11/140 P497/1918（P1171）, Sir Marks Sykes, "Appreci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Syria, Palestine, and Lesser Armenia," 15 November 1918.

［12］ FO 371/4149/114964, Civil Commission Baghdad, "Confidential Report for Week Ending 31/5/19."

［13］ *al-'Āsima*, 29 April 1920, 4.

［14］ Ortner, "On Key Symbols," 1339.

［15］ 关于口号在后者中发挥的作用，参见 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History: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1730—1848, 245。根据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的观点，口号可以为"向公众提供概要性陈述以供指导""在单个词与法律或哲学的完整命题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通过重复和上下文获得意义"。"The Language of Power," 17.

［16］ 关于阿拉伯政府对反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态度，参见 MAE L: SL/vol.12/32—38, Cousse to HC, 6 April 1919。

［17］ 关于谣言的"自然选择"的类似分析，参见 Tamotsu Shibutani, *Improvised New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 176—182。

［18］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援引均来自原阿拉伯语文献。在援引中我尽可能用了贴近原文的语言。

［19］ 关于对安东尼厄斯的《阿拉伯的觉醒》中《大马士革议定书》的评判性评价，参见 Liora Lukitz, "The Antonius Papers and the Arab Awakening, Over Fifty Years On"。

［20］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 47—48;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157;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175.

［21］ 大部分这些传单的选集参见 MAE L: SL/vol.15/340/92—95, Picot to Pichon, 21 July, 1919; MD 7N4182/4/340, Picot to MAE, 21 July, 1919。

［22］ 23% 的传单是写给公民、同胞等的，剩下的则没有包含称谓。

［23］ MAE L: SL/vol.15/340/92—95, Picot to Pichon, 21 July, 1919.

［24］ FO 371/3054/227658, Clayton to Sykes, 28 November 1917.

［25］ 参见 Thomas Philipp, *The Syrians in Egypt, 1725—1975*, 114。

［26］ 参见 Rashīd Ridā, *Mukhtārāt siyāsiyya min majallat "al-Manār,"* 241;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 102, 110;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297—299。

［27］ 创始成员包括拉菲克·阿兹姆、哈立德·哈基姆、瓦赫巴·以萨、米歇尔·鲁特法拉赫、卡米勒·卡萨布、拉希德·里达、萨利姆·萨尔基斯、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伊斯坎达尔·阿姆、哈基·阿兹姆和姆西布丁·哈提卜。Darwaza, *Mudhakkarāt*, 130—131; Zeine, *Struggle for Arab Independence*, 22; FO 371/4178/16051, 10 January 1919.

［28］ 参见 Ridā, *Mukhtārāt siyāsiyya*, 245—247。

［29］ 宣言承诺，未来在战争期间被协约国军队占领的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政府应该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上"；在那些"仍然在土耳其控制下的区域……国王陛下的政府希望这些地区的

被压迫人民获得自由和独立”。参见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 111—112。

[30] Ridā, *Mukhtārāt siyāsiyya*, 247.

[31] 剩下的多数文章是围绕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少数群体权利等问题的。FO 371/4178/160/16051, “Program of the Syrian Union” (in Arabic and French), 10 January 1919.

[32] Ridā, *Mukhtārāt siyāsiyya*, 247.

[33] AD 2326/dossier du Hedjaz, “Extraits de la letter 94M de M. Bensaci, envoyé du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nlique à la Mecque,” 16 May 1919.

[34] 尤其参见 Hassan al-Hakīm, *al-Wathā'iq al-tārīkhiyya al-muta'alliqa bil-qadiyya al-sūriyya fī al-'ahdayn al-'arabī al-faysalī wal-intidābī al-faransī, 1915—1946*, 43—44;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286—287。

[35] FO 882/24/85—90, Walrond to Cornwallis, 13 January 1919.

[36] Ridā, *Mukhtārāt siyāsiyya*, 245.

[37] Ibid., 249; FO 882/24/85—90, Walrond to Cornwallis, 13 January 1919; MD 16N/3202/book 19/599, Feer to MAE 23 April 1919; AD 2209/145, Cousse to Picot, 28 April 1919.

[38] MAE L: SL/vol.8/230, Cousse to HC, 14 January 1919.

[39] FO 882/24/85—90, Walrond to Cornwallis, 13 January 1919.

[40] 参见 Domonique Chevallier, “Consciences syriennes et representations cartographniques à la fin du XXIXe siècle et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2。

[41] L.S. Schilcher, “The Impact of Railways on the Grain Trade of Southern Syria, 1890—1925.” 另见 Doumani, *Rediscovering Palestine*, 56, 74—76; Faruk Tabak, “Agrarian Fluctuations and Modes of Labor Control in the Western Arc of the Fertile Crescent, c.1700—1850,” 146—152; Gad G. Gilbar, “Chang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Ties: The Syrian and Iraqi Province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42] 尤其参见 Muhibb al-Dīn al-Khatīb, *al-Mu'tamar al-'arabī al-awwal*;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115; Ahmed Turabein, “'Abd al-Hamid al-Zahrawi: The Career and Thought of an Arab Nationalist,” 102; James Jankowski, “Egypt and Early Arab Nationalism, 1908—1922,” 246; Chevallier, “Consciences syriennes,” 4。

[43] 根据英国联络官基纳汉·康沃利斯（Kinahan Cornwalis）少校在金—克莱恩观察团抵达叙利亚前夕提交的报告，“费萨尔将政治活动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已经向全国各地发出指示。这些指示将由政府官员传达给民众，他们无疑将比过去更加公开地将其用于实现政治目的。叙利亚民众被告知应要求叙利亚完全独立，同时表示希望给予其他阿拉伯国家独立。通过这一妥协，费萨尔使只考虑叙利亚的追求‘叙利亚团结’的人与代表‘阿拉伯独立’追求泛阿拉伯帝国的狂热分子的和解”。FO 371/4181/89850/24, Clayton to Curzon: “Report by British Liaison Officer (Cornwallis) on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rabia,” 17 June 1919.

[44] Hasan al-Hakīm, *al-Wathā'iq al-tārīkhiyya*, 35; AD 2324/379, Cousse to HC, 16 June 1919; FO 371/4181/8950/24, Clayton to Curzon, “Report by British Liaison Officer (Cornwallis) on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rabia,” 17 June 1919. 另见 comments by Corn in Sulaymān Mūsā, *al-Murāsalāt al-tārīkhiyya*, 2: 78。

[45] MAE L: SL/vol.5/58—61, Mercier to HC, 20 November 1918.

[46] MAE L: SL/vol.12/32—38, Cousse to HC, 6 April 1919.

[47] MAE L: AH/vol.4/237—238, Picot to Picon, 25 May 1919.

[48] al-'Azm, *Mudhakkarāt Khālid al-'Azm*, 1: 244—245.

[49] Mūsā, al-Murāsalāt al-tārīkhiyya, 1: 244—245.

[50] Hasan al-Hakīm, *al-Wathā'iq al-tārīkhiyya*, 43—44.

[51] Ray Stannard Baker and William E. Dodd, eds.,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5: 180.

［52］ al-'Azm, *Mudhakkarāt*, 95;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286; Stephen Hemsley Longrigg, *Syria and Lebanon under French Mandate*, 71; Russel, *First Modern Arab State*, 36. 根据安东尼厄斯所述，费萨尔知道导致 1919 年 3 月 20 日《赛克斯—皮科协定》修订的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谈判。1919 年 4 月 28 日，就在费萨尔离开巴黎前往叙利亚后不久，协约国代表通过了国际联盟的宪章，这份宪章批准了托管体系。

［53］ Abū Khaldūn Sāti' al-Husrī, *Yawm Maysalūn*, 198.

［54］ *al-'Āsima*, 12 May 1919, 1—2. 对同一讲话的描述略有不同，具体如下 Sultān, *Tārīkh Sūriyya 1918—1920*, 431—442; AD 2343, "Annexe au journal 'Hermon' 35," 7 May 1919; FO 371/4181/8950/24, Clayton to Curzon, "Report by British Liaison Officer (Cornwallis) on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rabia," 17 May 1919。

［55］ AD 2324/379, Cousse to HC, 16 June 1919; FO 371/4181/8950/24, Clayton to Curzon, "Report by British Liaison Officer (Cornwallis) on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rabia," 17 June 1919.

［56］ 参见 al-'Azm, *Mudhakkarāt*, 96; Yūsuf al-Hakīm, *Dhikrayāt*, 3: 80; Russel, *First Modern Arab State*, 86—87。根据英国的一份报告，米歇尔·鲁特法拉赫（Michel Lutfallah）声称费萨尔不仅准备接受英国的授权，而且还准备接受"通过委任统治的方式发展成为大英帝国内部的自治领"。同一份报告还指出，鲁特法拉赫告诉一名英国代表，叙利亚联盟也愿意接受在大英帝国内部的自治，但出于战术上的原因反对强加委任统治。FO/371/4182/125032/CPO, "Report on a conversation in Cairo with Michael Bey Lotfullah on his return from Syria August 5th 1919."

［57］ Albert H. Lybyer Papers (R.S. 15/13/22),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Instructions for Commissioners from the Peace Conference," 25 March 1919. 另见 "Condensation of Instructions," 1 May 1919; "Supplementary Instructions," 1 May 1919, 在 Lybyer Papers 中也可找到。

［58］ Khayr al-Dīn al-Ziriklī, *Dīwān al-Ziriklī: al-A'māl al-shi'riyya al-kāmila*, 24—25.

［59］ al-Amīn, *Dhikrayāt*, 27. 这一口号的传播速度很快，在其推出后的三个月内出现在大约 40% 的传单样本上。

［60］ *al-'Āsima*, 24 July 1919, 5; FO 371/4182/125032/CPO, "Report on a conversation in Cairo with Michal Bey Lotfullah on his return from Syria August 5th 1919." 报告将游行活动归咎于阿拉伯独立党。

［61］ Russel, *First Modern Arab State*, 90; FO 371/4182/125032/CPO, "Report on a conversation in Cairo with Michal Bey Lotfullah on his return from Syria August 5th 1919."

［62］ al-'Azm, *Mudhakkarāt*, 95—97.

［63］ 关于《大马士革方案》的完整内容，参见 Hasan al-Hakīm, *al-Wathā'iq al-tārīkhiyya*, 85—88。

［64］ Russel, *First Modern Arab State*, 89.

［65］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83.

［66］ 关于大马士革解放争论的综述，参见 Kedourie, "The Capture of Damascus, 1 October 1918"。

［67］ Ibid., 51.

［68］ 1919 年 4 月 11 日和 18 日，阿拉伯政府提供的要求在大马士革清真寺的布道中被传达。有趣的是，布道中穿插了对叙利亚人要"捍卫你们的独立"的警告和自相矛盾的命令，即"要求并坚持你们对独立的索求"。AD 2343/286, Cousse to HC, 24 April 1919 (Arabic and French).

［69］ AD 2372/297/bureau., 13 March 1919.

［70］ MAE L: SL/vol.3/3, Durieux (Beirut), 28 October 1918.

［71］ *al-Kawkab*, 7 October 1919, 12.

［72］ *al-ʿĀsima*, 19 April 1920, 4.

［73］ MAE L: SL/vol.5/58—61, Mercier to HC, 20 November 1918.

［74］ MD 7N4182/4, M.X. de Laforcarde to Pichon, 19 August 1919; MD 4H114/2, Toulat to Gouraud, 10 April 1920; MD 4H112/2b/215.

Translation of article from al-Rāya: "Manifestation de protestation contre les actes du gouvernement du littoral," 14 April 1920. 法国最终恢复了谢赫穆罕默德·马卡维（Muhammad al-Makkawi）在马基迪亚（Majidiyya）清真寺海推布的职位。有趣的是，随后的事态发展使马卡维对埃米尔产生了厌恶。根据一份法国的报告，1920 年 7 月 22 日，在大马士革陷落前夕，马卡维的信众问他是否打算在布道前提及费萨尔的名字。他的回答包含了人民委员会在警告费萨尔愿意与协约国达成协议时流行的一句话："该死的，他出卖了我们。"第二天，法国人视察了贝鲁特的清真寺以决定布道开始时会提到的名字；马卡维本打算不提任何人的名字。MD 4H60/1, "Bulletin quotidien," 24 July 1920.

［75］ *al-ʿĀsima*, 24 (n.d.); AD 2343/ "Annexe au journal 'Hermon' 35," 7 May 1919; FO 371/4181/89850/24, Clayton Curzon, 17 June 1919.

［76］ Hasan al-Hakīm, *al-Wathā'iq al-tārīkhiyya*, 50—51.

［77］ 这些语句来自 MAE L: SL/vol.43 中一组原始传单中的一个，其表达的情绪在其他传单中有所重复。

［78］ al-Husrī, *Yawm Maysalūn*, 196; Ghazzī, *Nahr al-dhahab fī tārīkh Halab*, 656. 另见 'Ali Rida al-Rikabi 在 Mardam Bek, *Dimashq wal-Quds fī al-ʿishrīnāt*, 59 中对阿勒颇居民的告别词。

［79］ AD 2346/c1a, "Remembrance of Syrian Independence Day: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and Poems Delivered on the Occasion of Independence Day,"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Arab Club of Aleppo (in Arabic), n.d., 8—12.

［80］ 关于 inqilāb 一词的使用，参见 the speech delivered by Khalil al-Sakakini before the Arab Club of Damascus and excerpted in *al-ʿĀsima*, 22 August 1919, 4; 关于 nahda 一词的使用，参见 speech of Wadi Effendi delivered before the Literary Society of Jerusalem and excerpted in *al-Kawkab*, 27 May 1919, 9。

［81］ 例如，同一期的《国防报》包含以下内容：

第二页：在一篇名为《外国人如何描绘我们革命者的行动》的文章中，该报使用了 thuwwārinā（我们的革命者）一词。

第三页：《在亚历山大勒塔前线》这篇文章中写道："革命（thawra）的火焰似乎已经向北蔓延，现在已经席卷了西部地区的所有区域。昨天传来消息说，有一帮革命者（thā'irīn）袭击了法国车队……"

第三页：《在迈尔季欧云前线》："我们了解到，志愿者仍然从许多地区骑马或步行前来加入革命者的行列，用他们的鲜血浇灌祖国的土地。"

此外，报纸转载了原载于 1920 年 1 月 6 日发行的《地球报》上题为《新革命》(al-Thā'ir al-jadīd）的文章。*al-Difāʿ*, 13 January 1920.

［82］ *al-ʿĀsima*, 22 December 1919, 2.

［83］ AD 2344/325 (original leaflet enclosed), Cousse to Picot, 8 November 1918.

［84］ Mūsā, *al-Murāsalāt al-tārīkhiyya*, 2: 205, 224, 232, 234, 235, 236; FO 371/4185/154755, Zayd to Faysal, 17 November 1919.

［85］ *al-Kawkab*, 6 January 1920, 5.

［86］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190.

［87］ al-'Azm, *Mudhakkarāt*, 1: 69—70.

［88］ USNA 59/867.00/955, "Report of Elias Khouri, First Dragoman of Beirut Consulate," 8

September 1919; IO MSS EUR 152 (Frank Lugard Brayne Mss.) /18b, "Palestine and Syria Autumn 1918," 7 October 1918.

[89] AD 2429/9, HC Beyrouth, 21 October 1918; FO 371/3412/177154/3222, Clayton to FO, 22 October 1918.

[90] 关于国家围绕烈士象征符号"发明传统"和开展烈士家属的庆祝活动的努力，参见 FO 371/3412/177154/3222, Clayton to FO, 22 October 1918; DU SA 493/15/5, n.d.; *al-Kawkab*, 2 December 1918, 8; USNA 59/867.00/955, "Report of Elias Khouri, 1st Dragoman of Beirut Consulate," 8 September 1919; *al-'Āsima*, 4 May 1920; MD 4H112/2B, Notebook entitled "Habib Bey Estephane," n.d. (entry for 6 May 19200); USNA DC/vol.24/845, Al-Muzaffar to U.S. consul, 4 May 1920; MD 4H114/4/374, Cousse to Gouraud, 7 May 1920; *L'Asie Francaise*, 15 June 1920, 4。

[91] *al-'Āsima*, 3 May 1920, 5.

[92] *al-'Āsima*, 6 May 1920, 6.

[93] *al-'Āsima*, 29 April 1920, 4.

[94] 关于叙利亚人对宗教狂热的警告，参见 MAE L: SL/vol.6/20/20—21, Mercier to Picot, 10 December 1918; AD 2372/dossier: propaganda anti-française/219/41/Bureau b5/d, 19 December 1918。关于烈士作为穆斯林 / 基督徒合作的典范，参见 MD 4H58/1, "Rapport hebdomadaire: 27 avril au 3 mai 1920"。

[95] Speech of Tahir al-Kayyali in AD 2346/c1a, "Remembrance of Syrian Independence Day," 26. Felix Faris, another speaker, also cited the passion of the martyrs. Ibid., 12.

[96] FO 371/5188/E6132/39, "Arabic Press Extracts for Week Ending May 24 1920." For similar usage, see MD 4H112/2b, Notebook entitled "Habib Bey Estephane," n.d.; MD 4H114/4/374, Cousse to Gouraud, 7 May 1920.

[97] 这一神话在 L. Carl Brown, "Patterns Forged in Time: Middle East Mind-Sets and the Gulf War," 3—21 中有更为详尽的阐述。

[98] *al-'Āsima*, 26 February 1919, 3.

[99] *al-'Āsima*, 11 November 1919, 2.

[100] *al-'Āsima*, 20 November 1919, 1—2.

[101] *al-'Āsima*, 28 August 1919, 4.

[102] al-Husrī, *Yawm Maysalūn*, 77. 例如，在前面引用的《独立或死亡！》这份传单中，这一口号被附在后面，但是却是作为插句并放在了文末。如下文所述，人民委员会更为经常地借用伊斯兰符号，或将口号和伊斯兰符号合并在同一文本中，以此来消除少数民族的恐惧，这些少数民族为"志愿者运动"和武装（穆斯林）民兵感到担忧，以及用希腊东正教的话来说，质疑"武装那些可能会滥用他们武器的人是否明智"。参见 *al-'Āsima*, 7 November 1919, 5。

[103] Sultān, *Tārīkh Sūriyya 1918—1920*, 133—134; Mūsā, *al-Murāsalāt al-tārīkhiyya*, 1: 244—245.

[104] 在逗留阿勒颇期间，阿里·里达·里卡比曾两次使用过这一表达。参见 Mardam Bek, *Dimashq wal-Quds fī al-'ishrīnāt*, 28, 43。

[105] *al-'Āsima*, 7 November 1919, 6.

[106] *al-'Āsima*, 16 June 1919, 3.

[107] 关于这种体现，参见重刊在 *al-'Āsima*, 25 March 1919, 3 上费萨尔给扎伊德发送的电报。

[108] *al-Kawkab*, 8 October 1918, 4—5.

[109] *al-'Āsima*, 7 November 1919, 6.

［110］ 在《首都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法伊兹·胡里引用了赫伯特·斯宾塞的话，斯宾塞把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比作“被宗教所消费的人”。根据胡里的说法，两者都更多地受信仰和一厢情愿的思想束缚，而不是受到科学上可证明的法律的约束，而法律应该是社会的基础。参见 *al-ʻĀsima*，14 June 1919，1。

［111］ 参见 Smith，*National Identity*，9—11；Anthony D. Smith，“The Myth of the ‘Modern Nation’ and the Myths of Nations，” 8—12。史密斯所说的公民民族主义是指“一种政治承诺，不仅是对特定的边界，无论它们是如何产生的，还是对其他领土民族之中特定空间和社会位置的承诺。这一承诺的基础是对居住地和邻近关系重要性的信念，而不是血统和家谱”。*National Identity*，117.

［112］ 参见 statements of Amir Faysal in Aleppo，11 November 1918，transcribed in al-Husrī，*Yawm Maysalūn*，213。

［113］ M.M. Bakhtin，*The Dialogic Imagination*，342—346.

［114］ Emile Durkheim，*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63.

［115］ 在 1918 年 10 月至 1919 年 6 月期间分发的传单样本中，有 14% 出现了“宗教属于真主，国家属于全体”的口号；在金—克莱恩观察团离开大马士革之后，没有一份传单印有这一口号。在前一时期的传单中，有 32% 呼吁维护少数民族权利或所有叙利亚人不论宗教信仰一律平等；1919 年 6 月后，这一数字下降到 7%。

［116］ E.J. 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46.

［117］ *al-ʻĀsima*，23 October 1919，1—2.

［118］ 在金—克莱恩观察团离开叙利亚后分发的传单样本中，53% 的含有观察团抵达前分发的传单中从未出现的下列一种或多种符号或口号：呼吁伊斯兰团结（22%）；呼吁圣战（17%）和口号“真主与我们同在”（31%）。在同一时期，22% 的样本传单是写给穆斯林或“伊斯兰捍卫者”的；在金—克莱恩观察团访问大马士革之前和访问期间搜集的传单没有上述任何叙述。

［119］ AD 2344/643，Cousse to HC，30 October 1919（enclosures in Arabic and French）. FO 371/4186/162128/495，Dispatch from the Acting Spanish Consul in Damascus，11 December 1919.

［120］ *al-ʻĀsima*，29 April 1920；MD 4H58/1，“Rapport hebdomadaire：27 avril au 3 mai 1920.”

［121］ FO 371/4184/144109/I.4405，GHQ（Egypt）to DMI，30 October 1919；FO 371/41184/150560/I.618/S，GHQ（Egypt）to DMI，4 November 1919；FO 371/4185/158008，“Summaries of Telegrams，” 29 November 1919；FO 371/4185/158008，“Summaries of Telegrams，” 29 November 1919；MD 20N 171/2，“Rapport hebdomadaire 18—25 janvier 1920”；MD 4H58/1，“Rapport hebdomadaire：9 au 16 février 1920”；MD 4H58/1，“Rapport hebdomadaire：17 au 23 février 1920”；AD 2345/no no.，“Le cri du droit，” 5 March 1920；MD 4H114/2/146，Cousse to Gouraud，30 March 1920；AD 2358/526，Cousse to Gouraud，10 June 1920.

［122］ *al-Kināna*，15 July 1920，2.

［123］ 在给他的朋友赛义德·舒贾伊尔的一封信中，一位在阿拉伯政府外交部工作的医生写道：“个体痴呆症是我知道的最大的苦恼之一。但更糟糕的是一个民族的痴呆……我不是先知，但是如果受苦的人不能恢复理智，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最后的结果。”DU SA/493/6/51，Amin Ma'luf to Sa'id Shuqayr，1 June 1920.

［124］ 例如，以下内容来自大马士革国防委员会重新印发的题为《占领下的痛苦：1333 年主马达·阿色尼月 8 日周五一名突尼斯人在大马士革市的讲话》：“法国认为，只要信仰的光芒在伊斯兰人民心中燃烧，他们的心就不可能被动摇，因此，他们将违反宗教感情和义务作为压倒一切的原则，以便使真正的信仰在青年的心中动摇。”源自 MD 4H114/2，“Brochures anti-françaises éditées pendant la guerre et remises un moment en circulation par le comité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à Damas，” 3 February 1920。 BL AJB/ADD.MSS. /49749，21 April 1919；AD 2344/629，Cousse to HC，23 October

1919; 4H112/2b, n.d.; MD 4H112/2b, al-Rayah: "Méfaits des soldats" (in French), 18 April 1920; MD 4H114/4, *al-Difā'*, 22 June 1920.

[125] *al-'Āsima* cited this poem, by Ahmad Shakir al-Karami, as model for a "new, nationalist poetry." 13 May 1920, 2—3.

[126] 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声称，进步党最初包括 35 个成员（巴拉维估计成员为 30 人），后来扩大到 65 人，而民主党和中间派集团各有大约 20 人。除了记忆错误外，关于数字的争论可以归因于三个因素：党派忠诚的流动性、国民大会内部政治的演变性，以及大马士革以外地区的代表延迟抵达首都。参见 Darwaza, *Mudhakkarāt*, 2: 145, 188—189; Darwaza, *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 1: 115—116; Balāwī, "al-Ahzāb al-siyāsiyya fī Sūriyya," 28; Farzat, *al-Hayā al-hizbiyya fī Sūriyya*, 75。来到大马士革的代表的名单参见 Russel, *First Modern Arab State*, 236 n.6.。

[127] AD 2343/286, Cousse to HC, 24 April 1919 (Arabic text and French translation enclosed).

[128] 参见 *al-Fallāh*, May 1919, 16—18; *al-'Āsima*, 7 May 1919, 1。

[129] *al-Fallāh*, May 1919, 18.

[130] *al-'Āsima*, 28 August 1919, 5—6. 另见 *al-'Āsima*, 5 February 1920, 5; *al-Kawkab*, 11 November 1919, 11; *al-Kawkab*, 13 January 1919, 11。

[131] *al-Kawkab*, 11 November 1919, 11. 另见 *al-'Āsima*, 11 September 1919, 1—2; the account of Gertrude Bell's visit to the "School for the Daughters of Martyrs" (*madrasat banāt al-shuhadā'*) in Damascus in IO L/PS/10 802, Gertrude Bell, "Syria in October 1919," 15 November 1919, 11。

[132] *al-'Āsima*, 28 August 1919, 5—6.

[133] *al-'Āsima*, 12 July 1920, 1; Darwaza, *Hawla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ītha*, 1: 115—116; Farzat, *al-Hayā al-hizbiyya fī Sūriyya*, 75; Hassan al-Hakīm, *Khubarātī fī al-hukm*, 46; al-Haffār, "al-Hukūmāt allatī ta'āqabāt 1 (15 tishrīn al-thānī 1372): 10; AD 2374/938/CP/dossier: TEO zone oust, "Situation politique," 19 April 1920. 根据 1920 年 5 月 31 日的《首都报》，叙利亚大会于 1920 年 5 月 29 日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一项决议，授予妇女投票权。

[134] FO 371/5188/E7808/42, "Arabic Press Abstracts for Week Ending June 14 1920."

[135] 原文出自 SL: LW。重印于 *al-Ahrām*, 12 March 1920 和 USNA 165/2558—16, Military Attaché (Cairo) to Director Military Intelligence, 16 March 1920。

[136] SL: LW, "Nizām al-lijna al-watraniyya al-'ulyā fī al-'āsima al-Sūriyya," 17 November 1919.

[137] SL: LW, "Nizām al-lijān al-watraniyya al-far'iyya fī bilād Sūriyya," 17 November 1919.

[138] *al-'Āsima*, 5 January 1920, 1—2.

[139] 根据《首都报》的一篇未署名的社论报道："当臣民们看到殿下与他们握手，表现得就像和他们平等一样，并且按照他的第一个先祖的惯例招待他们时，阿拉伯的民主就会到来。因此，我们已经看到了英国国王陛下走下公共舞台，用亲切的话语回答一位埃及村民的问题。'谢谢你，我的孩子，谢谢你的支持，真主保佑你。'（用皇家印章签署）读者会在这个回答中看到真正的民主精神，这种精神在日常英国形成并燃起骄傲。" "Democracy for the Arabs," *al-'Āsima*, 21 April 1919, 1—2.

第四章　竞争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场的整合力和规范力

上一章从各种口号和关键符号讨论了两个主要的民族主义话语共同体话语意义的多样性，其中一些是两个共同体所共有的，有些只是属于其中某一个共同体。本章的目的是展示这些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在共同体中的特定含义，并将它们置于每个共同体话语场整体价值、责任和目标的广泛背景下进行观察。

在某些方面，这项任务之前就开始了。当然，要讨论关键符号“进步”和“民主”所起的核心作用，不提及这些术语转化为代表性符号的框架是不可能的。但是，本章所采用的方法与上一章有两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本章颠倒了研究的方向：由于话语场本身规定了一套内涵，话语共同体的参与者可能将自己归为其中任何一个封闭符号，因此对话语场的分析必须从对作为整体的场域的研究开始，而不是从离散的、选定的符号进行外推。其次，本章将比上一章更严格地对主题进行限制：尽管所研究的话语场域支持了一套全面的用来解决多重公共和私人问题的信念，但本章把聚焦点限制在每个话语场域在处理建立理想政治共同体和重建适合的社会秩序具体问题时所主张的路径方法。

这一讨论之所以对与理解后奥斯曼时期叙利亚政治和社会转型至关重要，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话语场不仅仅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它们还激励自己的支持者，并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指导。正如第三章开头所

提到的，话语场中的符号充当了符号所指对象和特定含义范围之间的桥梁。因此，话语场反映了其被创造的环境。[1] 但由于话语场域本身对一系列可能的象征含义施加的连续作用，它同时将自身从社会情景中分离出来，并获得了范例真理（paradigmatic truth）的特征。[2] 也就是说，话语场自身成为了其权威来源。结果是，整合起来的符号系统充当了行为规范的指南：因为封闭的符号，其含义来自话语场内的符号的整合，话语场区分了合法的和非法的追求并引导其追随者经历一些受认可的活动。正如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所指出的，话语场经常直接将符号并列来发挥作用，并列的符号同时暗指被倡导的行为和价值观以及那些被认为是有害的举止，例如，基督教神学将天堂和地狱并列，进入其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条件。[3] 正如在下文中将进行详细讨论的，在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叙利亚，穆塔纳维尔的话语场中“进步”和“停滞”并列，就像其在人民委员会中的竞争对手的话语场中将“民族”和他的敌人（诸如“那些像商品一样出卖国家的人”）并列一样，用来赞扬适合各自话语共同体的行为。

与阿拉伯政府及其政府外同盟相关的话语场是一个有助于阐明话语场如何协调社会经验和象征意义的过程的案例。这一特定的话语共同体话语场将中产阶层这一客观的职业和社会地位分类转变成为象征分类（穆塔纳维尔、穆斯塔尼伦［mistanīrūnd］等），其追随者从中获得了有限数量的含义和可能的行动方针。反过来，这些意义和被授权的行为证实了组成这一话语场的其他象征形式的一致性，因此又加强了话语场本身的综合性。

这个话语场将是本章第一部分的主题，穆塔纳维尔和他们的盟友不仅只是构建了这一话语场，而且沉浸其中。

自上而下的观察

阿拉伯政府及其政治和文化社团同盟所认同的话语共同体包括两个群体，他们或许都可以被描绘为叙利亚社会的“局外人”，因为他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才形成的。第一个群体由军人、谢里夫家族及其随从等组成，他们跟随阿拉伯军队或是在奥斯曼帝国撤出叙利亚后从其他地方（汉志、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来到大马士革。由于是因为参加阿拉伯起义而获得政治权力，他们在阿拉伯政府中的存在引发了许多传统上控制当地政治的本土权贵的抗议。第二个局外人群体由穆塔纳维尔组成，他们认为无论在战时的表现如何，自己接受的教育或从事的职业使他们有资格在战后的叙利亚发挥特殊的作用。

共同利益将这两个群体团结在一起。例如，他们都对政治体系结构感到极度不满，因为这一结构不能满足他们的野心。因此，这两群人都试图重建该体系，尽管方式不同。虽然许多移民无疑会满足于仅仅使自己融入先前存在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但是穆塔纳维尔认为，权力关系的转变已经远远落后于过去半个世纪改变叙利亚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只有经过更为激进的社会现状改变才能进行修正。除了他们共同的目标外，两个群体之间拥有互补的属性：移民为穆塔纳维尔提供了合法性（阿拉伯起义的神话和获得国际承认的能力）、获得权力和财政资源的途径，而移民需要穆塔纳维尔阐明民族主义计划，尽可能地将他们与本土社会和政治结构联系起来，建立和指挥现代民族国家正常运转所需的陌生的制度。

在大多数情况下，穆塔纳维尔制定议程并建构阿拉伯政府的话语场。因为，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进步和其他现代主义公理构成了其社会想象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穆塔纳维尔的话语场再现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居住

在类似环境中的欧洲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许多两极对立概念。因此，穆塔纳维尔的话语场将文明与野蛮[4]、进步与停滞[5]、世俗主义的温和与社会主义的狂热[6]，以及精英政治的先进性与恩庇政治相对立[7]，这些修辞对于晚期殖民时期的民族主义精英来说都很常见。对于穆塔纳维尔而言，这些两级对立概念就像路标，标志着新叙利亚的轮廓。以欧洲和美国这样的“年轻”国家为蓝本，未来的叙利亚将同样居住着一群致力于进步原则以及拥有自由政治价值观、个人主动性和进取心的人。《地球报》的一个供稿者以下述方式为这些价值观辩护：

> 我们必须把政府及其事务放在一边，让它全神贯注地履行其常规职能，因为我们绝对不能将它没有的能力强加给它。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进步上，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政府无法做到我们所做的事情。现在是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了，是时候追随其他民族的脚步了。[8]

虽然穆塔纳维尔话语场中嵌入的一些对立概念组明确传达了共同体目标，但其他一些仅是通过隐喻和典故暗示了范例理想。例如，那个时期的作家和演说家经常将现代性的活力与过去（奥斯曼帝国）的停滞进行对比，歌颂青年人的活力，含蓄地贬低他们认为的顽固的传统主义。阿拉伯俱乐部声称代表“所有有文化的青年”[9]，“年轻”是用来描述民族主义守护神“烈士们”的首选形容词，[10]而埃米尔费萨尔声称自己与叙利亚青年有着特殊的联系：“如果我对年轻人说跳入大海，他们会这样做，没有人会犹豫，因为他们知道我说的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什么都懂。”[11]穆塔纳维尔支持的政治协会的名称也反映出对青年的关注。不仅是法塔特（jam ‘iyyat al-umma al-‘arabiyya al-fatāt，青年阿拉伯协会），还包括阿拉伯

青年俱乐部（Arab Youth Club）、青年叙利亚人协会（Association of Young Syrians）、青年黎巴嫩人协会（Young Lebanese，之后和青年叙利亚合并）、青年美索不达米亚（Young Mesopotamia）、爱国青年（Patriotic Youth），青年之剑、之火、之热情（The Sword，the Firem the Ardor of Youth），以及贾兹拉青年（fityā al-Jazīra），该组织最初是位于埃及的叙利亚联盟的叙利亚分支，后来与卡米勒·卡萨布的民主党合并。[12]

在穆塔纳维尔的话语场中，将青年和老年相对立是由几个因素导致的。正如第一部分所讨论的，青年/老年二分法对应了实际存在的代际间冲突：大多数认为自己是穆塔纳维尔的人都是年轻群体的成员，他们与奥斯曼帝国晚期在大马士革掌权的权贵相比更年轻。但是，这一修辞还必须从另一个层面进行解读。青年和老年的对立反映的是穆塔纳维尔和谢里夫家族颠覆之前存在于叙利亚的权力关系（无论是客观存在的还是想象的），将叙利亚与现代性的普世工程联系起来，并灌输自身带有科层划分的政治共同体和社会秩序新概念的努力。[13]

同样，穆塔纳维尔的话语场也衍生出类似的修辞含义，将觉醒的活力（穆塔纳维尔的状态，他们寻求向叙利亚人民灌输这种活力）和昏睡的麻木相对立，呼吁叙利亚人“从梦中醒来，清除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无知的尘埃”。一位社论撰稿人说：“如果大众吸取了真正的知识精华，而不是接受一群几乎以愚蠢和闲谈结束生命的缪斯老师的指导，他们就会从睡梦中醒来，与其他民族并驾齐驱，走上进步的道路。”[14] 像使用“youth”和“young”一样，穆塔纳维尔也将“清醒”（wakefulness）和“重新觉醒”（reawakening）作为组织的名称，例如知识分子觉醒委员会（Committee for Intellectual Awakening，由萨米·巴克里［Sami al-Bakri］、阿卜杜勒·拉赫曼·萨法尔扎拉尼［‘Abd al-Rahman al-Safarjalani］、纳迪姆·萨瓦夫［Nadim al-Sawwaf］、叶海亚·沙马［Yahya al-Sham ‘a］领导）和巴勒斯坦

觉醒委员会（Committee for Palestinian Awakening）。[15]

因此，穆塔纳维尔存在的理由是提供上述社论作者所称赞的“真知的精华”（milk of true knowledge）。姆西布丁·哈提卜在《首都报》上抱怨：“国家的大部分人，并不局限于受过教育的人，城市里的显贵和商贾，每天都看报纸，关注国际、国内政治，关心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

> 相反，这个国家的广大人民是由劳动人民组成的，他们居住在乡村和山区，他们致力于开垦和种植土地。受过教育的人（muta‘allimīn）必须把热情献给这些人，以启迪他们的心灵，提高他们的才能和智力。[16]

为了实现他们的现代主义神话，穆塔纳维尔直接对流行的实践进行攻击，并向叙利亚人提供说教口号（包括“宗教属于真主，国家属于全体”）和虚张声势的建议。例如，《首都报》重刊了刚刚去世的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在1885年发表的演讲，为的是“给这个正在觉醒的国家的青年提供美国青年取得财富和成功的经验，并使青年们掌握这些经验”。很难想象叙利亚人会如何看待卡内基对青年人努力工作、节约收入、避免酗酒、股票投机和打白条（IOU）的建议。[17] 同一份报纸的标题为《我们家庭生活的威胁》（A Danger Threatens Our Domestic Life）的社论将叙利亚咖啡馆的泛滥归咎于各种社会弊病，包括失业（“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咖啡馆，那么闲散的人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找工作上”）和家庭破裂（“那些从家逃到咖啡店的人，没有感受到幸福家庭的甜蜜和美好，反而给家庭主妇做了坏榜样，她们会抓住一切机会逃到邻居家”）。社论补充说：“地球上最伟大的城市——我指的是伦敦——缺少咖啡馆，因此咖啡馆是一回事，文明又是另一回事。”[18] 10个月后，也就是法国入侵叙利亚内陆前夕，该

报甚至将叙利亚经济崩溃归咎于社会下层的挥霍行为：

> 人们沉浸在酒水、娱乐、服装和浪费之中。这就是农民提高土地价格的原因——以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变得骄傲和放纵，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工作被抛弃、交易变得困难。[19]

为了打击大众阶层有害身心健康的实践，穆塔纳维尔支持他们所谓的在道德上令人振奋的、文明的和爱国的娱乐活动。绝非巧合，官方机构很容易观察和监督这一娱乐活动。例如，在反对《费萨尔—克列孟梭协议》的大众抗议后，《首都报》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呼吁阿拉伯政府在叙利亚东部地区的城市建设赛马场。文章说，

> 战前大众阶层（看赛马）消磨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但宣战后这项活动就停止了。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爱马的人来说，有一个地方可以消磨时间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在赛马场消磨时间比在咖啡馆的角落里消磨时间更好。他们将从这项活动中获得物质和健康上的好处，他们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20]

作为他们为国家提供意见咨询的交换，穆塔纳维尔为自己争取特权，如优先选择行政职位、获得之前比他们社会地位高的人的服从，以及接触或进入社会最高层。这些主张自然使穆塔纳维尔与许多传统的显贵阶层（被描述为特权的捍卫者和恩庇的提供者）人士产生矛盾，也使穆塔纳维尔自己自相矛盾。[21] 刊登在《地球报》上的一篇名为《祖国高于一切》的文章描述了两个群体之间强烈的敌意，并将其比作“我们东方人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危险疾病”。

显贵和启蒙者（在文章中被称为 'ulamā、mustanīrūn 和 'isāmiyyūn[22]）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双方都开始努力取代自己的对手，并获得其垂涎的领导权和影响力。（每一方）都在（自己的）设计中利用他人……我们不应该要求他们停止争论、坚持团结一致的原则或发誓放弃争夺主导并抓住和谐的纽带，因为两个不同阶层之间的争论是不可能被消灭或抛弃的。然而，我们希望（相互）保证和天然边界会限制这一争端，使它们不会蔓延至触及祖国的整体利益。[23]

这篇文章的作者通过描述一次会议继续分析了老牌精英和新兴精英之间的争论，召开这场会议是为了决定“关系到民族命运和国家未来的重要问题”。参与者选择了一位启蒙者（isāmiyyūn）而不是一位在场的显贵来领导他们，这激怒了后者，“他对自己从属于这个暴发户感到不悦”。作者尽管责备启蒙者没有以更灵活的方式与其对手打交道，但还是对这位显贵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提醒他：

我们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总统或领导的外表很重要，因为这会给灵魂带来狂喜和幸福。但这不能让我们的理性黯然失色，挡在我们和我们的梦想之间。（也不能允许）我们去冒风险，从中我们只会得到失败和失望。

文章最后将显贵和启蒙者之间的冲突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制度演变框架下，告诫传统的显贵必须向不可避免的事低头：

在过去，权力和影响力都属于那些有体力的人；在那之后是一个

> 没有体力的人拥有权力的时代，随后的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天赋和专长各不相同的长官，直到这个时代的到来。（现在）只有那些被赋予了为主人照亮黑暗并引导他前进的光明的知识分子才能进行统治。如果一群人因看到我们共同体中的这种人当头而感到难过，他们不应该放在心上，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是必要的。抵制这一点不会获得任何利润或利益。他们必须认识到，知识是进步的途径，是获得高位和他们追求的伟大的手段。如果他们的灵魂中有任何崇高的爱，那么它应该指导他们并支配他们的活动。

穆塔纳维尔及其在谢里夫家族中的盟友所要求的特权不仅使他们与传统的叙利亚显贵产生不和，而且使他们与叙利亚多数民众格格不入。例如，1919 年 6 月法伊兹·胡里在《首都报》发表的一篇长达两页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讨论，只不过是对社会中受过教育的精英进行统治的隐晦辩护。[24] 胡里毕业于伊斯坦布尔法学院（School of Law）和帝国战争学院（Imperial War College），战前是伊斯坦布尔文学协会的成员，在费萨尔时期是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的成员、赫伯特·斯宾塞哲学的倡导者，[25] 他在文章中挑战了欧洲社会主义者主张的社会平等，提出“那些见多识广的人和非见多识广的人能否平等”的问题，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断言，人们是通过履行促进祖国发展的职责来赢得自身权利的。因此，“法律规定的那些为国际利益工作的、受过教育的人和野蛮的无知者的平等其实是不平等的”。胡里举了两个例子来支持他的穆塔纳维尔应该与社会上的其他人区别对待的论断。首先，他（暗含赞许地）援引了赋予受过教育的人比无知的人更大发言权的选举制度。然后他问道，袭击商人的罪犯受到与袭击统治者或法官的罪犯相同的惩罚，这是否公正？毕竟后者是为其臣民服务，前者只是为自己服务。对于胡里文章的目标受众——其他订阅《首都报》

的穆塔纳维尔和政府雇员——来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与穆塔纳维尔一样，谢里夫家族及其追随者同样将叙利亚社会划分为适合统治的人和只适合被统治的人。然而，因为他们缺乏穆塔纳维尔的资格或自命不凡，谢里夫们没有采取文化精英的姿态。相反，作为局外人和征服者，这些大马士革政治的新来者坚持认为，他们的存在对于整合和管理一个他们称之为几个世纪以来分裂为自治的、垂直组织的教区共同体是必要的。阿里·里达·里卡比虽然是大马士革人，但是在《首都报》却表达了谢里夫们的观点，

> 阿拉伯政府在维护和平上非常警醒，遵守法律并以团结的精神为指导组建政府，所有教派、宗教和民族的民众之间和协议一致，互相合作，以至于他们在权利上没有区别……
>
> 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慈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人民应该以忠诚和热爱来对待政府。[26]

对于里卡比和他的同伴来说，阿拉伯政府与叙利亚民众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它们受到费萨尔之手的担保”。[27]但费萨尔不仅仅是将叙利亚不同的“教派、宗教和民族”团结起来的黏合剂。费萨尔在大马士革的存在认可了汉志人和伊拉克人的存在，以及穆塔纳维尔的政治和社会愿景。费萨尔因此成为国民偶像、“严厉而仁慈的父亲”、治疗民族弊病的医生、“民族运动的精神”、“压迫的粉碎者、权利的保护者、阿拉伯人的守护者、贵族和荣耀的儿子”。[28]在一篇文本中，他是叙利亚的爱德华·詹那博士（Dr. Edward Jenner），因为他有“治愈”这个国家的能力。在另一个文本中，他是现代阿拉伯的哈立德·本·瓦利德。[29]费萨尔本人参与了这场崇拜的建构，将自己置于仪式的中心，像阿巴斯王朝的哈里

发一样接受致敬（mubāya'a），[30] 检阅为庆祝国家节日而举行的游行，并公开出巡旅行，为欢迎他的到来，各地为这一场合特别建造了凯旋门。简而言之，用他自己的话说，费萨尔是“（叙利亚人）将他们的利益托付出去并交付政治领导权的人”。[31] 在所有后奥斯曼时代叙利亚的政治行为体中，只有费萨尔和他的内阁成员将叙利亚民众称为臣民（ra'āyā），这个词在 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过时，被认为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法。[32]

因此，对于穆塔纳维尔及其在阿拉伯政府中的同伴而言，叙利亚是一个二分的社会，其中有教养和受过教育的人与庸俗的人被严格区分开来。正如历史学家基思·赖特森（Keith Wrightson）所写的那样，这样的世界观不仅设想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一个“孕育着冲突”的社会，将“更好的类别”与“劣等的类别”对立起来，它还制造了一种制造分离的语言（language of dissociation）来污名化和疏远绝大多数的人。[33] 换言之，最初基于技能和军事实力的区分发展成为基于道德品质的差异。[34] 结果，穆塔纳维尔未能提出引起多数叙利亚民众共鸣的未来叙利亚的包容性愿景。他们无法构想一个对叙利亚社会有意义的文化参照形象，因此让这个领域对那些有能力的人保持了开放，例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层和他们的盟友。

人民委员会的话语场

正如在第二章中所讨论的，人民委员会的参与者社会背景广泛：富裕的粮商和邻里纽带下的小资产阶级、地主显贵和商人乌里玛、贝都因谢赫和贾

巴达亚特。在某种程度上，共同的怨恨使这个多样化的群体团结起来。对于一些加入人民委员会的人来说，欧洲对叙利亚事务的政治干预最终导致了阿拉伯起义和即将强加给叙利亚的托管，这不仅剥夺了他们以前享有的声望和权威，而且导致了领土的分裂和外来（法国人、汉志人）统治的双重灾难。人民委员会的中层领导和普通成员一样对新的政治秩序怀有敌意，因为前者被 19 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力量和国家能力的扩张所压垮。

对于这两类群体，穆塔纳维尔及其盟友所倡导的“进步”“文明”及其他原产自欧洲的抽象概念不仅缺乏吸引力，而且还使他们想起自己遭受的苦难。此外，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叙利亚人遭遇社会和经济混乱的背景下，将许多叙利亚人认为是外来思想结构和类型强加于人的努力引发了以僵化的、自觉的传统主义为形式的意识形态反应。为回应穆塔纳维尔所支持的看似空洞的价值观和外来的社会建构，受欢迎的演说家和作家不仅有选择地利用并意识形态化了迄今为止没有被意识形态化的形象，即永恒和平等主义的过去，而且通过赋予时代教条以永恒的光环，为共同体重建和日常社会行为提供了原则和道德要求。

后奥斯曼时期叙利亚人民委员会宣传人员的演讲、传单、文章和宣言中的话语核心是一组互相关联的图像：叙利亚民族的有机性和历史延续性，以及民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市民社会自治及其高于国家机构的地位；传统价值的优点及其在面对外来阴谋、叛徒和“那些将国家当作商品出售的人”时的脆弱性。如上一章所说，人民委员会的组织者和活动家所设想的民族主义共同体比街区或城镇范围大，但小于谢里夫们最初倡导的泛阿拉伯国家。这个共同体是一个叙利亚民族共同体，由居住在叙利亚“天然边界”内的居民组成，他们拥有源自共同文化和经济的自然亲缘关系。由于这个共同体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即使它被淹没在奥斯曼帝国等更大的政治实体中，它的绝对独立权也不是基于阿拉伯起义，而是基于共

同的祖先并建立在“浸透了我们祖辈和父辈鲜血”的土地上：[35]

> 世世代代，你们一直被指引着追求正义，正义出现在你们面前，不易捕捉，你们追随着它。你们的种族里流着祖先的血液，你们的心中有他们自由和崇高的品质。你们要像祖先一样生活，像狮子住在巢穴中，像鹰在天空遨游。[36]

因此，团结叙利亚人的纽带不是政治纽带，而是源于种族和叙利亚民族历史经验的世界观和利益的共同性。

人民领袖及其选民对叙利亚的这种有机概念认知支配着他们对国家性质及其与社会的适当关系的态度。在许多人眼中，阿拉伯政府由于多种原因缺乏合法性，例如，外国人特别是“野蛮的”汉志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经济政策上的无能；看似阿谀奉承和过于妥协的外交政策。此外，穆塔纳维尔使用的“制造分离的语言”，这种语言反映的是专横国家对顺从社会的支配，证实了一种看起来特别不自然和具有挑衅意味的分裂。相比之下，人民委员会及其盟友假定了民族（乌玛）的独立存在及其先于国家的地位。[37] 从第三章开头卡米勒·卡萨布对 1920 年 1 月的示威游行的描述到出现其签名的题为《民族向叙利亚国民大会表达其愿望》的大报，这一主题不断出现在人民委员会的宣传中。“我对政府不感兴趣，因为它是民族的影子，它的统治就是你的统治”，一位社论家在《国防报》（*al-Difāʿ*）中写道：“如果想要进行改革，我将从民族开始。”[38]

对于包含人民委员会及其盟友的话语共同体而言，乌玛是自我调节的，通常是和谐的，能够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因此，对于那些人民委员会的成员来说，叙利亚不仅不是一个需要政府或穆塔纳维尔干预的自治共同体的合集，也不是横向分层的。叙利亚人有着共同的历史祖先

和同时代的兄弟，是（引用一个常见的比喻）一个家庭。一位“忠实的阿拉伯公民”在金—克莱恩观察团来到大马士革前夕的传单上写道：“不要接受对你们国家、你们家庭、你们祖国的瓜分。”[39] 设立高级人民委员会分支机构的宪章第三条确认了这一主题，实际上赋予了人民委员会家庭监护人的角色：

> 每个街区、邻里或共同体将指导邻里或共同体内的成员做他们必须为祖国做的事情，（这是为了实现）上一条所述的目标。它特别注重加强本地区人民之间的和谐、友爱和相互理解，使他们能够像一家人一样，并加强祖国所有孩子之间的爱国和民族纽带。[40]

正如一个家庭是由离散但相互依存的成员组成的，成员们通过亲属关系团结起来，根据那些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演说家和作家的说法，叙利亚也是由离散但相互依存的“tabaqāt”（单数为 tabaqa）组成，tabaqāt 在英文里通常翻译为“阶层”（classes），但在人民委员会的话语场中更接近于“社会等级”（estates）。tabaqa/tabaqāt 一词的使用，就像民族主义文本中许多词的使用一样，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话语共同体。例如，埃米尔费萨尔偶尔将这个词用作“信仰”或“信条”（madhāhib）的同义词，亲政府的记者哈利勒·马丹·贝克（Khalil Mardam Bek）基于他所称的“社会教养”（social upbringing），将哈马人民分为两个 tabaqāt：“绅士”或“上层阶级”（sād，khāssa）和“群众”（‘amma）。[41] 然而，正如预期的那样，当与人民委员会所认同的话语场相结合时，该词的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亲政府的报纸《地球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使用了 tabaqāt，其意义接近于马丹·贝克所认为的那样，也就是将叙利亚社会一分为二。一位编辑写道：“在今天的叙利亚，有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政党，在困难面前毫不犹豫地、

迫切地争取独立和幸福。”

>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帮助党的普通老百姓、劳工和农民 tabaqa 毫无例外都只有一个要求。他们只承认一个词，“独立、独立”，没有外国人在这个国家，无需对这个词加以评论，也无需为之勾勒出一套哲学。穆塔纳维尔 tabaqa（al-tabaqa al-mutanawwira）日夜不停地从语言和政治方面解释这个词……如果持不同意见的人放弃他们的某些解释，并努力建立相互理解的纽带，我们将看到所有叙利亚人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没有障碍和困难。[42]

另外，对于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及其盟友来说，将社会划分为 tabaqāt 与上述划分有两点不同之处。第一，虽然文本呈现了不同类别的 tabaqāt（例如，商人、工人、农民、乌里玛、政府工作人员等），它们总是将叙利亚社会呈现为由两个以上的部分组成的社会。叙利亚社会因此没有被分裂为等级森严和对立的派别。与穆塔纳维尔使用的“制造分离的语言”相反，将社会划分为许多不同但基本相似的 tabaqāt 意味着一种既包容又民主的社会秩序。第二，由于每个 tabaqa 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同，所有 tabaqāt 必须协调行动，社会才能顺利运行。人民委员会散发的表达所谓“国民意愿”的请愿书，以及卡米勒·卡萨布等人民代言人的演讲，通过通常使用的 kull tabaqāt（all tabaqāt）这一意指叙利亚民族整体的词组强调了 tabaqāt 之间基本的相互联系。与此相对，人民委员会的宣传把那些反对委员会活动的人当作一名共同体之外的 tabaqa：“在人类的孩子中，有一名 tabaqa 只有在保持影响力的情况下才能意识到生活的快乐，即使这会导致现实的崩溃和人类孩子的毁灭。”[43]

对于人民委员会的话语共同体而言，组成社会的 tabaqāt 是通过相互之

间的义务连接起来的。例如，叙利亚的富有公民有义务通过支付传统的天课（zakāt）来帮助穷人。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谢赫穆罕默德·哈姆迪·萨法尔扎拉尼在《首都报》头版发表的一篇客座社论中呼吁人们支付此类慈善款项：

> 难道因为富人都是国家的重要成员，而不是在路上乞讨的断肢者，为穷人建造医院、为他们的孩子提供饮食和学校教育就不是他们的责任吗？……因此，我鼓励每个街区具有善心的人组成协会，其目的是从富人那里收集天课，然后转给穷人，并为所有旨在实现乌玛个体之间和谐的目标而努力。[44]

大马士革的贫困人口以“小巷里的残留”为代表，即那些被遗弃或被忽视的儿童，只有当那些“漠视自己重要职责（就像主动脉的职责一样，它的功能是将血液输送到其他静脉）”[45]的富人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贫困才会被减轻。

对于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及其支持者来说，tabaqāt 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历史决定的和自我调节的叙利亚乌玛的首要地位，加上被严格应用的传统主义，影响了指导道德规范和公共行为的所有类别的结构，包括那些与性别和社会职能相结合的领域。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前几十年间，各种因素导致了叙利亚社会中妇女先前所处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混乱。这些因素包括：城市空间的重组；闭关自守的乡村的衰落和城乡联系的同时扩张；新技术引发的手工业生产重组和就业模式的转变（例如缝纫机在大马士革的引进）；战争和移民导致的人口失调；以及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的动员活动。[46]人民委员会所使用的话语通过鼓励符合新现实的活动和价值观，促进了社会重建和性别角色的再平衡，同时将这些活动和价值观包装在

“传统”的外衣下，使其不因创新而受到谴责。

通过这些认证行为，地方的人民委员会授权妇女在公共领域从事各种活动，包括许多以前被禁止参加的活动。例如，与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一样，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人民委员会鼓励妇女参加有计划的示威活动。然而，与他们的竞争对手不同的是，有报道称，人民委员会允许甚至鼓励妇女评估和筹集资金，以支持地方的人民委员会。此外，如果轶事证据和外国观察员的说法是准确的，女性可能还被征召加入了由人民委员会组织的民兵队伍，她们不仅是辅助人员，而且还是战斗人员。[47]“先知的妻子发动了圣战”，据称一名女志愿者在前往梅萨伦作战前对她的兄弟说，“你能去，为什么我不能？”[48]

因此，相对于穆塔纳维尔的话语场，人民委员会的话语场赋予了妇女一套不同的责任。如上一章所述，在进步的标题下，穆塔纳维尔为妇女的活动确定了一个独特的空间，与男性的活动平行并起到补充的作用。因此，从穆塔纳维尔的角度来看，妇女要通过慈善团体（如阿勒颇的妇女慈善节约协会［jam ‘īyat al-iqtisād al-nisā’ī al-khayrī］、贝鲁特的阿拉伯妇女觉醒运动［yaqzat al-fatāt al-‘arabiyya］和穆斯林妇女慈善事务组织［al-umūr al-khayriyya lil-fatayāt al-musilimāt］）[49]从事慈善活动、组织附属于已经建立的民族主义协会的妇女协会、教育他们的子女，并参加有助于她们成为“民族母亲”的公共活动（示威、请愿运动和投票）来为民族作贡献。例如，根据《首都报》中的一篇文章，1919 年 12 月在阿勒颇的一个妇女协会成立的大会上，明显属于上层阶级的与会者解决了以下问题：在衣服和其他商品上少花些钱，并推迟采购；推广和使用“民族的”布料，而不是从欧洲进口的布料；放弃高级时装，回归简单的款式；放弃奢侈的习俗，比如不穿同一件衣服参加两场不同的婚礼；创办教授裁缝和造型的地方，并任命一个委员会和主席来监督其运作；“在妇女中传播民族主义精神……

（以便她们能够）训练未来的人”。[50]

同样，虽然“教化了的”妇女也参加了阿拉伯军队，但是她们的活动，诸如包扎绷带和照料伤员，重复了穆塔纳维尔给他们确立的社会角色。娜齐克·阿比德（Nazik al-Abid）就是这类女性之一，她是贝鲁特文学家、叙利亚国民大会代表穆罕默德·贾米勒·贝胡姆（Muhammad Jamil Bayhum）未来的妻子，她甚至还获得了阿拉伯军队“荣誉主席”的称号，“以表彰她为烈士女儿所付出的努力、社区服务以及对妇女（nisā' iyya）活动的参与”。[51]

然而，人民委员会的话语场既不认可将进步作为典范原则，也不认可将欧洲“文明”国家作为原型。因为他们的话语场不承认妇女是乌玛中的一个自治类别，人民委员会认为，穆塔纳维尔扩大选举权至女性、推动国家支持女孩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种前所未有的和欧洲性质的努力是危险的并具有分裂性质的，是对历史上叙利亚社会不可分割性和纯洁性的威胁。因此，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发起了反对妇女选举权的激进运动，例如，就像广泛流传的驻扎在西部占领区的法国士兵侵犯叙利亚妇女的故事一样，穆塔纳维尔的活动象征着帝国主义对乌玛完整性的侵犯。相反，穆塔纳维尔并非没有感知到这些情感的深度和产生的原因：几个月前，底层的大马士革青年开始袭击穿着西方服饰的妇女，《首都报》警告女性要避免那些可能被解释为“对他人造成挑衅”的活动和炫耀性的展示，并且在公共场合的举止要“与（其他人的）社会生活和习俗保持严格一致”。[52]

因此，在妇女选举权和受教育权方面的斗争不过是人民委员会及其支持者以民族的名义对“虚伪叛徒”[53]（第五专栏作家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骗子）发动的战争中的一条战线。人民委员会对煽动者（mushāghib）和被压迫者（mankūb）[54]这两个词的重新定义说明了这些团体如何将原本带有贬义色彩的标签据为己有，并将其转化为肯定乌玛自主性和凝聚力的象征。

例如，阿拉伯政府首先使用 mushāghib 一词来描述那些对其政策提

出质疑或反抗示威的人。费萨尔 1919 年 5 月第一次欧洲之行回国时阿里·里达·里卡比发表的一篇演讲中使用了这个词，他说："这个民族受人尊敬的孩子们自然地准备好了与现代文明同化，不管有多少 mushāghibūn（mushāghib 的复数）的煽动，不管这些说谎者的意图是什么。"[55] 这个词被作为里卡比军事长官继任者的穆斯塔法·内马特（Mustafa Ni'mat[56]）所采用，他在撤离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谴责了那些"在需要完全平静时忘记了他们的职责和论点"的 mushāghibūn。[57] 作为回应，《国防报》刊登了一篇言辞尖刻的头版社论，作者在这篇社论中把自己与对手作了比较，作者仅用"mushāghib"这个标题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 我不想在皇宫里的哪间办公室里得到一个职位。
>
> 我不想当某个大协会的主席。
>
> 我不想冒犯一个自认为优越于我的人，尽管他并不比我好。
>
> 我不想要国库的钱，虽然少了这些钱我会一贫如洗。
>
> 我不想在一个赛义德或扎伊姆（za'im）* 头衔使我快乐的城市中变得卓越。
>
> 我不想让扎伊姆重新占据职位，尽管我和他在一起就像黄油和蜂蜜一样搭。
>
> 我不想付出沉默的代价。
>
> 我不想回到一个只对我有利但伤害整个民族的习惯上去。
>
> 我不想要参孙（Samsom）的姿态，当他摇动圣殿的支柱并使它坍塌的时候，他说："主啊，在我自己和你的敌人之上。"[58]

人民委员会及其支持者的话语场通过一种"那些会像出卖商品一样出

---

* 阿语单词"扎伊姆"意为"领袖""首领"。——译者注

卖国家的人”的阴谋论的形式，将 mushāghibūn 共同体与其对照物相对立。[59] 尽管这一特别的比喻并不唯独形容费萨尔统治下的叙利亚（还有贝隆主义时期阿根廷国内叛徒［vendepatria］的阴谋），但是它容纳了反帝主义、人民委员会主张并得到其选民支持的反市场的经济家长制和《古兰经》典故，因此与这一时期尤为相关。[60]“打倒那些出卖祖国的人，”黑手组织（Black Hand）散发的一张传单上写道：“叙利亚人，你们要警醒，要谨慎。”另一份传单警告叙利亚民众“在民族灭亡前拯救民族……在卖国者犯下叛国罪前，先打倒他们”[61]。

就像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和林恩·亨特（Lynn Hunt）[62] 所分析的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民主派如变魔术般变出的“贵族密谋”（aristocratic plot）那样，“那些想把国家当作商品出售的人”的阴谋论对于人民委员会及其盟友有两种作用。首先，它使委员会的活动合法化，将许多人认为可能仅仅是权力上的竞争上升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斗争：

> 民族啊！叙利亚的子孙们，我的兄弟们！指责你们朝三暮四的人是狡猾的伪君子、叛徒，或者是假装知情的无知者。他至少被认为是一个傻瓜。一个人有可能出卖他的原则，奴役他的荣誉。至于全体人民，在整个世界上没有足够的金钱来收买他们，也没有力量能够压垮他们，因为他们每一步都要求获得真主在生活中赋予他们的权利。而捍卫神的权利的人足够高尚和强大，无法被战胜。[63]

其次，这个阴谋论为革命者提供了一个镜像，即一个旨在维护特权和教区利益的“反原则的”阴谋，使新秩序与之形成对比。

另一方面，虽然谴责那些“以（民族）名义与外国人交谈，但追求的却是与其不相容的野心和个人利益的”[64] 叛国者、诽谤者和叛徒成为第一

次被迫面对大众政治现实的群体的共同诉求，这种谴责也将不可避免地使政治辩论变得粗俗。叙利亚各人民委员会成员的宣传，同在他们之前的法国激进分子的宣传一样，充斥着暴力形象，并呼吁警惕民族的敌人。在独立日上，萨米·萨拉支在阿勒颇阿拉伯俱乐部发表的讲话就是这种新的好战习语的代表：

> 在我说话之前，文字之王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们生产出思想，用温和的曲调来拨动心弦。然而，我希望能震动人们心中的力量之弦。如果孩子能够安眠，是因为母亲轻快的摇晃和哼唱。那么人民将在我将他们交予真主后才能得以熟睡。
>
> 当在这荒凉的沙漠中，猛兽伏在岩石上找到藏身之处，饥饿的秃鹫在空中盘旋，蝰蛇和眼镜蛇在砾石中滑行，此时安眠距离人们的营地还有多远？
>
> 对于那些在没有月亮、黑影迷蒙、阴霾渐增时选择出发的人，安眠距离他们有多远？
>
> 对于身佩剑带，从肩上取下勇气之弓，挥舞着浮图瓦（futūwa）* 之剑，使宇宙惊恐、使时代不安的阿拉伯民族，这样的民族，安眠距离他们还有多远？
>
> 当豺狼撕咬狮崽时，狮子是不会安眠的。[65]

当然，政治话语的这种粗俗化并不局限于那些人民委员会共同体；谴责的暴力（在《费萨尔—克列孟梭协议》签订后不久，埃米尔本人也被认为是叛徒之一）使所有的民族主义派别都非常好战。在这种气氛下，即使

---

* “浮图瓦”意为“精神骑士”。——译者注

是费萨尔，当聚集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官不再倾听他的发言时，也不得不采取一种好战的姿态。因此，埃米尔的讲话（即使是那些耐心劝告的话）与保全颜面的口号“独立是争取的，不是被赋予的”交织在一起，这一口号是他与克列孟梭签署协议后从巴黎回到国内时首次提出的。[66]

总之，人民委员会及其盟友使用的话语场的基调和内容、其传统主义和独特组合，以及对立形象——将“民族”（以人民委员会及其支持者为代表）与其敌人（那些将“国家作为商品出售的人”为代表）相分离，将前者中的不同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和后者策划的阴谋所构成的危险等相分离——将在费萨尔时期的叙利亚兴起的民粹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同叙利亚的大众运动一样，民粹主义运动在历史上是作为对社会脱节的一种政治反应兴起的，这种脱节是由市场关系的快速和不均衡扩散所导致的。社会转型的可变范围和时机不仅将社会分割成不相同的、相互竞争的部分，还促使不满者和被排除在外者组成新的政治集团。[67] 这一政治集团所面临的话语选择既反映了其产生的环境，也反映了它容易受到最初推动其建立的资本和国家力量的破坏。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民粹主义比喻不断被重复。尽管人民委员会的话语场很难算得上独一无二，但是它确实展现出群众或部分群众共有的担忧，他们认为自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边缘化的受害者，开始将自己组建成与主导政治的“反民族”相对立的“民族”。

符号、场域和民族主义历史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菲利普·库利指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的

研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忽视了解释阿拉伯主义思想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被转化为一场全面的政治运动的。”[68] 尽管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在现代中东历史学家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它基于两个经不起推敲的假设：第一，阿拉伯中东的民族主义只有一条演进路径；第二，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群特定思想家的专属产品，是他们在剩下的人中传播了这种思想（据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所说，“具有革命的突然性”[69]）。

沙龙常客、野心勃勃的军人和纯文学作家确实为后奥斯曼时代的阿拉伯政体提供了一个轮廓，但是因为无法（而且不情愿）用一种令人信服的说辞来解决民众的担忧，他们的影响力受到限制。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神话创造的民族主义，即阿拉伯知识分子、法塔特、费萨尔的民族主义和“真主属于个人，国家属于全体”的民族主义在叙利亚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它受到了叙利亚内部不同民族主义倾向在不同层次的挑战：来自不信任谢里夫家族和阿拉伯起义的叙利亚统一主义者（Syrian Unionists）及其合作者的挑战，来自不满“外国人”干预叙利亚事务的叙利亚本土主义者的挑战，来自那些反感外来人的自负并担忧自己被日益崛起的精英边缘化的乌里玛及其商人盟友的挑战，来自那些谢里夫家族及其盟友已经动员起来但是没有赢得他们支持的不属于前三类群体的异质性政治集团的挑战。人民委员会能够清楚地用一种与最后一类群体的需求密切相关的言语表达他们的担忧，使这些叙利亚人不仅没有漠视民族主义的争论，也使他们的政治参与没有随着阿拉伯政府强制力的消失而减弱。人民委员会的发言人从各式各样的唤情符号中汲取灵感，同时通过在一个完整的话语场中重新定位这些符号来对其进行重塑。通过这一进程，这些符号在因数十年危机而居无定所并面临共同体重建任务的人民中产生了新的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给民族主义传说加上大众维度，会产生一种更为棘手的民族主义，在这种民族主义中，叙利亚的“领土”认同挑战了阿拉伯认同、伊斯兰意象美化了“烈士”的传说、法国人对穆斯林妇女的性侵传闻与阿拉伯起义一样，在那些自愿参加梅萨伦战斗的人的脑海中有着同等分量。然而，如果研究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忽视了这些情绪，他们至少可以从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的第一任主席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扎法尔异常的盲目中得到慰藉，因为穆扎法尔也未能理解叙利亚民族主义政治的大众维度。就在一个多月前，大马士革的一群人冲进了叙利亚国民大会，从大马士革堡垒中抢夺武器，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与效忠于政府的士兵交战，然后聚集在巴拉姆基车站，准备前往西部发动反对法国人的“祖国圣战”（al-jihad al-watani），而之前穆扎法尔曾对法国官员说：“如果你们想挑起示威，我们要召集 50 人都很困难。”[70]

注释

［1］ Wuthnow,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3, 13—14, 554—558.

［2］ Bruce Lincoln, *Discour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Myth, Ritual, and Classification*, 24—25. 另见 Wuthnow,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3, 555; Castoriadis,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368—369。

［3］ Wuthnow,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3, 14—15, 554—558.

［4］ 例如，参见 *al-ʿĀsima*, 7 May 1919, 1—2, 5—6; *al-ʿĀsima* 24 (n.d.); MAE L: SL/vol.15/340/92—95, Picot to Pichon, 21 July 1919; MD 7N4182/4/340, Picot to MAE, 21 July 1919; *al-ʿĀsima*, 28 October 1919, 3; *al-Kawkab*, 28 October 1919, 7—8。

［5］ 参见英国陆军首席政治官的分析：FO 371/3054/227658, Clayton to Sir Mark Sykes, 28 November 1917; *al-ʿĀsima*, 16 June1919; *al-Kawkab*, 21 October 1919, 7—8。

［6］ *al-ʿĀsima*, 26 February 1919, 3; *al-ʿĀsima*, 7 May 1919, 5—6; MAE L: SL/vol.6/20—21, Mercier to Picot, 10 December 1918; AD 2372/dossier: propaganda anti-française/219/41/bureau b5/d, 19 December 1918.

［7］ 埃米尔费萨尔在 1919 年 5 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在私人事务中，我们应该尊重名人家庭的人，但是我们不应该给他们需要负责任的职位，除非适合他们且他们的教育和性格使其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 *al-ʿĀsima* (n.d.). *al-ʿĀsima*, 16 June 1919, 3; *al-Kawkab*, 30 September 1919, 7—8.

［8］ *al-Kawkab*, 30 September 1919, 7—8. 在一系列罢工之后，大马士革的电车系统、电力生产和制造业瘫痪，《首都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认为“罢工是工人的权利，正如降低工资和解聘是雇

主的权利一样”。社论以谴责工匠罢工作为结束，因为他们对提高价格和工资的要求“会造成破坏性垄断”。*al-ʻĀsima*，16 June 1919，1—2.

［9］ MD 7N4182/4，Laforcade to Pichon，19 August 1919.

［10］ AD 2343，“Protestation”（in French and Arabic），5（？）February 1919；*al-Kawkab*，27 May 1919，9；*al-ʻĀsima*，11 September 1919，4—6.

［11］ *al-Kawkab*，5 August 1919，6—7. 有趣的是，转载的费萨尔思考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是《这是民主吗？》。

［12］ 关于这些往往寿命很短的组织，参见 AD 2368/10/2，Report to Lt. Wiet on Yusuf Estifan，2 January 1919；AD 2372/no no.；MD 7N4182/4/340，Picot to MAE，21 July 1919；FO 371/4183/136154/346—351，Lutfallah to Lloyd George，16 September 1919。

［13］ 关于“青年”比喻及其含义可比较的例子，参见 George L. Mosse，*Fallen Soldiers：Reshaping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Wars*，54—69；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118—119。埃里·凯杜里在 *Nationalism* 82—83，96 中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点（“民族主义运动是儿童的十字军”）。

［14］ *al-Kināna*，26 June 1920，2；*al-Kawkab*，27 May 1919，9；*al-ʻĀsima*，11 September 1919，4—6；FO 371/5187/500，Extracts from al-Urdunn in “Arabic Press Abstracts for the Week Ending February 9 1920”；al-Ziriklī，Dīwān al-Ziriklī，24—25. 虽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讨论了这个比喻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流行，但是他的论点与本处的使用有所不同。参见 *Imagined Communities*，195—196。

［15］ FO 371/4183/136154/346—351，Lutfallah to Lloyd George，16 September 1919.

［16］ *al-ʻĀsima*，16 October 1919，1—2.

［17］ *al-ʻĀsima*，25 August 1919，1—2. 另见 “Grave of Carnegie” in *al-ʻĀsima*，28 August 1919，6—7。卡内基作为赫伯特·斯宾塞哲学的支持者而闻名，斯宾塞的著作在穆塔纳维尔中影响深远。

［18］ *al-ʻĀsima*，11 September 1919，1—2.

［19］ *al-ʻĀsima*，17 July 1920，5—6. 另见 *al-ʻĀsima*，27 March 1919，4；*al-ʻĀsima*，7 May 1919，1—2。

［20］ *al-ʻĀsima*，5 February 1920，2.

［21］ *al-ʻĀsima*，26 January 1920，1—2.

［22］ 关于此后一段时间内使用的术语 ʻisāmiyyūn，参见 Joseph Vashitz，“Dhawat and ʻIsamiyyun：Two Groups of Arab Community Leaders in Haifa During the British Mandate”。尽管根据瓦希兹（Vashitz）所说，在托管下的巴勒斯坦，这一术语指的是经济成就，但是《祖国高于一切》一文的作者将其与 “mustanīrūn” 替换使用。此外，虽然认为在他的文本中 dhawāt（显贵）与 ʻisāmiyyūn 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但是发表在《地球报》上的文章表明，战后叙利亚的 a’yān/ʻisāmiyyūn 两分法是先前描绘地位革命的风向标。

［23］ *al-Kawkab*，30 September 1919，7—8.

［24］ *al-ʻĀsima*，14 June 1919，1—2.

［25］ 关于胡里的背景，参见 al-Charkas，*al-Dalīl al-musawwar*，1：72—73。

［26］ *al-ʻĀsima*，7 May 1919，5—6.

［27］ 第一届叙利亚文官内阁在 1920 年 5 月 27 日向叙利亚国民大会发表的声明中也附和了这一观点：“由于侯赛因国王及其勇敢的儿子的光辉伟绩，阿拉伯人获得了解放，人民将永远怀着感激之情铭记这些伟绩。因此，他是阿拉伯现代历史的奠基人，阿拉伯国家由此开启了第二个黄金时代。”“我们的历史中也将有几章对他的儿子、叙利亚国王费萨尔一世陛下表示感谢和尊敬。他已着手处理叙利亚问题，并承诺继续为整个国家的解放努力，并将捍卫它到最后。他是叙利亚王国的缔造者，也是拯救叙利亚王国并在自由和复兴的基础上建立这一王国的最主要的负责人。” al-Husri，*Day of Maysalun*，124—126.

［28］ USNA 165/2266-AA-45/58, Yale to War Department, proclamation of Amir Faysal, 3 October 1918; *al-'Āsima*, 7 May 1919, 5—6; FO 3371/5032/81—83, From *al-Ahrām*, 1 February 1920; AD 2346/c1a, Speech delivered by 'Abd al-Rahman al-Kayyali in "Remembrance of Syrian Independence Day."

［29］ *al-'Āsima*, 2 May 1919, 1; *al-Fallāh* 1（May 1919）, 16.

［30］ *al-'Āsima* 24, n.d.; FO 371/4181/89850/24, Clayton to Curzon, 17 June 1919; *al-'Āsima*, 11 March 1920, 3.

［31］ *al-'Āsima*, 11 September 1919, 4—6. *al-'Āsima*, 16 June 1919, 3; MAE L: SL/vol.14/873, Picot to MAE, 24 June 1919; FO 371/5032/81—83, Excerpts from *al-Ahrām*, 1 February 1920; USNA 59/890d.00/8/468, Jack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4 March 1920.

［32］ *al-'Āsima*, 3 May 1920, 2—3. 关于 ra'āyā 一词使用的演化，参见 Ami Ayalon, *Language and Change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Discourse*, 48—50。

［33］ Keith Wrightson, "Eastes, Degrees, and Sort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ociet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44—47.

［34］ Cp. Geoffrey Crossick's analysis of "moral terminology" in Victorian Britain in "From Gentleman to the Residuum: Languages of Social Description in Victorian Britan," 163—164.

［35］ From a speech delivered by Kamil al-Qassab, transcribed in *al-Kināna*, 15 July 1920, 2—3.

［36］ Included in a speech delivered by Felix Faris transcribed in AD 2346/c1a, "Remembrance of Syrian Independence Day." 另见包含在以下文献中的传单和笔录：MAE L: SL/vol.43.62—171, Original copies of "nombreux tractes, affiches, et manifestes ... répandus à profusion à travers la ville（Damas）avant et pendant le séjour des délégués（Américains）," n.d.; AD 2345, 5 March 1920; AD 2372/dossier: propaganda anti-française, 8—9 March 1920。

［37］ 在费萨尔时期，"乌玛"一词可能是最常用的表达"民族"的词语。虽然最初是指穆斯林群体，但是它是一组源自宗教术语但被用作非宗教指称的术语之一，尤其是当其他术语缺乏、不适当或该指称已经很普遍时，正如 20 世纪第二个十年那样。该术语被两个话语共同体同时采用。

［38］ *al-Difā'*, 13 January 1920, 1.

［39］ MD 7N4182/4/340, Picot to MAE, 21 July 1919; MAE L: SL/vol.43/86, 88.

［40］ SL: LW, "Nizām al-lijān al-watraniyya al-far'iyya fī bilād Sūriyya," 17 November 1919.

［41］ *al-'Āsima*, 6 May 1920, 4; Mardam Bek, *Dimashq wal-Quds fī al-'ishrīnāt*, 148.

［42］ *al-Kawkab*, 13 January 1920, 12. 另见 *al-'Āsima*, 11 September 1919, 6; *al-'Āsima*, 16 October 1919, 1—2; *al-'Āsima*, 8 December 1919, 1—2。

［43］ *al-Kināna*, 26 June 1920, 2. *al-Kināna*, 27 January 1920, 5; SL: LW, al-Qassab, "Important Notice,"（in Arabic）, early March 1920; USNA 165/2558—16, Military Attaché（Cairo）to DMI（reprint of speech by al-Qassab from *al-Ahrām*）, 16 March 1920; FO 371/5188/E4515/35, "Arabic Press Abstracts for Week Ending April 26, 1920"; USNA DC RG84/vol.24/674, Shahbandar to US Consul（Damascus）. Arabic transcription of protest delivered by the Higher National Committee, 18 May 1920.

［44］ *al-'Āsima*, 17 November 1919, 1—2.

［45］ *al-'Āsima*, 12 January 1920, 1.

［46］ 例如，参见 FO 371/2770/189602, I.C. E.C.（Switzerland）, 19 September 1916; FO 371/3058/137867, "Internal Conditions," 11 May 1917; FO 371/3400/100453, "Enemy Treatment of Armenians," Clayton to Sec.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19 May 1918; FO 371/4227/77186, Report by Major Davenport（APO Amman）, 22 April 1919; MD 4H112/2a, "Report on Independence Day Celebrations at Aleppo," Lt. Kouadi, 10 March 1920; James Anthony Reilly, "Women in the Economic Life of Late-Ottoman Damascus"; Reilly, "Origi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155—156, 158。

［47］ MAE L：SL/vol.21/44，Roux to MAE，22 January 1920；对 Kamil Daghmush（1989 年 11 月 2 日）和 AbuRibah al-Jaza'iri（1989 年 11 月 15 日）的访谈，这两人都是参加过梅萨伦战役的老兵。1919 年 12 月 11 日《首都报》第三页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两名伊拉克妇女，她们也参了军。不幸的是，这篇文章没有提到她们加入的部队是正规军还是非正规军。

［48］ Jān Alexān，"Zaynab fī Maysalūn." 在叙利亚溃败 40 年后接受访谈时，她还告诉记者："我无法准确描述我的感受。我们都知道侵略军比我们强大，但是我们的信念是坚定的。我们希望能在战场上牺牲，从而复兴祖国。"根据她的回忆，在梅萨伦战役中，有 3 名来自她所在村庄的妇女自愿参战。

［49］ *al-'Āsima*，5 February 1920，5；Lybyer Papers，R.S. 15/13/22，"Statement of the Moslem Women Presented to the Commission at Beirut，July 8，1919." 后一份文件列举了组成"贝鲁特穆斯林妇女协会"的另外两个组织：dār al-sinā'āt al-bayrūtiyya 和 madrasat nādī al-fatayāt。

［50］ *al-'Āsima*，18 December 1919，3—4；*al-Kawkab*，11 November 1919，11；IO L/PS/10/802/12，Gertrude Bell，"Syria in October 1919，" 15 November 1919（particularly pages 12ff.）

［51］ Bayhum，Sūriyya wa Lubnān 1918—1922，167.

［52］ *al-'Āsima*，12 January 1920，1—2.

［53］ *al-Kināna*，15 July 1920，3.

［54］ 署名"mankūb"传单的复印件参见 MAE L：SL/vol.43/62，64，n.d.；MD 7N4182/4/340，Picot to MAE，21 July 1920。

［55］ *al-'Āsima*，7 May 1919，5—6.

［56］ 在里卡比和内马特之间，阿卜杜勒·哈米德·卡尔塔克基（'Abd al-Hamid al-Qaltaqji）担任了几天该项职务。

［57］ *al-'Āsima*，15 December 1919，5.

［58］ *al-Difā'*，13 January 1920，1.

［59］ 参见 AD 2372/dossier：propaganda anti-française，19 December 1918；MD 7N4182/dossier 4/340，Picot to MAE，14 April 1919；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Cousse to HC，17 May 1919（Arabic enclosure）；AD 2329/dossier a-1，Unsigned，untitled leaflet，25 June 1919；MAE L：AH/vol.4/48（undated Arabic leaflets and broadsheets）；MAE L：SL/vol.43，Original leaflets，21 July 1919；FO 371/4185/156060 B.II/6946（M.I.2），DMI to Under Sec. of State，26 November 1919。埃米尔费萨尔也在 1919 年 6 月在大马士革的讲话中采用了这一说法："我（在和会上）发了言，并且要求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独立不应该因她所需的一点点外部帮助而被出卖，叙利亚应该被允许以值得的代价换取帮助。" FO 371/4181/89850/24，Clayton to Curzon，27 June 1919.

［60］ 一位《国防报》主笔人在提到雅各和以扫的故事时暗示说："我不想为了一口小扁豆出卖我的长子权利。" FO 371/4181/89850/24，Clayton to Curzon，27 June 1919.

［61］ AD 2329/a-1，25 June 1919；MAE L：SL/vol.43/63，21 July 1919.

［62］ Furet，*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53—56；Lynn Hunt，*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ition*，38—48.

［63］ Included in a speech delivered by Felix Faris transcribed in AD 2346/c1a，"Remembrance of Syrian Independence Day."

［64］ AD 2372/dossier：propaganda anti-française，"To the Noble Arabs，" 19 December 1918；*al-Difā'*，13 January 1920，1. 另见 al-'Iyāshī，*al-Īdāhāt al-siyāsiyya*，105—106。据报道，第一份引文中的传单是由阿拉伯独立党散发的，其中使用了这一短语，警告那些利用宗派主义分裂国家的人。这表明这些熟悉的短语是如何在重构语境时获得新的意义。

［65］ AD 2346/c1a，"Remembrance of Syrian Idependence Day，" 17—20.

［66］ 例如，参见 USNA 59/890d.00/8/468，Jackson to Sec. of State，4 March 1920；MD/4H114/dossier 4/459，Cousse to Gouraud，27 May 1920；FO 371/5188/E7808/42m，“Arabic Press Abstracts for Week Ending June 14 1920”。例如，根据 1920 年 5 月 29 日的贝鲁特《真理报》，费萨尔在以下段落的讲话中重复了这一口号：“叙利亚民族根据自己的利益宣布独立。这些大国虽然承认了这一独立，但也规定了一些维护其利益的条件。在宣布独立的同时，我们承诺尊重所有国家的利益，以便我们能够与我们作为盟友并肩战斗的各国人民友好地团结在一起。列强已经确定了他们的条件，并说：‘来吧，我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之间不要有任何摩擦。’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受到任何错误的影响。谈判的大门仍然对双方开放，而且我们必须知道，自己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67］ J.B. Allcock，“‘Populism’：A Brief Biography，” 382，386；Kenneth Minogue，“Populism as a Pplitical Movement，” 200；William F. Holmes，“Populism：In Search of Context，” 37—41；Margaret Canovan，“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 544—552；Angus Stewart，“The Social Roots”；Donald MacRae，“Populism as an Ideology”；Carlos M. Vilas，“Latin American Populism：A Structural Approach，” 391.

［68］ Philip S. Khoury，“Syrian Political Culture：A Historical Pespective，” 19.

［69］ Elie Kedourie，“Pan-Arabism and British Policy，” 213.

［70］ AD 2374/dossier：TEO zone oust：adm.，cabinet politique/1193/CP，“Zone est：situation générale，” 15 June 1920.

第三部分

民族主义的仪式

第五章　自上而下的动员和传统的发明

第二部分指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两个主要的民族主义话语共同体，即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穆塔纳维尔和人民委员会及其支持者，并概述了共同体参与者从中获得的个人的和综合的内涵。相互对立的共同体之间为实现它们认为的适合的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和属性而进行竞争，这种竞争既包括对符号和口号的创造和使用，也包括对它们的一些适当的意义的描述，通常是在公共或半公共空间中进行。演说家在对公众并不完全开放的俱乐部和公共游行中发表演讲；演员在剧院和市政广场上表演说教剧目；咖啡馆的顾客在听到其他顾客大声朗读的报纸社论后争论不休；根据一些仪式专家（ritual specialist）关于适合代表社会的理念组织游行，游行队伍穿过蜿蜒的街巷和主干道。[1] 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将研究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群体争论和证明他们理念的一种方式：集体仪式。对集体仪式的分析不仅对于理解相互竞争的政治团体吸引和指导叙利亚民众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理解制造和动员政治公众（political public）的过程也是必要的。

根据人类学家萨莉·法尔克·穆尔（Sally Falk Moore）和芭芭拉·迈尔霍夫（Barbara Myerhoff）的定义，集体仪式是“一个戏剧性的场合，是通常有一个目标的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但它暗指的比它说的要多，并且同时含有许多意义”。[2] 世俗领域中有效的集体仪式与有效的宗教仪式以

同样的方式进行：它将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共同体中一员的参与者与一个值得效仿的秩序相连接，以便“生活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在一系列单一的象征形式的作用下融合在一起，成为同一个世界”。[3] 参加有效仪式的人因此会暂时脱离世俗世界，进入一个只有象征性活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走在街上的人被转换为游行队伍。[4]

仪式通过两种方式使用符号：仪式不仅包含符号，而且仪式整体本身也充当着符号。仪式中包含的符号——仪式参与者携带的旗帜或他们所穿的制服、行进中呼喊的口号和演讲中的口号，以及印在标语牌或横幅上的口号等——可能会用与分析其他文本符号时相同的技巧来解读。然而，对一场仪式的形态所包含的象征手法的分析需要采用其他方法，也就是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的方法。

根据格尔茨的说法，仪式由两种形式的建模组成：它们提供了“（社会）现实的模拟”（model of social reality），需要“对符号结构进行操控，以使它们无限趋近于已经建立的非符号体系”；以及“（社会）现实的模范”（model for social reality），需要“按照符号所表达的关系来操控非符号体系”。[5] 格尔茨的公式使那些研究仪式的人可以摆脱涂尔干功能主义（格尔茨的仪式概念隐含着“社会现实的模型”的观点）单一维度的限制和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格尔茨的概念相对，认为仪式是“社会现实的模范”），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仪式的功能是社会主导群体向从属群体灌输其价值观的手段。[6] 正如格尔茨所理解的那样，仪式的效力和真实性源于它不是单一维度的事实；相反，一个仪式的效力和真实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多意义性的”符号，同时庆祝社会中个人的实然与应然。

尽管大多数仪式同时提供了“现实的模拟”和“现实的模范”，但它们很少能同等地平衡两种建模功能。通常由新政权和革命政权举行的说教仪式（didactic ceremonies）会自然地寻求淡化仪式的“模拟”方面，因为这只会

强化旧政权的社会分化和目标。因此，仪式专家在设计这类政权的仪式时，会反复灌输新政权意识形态的特定筹划，努力强调仪式的“模范”方面，以清除“模拟”方面的所有痕迹。这样的强调并非没有问题：在仪式专家制造仪式以反复灌输用套话堆砌而成的现实“模范”的愿望与仪式过程本身之间存在着矛盾。符号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们的多元性，但新政权和革命政权雇用的仪式专家必须消除这种多元性，以便指导民众遵循一套规定的价值观。因此，在建构仪式的过程中，仪式专家将符号简化为记号（signs）；换言之，每个符号/能指（signifer）都有且只有一个含义/所指（signified）。因此，仪式越接近纯粹的社会“模范”的说教，就越不可能引起民众的共鸣。[7]

阿拉伯政府组织的各种仪式，诸如示威、游行和戏剧创作，因其说教癖（didacticism）和过度的“模范”构成，缺少效用和能量。然而，正如下文将要展现的，这些仪式的形式不是被任意选择的；相反，阿拉伯政府为取得独立所采取的战术方法和嵌入在政府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关系表达模式共同决定了它们的形式。相反，由于人民委员会仪式专家规定的社会“模范”更能真实地反映参与者认为或希望的社会关系，所以人民委员会支持的仪式能够消解其竞争对手组织的游行中包含的更加明显的规范性元素。因此，如果目击者的说法是可信的，它们获得了在费萨尔统治时期的叙利亚举行的其他仪式无法比拟的说服力（cogency）。

自上而下的动员：制造群众

阿拉伯政府在叙利亚民众中植入谢里夫家族合法性原则并灌输穆塔纳

维尔的民族主义价值观的努力面临两难困境。在东部地区建立和维持权威，传播穆塔纳维尔的理念，并向协约国表明叙利亚不仅准备好了站在文明国家之列，而且叙利亚人团结一致渴望获得独立，这种迫切需要使在巴黎和会的谢里夫家族代表迫使阿拉伯政府对叙利亚民众进行有控制的动员。但由于许多先前掌握地方权威的人认为阿拉伯政府是由暴发户和入侵者组成的，因而其在叙利亚城镇中的代表和支持者，以及其在穆塔纳维尔中的盟友无法依靠既有的网络来为他们动员叙利亚民众。此外，与传统的显贵和人民委员会的地方领导不同，阿拉伯政府的成员和代表通常对他们试图控制的社区和村庄不甚了解。结果，他们采取了多种策略来绕过或拉拢他们的竞争对手。这些策略包括之前提到的贿赂麻烦制造者和潜在的竞争对手、资助报纸发行和重组直接连接政府与民众的机构。通过这些举措，阿拉伯政府及其支持者不仅加速了传统权威体系的持续衰落，而且在无意中加速了人民委员会的崛起。

例如，为了增强其对村庄和城市的检查和渗透能力，阿拉伯政府获得了马哈提尔（当地政府官员，makhātīr）的支持，这些官员传统上充当着国家和民众之间的中介。在奥斯曼帝国时期，马哈提尔征收税款、分配政府慷慨的赏赐，并在政府与民众之间传送信息。在阿拉伯政府的领导下，马哈提尔做了上述一切，甚至更多工作：与地方阿拉伯俱乐部并肩工作，他们执行颇有争议的阿拉伯政府的征兵政策，召集居住在他们管辖的街区的居民参加政府主办的示威和庆祝活动，确保在他们所管辖街区和村庄显著张贴政府认可的海报，报告他们所在区域内未经批准的政治活动，并监督商店在法定假日和抗议日关店。[8] 因此，费萨尔统治下的叙利亚的马哈提尔促进了对民众的政治动员，传播和强化了阿拉伯政府的意识形态观点并使那些在奥斯曼时期相对没有受到政府干涉的村庄直接、连续性地置于国家的管辖之下。[9]

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发起的反对法国外长斯蒂芬·毕盛（Stephen Pichon）的抗议运动反映出阿拉伯政府、地方工作人员、政府外组织领导人和马哈提尔之间密切的工作关系。在 1918 年 12 月 29 日巴黎和会召开前夕，毕盛在法国众议院发表的讲话重申了法国在叙利亚的历史利益。这一讲话成为所有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特别是那些与阿拉伯政府有关的人及其在法塔特和阿拉伯俱乐部中的支持者讨论的热门话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开展扩大政府群众基础运动的机会。

反对这一讲话的运动始于费萨尔的大臣、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执行委员会成员纳西卜·巴克里（Nasib Bakri）召集大马士革的马哈提尔举办的一场会议。战争期间，巴克里曾途经浩兰，代表阿拉伯起义军将钱分发给德鲁兹长老。在阿拉伯军队进入大马士革后，巴克里再次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但这次是在阿拉伯政府和政府外的组织之间。凭借这一身份，他从政府的“秘密服务账户”（secret service account）中提取资金，用于各种私密目的。[10] 在与巴克里会面后，大马士革的马哈提尔在他们所在的街区散发了两份请愿书，一份是抗议毕盛的声明，另一份确认选择费萨尔作为民族代表出席巴黎和会。[11] 根据法国的一份报告，是阿拉伯俱乐部的执行委员会起草了这两份请愿书。英国方面还质疑了请愿书的可信度，抱怨不仅马哈提尔是在宪兵的陪同下收集签名的，而且他们还伪造了签名，并在请愿书上盖上当地居民交由他们保管的印章。法国联络官总共收到了 200 份此类请愿书，并转交给了法国政府，而英国联络官搜集到了 350 份请愿书。[12] 这些请愿书的内容太过相似，英国代表只向他在伦敦的上级发送了一份抗议毕盛言论请愿书的副本：

> 我们这些在解放领土上生活的叙利亚人和非叙利亚人居民，抛开所有的种姓和宗教差异，写信抗议法国声称的世俗权利完全没有任何

基础，我们不承认任何国家在祖国范围内的任何古老或当下的权利。基于商业自由的经贸关系不能构成对其居民、自由或民族独立的任何权利。

考虑到每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尤其是可敬的美国总统所宣称的，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解放各国人民和废除损害弱小民族自由的条约，未经我们同意达成的条约，我们是不会承认的。我们的国家加入协约国（Allies）仅是为了争取独立。我们全心全意地抗议令人尊敬的法国外交部长的声明，我们相信协约国将帮助我们捍卫我们的权利，并获得我们的独立。[13]

请愿书中的类似措辞和要求使法国的指控更可信，即它们的来源是相同的。

阿拉伯政府通过调动手工业行会来协助传播请愿书并扩充游行规模，从而扩充了马哈提尔的努力。到 20 世纪初，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行政重振和帝国加速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双重进程，行会的权力和肩负的责任已经大大减少。尽管正如一位当代观察家所抱怨的那样，即大马士革的行会甚至无法保证其成员拥有最低水平的专业能力，但是它们仍然履行着各种支持和福利职能，并且为街区内部和街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网络。[14] 例如，大马士革每种手工艺的大师（arbāb）充当了传播新闻和消息的重要渠道。他们在跨越社区或街区的环线（dawr，复数为 adwār）中往返，每周在不同的行会成员家中举行会议，讨论私人和公共事务。在拜访了环线上的最后一个家庭后，大师们又回到第一个家庭，重新开始这个过程。[15]

阿拉伯政府及其在阿拉伯俱乐部等组织中的盟友试图利用这些现成的网络，将行会用作示威和集会的基石。[16] 例如，各行会在大马士革市政府组织的游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游行是为了在 1919 年 5 月初迎接

埃米尔费萨尔从法国回国。市政府命令行会按照规定的顺序聚集在巴拉达河（Barada River）沿岸，从珠宝商、谷物产品商和皮革商，到起毛工人、旅馆老板、磨坊主、染工、鞋匠、理发师、木匠、浴室老板、蔬菜杂货商、容器制造商、面包师、钳工、鞋匠、甘草商、锡匠、铁匠、屠夫、陶工、织布工、印刷商、糕点师和谷物商，最后分别是阿尔瓦姆集市（Suq al-Arwam）、布祖里亚集市（Suq al-Buzuriyya）和阿塔林集市（Suq al-'Attarin）的商人。政府指示参加游行的每个行会都举着“阿拉伯独立万岁！”的标语，并在下面写上、缝上或贴上行会或职业的名称。当埃米尔从他们的队阵前经过时，行会成员奉命用“埃米尔万岁！”和“阿拉伯完全独立万岁！”的欢呼和口号来迎接他。为了确保他们服从指示，市政府警告称，它将指派警察在战略性的时间间隔里监督游行者的活动。[17]

为了促进对行会的监督，阿拉伯政府监管了现有行会的重组，并授权建立新的行会。[18] 尽管几乎没有关于大多数行会成员对其行会重组和政治化的态度的资料，但有证据表明，一些成员，尤其是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对政府及其盟友的活动缺乏热情。在金—克莱恩观察团访问大马士革时，有 50 多名行会代表出现在观察团的面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证明对国民大会颁布的《大马士革方案》的支持）；观察团还收到了阿勒颇基督徒的请愿书，他们对这些行会的资质提出了质疑。他们抱怨道：“（阿拉伯俱乐部）在官方的帮助下组织了行会，这些行会必须出现在你们面前，并以手工艺者的名义发言。”

只要稍加检查，你就可以证实，这些行会不过是阿拉伯俱乐部为了支持其观点授权成立的小团体。这个俱乐部和这些行会完全由穆斯林组成，尽管许多工艺行业几乎完全是由基督徒和犹太人从事的。[19]

与对行会成员的做法一样，阿拉伯政府动员教师和学童参加游行和仪式活动，早在 1919 年春，学童就经常成为这些活动的组成部分，有时是被单独动员，有时则是混杂在其他群体中间。市民们聚集在一起，庆祝埃米尔或阿拉伯政府的政策。[20] 但是，由于阿拉伯政府和穆塔纳维尔不仅渴望让年轻人参与他们的活动，而且在他们中间灌输各式民族主义，因而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对学童表现出的兴趣超出了仪式的场合。例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政府在卡米里亚学校和师范学校主办大会，让行政人员和教师了解在政府监督下制定的课程，以便他们反过来向其他小学的教师传播这些课程。[21] 在这次会议之后，整个地区的学童被要求记忆和背诵对叙利亚和穆塔纳维尔价值观的赞美诗。例如，

1. 便笺发出的哗啦声，笔发出的吱吱声，
   斩断了枷锁，解除了压迫。
   没有它们，我们就不会取得成功。
   这些才是民族的生命。
2. 我们是贾兹拉（al-Jazira）* 的青年，
   我们是国家的青年。
   从一个已经归来的时代，
   我们继承了古老的荣耀。
3. 你，叙利亚，我的国家，
   你是辉煌的象征。
   有一天，所有人都会走近你，
   其中那些贪婪的人，将会被杀死。

---

* 贾兹拉地区位于叙利亚东北部的哈塞克省。——译者注

4. 我们是敢于在死亡阵痛中挣扎和寻求冒险的人，
除了荣耀与死亡，我们别无选择。[22]

私立学校和政府外的政治协会也鼓励进行“爱国教育”。1919 年 10 月，格特鲁德·贝尔访问了烈士女儿学校（madrasat banāt al-shuhadā），这所学校建在大马士革，受到慈善捐款的资助。这所学校的学生中包括在阿拉伯起义中牺牲的阿拉伯军人的遗孤（女儿），以及来自“优越的大马士革家族”的 16 岁至 18 岁的女孩。在其报告中，贝尔描述了她出席的一场仪式：

女孩和孩童们被带到房子周围的大花园中唱爱国歌曲。在其中的一首歌里，年长的姑娘们齐声向孤儿们诉说，提醒她们每个人，她们的父亲是为自由的事业牺牲的，并告诫她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阿拉伯人的女儿”（bint al-‘Arabi），同时，孩童们回答，她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出身或为种族而斗争的侯赛因国王，（这一诗节是专门为美国观察团准备的）也不会忘记宣布自由原则的威尔逊总统。[23]

由于阿拉伯俱乐部的公共使命是将叙利亚提升到“文明”国家的行列，并在民众之中灌输民族主义价值观，所以俱乐部的地方分会还在整个东部占领区及其他地区支持爱国主义教育。一位在耶路撒冷的英国代理人抱怨，当地的阿拉伯俱乐部和文学社“向孩子们传授泛阿拉伯的理想，尤其是拉什迪亚（Rashidiyya）和拉乌达特·马阿里夫学校”；每周四，也就是一周休学之后，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俱乐部“鼓励”学生们在城市巡游，歌颂谢里夫家族：

伟大的真主，所有阿拉伯人的骄傲

你的权柄是荣耀的权柄，
是你祖先的权柄，是先知的权柄。[24]

有一所学校特别成为民族主义组织的温床。安巴尔学校（Maktab Anbar，1918 年冬天更名为塔吉希兹［tajhīz］，是一所预科学校）是奥斯曼帝国晚期大马士革唯一的公立中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学校每年教育（并经常安置）多达 600 名学生。这些学生来自偏远的城镇和村庄，此外由于学校与哈米底亚集市的富商之间关系特别密切，因此也会经常招收他们的孩子。由于学校教员组织的游行活动主要由学生组成，从学校的所在地开始，穿过山坡，通常在埃米尔的宫殿结束游行。据一位参与者说，在游行的路上，“城市中的群众”加入游行队伍，高呼在学校中编写和练习的口号。[25]

随着“撤离危机”前后东部占领区和沿海地区边界紧张局势的升级，塔吉希兹学校的师生和其他许多大马士革人一样，通过为战争作准备来应对城市日益军事化的气氛。例如，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穆巴拉克（Shaykh ‘Abd al-Qadir al-Mubarak）是塔吉希兹学校和军事学院（al-madrasa al-harbiyya）的一名阿拉伯语讲师，他帮助学生从塔吉希兹学校转移到军事学院。一位观察家回忆说，到 1920 年春天，教师和学生们已经将塔吉希兹学校“变成了军营”，武器被分发给学生，学生们在日常训练中使用这些武器。在这一时期就读于该校的贾米勒·萨利巴（Jamil Saliba）后来回忆说：“（我们学生）睡觉时把我们的步枪放在床边。”从学校召集的一队学生随后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梅萨伦战役。[26]

穆塔纳维尔并不是费萨尔统治时期的叙利亚唯一认识到教育活动可能与组织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存在联系的群体。许多乌里玛，特别是那些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乌里玛，也将两者连接起来。因此，即使是那些敌视政

府政策和穆塔纳维尔理念的民族主义组织也纷纷进行效仿，与政府和阿拉伯俱乐部展开竞争，以招募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人民委员会不仅从学童那里收集捐款，还从年龄较大的学生中招募志愿者，参加当地民兵组织的训练。在大马士革，教授《古兰经》学院的教员，尤其是位于贾米·坦齐兹（Jami 'Tankiz）和伍麦叶清真寺（Umayyad Mosque）的教员，带领他们的学生参加由高级人民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发起的游行活动。和塔吉希兹学校的学生一样，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也是从周边村庄来到首都的。[27]

尽管短命和财政拮据的阿拉伯政府和各式民族主义协会试图利用学校向年轻人灌输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效果仍停留在猜想阶段，但是一本回忆录的作者留下了他作为一名学童被动员参加政府组织的游行经历的记录。刚刚被加冕为叙利亚国王的埃米尔费萨尔访问了该市并接受了其居民的致敬，当时里达·萨菲（Rida Safi）正在霍姆斯的侯赛尼耶·苏丹尼耶（Madrasa al-Husayniyya al-Sultaniyya）学校。全市所有学校的学生在老师的监督下，站在游行行进路线的道路两旁。不出意外，给年轻的萨菲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该事件的政治意义，而是埃米尔行列队伍的隆重排场、国王令人失望的平淡无奇的外表，以及如果学生错举了发给自己的微型阿拉伯国旗所受到的惩罚：

> 每个学生都有责任垂直举起并挥舞自己手中的旗子，如果他在这方面有所松懈，作为惩罚，他手中的旗子将被夺走，因为这种无礼的行为配不上阿拉伯的旗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因这一惩罚而留下的那些眼泪，这一旗帜的正义性或者“他值得被信任，并将使他亲爱的旗帜永远飘扬”的承诺都变得毫无价值了。[28]

也许政府传播消息和动员民众最简单、最廉价的方式就是借助新闻界。

同情政府或受政府控制的报纸刊登了公共仪式的公告、参与者须知、应遵循的游行路线、发表过的演讲稿、支持游行者要求的请愿书、赞扬爱国主义事业的诗句或应当庆祝的节日。对于特别重要的时机，如 1919 年春费萨尔从巴黎和会返回大马士革、金—克莱恩观察团抵达大马士革、叙利亚国民大会重新召开、宣布叙利亚独立、费萨尔被加冕为叙利亚国王等，报刊的宣传活动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尽管叙利亚的识字率很低，尤其是在农村地区，[29] 每份报纸的发行量也并不大，但是报纸在动员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发表与其所奉行的政策相符的民族主义和其他主题的评论，以及在官方编年史中刊印自己的事件版本，《首都报》、阿拉伯政府和为该报撰稿的穆塔纳维尔显然希望影响和指导那些受过教育的叙利亚人的活动，因为动员民众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都依赖于这些人。由于所有收入超过 1 000 库升的政府职员都必须要订阅《首都报》，阿拉伯政府实际上获得了一个被俘虏的受众群体。此外，由于禁止其他报纸在《首都报》之前对地方新闻进行报道，阿拉伯政府得以在其对手之前对事件进行自己的“杜撰”。[30]

然而，报纸的影响不仅限于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报纸不仅在咖啡馆等非正式场所被传阅和朗读，而且令驻大马士革的法国外交官非常恼火的是，街角的小贩们叫嚷着最新一期报纸的头条新闻，尤其是那些格外具有挑衅性或丑闻性的标题，比如那些报道法国士兵暴行的标题。法国政府对这种做法感到恼火，于是向阿拉伯政府提出正式投诉，要求其采取措施制止该做法。收到投诉后，阿拉伯政府威胁要逮捕叫卖报纸的小贩。[31] 有时，报纸甚至充当了标语牌，将标语（有时是英文或法文）印在单页或对开页一侧的横幅标题上，作为大报被张贴或作为游行活动的标语牌被高举起来。

虽然并非所有的报纸出版商和编辑部都是代表阿拉伯政府进行宣传活动的，但参与的人也不总是出于个人信念或对谢里夫家族的忠诚。政府通

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来争取记者的支持。阿拉伯政府通过金钱诱惑，让出版商和编辑们刊印对政府有利的文章和社论。阿拉伯政府的财务顾问赛义德·舒贾伊尔的记录中包含为此目的拨款的清单，包括从埃米尔的秘密服务账户中向报纸所有者发放的480埃及镑；分别在1919年1月、5月和6月为同一目的支付的450埃及镑、400埃及镑和415埃及镑的“非常规或超常规支出”；向《穆克塔巴斯报》（*al-Muqtabs*）编辑穆罕默德·库尔德·阿里支付200埃及镑，以及从特别“捐款”基金中向另一家报纸的负责人支付的85埃及镑。其他资料显示，阿拉伯政府向《新叙利亚报》（*Siriyya al-jadida*）的所有者哈比卜·卡哈拉支付了200埃及镑，向《阿拉伯独立报》（*Istiqlāl al-‘Arab*）的所有者鲁什迪·萨利赫（Rushdi al-Salih）和马鲁夫·阿勒纳乌特支付了150埃及镑。在费萨尔离开欧洲前夕支付给萨利赫和阿勒纳乌特的费用，用于包销在大马士革卡纳瓦特街区、梅丹区、萨利希耶区、阿马拉区（‘Amara）和图马门区（Bab Tuma）分发的500份免费报纸，以及在其他地区低于成本价出售的报纸。[32]

在某种程度上，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叙利亚报纸出版经济加强了政府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大马士革的报纸平均发行量为1 500份，其中大约300—400份是售出的，其余的则被免费分发。[33] 如果没有外来补贴，仅印刷就会使报纸的出版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根据内政部在1920年6月向报社开出的价格，控制新闻用纸分配及邮政和电报价格的阿拉伯政府仅凭25埃及镑和一堆新闻用纸就可以购买到影响力。这也就难怪在《新叙利亚报》《基纳纳报》和《阿拉伯语言报》（*Lisān al-‘Arab*）的所有者拒绝政府补贴的提议后，阿拉伯政府中的法国代表预言，审查制度和纸张短缺将很快削弱他们的决心。[34]

收买记者和报纸只需要极低的价格，这使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被收买，外国代表和各种政治协会（例如负责监督两份报纸出版的阿勒颇阿拉伯俱

乐部）都加入阿拉伯政府购买影响力的活动。法国人不仅想反击民族主义和凯末尔主义的宣传，还想制造虚假的经济数据，将沿海地区的繁荣与东部占领区的窘况进行对比，他们特别积极，至少向 9 家报纸提供了资助。因此，像穆罕默德·库尔德·阿里和哈比卜·卡哈拉这样有进取心的记者能够用法国给的报酬来补充他们从阿拉伯政府获得的支持。而在短暂地追求经济独立后，同样有进取心的《阿拉伯语言报》的易卜拉欣·黑勒米（Ibrahim Hilmi）将他的报纸版面同时提供给法国和英国代表，仅换取不多的 100 埃及镑。[35]

此外，除了提供作为胡萝卜的金钱之外，阿拉伯政府也追随协约国的脚步，挥舞起审查的大棒。协约国对东部占领区出版的报纸的审查一直持续到 1919 年 10 月。新闻条例中包含一系列许可和禁止的主题。例如，一方面，允许报纸发表的文章呼吁国际联盟直接或强制干预叙利亚事务，它们也可以主张建立一个瑞士模式的阿拉伯联盟，只要其中包括在某种托管安排内建立这种联盟的建议。另一方面，报纸不得对任何协约国发表贬损性言论，也不允许在没有将文章提交出版前审查的情况下刊登呼吁“完全独立”或包含“泛阿拉伯”“泛伊斯兰情绪”的文章。[36]

阿拉伯政府继续执行由协约国创立的直接审查政策。在出版前，报纸的所有者必须向政府交纳 100 埃及镑的准备金，以支付未来因违反审查规则而可能招致的任何罚款。政府还警告报纸所有者，将追究他们任何违规行为的个人责任。关于谢里夫侯赛因和他的孩子们、阿拉伯政府、协约国及其代表、犹太复国主义及其他类似话题的贬毁言论是被禁止的，同样被禁止的还有最初由法国哈瓦斯通讯社或《时报》（*Le Temps*）刊登的故事。[37]

尽管阿拉伯政府在实施这些规定时反复无常，但确实对出版行业产生了寒蝉效应。例如，1919 年 2 月，政府暂停了《新叙利亚报》的发行，并将其所有者告上了军事法庭，原因是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总会看到的》

（Things Seen）的文章，据称这篇文章故意“诋毁了爱国感情”。政府在不同时期对《国防报》《阿拉伯语言报》和《军区报》（*al-Urdunn*）采取了类似措施。[38] 因此，反对派报纸很可能采用独特的风格，使用讽刺来掩饰批评（例如在《国防报》的文章中，“埃米尔是否会同意法国对叙利亚的托管？有可能吗？”），以及用演讲的“笔录”代替社论，以为类似的诽谤指控辩护。

公共节日

阿拉伯政府同阿拉伯俱乐部等与其联盟的政治协会合作举行公共仪式，主要是通过动员以下网络，诸如上文提到的治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行会、学校和新闻界，以及军队成员。通过颂扬各类明确指定的英雄（烈士、埃米尔费萨尔、阿拉伯军队的士兵等）、庆祝周年纪念日（例如标志着阿拉伯起义发动的日子、大马士革“解放日”和烈士蒙难的日子）和事件（1919年5月和1920年1月费萨尔从欧洲回国），阿拉伯政府试图制定适合的民族叙事，确保社会和政治共同体的特定秩序，证实其合法性，并灌输与民族主义相关的价值观。简而言之，阿拉伯政府通过设计属于它的仪式，来标记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时代的开始。

毫无疑问，谢里夫家族及其盟友懂得象征性行动对于提升声望和确保合法性的重要性。仅在他们出现在这座城市的头四天，谢里夫家族与贾扎伊里兄弟就在以下问题上产生了争执：是阿拉伯起义的旗帜还是谢里夫侯赛因曾经赠送给阿卜杜勒·卡迪尔·贾扎伊里的旗帜应该在城市上空升起；释放数千名被土耳其人关押的囚犯（在此过程中，英国观察员巧妙地将其

称为“安全问题”）；派代表前往贝鲁特监督阿拉伯国旗在城市上空由一位烈士的姐妹升起；移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于 1898 年在萨拉丁墓中安放的铜花环；举行了两次入城仪式。第一次入城仪式于 1918 年 10 月 1 日由谢里夫纳斯尔、努里·赛义德及其他“名人”领队，穿过“密集的人群”，从梅丹骑马到皇宫，据报道，谢里夫们获得了“鲜花、带香味的礼物和各种表达爱意的方式”。两天后，埃米尔费萨尔亲自率领队伍，再次举行了进入首都的入城仪式。据一位英国观察家的报道，埃米尔拒绝了提供给他的汽车，“带有强烈历史顺应感”地选择了骑马，率领着由 1 200 名至 1 500 名支持者组成的随行队伍。这位英国观察家补充说：“毫无疑问，他的到来给城里的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远比大马力汽车驶过和由无数军队有序地行进要生动得多。”[39]

除了 1918 年 10 月（尝试性地）和 1920 年 5 月（更为自信地）举行的全国纪念烈士的活动外，阿拉伯政府还指定了三个庆祝的国家节日：4 月 27 日是阿拉伯起义发动的周年纪念日（‘īd al-thawra）；9 月 30 日是阿拉伯军队进入大马士革和“解放”叙利亚的周年纪念日（‘īd al-fath）；3 月 8 日是庆祝宣布叙利亚独立和费萨尔加冕为叙利亚国王的周年纪念日（‘īd al-istiqlāl）。因为纪念的是在阿拉伯政府成立之前发生的事件，前两个节日与最后一个不同：第三个节日是由需要纪念的事件强加的，而阿拉伯起义纪念日和叙利亚解放日是有意发明传统的政府有意识选择的周年纪念日。正如预料的那样，那些对谢里夫神话没有贡献的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奥斯曼军队从大马士革撤出、耶路撒冷的解放（由英国军队）、阿拉伯国旗首次在城市上空升起（由贾扎伊里兄弟）——既没有被单独挑选出来进行纪念，也没有在媒体上被提及。[40]

有趣的是，无论是否是计划中的，起义节和解放节的日期序列被纪念烈士的日子所分割，粗略地描绘了一个用来重申权威的民族叙事和节日象

征重要性的情节结构。纪念季从纪念 4 月的阿拉伯起义的开端（最初的冲突）开始，到 5 月烈士的激情（临时的逆转），并以 9 月大马士革的解放作为结束（最终胜利）。仪式重新建构了一场持续两年半的戏剧，并将其压缩在 5 个月中。[41] 因此，只有 1920 年 7 月阿拉伯政府的突然解散，才阻止了沙里夫传奇通过每年的节日周期的重复进一步加强。

在大马士革举行的解放节庆典包括两个部分。首先，由军乐队、阿拉伯军的骑兵部队和非骑兵部队、消防车、警察和宪兵，以及来自军校、职业学校和小学的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接受站在检阅台上代表其再次踏上欧洲旅途的哥哥的埃米尔扎伊德的检阅。[42] 和扎伊德一起进行阅兵的有军事长官、战争委员会主席、“政府和皇室的重要成员、士兵、协约国的代表、显贵和民族的伟人们”。[43] 一座代表“烈士精神”的雕像矗立在检阅台的一侧，无声地提醒人们阿拉伯起义、阿拉伯政府和“叙利亚之子”的牺牲之间的联系。正如《首都报》报道的那样，

> 阿拉伯军队的步兵、骑兵和炮兵部队的经过和继续演奏的音乐震撼人心，成千上万的人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学生们激动地颤抖着，阿拉伯国旗在他们头顶飘扬，微风吹散了他们歌唱的爱国歌曲的回声。

游行从早上 10 点开始，45 分钟后游行结束，人群散去。21 响礼炮的响起，标志着庆祝活动简短的公开阶段的结束。[44]

庆祝活动的第二部分在当天晚上举行，埃米尔在皇宫的住所举行了私人招待会。被邀请者包括政府官员、叙利国民大会代表、阿拉伯起义领袖和“杰出人士”（‘ilyat al-qawm）。“一张漂亮的桌子摆在他们面前，上面装饰着鲜花，客人喝着茶，吃着甜点和水果，愉快地交谈着。”为了提醒那些既非政治领袖也非“杰出人物”的人记住这一个特殊的时刻，阿拉伯政府

下令关闭政府办公室，在政府建筑物上挂上一串串电灯，并在全城悬挂阿拉伯国旗。[45]

虽然是在叙利亚独立的象征性庆祝活动之后举行的，7个月后在大马士革举行的纪念起义节的庆祝活动的形式与解放节的活动大致相同。正如在解放节期间发生的那样，阿拉伯政府下令暂停公务，政府办公室夜间亮起灯光，并在整个首都展示阿拉伯国旗和与国旗相似的四色旗。与之前的庆祝活动一样，这次活动也包括两个部分：以军事检阅作为开始的公开仪式，以及在埃米尔官邸举行的由叙利亚知名人士和外国客人参加的私人招待会。[46] 起义节庆祝活动和解放节庆祝活动的唯一不同是，在前一个节日中，公共场景在晚上重新开始。根据《首都报》的说法，在这个黄昏的场景中，阿拉伯政府再次在费萨尔官邸的阳台下聚集了主要由士兵和学童组成的群体。首先，当时作为费萨尔侍从的法赫里·巴鲁迪（Fakhri al-Barudi）祝贺国王，阿拉伯起义的第四个年头已经过去，又缅怀烈士，并祝愿国家“在殿下的庇护下”获得幸福。在另外三个简短的讲话重申了类似主题之后，费萨尔本人“（向群众）赠与了珍贵的（智慧之）珍珠，表达了对民族幸福的祝愿，以及对现在和将来的祝福”。在对费萨尔表示祝贺后，人群便散去了。[47]

这些庆祝活动的两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首先，公开仪式过程使用了各种方法来宣称谢里夫家族的先进性和合法性：检阅从埃米尔官邸下经过的游行队伍；费萨尔或其代理人在挑选被邀请到埃米尔家和“私人阳台”（《首都报》煞费苦心地告知读者）的杰出公民；费萨尔与阿拉伯起义和烈士激情之间的联系；群众表演出的奉承和头等公民献出的贡品；以及向国民献上的祝福。[48] 其次，庆祝活动分为公开仪式过程和私人仪式过程，而且报纸报道明确了后者的特权性以及群众的短暂参与和扮演的被动角色，以具体形式描绘了穆塔纳维尔话语中所支持的将国民分为两个不平等的部

分的主张。

庆祝叙利亚独立的活动与其他公共活动大相径庭，其背后原因有两个。首先，费萨尔对宣布叙利亚独立的反应是矛盾的；无论他的公开表现如何，宣言都迫使埃米尔在激怒协约国还是人民委员会及其选民之间做出选择。其次，是人民委员会和叙利亚国民大会，而不是阿拉伯政府，发起并主导了导致宣言产生的运动。因此，尽管标志着叙利亚独立的庆祝活动包含了上述庆祝活动中的许多象征性元素，但这次活动改变了这些象征元素的含义，迫使谢里夫们对更为普遍的民意进行响应。

1920 年 3 月上旬，埃米尔费萨尔“认为（叙利亚国民）大会将成为国内存在的巨大热情和冲动的发泄口”，因而重新召集起这一代议机构。[49] 3 月 6 日，埃米尔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国民大会确定未来叙利亚的国家形式并起草宪法。虽然声称叙利亚因阿拉伯起义和威尔逊原则而独立，但当时埃米尔并没有要求国民大会宣布国家独立，实际上对于向协约国妥协持开放的态度。[50] 然而，大会的后续行动与卡米勒·卡萨布在大会中提出的建议相一致，后来人民委员会以《国民对叙利亚国民大会表达其渴望》为题，将其建议转载、分发并张贴在大马士革街头。卡萨布的讲话总结道：“让（大会）忠于国民渴望的每一个字眼，并让它了解到，在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以民族的名义移交权力是不可原谅的错误。”1920 年 3 月 7 日，叙利亚国民大会投票支持叙利亚在其天然边界内独立，由费萨尔担任立宪君主。

大马士革人庆祝独立日的方式是根据卡萨布的要求，即国民（由国民大会和民事机构所代表）优先于统治机构。[51] 3 月 8 日上午 10 点，叙利亚国民大会召开会议，选出一个大会代表团向埃米尔提交决定。3 个小时后，由大会主席哈希姆·阿塔西（Hashim al-Atasi）率领的代表团来到埃米尔的官邸，邀请埃米尔一同前往烈士广场。[52] 此时，在市政府、人民委

员会、阿拉伯俱乐部和“国民代表们”的动员下，人群已经开始聚集在广场迎接埃米尔。仪式前一天在首都各处张贴的海报证明了市政府依靠行会和学校来扩充人群规模的事实。[53]

护送埃米尔从官邸到广场的队伍似乎是精心策划过的。埃米尔的座驾跟随在叙利亚国民大会代表、内阁部长和大会主席之后，费萨尔和扎伊德身穿军装，并被阿拉伯军队非骑兵部队的将领包围着。皇家卫队的成员在埃米尔的马车后骑马行进。阿勒颇市政府主席伊赫桑·贾比里在最后，率领一支由军官、显贵、枪骑兵和随从组成的队伍。从皇宫到萨利希耶桥（Salihiyya Bridge），队伍在两排列兵之间穿行。在桥上，学童的队列一直延伸到市政大楼，在游行路径的边际站成方阵。[54]

下午 3 点时，时任叙利亚国民大会书记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来到市政大楼的阳台上，宗教领袖、部落首领以及法国、意大利、美国、西班牙和波斯的领事已经在那里等候。他宣读了结束东部占领区军事统治的公告、独立宣言，以及授权费萨尔担任叙利亚国王的国民大会决议。在鸣响 101 响礼炮和费萨尔发表“保证他对国家利益的忠诚”的讲话后，伊拉克国民大会书记宣读了该机构授权费萨尔的兄弟阿卜杜拉（‘Abdallah）为伊拉克国王的决定。这份文件被仪式性地交给了费萨尔，仿佛进一步证实了叙利亚在其天然边界内与其东部邻国的分离。

在费萨尔观看完阅兵式后，该部分的庆祝活动就结束了。阅兵结束后，费萨尔和一些宗教领袖进入市政大楼的一个房间，参加了一场广为人知的效忠仪式。[55] 与费萨尔第一次从欧洲旅行归国时显贵、部落首领及其他人向他承诺的效忠不同，费萨尔和以民族名义行事的宗教领袖之间的契约（sakk）是具有互惠性的。[56] 契约文件开头这样写道：“当叙利亚民族选择将国王陛下之子埃米尔费萨尔殿下加冕为叙利亚天然边界内的国王，”

我们在首都大马士革的市政大楼度过了一天，亲身或通过代理来履行宣誓效忠的责任。这一行动是根据1918年10月6日星期一第一次会见殿下时规定的七项约束条件所采取的。这些约束条件是：服从真主；尊重（所有）宗教；协商规则与法律和法规执行的规则相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立秩序；传播知识；将工作和职位分配给那些最具资格的人。

殿下逐一接受了这些条件，我们承认他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保证对陛下的服从和奉献，并尽可能地支持他的政府。我们将这份带有我们签名和印章的文件交给殿下，并谦卑地请求国王陛下为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进步，在他的一生中按照文件所记载的内容行事。[57]

与庆祝起义节举行的类似仪式的顺序相反，仪式结束后费萨尔再次出现在市政大楼的阳台上，在那里，他再一次观看了阅兵仪式，并接受了各部长、国民大会代表和宗教领袖的美好祝愿（tabrikat）。[58]与先前的游行顺序相反，费萨尔之后返回他的官邸。这位新加冕的国王放弃乘坐马车，而是选择骑马，走在游行队伍的头上。接着是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大会主席，他们乘坐的是一辆由皇家卫队护卫着的马车。

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在此期间，阿拉伯政府宣布对所有在15天内自首的阿拉伯军队逃兵实施全面大赦，对大多数囚犯实施部分大赦（除了那些因“可耻或可恶罪行”而被监禁的人）。市政府下令在全市范围内悬挂旗帜，露天市场营业至午夜，公共和私人建筑及商店保持灯亮至午夜。晚上，部队的分遣队举着火把在城里巡逻。[59]费萨尔加冕的第二天，叙利亚国民大会宣布3月8日为独立日。[60]

不仅在大马士革，整个东部地区的城市都在庆祝独立日。由于大马士革的仪式专家通过电报下达指令，要求举办庆祝活动并规定了它们的形式，

因此，所有这些庆祝活动包含着共同的元素：每项活动持续三天；当地驻军、行会和学校为游行提供人力；外围城市代表团前往大马士革，为国王送上礼物；当地市政当局实施了与大马士革类似的假期规定；地方长官宣读了叙利亚国民大会的宣言，并为当地显贵举办招待会。在阿勒颇，大约有1 000名志愿者与正规部队一起游行，政府当局分发的传单中有要求高喊的口号，包括“除了他自己，穆斯林是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兄弟”，“在摩西、基督和穆罕默德面前阿拉伯人就是阿拉伯人”，“独立和费萨尔是叙利亚的两大财富”，当然还有“宗教属于真主，国家属于全体”的另类版本（在这个案例中是“宗教属于真主的，祖国属于他的孩子们”）。[61]

表面上看，在大马士革举行的纪念独立日的庆祝活动类似于纪念起义节和解放节的庆祝活动。这三个庆祝活动都包括阅兵仪式、举行闭门仪式，以及保留给重要人物的特殊角色，这补偿了保留给大众的非参与性或有限的角色。然而，在首都举行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为这些共同属性赋予了新的意义。通过对它们的结构和象征符号的使用，独立日庆祝活动将积极的“国民”和被动的埃米尔/国王进行了对照。这个主题在三个独立的戏剧场景中展现得尤为明显。首先，一支游行队伍护送费萨尔离开他的官邸，并将他带到民众面前的一座公共建筑中，他同意遵守国民大会的决定和民族精神领袖们提出的契约。其次，埃米尔在国民大会代表们的后面乘坐马车，参加加冕典礼；市政大楼的仪式结束后，他反而得到了国民的祝福。正如我们在下一章所要看到的，独立日仪式中所包含的许多象征意义与人民委员会组织的游行活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在大马士革举行的纪念独立日的仪式并没有强调谢里夫家族的权力，而是反映了以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与正在兴起的街头政治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特别是以人民委员会为代表的街头政治。

剧　院

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仪式的规模之大就像下一章将要讨论的许多游行一样，动员了动辄数万甚至数百万叙利亚人参加，并将举行仪式的整个城市变成了纪念活动的场地。但是阿拉伯政府及其阿拉伯俱乐部和文学协会盟友也设计了一种相当亲密的仪式，以至于它们的表演可以在咖啡馆、剧场或电影院中进行。和那些更为宏伟的剧目一样，戏剧作品，如话剧、诗歌朗诵、戏剧朗诵、改进后的卡拉库兹（karakuz）皮影戏甚至电影，它们单独或与其他仪式一起打造，[62] 实现了穆塔纳维尔的重要职能：灌输民族主义价值观。为此，阿拉伯政府和东部占领区内外的地方政府与其政府外的盟友一道鼓励并支持戏剧表演。他们通过多种方式支持戏剧表演，包括组建剧团和建造剧院（例如拉姆安拉地方政府建造的市政剧院），以及至少在阿勒颇建立了一所名为戏剧学院（al-Masrah al-madrasī）的表演学校。阿拉伯政府对戏剧表演的价值极其感兴趣，甚至连大马士革战争学院都自称开设了戏剧课程。1919 年春天，学员们甚至还创作了一部名为《安达卢斯的阿卜杜勒·拉赫曼或第二倭玛亚王朝》（*'Abd al-Rahman or the Second Umayyad Dynasty in al-Andalus*）的戏剧，并邀请观众观看。[63]

虽然阿拉伯政府是戏剧的热心支持者，但大多数创作都是由阿拉伯俱乐部和文学协会赞助的。文学协会是一战后戏剧的政治用途的坚定拥护者。根据其章程，文学协会的成立是“为了阿拉伯民族的利益，为了复兴阿拉伯民族的荣耀，传播它的历史和高贵的传统，教授它的子孙真正的知识，以训练他们的头脑，使他们联合，建立有利于文学、知识、艺术、社会、农业、文化、贸易、经济、卫生和道德的公益事业和项目，这将给阿拉伯民族带来巨大的利益和收益”。为此，协会成员将民族主义主题融入旧

剧本，并委托他人撰写新剧本。[64]

《地球报》经常报道阿拉伯俱乐部和文学协会的分支机构制作的戏剧，其中一篇文章详细概述了民族从这种戏剧表演中获得的好处。据该报称，虽然描述伊斯兰历史事件的剧本业已存在，但是它们是不够的，“需要”一种新的表述方式，以适应在国家和人民之间传播的民族精神。文章还说，剧作家应该写一些有“叙利亚特征”（Syrian shape）的剧本。这些剧本将描绘叙利亚的历史和叙利亚的英雄，对当代事务进行批判，并“提醒我们习俗和行为上的缺点，以便人们能够净化道德和改善处境”。这篇文章总结说，只有在这样的戏剧被创作和表演后，“这些英雄的后代才能追求他们父辈的理念”。[65]

舞台剧——即使是那些作为政治宣传的剧目——对于后奥斯曼时期的叙利亚来说也并不新鲜。戏剧在19世纪中后期大叙利亚产生的阿拉伯文化复兴（nahda）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的剧作家和演员，如法拉·安通（Farah Antun，他将《俄狄浦斯王》译成阿拉伯语）和哈利勒·穆特兰（Khalil Matran）翻译并制作了索福克勒斯、莫里哀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将其作为阿拉伯主义工程的一部分，以创造一种新的植根于高雅文化和阿拉伯语文学的阿拉伯身份。一些演员，例如专门表演莫里哀作品的广受欢迎的乌斯曼·贾拉勒（‘Uthman Jalal）在受过教育的观众中培养了忠实的追随者。在费萨尔时期激增的政治/文化协会和表演团体通过持续地制作“新古典主义”作品（通常在阿拉伯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力图在阿拉伯主义的外衣下扩大上流社会文化的影响范围，并且凭借这些作品获得了国际声誉。例如，在大马士革举行的独立日庆祝活动包括两次上演由著名演员萨拉马·汉志尼（Salama Hijazi）制作的新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报道称，它们受到了极大的欢迎。[66]

然而，新古典主义和“普通戏剧”（plain drama）只吸引了极少数叙利

亚人。[67] 因此，在奥斯曼帝国晚期，诸如阿布·哈利勒·卡巴尼（Abu Khalil al-Qabbani）这样的剧作家和制作人开始尝试新的主题和流行戏剧形式，并上演了融合音乐、戏剧和舞蹈或描绘历史主题的戏剧。在世纪之交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演团体受到卡巴尼的启发，在黎凡特地区进行巡回表演。[68] 在萨拉马·汉志尼和导演乔治·阿比亚德（George Abyad）的引领下，一系列历史剧上演了，如《萨拉丁和耶路撒冷王》（*Salah al-Din and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和《哈基姆·比阿穆尔·阿拉》（*al-Hākim bi-'Amr Allah*）。[69] 生于叙利亚、在巴黎接受训练的阿比亚德的演出受到广泛的欢迎，他获得了来自阿拉伯俱乐部的赞助，在事实上变成了阿拉伯政府的宫廷演员。[70]

剧作家和政治煽动家马鲁夫·阿勒纳乌特在费萨尔时期的活动在上文有所提及，他也写了一系列带有政治和历史信息的剧本，包括《阿姆鲁·本·阿斯》（*'Amr ibn al-'Āṣ*）、《的黎波里战争》（*al-Harb fī Tarāblus*）、《欧麦尔·本·赫塔卜》（*'Umar b. al-Khattāb*，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燃烧的埃迪尔内》（*Adirna fī al-nār*）。《燃烧的埃迪尔内》又名《回到埃迪尔内》（*Return to Edirne*），尽管其文本已经失传，但是其副标题传达了它的内容："一场悲剧，包括引言和四幕，再现了3月26日埃迪尔内的陷落、第三次巴尔干战争期间的灾难，以及在英雄安瓦尔·贝克（Anwar Bek）领导下埃迪内尔的光复。"阿勒纳乌特也因发明了一种对叙利亚舞台来说很新鲜的戏剧技巧而备受推崇，在他的戏剧表演之前或之后，一名扮演算命者或其他预言家角色的演员，会转向观众并直接对他们讲话，以预测未来的形式作出政治评论。[71]

阿拉伯俱乐部和文学协会在战后时期制作的戏剧包含了各种戏剧性主题，有些是对谢里夫军神话的无耻吹捧。例如，霍姆斯的阿拉伯俱乐部赞助了一场名为《阿拉伯起义》（*Thawrat al-'Arab*）的业余演出，图勒凯尔姆

的爱国俱乐部（al-nādī al-watanī）则制作了一部名为《塔菲拉之战》（*The Battle of Tafila*）的戏剧，该剧作为为当地寡妇和孤儿筹款的活动，描绘了1918年1月谢里夫军对奥斯曼军队的胜利。在哈马和阿勒颇，一个热心参与阿拉伯俱乐部活动的显赫家族的后裔阿明·凯拉尼（Amin al-Kaylani）制作了《瓦迪·穆萨》（*Wādī Mūsā*）、《哈萨之战》（*The Battle al-Hasa*）和《马安之战》（*The Battle of Ma 'an*）等剧作，这些作品颂扬阿拉伯起义中的重要战役。[72] 其他戏剧颂扬民族主义美德，描绘叙利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受的苦难，或纪念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或人物，例如有广受喜爱的萨拉丁的传奇和对西班牙的征服。[73] 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戏剧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ab Drama）和同胞与美德协会（Association of Brotherhood and Virtue）合作创作的双剧目包括前两类戏剧。晚上的开幕剧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堕落》（*The Fall of a Young Girl*），该剧描绘了女主人公“屈服于欲望和食欲，她所受到的羞辱和折磨，以及（最终的）悔改”。该剧的第二剧目《叙利亚的饥荒》（*Famine in Syria*）描绘了一位母亲和她饥饿的孩子在战时的困境，以及奥斯曼军队中一位处境也好不了多少的阿拉伯士兵的高尚行为。根据《地球报》的一篇评论，该剧的爱国思想“以一种让人心潮澎湃的方式”传达出来了。[74]

战后时期创作的最为广泛的戏剧可能是那些描绘“邪恶的”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总督贾迈勒帕夏的所作所为及烈士们经历的苦难的戏剧。《屠夫贾迈勒帕夏》（*Jamal Pasha the Butcher*）和《贾迈勒帕夏和阿拉伯共同体的烈士》（*Jamal Pasha and the Martyrs of the Arab Community*）这两部可能衍生自一部阿勒纳乌特的原始文本的戏剧，[75] 是阿拉伯俱乐部和文学协会剧目库中的主要作品之一，曾在耶路撒冷、雅法、贝鲁特、图勒凯尔姆、霍姆斯和大马士革上演。据称，阿勒纳乌特本人非常擅长舞台表演，“他吓坏了大马士革的民众”。[76]

尽管出于几乎相同的原因呈现了基本相同的故事，即“以便人们可以在故事中看到这个制造流血者所迷恋的暴行，以及他用来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暴行”[77]，但是关于贾迈勒帕夏的戏剧的实际表演却因城市而异。在图勒凯尔姆，戏剧创作得到了当地爱国俱乐部的赞助，根据《地球报》的一篇文章，该协会不仅是由显贵和知识分子建立的，而且就是为这些人而建的。演出前，演员们身着戏服上台演唱《阿拉伯国歌》。俱乐部的一名成员随后发表了演讲，“（敦促）他的同胞们保持团结与和谐，并且通过指出阿拉伯人在过去所拥有的辉煌、文明和力量，激励他们为未来竭尽全力”。在幕间休息时，学生们走上舞台，歌唱爱国歌曲。[78]在耶路撒冷，当地的阿拉伯俱乐部以一部短剧开始当晚的演出，演员们打扮成伟大的阿拉伯人的灵魂，在断头台上徘徊，以提醒观众中的孩子们意识到他们的“爱国义务”。俱乐部以一首向费萨尔致敬的歌曲结束了当晚的演出，据称这首歌是由当地的纯文学家哈利勒·萨卡基尼（Khalil al-Sakakini）创作的，当时他正带领着300名青年加入阿拉伯军队：

哦，伟大的国王，所有阿拉伯人的骄傲！
你的统治是伟大的，是你的祖先先知的统治。
在为时已晚前向此进军。
对敌人表现出热诚，以净化祖国。
复兴古老的时代，辉煌的时代。
遵循正确的道路，遵从正确的意见。
我们不再是一个屈从的民族。
放松和快乐的夜晚并不适合我们。
在战争期间，我们成群结队地出动。
我们攻击敌人，谁也不会逃跑。

如果我们活着，我们活得体面；如果我们死了，我们死得体面。

可耻地死去会使我们悲伤，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结束那可耻的东西。[79]

图勒凯尔姆和耶路撒冷的戏剧表演之间的区别虽然更多是在结构上，而不是在意义上，但是却显示出，阿拉伯政府和穆塔纳维尔在努力利用戏剧来灌输预先确定的民族主义议程时遇到了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规定的仪式顺序、持续的监督和仪式策划中固有的权威增强了政府及其盟友控制大型仪式的形式和象征内容的能力，从而限定了它们传达给参与者和观看者的一系列意义。但是，地方性和那些长期自治的政治协会分会会经常赞助或制作戏剧和其他许多小型场所的舞台表演。表演的非正式性和不受监督的性质增加了政府和穆塔纳维尔努力灌输的思想被破坏甚至出现完全乱码的可能性。戏剧活动还提供了一个公开表达反政府思想的场合，尤其是在撤离危机出现后。有时，来自人民委员会的演说家和招募人员会上台演讲，他们有时会即兴慷慨陈词，呼吁采取行动，扰乱聚会。[80] 如第二章所述，阿勒颇的剧院是招募年轻人加入控制乡村的武装团伙的热门地点。

咖啡厅位于城市中心的主干道上和毗邻半私人车道的露天市场中，为举办爱国戏剧活动提供了场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更受欢迎且位于城市中心的咖啡馆每天通常会接待数百名顾客，他们喝咖啡、玩西洋双陆棋（tāwula）、抽大麻、交流八卦、阅读报纸、看皮影戏，也进行其他娱乐活动。[81] 一方面，阿拉伯政府对这个公共的讨论场合的态度是矛盾的。如第四章所述，《首都报》指控咖啡馆败坏道德风气、破坏家庭生活、助长闲散文化。此外，政府成员还担心咖啡厅提供了进行不受限制的讨论和政治密谋的空间，因此在法国人侵之前的戒严期间便采取措施对其进行监管。这些密谋并非完全是想象的：据称那些在 1919 年 6 月策划暗杀埃米尔费萨

尔的人是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咖啡馆（Syrian Café）每天举行的集会中制订了他们的计划。[82]

另一方面，一些穆塔纳维尔试图利用这些现成的平台。例如，在这一时期，哈马有 50—60 家咖啡馆在经营着穆塔纳维尔的生意，其中两家以他们所制作的戏剧作品而格外闻名。其中一家为图菲克·希夏克里（Tawfiq al-Shishakli）所有，他是一名医生，毕业于安巴尔学校，是该市阿拉伯俱乐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另一家咖啡馆是沙龙咖啡馆（al-Salon），为市政府所有。市政府将其作为剧院场地租给剧团。这些咖啡馆和其他咖啡馆的作品往往是由业余爱好者表演的，例如那些来自显贵家族的热爱表演的年轻人。他们只向观众收取很少的费用，演出所得与阿拉伯俱乐部和咖啡馆所有者分享。[83]

与阿拉伯政府和阿拉伯俱乐部形成对比的是人民委员会，它们似乎并没有赞助过在官邸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戏剧表演，其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并非所有委员会所代表的选民都认为戏剧和表演是得体的。例如，当阿萨德·哈基姆（As ‘ad al-Hakim）博士在卡米里亚学校教授表演时（当时卡米勒·卡萨布仍是该校的负责人），他创作了两个剧目，不仅在大马士革引起了风波，也受到了《真理》（*al-Haqā’iq*）杂志的批评，而且保守的乌里玛收集了谴责这类活动的政治法律意见。[84]但更为重要的阻碍人民委员会赞助戏剧表演的原因可能是，戏剧表演在客观上复制了谢里夫家族和穆塔纳维尔所倡导的不平等的社会划分：通过用“适当的”民族主义神话和美德指导被动的观众，戏剧中的演员往往自诩来自“受过启蒙的”或“有教养的”青年阶层，他们努力为民族主义学说创造大众听众，同时又不鼓励大众参与民族主义政治。[85]正如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人民委员会举办的仪式不仅反映了对合适的社会秩序安排截然不同的见解，而且其形式和内容也符合这种秩序安排。

注释

［1］ 我借用了“仪式专家”一词来指代负责策划公共仪式的人，该词是从以下这本极为有用的著述中获得的：*The Rite of Rulers*：*Ritual in Industrial Society—The Soviet Case*。

［2］ Sally F. Moore and Barbara Myerhoff，“Secular Ritual：Forms and Meanings，”5.

［3］ Clifford Geertz，“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28.

［4］ Mosse，*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50—51，208.

［5］ Geertz，“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28；Lane，*Rite of Rulers*，12. 唐·汉德尔曼（Don Handelman）在其书名 *Models and Mirrors*：*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Public Events* 中简要描述了仪式的双重作用。

［6］ Emile Durkheim，*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245.

［7］ Lane，*Rite of Rulers*，13，192—193，281.

［8］ *al-‘Āsima*，5 February 1920；*al-‘Āsima*，5 February 1920；al-‘Allāf，*Dimashq fī matla’ al-qarn al-‘ishrīn*；Balāwī，“al-Ahzāb al-siyāsiyya fī Sūriyya”；Gabriel Baer，*Fellan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Studies in Social Histtory*，119，134—135. 根据霍华德·萨查尔（Howard M. Sachar）所述，阿拉伯政府也试图将生活在沿海区的马哈提尔招募到民族主义活动中。*Emergence of the Middle East*，263.

［9］ 尽管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充当政府的耳目，但仍有一些马哈提尔要么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要么与人民委员会进行合作。参见 SL：LD，Letter to al-Qassab，18 December 1919；SL：LW，Qa’id fawj[?] to presidency of LW，20 December 1919；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634，Cousse to HC，24 October 1919；FO 371/5076/E8007，“Note by Miss G. L. Bell-May 22，1920”。根据上述文件，来自代尔阿提耶、卡拉、代尔祖尔和大马士革阿玛拉、梅丹和萨利希耶区的马哈提尔参加了高级人民委员会、其分支机构或地方国防委员会的活动。

［10］ Al-Charkas，al-Dalīl al-Musawwar lil-bilād al-‘arabiyya，1：62—63；SL：LW，Fawzi and Nasib al-Bakri to Higher National Committee，n.d.；AD 2367/10/1/117，Cousse to HC，5 February 1919；DU SA 493/13/25-35，Shuqayr to Waters-Taylor，3 September 1919；AD 2380/5/67/386，‘Ali Rida al-Rikabi to Military Governor of Aleppo，17 February 1920；MAE L：SL/vol.12/32-38，Cousse to HC，n.d.

［11］ 费萨尔早些时候向他在大马士革的兄弟扎伊德发送了一封电报，要求将授权他担任阿拉伯代表的类似请愿书在巴黎转交给他。就在这一要求提出后，发生了反对毕盛的抗议活动。关于费萨尔对上述运动的授权，参见 Mūsā，*al-Murāsalāt al-tārīkhiyya*，2：61。

［12］ MAE L：SL/vol.10/19-23，Cousse to HC，12 February 1919；MAE L：SL/vol.9/240，Picot to MAE，13 February 1919；AD 2367/10/1/181，Cousse to HC，5 March 1919；AD 2430/no no.，Cousse to HC，18 March 1919.

［13］ FO 371/4179/47227/74，Clayton to Balfour，18 March 1919.

［14］ al-‘Allāf，*Dimashq fī matla’ al-qarn al-‘ishrīn*，137.

［15］ 哈桑·阿明（Hasan al-Amin）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三条环线穿过他所在的街区，即哈拉卜街区（Hayy al-Rharāb）。al-Amīn，*Dhikrayāt*，38—43.

［16］ 例如，参见 *al-‘Āsima*，11 September 1919，4—6；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240，Cousse to HC，11 August 1919。人民委员会还会鼓励行会参加它们组织的游行和示威活动（例如，卡米勒·卡萨布对 1920 年 1 月 17 日组织的一次游行的描述，参见 *al-Kawkab*，27 January 1920，5）。然而，正如下文将讨论的那样，这些仪式的结构对于行会的参与来说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

［17］ MAE L：AH/vol.4/237-238，Picot to Pichon，22 May 1919，（in Arabic and French）.

［18］ 参见 Mardam Bek，*Dimashq wal-Quds fi al-'ishrīnāt*，6。在刚刚描述的游行前夕，市政府在大马士革各地张贴的大报中也暗示了这一点："尚未成立行会的商人或工匠应派代表到上述行会的后方集合，并按照本方案的规定行事。"

［19］ MAE L：SL/vol.43/24-32，"Ra" pport des Syriens Catholiques et Orthodoxes d'Alep，" 18 July 1919. Harry N. Howard，*The King-Crane Commission*：*An American Inquiry in the Middle East*，120. 阿拉伯俱乐部并不是唯一一个理解行会在政治中的价值的政治组织。叙利亚爱国党的纲领呼吁该党"支持慈善、贸易和行会组织"（jam'iyyāt al-'umal）。Farzat，*al-Hayā al-hizbiyya fī Sūriyya*，77.

［20］ AD 2430，Cousse to Dame，18 March 1920. FO 371/4181/89850/24，Clayton to Curzon，17 June 1920.

［21］ *al-'Āsima*，27 June 1919，4. 政府各项努力的总体效果尚不清楚。

［22］ Sāfī，*'Alā janāh al-dhikrā*，1：231.

［23］ IO L/PS/10/802，Gertrude Bell，"Syria in October 1919，" 15 November 1919.

［24］ Sultān，*Tārikh Sūriyya*，108.

［25］ Khoury，*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410—412；Fakhrī al-Bārūdī，Mudhakkarāt al-Bārūdī，1：30—31；al-Qāsimī，*Maktab 'Anbar*；Interview with Kamil Daghmush，2 November 1989；Interview with Dr. 'Abd al-Karim al-Yafi（alumnus of the tajhīz），21 November 1989；Interview with Ihsan Haqqi，10 November 1989.

［26］ Munīr al-Rayyis，*al-Kitāb al-dhahabī lil-thawrāt al-wataniyya fī al-mashriq al-'arabī*：*al-Thawra al-sūriyya al-kubrā*，103；al-Qāsimī，*Maktab 'Anbar*，102—103.

［27］ Interview with Dr. 'Abd al-Karim al-Yafi，21 November 1989；FO 371/4182/125609/M56，"Arab Movement and Zionism，" Major J. N. Camp（Jerusalem）to CPO，Cairo，26 August 1919；*al-Kawkab*，16 December 1919；*al-Kawkab*，6 January 1920，10；Darwaza，*Mudhakkarāt*，2：26；Akram Hasan al-'Ulabī，*Khitat Dimashq*：*Dirāsa tārīkhiyya shāmila*，62—63.

［28］ Sāfī，*'Alā janāh al-dhikrā*，1：233—234.

［29］ 根据法国在占领叙利亚内陆 10 年后积累的数据，只有 28% 的叙利亚人口识字。在贾巴尔德鲁兹，识字率为 6%。Khoury，*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411. 法国占领叙利亚内陆两年后发表的一份报告列出的识字率要高得多。参见 Haut-commissaria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Syrie et au Liban，*La Syrie et le Liban en 1922*。

［30］ *al-Kawkab*，11 March 1919，12.

［31］ MAE L：SL/vol.56/147，Cousse to M. l'administrateur en chef，22 July 1919；MD 4H1/5，Commandants Sciard，"Rapport avec annotations sur un voyage en Syrie（29 juin-25 juillet 1919）et compte rendu sur la situation au Levant"；MAE L：SL/vol.56/220/152，Cousse to Picot，1 August 1919. 一个典型的标题是《士兵的侮辱》，刊登在阿勒颇的《观点报》上，故事如下："鲁梅拉（Rumayla）是贝鲁特最美丽的街区之一，位于海边，聚居着最好的基督教家庭。在这个街区附近安营扎寨的是一群法国士兵，他们在夜间即刻开始洗劫房屋，并在光天化日下猎杀妇女，粗暴地辱骂她们。这一地区的居民因这种野蛮行为而采取行动，向该街区的负责人提出投诉，后者将他们的投诉转达给由古洛将军监督的行政委员会。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投诉被搁置，因为没有人敢向政府提起这件事。该地区的一名居民现在建议其他人与家人一起移居埃及或美国！" MD 4H112/dossier 2b，18 April 1920.

［32］ DU SA 493/12/2，4，5，Letter from Shuqayr to Waters-Taylor：Appendices B，D，E，3 September 1919；MAE L：SL/vol.5/58-61，Mercier to HC，20 November 1918；AD 2368/10/2/66，Cousse to HC，21 January 1919；MAE L：SL/vol.12/32-39，Cousse to HC，6 April 1919；Fakhrī Nūrī al-Kaylanī，"Qirā'a fī milaff al-sihāfa bayna 'āmī 1727 wa 1928 fī bilād al-shām"（n.p.，n.d.）

（Handwritten manuscript）.

［33］ AD 2368/10/2/56，Cousse to HC，18 January 1919.

［34］ *al-Kawkab*，11 November 1919，11；MD 4H114/4/482，Cousse to Gouraud，2 June 1920；MAE L：SL/vol.12/32-38，Cousse to HC，6 April 1919.

［35］ AD 2430，Picot to Cousse，2 January 1919；AD 2368/10/2/56，Cousse to HC，18 January 1919；AD 2368/10/2/66，Cousse to HC，21 January 1919；MAE L：SL/vol.12/32-38，Cousse to HC，6 April 1919；AD 2342，"Rapport sur les troubles survenus le 28 février 1919 à Alep-1er échelon GHQ，" 14 April 1919；AD 2209/158，Pilley to Picot，18 April 1919；AD2343/87，Pilley to Picot，22 May 1919；MD7N4148/1，"Renseignments politiques，" 20 April 1920；MD7N4148/1，"Renseignments politiques，" 20 May 1920；MD 4H114/4/594，Cousse to Gouraud，24 June 1920. 格特鲁德·贝尔写下了对易卜拉欣·黑勒米的评价："易卜拉欣·黑勒米几次来拜访我，他是一名25岁或更年轻的巴格达人，是《阿拉伯语言报》的编辑。他的阿拉伯语知识如此渊博，以至于当时最好的法官之一佩雷·阿纳斯塔斯（Pere Anastase）试图说服他回到巴格达，在他编辑我们当地报纸时帮助他。他是亲英派，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有利于我们施政的文章。他讨论了他的报纸在我们这里发行的可能性，并认为像他这样来自叙利亚而不是来自巴格达政府新闻界的宣传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对于我们最终会补贴《阿拉伯语言报》并非不抱希望。他暗示，如果我们给他足够高的条件，他愿意在巴格达从事编辑工作，但他的要求不会太低。然而，他是一个能干的年轻人。" IO L/PS/10/802，Gertrude Bell，"Syria in October 1919，" 15 November 1919.

［36］ MAE L：SL/vol.9/214，Hornblower（Chief Censor），13 February 1919；DU SA 493/15/74-84，Report of the "Conférence des administrateurs en chef"（Haifa），12—14 May 1919；MAE L：SL/vol.56/147，Cousse to M. l'administrateur en chef，22 July 1919；*al-Kawkab*，14 October 1919，10. 然而，即使协约国停止了对报纸的直接审查，它们仍继续间接地施加压力，在它们不赞成的文章发表之后向阿拉伯政府提出外交抗议。

［37］ *al-Kawkab*，18 February 1919，1；*al-Kawkab*，27 January 1920，11；*al-Kawkab*，11 November 1919，11；MAE L：SL/vol.56/220/152，Cousse to Picot，1 August 1919；WO 95/4374，Copy of telegram from Cousse to Picot，14 October 1919；MD 4H114/1/373-374，Cousse to Gouraud，5 December 1919；MD 4H114/4/617，Cousse to Gouraud，30 June 1920.

［38］ *al-Kawkab*，27 January 1919，11；*al-Kawkab*，18 February 1919，1. 在"撤离危机"后，1919年11月政府再次停止发行《新叙利亚报》。*al-Kawkab*，11 November 1919，11.

［39］ AD 2429/9/no no.，Telegram marked HC Beyrouth，21 October 1918；USNA 59/867.00/955，"Report of Elias Khouri，1st Dragoman of Beirut Consulate，" 8 September 1919；al-Haffār，"al-Hukūmāt allatī ta'āqabat" 1（3 shawwāl 1372）：18—19. Quotes taken from FO 371/3383/169562/559ff.，Clayton to FO，8 October 1918.

［40］ 1919年5月，首次起义纪念日活动在阿勒颇举行。相关档案记录很少。据法国驻阿勒颇联络官说，时任省长助理、阿拉伯俱乐部成员纳吉·贝伊·苏瓦伊迪（Naji Bey al-Suwaydi）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由于阿拉伯俱乐部在亚美尼亚大屠杀发生不到3个月后就组织了阿勒颇的纪念活动，因此据称这是一个促进阿拉伯和亚美尼亚共同体精英之间和解的机会。两族的代表在俱乐部总部开会，听取了对"事件"表示遗憾的发言，并宣布"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从此将成为兄弟"。AD 2343/87/8-10，Pilley to Picot，22 May 1919. 另见 AD 2209/153，Pilley to Picot，14 April 1919。

［41］ 关于日期排序的讨论，参见 Eviatar Zerubavel，*Hidden Rhythms：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al Life*，46；Hunt，*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French Revolution*，34—35。

［42］ *al-'Āsima*，2 October 1919，3；*al-Kawkab*，14 October 1919，10. 根据《地球报》称，检阅是"这次庆典最重要的活动"。

［43］ *al-ʻĀsima*，2 October 1919，3.

［44］《地球报》的一份报告称游行的时间是 9 点。*al-Kawkab*，14 October 1919，10.

［45］ 历史学家将阿拉伯国旗的设计全部或部分地归于几方，包括伊斯坦布尔文学协会（据说在 1909—1911 年就提议了国旗的条纹图案）、英国陆军部的马克·赛克斯爵士、奥斯曼行政权力下放党、法塔特、谢里夫侯赛因、阿拉伯起义的战地指挥官，以及叙利亚国民大会。不管它是由何而来，阿拉伯国旗就像所有的国旗一样，承担着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所说的“总结性符号”的角色（参见第三章），并因此凌驾于日常政治之上。国旗的图案和颜色的使用无处不在。宣布市政活动和反对派纲领的海报上都装饰着国旗，通常是彩色的，甚至连警察的警棍也被漆上了类似国旗的图案。这面旗帜在游行和国家节日中也发挥了核心作用，以下摘录自《地球报》在解放节后刊登的一篇文章，据该报称，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将叙利亚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由谢里夫家族）举起的阿拉伯国旗替代了土耳其国旗”：

> 太阳刚刚升起，光芒四射，大马士革的每一个地方都升起了阿拉伯国旗，无论是家庭、商店、俱乐部、酒店、政府部门还是咖啡馆。大马士革好像披了一件四色披风，遮住了太阳。那些骚动的人们，除了这些飘扬的阿拉伯国旗，再也无法注视其他的风景。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旗帜的含义，它们在列强面前公开宣布国家的要求。电车和铁路隧道也悬挂着旗帜……步兵、炮兵、骑兵、机枪手、警察、宪兵和消防队员（接受检阅），但是给人们带来最多快乐、引起最多掌声和欢呼的是阿拉伯军队去年带来并首次升起的阿拉伯旗帜，他们充满勇气、坚毅和自豪地观看这面旗帜。

参见 FO 371/2136/42812，25 May 1919；USNA 59/867.00/955，“Report of Elias Khouri，First Dragoman of Beirut Consulate，” 8 September 1919；IO MSS EUR 152（Frank Lugard Brayne Mss.）/18b，“Palestine and Syria Autumn 1918，” 7 October 1918；*al-Kawkab*，28 October 1919，10；USNA 165/2558-16，Military Attaché to D.M.I.，16 March，1920；A.L.Tibawi，*A Modern History of Syria，Including Lebanon and Palestine*，272；Sulaymān Mūsā，*al-Haraka al-ʻarabiyya：al-Marhala al-ūlā lil-nahda al-ʻarabiyya al-hadītha*，1908—1924，130—140；Kasmieh，*al-Hukūma al-ʻarabiyya fī Dimashq*，48；Fromkin，*A Peace to End All Peace*，315。

［46］ MD. 4H58/1，“Rapport hebdomadaire，27 avril au 3 mai”；MD 4H114/2/327，Cousse to Gouraud，28 April 1920. 在之后的活动中，阿里·里达·里卡比、哈希姆·阿塔西、谢赫伊斯拉姆·塔支丁·哈桑尼和希腊东正教牧首发表讲话，感谢谢里夫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并表示希望叙利亚的独立得到协约国的同意。在其回应中，费萨尔回顾说，阿拉伯人加入战争时，协约国的事业似乎令人怀疑，他渴望未来与大国保持在冲突时期所享有的类似友谊关系。

［47］ *al-ʻĀsima*，29 April 1920，4.

［48］ 参见 Russell，*First Modern Arab State*，136—140。

［49］ IO L/PS/10/802/P1896，Allenby to FO，7 March 1920. 艾伦比接着说：“如果他拒绝召集国民大会，或拒绝接受王位，这意味着他（费萨尔）认为自己将被人民抛弃，他将立即开始对英国和法国的敌对行动。”费萨尔的军事顾问和密友努里·赛义德同意艾伦比的分析。在与一位英国代表的谈话中，赛义德表示：“费萨尔看到了整个叙利亚陷入不满的巨大危险。正是为了引导公共舆论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他才同意在大马士革召开国民大会，但在这样做之前，他一直努力劝说他们不要集会。直到他意识到自己将失去作为叙利亚阿拉伯人统治者的地位时，他才不得不同意大会的行动。”FO 371/5034/E2522，“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Major Young and Nuri as-Sa'id，” 1 April 1920. 另见 AD 2346/c1a/204，Cousse to HC，9 March 1920；FO 371/5216/E2896，Major H. Garland，“A Talk with Sheikh Abdul Malik of Arab Agency，Cairo，” 18 March 1920。

［50］ *al-ʻĀsima*，7 March 1920，1—2. 根据《首都报》的记录，费萨尔的讲话包括以下内容：“我不相信任何国家希望奴役我们。根据我对欧洲的官方访问以及与协约国领导人的对话和通信，我

毫不怀疑他们的善意。”费萨尔讲话全文参见 Hasan al-Hakīm，*al-Wathā'iq al-tārīkhiyya*，137—139。

［51］ *al-'Āsima*，8 March 1920，2；MAE L：SL/vol.25/285-290，"Extrait du journal Difah，" 9 March 1920；MAD 4H112，Toulat to Gouraud，10 March 1920；*al-'Āsima*，11 March 1920，3；IO MSS/Eur/F152（Frank Lugard Brayne Mss.）/20，Pierre Bardakjy（？）to Capt. Bichon，18 March 1920；*al-'Āsima*，25 March 1920，4；AD 2346/144，Cousse to Millerand，8 April 1920；al-Charkas，al-Dalīl al-musawwar lil-bilād al-'arabiyya，1：109—112.

［52］ 有趣的是，代表团由持有广泛不同政治观点的个人组成：哈希姆·阿塔西、艾哈迈德·卡德里、阿卜杜勒·卡迪尔·凯拉尼、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提卜、艾哈迈德·伊亚希、里亚德·苏勒赫、图菲克·比萨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尤素夫、台杜里·安塔基、拉希德·里达、苏布希·塔维勒、法塔赫·马尔阿什里、马哈茂德·法乌尔、阿明·贝胡姆和赛义丁、贾比里。al-'Iyāshī，*al-Īdāhāt al-siyāsiyya*，50.

［53］ 海报是彩色的，醒目地展示着阿拉伯国旗，开头如下：

1. 首都所有居民将于 3 月 8 日上午 11 点在纳斯尔街和萨利希耶集合。
2. 这些群众将在各方领导人的带领下安静地前往指定的地点。
3. 所有商人、学生，不论男女，都将参加游行。
4. 各群体下午两点将在烈士广场汇合。
5. 下午 3 点将在市政大楼阳台上宣读叙利亚国民大会的决定，宣布独立。

USNA 165/2558-16，U.S. Military Attaché（Cairo）to DMI，16 March 1920.

［54］ *al-Difā'*，9 March 1920，1.

［55］ 当地报纸刊登了有关仪式的详细报道。参见 *al-'Āsima*，11 March 1920，3。

［56］ 根据《国防报》的说法，参加仪式的宗教领袖有希腊东正教主教、希腊天主教主教、叙利亚天主教主教、马龙派主教代表、亚美尼亚天主教主教代表、新教社区主教和大马士革首席拉比。*al-Difā'*，9 March 1920，1.

［57］ Ibid.，3.

［58］ 祝福者包括部长会议主席和成员、叙利亚国民大会代表团、一位伊斯兰教法官、一名穆夫提和纳吉布·阿什拉夫（代表先知后裔财产的首领）、希腊东正教主教、天主教主教、拉丁、叙利亚和古亚美尼亚教会的主教们、新教社区主教和拉比们。*al-'Āsima*，8 March 1920，2.

［59］ USNA 165/2558-16，Military Attaché（Cairo）to DMI，16 May 1920；*al-'Āsima*，25 March 1920，4. 根据一份法国的报告，“在大马士革，费萨尔试图释放反对他的政党成员。但这些人拒绝离开，并宣布他们将留在监狱中，直到一位叙利亚统治者统治叙利亚为止”。MD 4H112/2a，Lt. Kouadi，"Report on Idependence Day Celebrations at Aleppo，" 10 March 1920.

［60］ AD 2346/114，Coussse to Millerand，8 April 1920. 阿乌尼·阿卜杜勒·哈迪将会议日期提前了一天，叙利亚国民大会也是在这个时候批准了国旗的设计。AD 2346/iii-e，'Awni 'Abd al-Hadi to Cousse，31 March. 3 周后，叙利亚外交部确认了这两项决定。IO L/PS/10/802/P2905/59，Meinertzhagen to FO，29 March 1920.

［61］ 参见 MD 4H112/2a，Lt. Kouadi，"Report on Independence Day Celebrations at Aleppo，" 10 March 1920；USNA 59/890d.00/9/473，Jackson to Sec. of State，13 March 1920；IO MSS Eur F152（Frank Lugard Brayne Mss.）/20，Letter from Pierre Bardakjy（？）to Capt. Bichon，18 March 1920；AD 2347（？）/série c/carton 5/dossier a/67/1，Trenga to HC，20 April 1920；Sāfī，'Alā janāh al-dhikrā，1：233—234。

［62］《首都报》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大马士革市政府在马纳赫电影院举办的一场“电影派对”，派对邀请了费萨尔、扎伊德、协约国代表、显贵、穆塔纳维尔和商人，共放映了三部电影。第一部是关于童子军运动“以及它是如何通过身体和精神活动灌输一种趋善避恶的思想，如何做好身体准备（以便年轻人）能够承担起他们国家的责任”。第二部影片展示了费萨尔在巴黎的谈判活动，他第

一次从欧洲凯旋回到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以及“为他举办的盛大招待活动”。最后一部是喜剧片。*al-ʻĀsima*，11 September 1919，6.

［63］ *al-Kawkab*，3 June 1920，8；*al-Kawkab*，29 January 1919，10；ʻAdnān Ibn Dhurayl，*al-Masrah al-sūrī Mundhu al-sūrī mundhu al-Qabbānī ilā al-yawm*，94.

［64］ *al-Kawkab*，8 April 1919，11；Birrū，“al-Muntadā al-adabī.”

［65］ *al-Kawkab*，12 August 1919，7.

［66］ Rushdī Sālih，*al-Masrah al-ʻarabī*，69—70；al-Charkas，*al-Dalīl al-musawwar lil-bilād al-arabiyya*，1：112.

［67］ 当评论家批评演员乔治·阿比亚德仅仅用“情节剧”代替古典作品时，这位演员和制片人为自己辩护称，人们“只会支持更便宜的票价”。Sālih，*al-Masrah al-ʻarabī*，70—71.

［68］ Ibn Dhurayl，*al-Adab al-masrahī fī Sūriyya：Dirāsa fī al-masrahiyya al-ʻarabiyya al-sūriyya mundhu Abī khalīl al-Qabbānī ilā al-yawm*，14，18；Nadīm Mu’alla Muhammad，*al-Adab al-masrahī fī Sūriyya：nash’a-tatawwur*，9—10；M.M.Badawi，*Early Arabic Drama*，56—64.

［69］ Sālih，*al-Masrah al-ʻarabī*，69. 另见 Jacob M. Landau，*Studies in the Arab Theater and Cinema*，75—80。

［70］《首都报》的评论家在评论一场阿比亚德剧团在大马士革上演的一出剧目（埃米尔扎伊德和阿里·里达·里卡比也在场观看）时盛赞，阿比亚德不仅“在过去六年中高举精致的阿拉伯戏剧的大旗……有益于这个正在觉醒的民族”，而且开创了未来的艺术。*al-ʻĀsima*，22 September 1919，4.

［71］ Ibn Dhurayl，*al-Adab al-masrahī fī Sūriyya*，33—36.

［72］ Ibn Dhurayl，*al-Masrah al-sūrī*，107；Ibn Dhurayl，*al-Adab al-masrahī fī Sūriyya*，68；*al-Kawkab*，7 October 1919，12.

［73］ *al-Kawkab*，3 June 1919，8；*al-Kawkab*，29 July 1919，9—10；MD 4H112/2b/68，Officier liaison d’Alep，“Renseignements，”10 June 1920.

［74］ *al-Kawkab*，8 October 1918，8.

［75］ 虽然没有剧本的副本存在，阿德南·伊本·德胡拉伊勒（ʻAdnan Ibn Dhurayl）写道，“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剧本（或者剧本所依据的文本）是阿勒纳乌特的作品。al-Adab al-masrahī fī Sūriyya，36. 另见 Muhammad，al-Adab al-masrahī fī Sūriyya，20—21。

［76］ Ibn Dhurayl，*al-Adab al-masrahī fī Sūriyya*，36；Ibn Dhurayl，*al-Masrah al-sūrī*，107；*al-Kawkab*，11 February 1919，9；MAE L：SL/vol.12/32-38，39，Cousse to HC，6 April 1919；*al-Kawkab*，15 July 1919，10—11.

［77］ *al-Kawkab*，15 July 1919，10—11.

［78］ Ibid.，10—11.

［79］ *al-Kawkab*，11 February 1919，9.

［80］ MD 4H112/2b，“*Excerpts from al-Rayeh 236*，”3 May 1920；MD 4H112/2b，Notebook entitled “Habib Bey Estephane，”13 May 1920；USNA 59/890d.00/17/507，Jackson to Adm. Bristol，19 May 1920.

［81］ Interview with Fakhri Nuri al-Kaylani，8 November 1989；Interview with Abu Ribah al-Jaza’iri，15 November 1989；Interview with ʻUmar Khadim al-Saruji，31 December 1989.

［82］ *al-ʻĀsima*，15 July 1920，2—3；AD 2324/A-1，25 June 1919. 在 1920 年 1 月纳布卢斯阿拉伯俱乐部制作的一部反犹太复国主义戏剧《巴勒斯坦的毁灭》中，两个主人公光顾一家咖啡店，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堕落：在光顾咖啡店时，一个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女性把他们灌醉，偷了他们的钱，并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为你的国家和民族尽最大的努力”的鼓舞下，骗这两人将

财产登记到她的名下。两个人一无所有，冲进集市大喊："犹太人夺走了我们的土地和荣誉。"他们之后自杀了。Muslih，*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169.

［83］ Interview with Fakhri Nuri al-Kaylani，8 November 1989；Interview with Abu Ribah al-Jaza'iri，15 November 1989. 凯拉尼加入了穆罕默德·巴鲁迪组织的剧团，参加了在法国统治期间在咖啡馆上演的业余戏剧（他曾在戏剧作品《悲惨世界》中扮演冉阿让）。

［84］ al-Qāsimī，*Maktab 'Anbar*，23.

［85］ 格尔奥格·L. 摩瑟（George L. Mosse）在分析在纳粹德国举行的"庭"（Thing）时也发现了类似矛盾。*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114—118.

第六章　游行共同体

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支持的不仅是公共节日的庆祝和戏剧作品的演出。政府的仪式专家也策划和举行了游行活动，就像前一章所描述的仪式的形式和内容一样，这些游行的形式和内容不仅揭示了设计者所声称的政治目标，而且揭示了他们对合理社会秩序安排的基本预设。然而，与前一章分析的主要由政府及其支持者举行的仪式不同，人民委员会及其盟友也组织了游行。两个民族主义集团通过相同媒介来进行自我展现的事实为仪式的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对两个集团举行的游行进行并列比较，能够使历史学家对他们各自的指导原则进行对比。分析游行之所以有益，还有另一个原因。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因为人民委员会发起的肯定性的（例如“积极的”）游行通常只发生在存在广泛横向和协会的联系的社会，这些横向的和协会的联系要么与纵向和共同体的联系并存，要么是其替代；这些游行证实了奥斯曼帝国晚期及后奥斯曼帝国早期社会和政治关系发生的根本转变。正如导言中所说，这种转变是以大众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出现的前提条件。

政府批准的游行

游行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被引入阿拉伯中东的新鲜事物，叙利亚的阿拉伯政府也不是地区内第一个批准和组织游行的政府。在整个奥斯曼帝国时期，叙利亚人举行游行来庆祝一些事件，包括奥斯曼苏丹的加冕典礼和皇室添丁。在这些庆祝活动中，他们不仅在商店橱窗里展示装饰品，对当地政府大楼进行装饰，每个街区显贵也会计划和组织游行，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前往当地帝国政府所在地的游行。

游行中行进和活动的规则与庆祝宗教节日和婚礼的行进和活动的规则相近（很可能是从中借鉴的）：游行者唱着相同或相似的歌曲，并挥舞着传统的仪式性武器，例如剑和手杖。正如宗教或婚礼游行，游行队伍中的领袖站在主要参与者们的肩上，以监督游行者的行动，并指挥游行者欢呼庆祝。游行本身就是仪式的中心节目，用一位当代观察家的话说，游行者只在目的地停留很短的时间，“来表达他们的忠诚和喜悦之情”。[1]

大马士革当地政府也在国际危机期间组织游行来夸大民众情绪，例如与欧洲列强在克里特岛（Crete，1896—1897）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1908）发生冲突期间，以及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期间（Tripolitanian War，1911），分派城市的每个苏曼（athmān）单独或与其他苏曼一起开展一天的游行。通过这种方式，政府确保了为期一周的一系列游行活动。正如他们在前面提到的游行中所做的那样，人群首先行进到政府办公室，挥舞着武器并高喊诸如“我们绝食，我们祈祷——克里特岛属于奥斯曼人”或“谁让你们去打仗，意大利的狗崽子们?”的口号。之后游行者们行进到外国领事馆门前，在那里他们继续高呼口号，他们的领导者则向外国使节提交抗议的请愿书。游行的路线（从住宅区到外国领事

馆，途经政府办公室）和请愿仪式向外国观察员们展示了群众对奥斯曼政府的忠诚和对欧洲行为的反对。与此同时，仪式和仪式中的大众参与使奥斯曼帝国的事业神圣化，使奥斯曼政府能够诱导民众做出牺牲（例如默许征兵和增加税收），这对扭转外国侵略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游行同时实现了对内和对外的目标。

1908年7月，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地方分支机构也组织了以街区为基础的游行活动，以支持恢复宪政。同样，他们在穆罕默德联盟（Muhammadan Union）中的反对者也匆忙组织了游行活动，以庆祝1909年针对该委员会未遂反政变的胜利。根据作为美国领事代理人的纳西夫·马沙卡（Nasif Mashaka）撰写的一份简报，前一类的游行每天发生，这对他而言是可怕的。“想象一下，大约有500名不识字的青年人，有的拿着剑，有的拿着左轮手枪，还有许多人拿着从政府偷来的违禁步枪，这群人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他们穿过街道，在集市上开枪叫喊”，他在简报中写道，

> 到了第八天，演说一般都是非常自由的。演讲台上站着一个“乌斯巴希”（Usbashy）级别“土耳其青年”，他掏出剑，让民众站起来，跟着他重复一个誓言，誓言的意思是，如果暴政再临，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推翻它。他们庄严地宣布，他们准备为自由牺牲他们的妻子、孩子和鲜血！在庄严的宣誓之后，人们为自由、军队和苏丹进行了三次欢呼。[2]

不到一年后，穆罕默德联盟的地方代表动员了梅丹的居民，为了纪念这一时刻，他们张灯结彩，在该街区游行了一天一夜，并高喊“真主已将胜利赐予苏丹”。[3]

由于阿拉伯政府致力于通过向协约国展示叙利亚人团结一致渴望独立

并为之做好了准备的策略来实现独立，它也发动游行，向外部世界进行展示。这些游行有两种类型：请愿游行，其中心内容是直接或间接地向协约国代表提出一系列要求；以及庆祝游行，在游行期间，阿拉伯政府和相关的政治组织，如阿拉伯俱乐部聚集民众，以展现他们对政府、埃米尔费萨尔或两者的忠诚。

这两种类型的游行的通用蓝图出现在金—克莱恩观察团到达大马士革前夕《首都报》头版刊登的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中。[4] 这篇题为《真实的愿景》(A True Vision) 的文章是以预言性比喻的形式写成的，概述了叙利亚人正在等待的独立和进步的光明未来，只要他们能说服委员会——通过委员会说服协约国——他们能够以“文明的”方式行事。

文章开头描述了作者坐在桌前，思索着埃及举行游行以显示民众支持其独立的新闻。作者在一份声明中宣称，“我们很难在先进的西方国家中看到如此良好的秩序”，阿里·里达·里卡比本人不久后也在私人信件中对此予以附和，

> 我对自己说：“天呐！他们不公正地指责东方及其人民是野蛮的、不成熟的，无法效仿西方的文明。还有什么比这场极为有序的完美游行更能表明他们准备好（独立）了呢？”[5]

入睡后，作者梦到一位占卜师带他踏上了未来之旅，在这次旅行中，他瞥见了即将到来的观察团对大马士革的访问。在梦中，“民族的孩子们”在知识分子的指导下，“有序地举行了展示他们民族情感和愿望的示威活动，向观察团表明这个民族是值得获得独立的”。所有叙利亚人，不论宗教或教派（正如作者小心翼翼地指出的那样），都参加了游行，在他们的前臂或胸前戴上印有“我们要求完全独立”口号的绑带。小男孩把标语戴在圆

顶小帽（fezzes）上，女孩则把标语绣在胸前。商店、旅馆和住宅的业主用英语和阿拉伯语公开展示了同样的口号。标语无处不在，以至于“走在街上的人可以在每个建筑和墙面上看到标语”。

> 当看到一个光头男人的头上写着标语时，我笑了。.我看到那些马车主将标语贴在了他们马的脸上。卖甜点的把标语贴在了甜点和牛奶的容器上。当我看到萨利希耶居民的创作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晚上在卡松山（Qasyun）上写下了两个帕勒桑（parsang）长度的文字口号。直到代表团离开大马士革前，民众一直都很活跃。

尽管所有大马士革人都展示了游行口号，但是就像参加上一章中描述的公共仪式一样，他们是被动的。笔者可以向读者保证，那些拒绝参加游行的人受到辱骂，并被迫参加了活动。“群众进行的游行是完美的，安静、没有骚动，也没有演讲，但它的沉默宣布了人民的进步。”观察团对他们在叙利亚发现的“智慧、进步和值得完全独立”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返回巴黎后建议允许叙利亚人独立。“此事已作出相应决定。”文章最后总结道，等待叙利亚人努力的回报将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光明未来，本书导言对此进行了引用。

正如不久后将看到的那样，虽然政府组织的大多数游行活动都符合《真实的愿景》中所描述的模式，但是作者不得不省略这些游行另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阿拉伯政府举行游行并非仅是为了给协约国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像奥斯曼政府为抗议外国侵略而组织的示威游行以及前一章讨论的阿拉伯政府创立的公共节日一样，政府发起游行活动也是为了动摇参与者和观看者的信念。因此，在向协约国代表呈现叙利亚社会“样板”（很大程度上是欺骗性的）的同时，阿拉伯政府利用游行为叙利亚民众呈现了一个官方

认可的社会“样板”。

在发起第一次游行前，阿拉伯政府就已经开始强行推行其社会“样板”了。例如，在那些以向外国代表提出请愿为中心剧目的游行中，散发请愿书和收集签名促成了上述目的。如前所述，由于阿拉伯政府集中协调请愿活动，通常与阿拉伯俱乐部合作，因此在特定活动中传播的所有请愿书都包含着几乎相同的要求。但是，除了传播政府批准的要求外，请愿书还遵循了一个标准化公式，强化了政府及其穆塔纳维尔盟友支持的社会分层。每一份请愿书的第一句都写的是请愿书传播的地区或城镇（“我们，是以下签名的……的居民”）；之后，在罗列要求之前，列举了阿拉伯政府对该地区居民划分的类别（例如“所有信教的成员”[madhāhib]、“所有教派的成员”[tawā'if]、“所有宗教的成员”[adyān]）。为了强调这些划分，请愿书正文之后的签名也常常是根据政府对叙利亚社会内部的天然分裂分置的，而这只能通过埃米尔费萨尔本人来弥合。[6] 阿拉伯政府在安排协助请愿仪式的游行行进时经常再造这种分裂。

因为请愿书的传播得到了阿拉伯政府和阿拉伯俱乐部附属机构的支持，这些请愿书及其中倡导的分层理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虽然前文已经描述了以街区为根据地的马哈提尔在请愿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但请愿书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了城市的边界。例如，在 1919 年 2 月 20 日游行之前的请愿活动中，阿拉伯政府和阿拉伯俱乐部的代理人不仅在整个东部占领区游荡，而且还在临近地区游荡。例如，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执行委员会成员萨米·阿兹姆起草了请愿书并监督请愿书在盖泰纳（位于大马士革西南部）和杜马（位于大马士革东北部）地区的分发活动。阿兹姆利用在盖泰纳分发请愿书的机会，在当地和周边地区建立了阿拉伯俱乐部的分支机构。根据法国的报道，该地区的地方长官阿卜杜拉·乌斯图瓦尼（‘Abdallah Ustuwani）是一名在伊斯坦布尔接受过培训的律师，也是阿拉

伯政府国务委员会成员阿卜杜勒·莫赫辛·乌斯图瓦尼（'Abd al-Muhsin Ustuwani）的儿子，派遣了30名骑兵陪同阿兹姆进行巡视。阿拉伯俱乐部的代表以类似的方式在远至安曼、萨尔特、卡拉克和贝鲁特的地区收集签名。[7]

1919年2月20日在大马士革举行示威游行的目的是向协约国代表提交阿兹姆及其同事收集的请愿书。尽管如下文所述，游行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但阿拉伯政府和阿拉伯俱乐部确实为该活动制定了一个需要遵循的程序，反映了组织者的计划和动机。根据计划，策划者打算让群众短暂参与（不到一个小时），使其角色边缘化。在实际中，群众原本可以将自己展现为请愿接受者的利益服务的“活人画”：在当地马哈提尔的指导下，游行者按照预定的行进路线，从他们的住处游行至市政府。但是在那里，游行者不仅耐心地聆听阿拉伯语演讲，而且聆听他们大都听不懂的法语和英语演讲，由阿拉伯俱乐部挑选的穆塔纳维尔组成的代表团将向外国使节提交请愿书。但按照计划设定，请愿书的提交作为游行的中心剧目，本将在台下闭门进行。[8]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也就是直到阿拉伯政府在人民委员会面前失去街道控制权前，政府及其支持者组织的一系列活动与这次请愿示威游行活动有着相同的重要特征。[9] 正如阿拉伯政府组织的庆祝国家节日的仪式，这些游行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政府支持的小学和中学、阿拉伯军队和阿拉伯政府官员、与政府结盟的政治或慈善协会、新近重组的行会，以及诸如阿拉伯俱乐部这样的“文化”组织。阿拉伯政府让这些团体参加游行活动有两个目的。第一，它使政府能够对叙利亚民众进行可控的动员，同时绕过甚至削弱它的竞争对手们，诸如大马士革显贵中的反对派成员，以及后来的人民委员会。此外，通过对游行中参与者的选择和组织、行进队伍的安排、仪式不同过程中谁来参与和谁不参与的安排，每次游行召集的过程使政府

能够定义、巩固和扩大其控制下的制度网络，同时再次为叙利亚民众提供官方认可的社会“样板”。

第二，因为在计划中政府支持的游行有一个共同的对外目的，即向协约国展示叙利亚人民已经准备好独立及团结在阿拉伯政府和埃米尔费萨尔背后。为此，他们为学生、行会成员、政治活动家、士兵和工作人员设计了相似的角色。与人民委员会在“撤离危机”后组织的许多实质上是在歌颂群众自己的游行活动不同，在政府发起的游行中，参与者很少成为仪式的焦点，甚至连剧目中的主要演员都算不上。政府及其盟友经常召集游行者作为真正关注焦点的背景，例如提交请愿。在其他时候，他们将示威者设计成剧目中的小角色，主要受到关注的则是埃米尔费萨尔、穆塔纳维尔和协约国。一方面因为政府支持的游行活动可以在没有群众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传达其意义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因为政府担心群众不守规矩，会在外国列强中严重抹黑叙利亚形象，使它们对叙利亚是否做好独立的准备产生怀疑[10]，所以在政府发起的游行活动中出现的群众往往转瞬即逝，其参与也受到限制。

1919年春天在大马士革举行的欢迎埃米尔费萨尔第一次从欧洲回来的游行是由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组织的典型的庆祝游行。费萨尔已经离开叙利亚5个多月，他返回大马士革，指导为即将到来的金—克莱恩观察团的访问做准备。埃米尔费萨尔离开欧洲的消息一传到大马士革，阿拉伯政府就开始准备迎接仪式。驻大马士革的法国联络官报告说：“都没必要告诉你，这里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保证对他的隆重接待。”

> ……警察们亲自邀请所有居民悬挂阿拉伯旗帜；学校已经动员起来了；胜利的拱门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各地竖起，那里将举行无数的演说。埃米尔的到来无疑将是叙利亚事务中的一个重大事件。[11]

在埃米尔抵达首都前的几天里，当地报纸报道了埃米尔从罗马前往贝鲁特的行程，还报道了在贝鲁特为他举行的庆祝活动，最后报道了他前往大马士革的行程。[12] 为确保他在首都得到合适的接待，《首都报》于5月2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尊敬的埃米尔费萨尔殿下》的文章，赞扬了费萨尔在欧洲所做的努力，并描述了他作为阿拉伯英雄的品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都在为保障民族的未来而不懈努力”，他“将民族从奴役和奴役带来的不幸中拯救出来”。[13]

与上述作为向协约国提交请愿书背景而举行的游行一样，在大马士革为迎接埃米尔而组织的游行也是由大马士革市政府协调的。一名叙利亚观察者对埃米尔进城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 当埃米尔费萨尔抵达大马士革时，他乘坐的是一辆由8匹马拉的马车。马车上有金银饰物。胜利的拱门已经为他竖起，上面装饰着大马士革妇女捐赠的珠宝。在他面前的路上，铺有25 000块地毯。[14]

根据《首都报》的说法，成群的叙利亚人出来迎接费萨尔。然而，这场公共仪式只是为协约国设计的橱窗。在简短地与群众打过招呼后，费萨尔到附近的一个公园休息，同一小群特别受到邀请的人进行谈话。[15] 在公园里，演说家发表欢迎演说，并朗诵特别创作的诗歌。作为回应，埃米尔向出席会议的协约国代表致谢，感谢他们政府的支持，它们“从敌人手中拯救了国家”，“给予了（阿拉伯人）独立”。此外，埃米尔感谢叙利亚人民在“过去5个月中保持冷静，使他能够推动完全独立”。公园中的仪式结束后，军事长官为费萨尔举行了宴会，“（阿拉伯）政府成员、乌里玛团体、（亲政府的）显贵、少数民族社区精神领袖和来自周边地区的代表团”也被

邀请参加宴会。

迎接费萨尔仪式的公共和私下特征与国庆节庆祝活动一样，都复制了叙利亚社会的二元划分：虽然挑选了显贵、不同共同体的首脑、穆塔纳维尔等来决定国家事务，但是仪式专家们却将民众从舞台中移除，安排给他们被动的角色。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阿拉伯政府组织的其他游行一样，此次游行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真正的政治决定既不是被民主地制定的，也不是在街头决定的。

然而，政府支持的游行活动的意义不仅仅是通过其形式展示出来的。如上一章所述，阿拉伯政府仔细审查了游行者喊出的口号和写在横幅上的信息。此外，阿拉伯政府利用游行的戏剧风格和让民众扮演被动或次要角色的机会，向民众灌输叙利亚社会和民族主义政治的合适“样板”。这在1919年11月16日大马士革举行的游行之前的巡游中展现得最为明显。据官方报道，巡游的目的是展示叙利亚人民的团结，重申他们对完全独立的渴望，并拒绝“在（叙利亚）任何地方存在除阿拉伯民族主义之外的任何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巡游队伍中有用来象征这一思想的花车。例如，一些游行者抬着一张用黑色、白色和绿色装饰的桌子，这三种颜色来自阿拉伯旗帜。巡游的组织者在桌子上放置了《旧约》《新约》和《古兰经》的文本，这显然指的是相互独立的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体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新宗教”的框架下的团结统一。[16] 巡游队伍中还有一辆马车，车上站着一个人，身着代表叙利亚地图的礼服，地图分为“东部地区”“南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与协约国对奥斯曼帝国阿拉伯省份的划分相对应。根据官方政府期刊报道，“这个人代表国家，询问人民是否对被分裂或被殖民感到满意，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表达了国家一致决定的原则”。[17] 为了确保民众不会忘记巡游的主题，另一辆花车载着正在进行印刷工作的新闻记者，他们印刷着民族主义口号，并将其分发给群众。

最终，由短命的阿拉伯政府组织的游行活动既没有实现其对外目标，也没有实现其对内目标。从驻叙利亚外国使节发回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协约国代表对游行活动时而感到困惑、时而鄙视。“我很荣幸发给您一份大马士革市政府向社团们的致函，其中规定了迎接埃米尔费萨尔仪式的最细微的细节，”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在写给奥赛码头（Quai d'Orsay，法国外交部的所在地）的上级的信中写道：“这份文件毫无价值，除了向你展示……如何组织一场自发的民众示威，以表现对任何想要的意见的一致支持。”[18]

此外，由于一些与阿拉伯政府安排游行的方式无关的原因，阿拉伯政府最终无法在叙利亚民众中留下其民族主义的烙印，其批准的游行活动也没有增强民众对其的支持。游行活动因为几个原因没有产生成效。首先，与人民委员会利用的容易引起共鸣和多义的象征符号相比，政府所依赖的说教象征符号影响力较弱。游行传递的思想被进一步淡化，因为游行的中心剧目，例如提交请愿书，与参与者组成的实体组织并没有内在联系。这并非偶然：由于阿拉伯政府组织的游行的主要功能是展现叙利亚民众的“文明”性及他们准备好了自治，政府不得不在实际上控制游行者与外界的接触，以免他们表现出对欧洲文明标准的漠视，以及对政府为实现独立所采取的战术手段的失望。此外，由于不能保持对街道的控制（至少三次在大马士革的主要道路上设置机枪掩体），阿拉伯政府在镇压示威游行上付出的努力与推动示威游行所花费的努力一样多。[19]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阿拉伯政府通过游行活动推动民族主义的努力并没有引起民众的共鸣。

如果将游行计划与实际效果的描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政府发起的游行向民众灌输一种对叙利亚人来说看似陌生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能力显然十分有限。有时，不认同政府政策的政治活动家故意颠覆政府发起的游行活动的含义。例如，在埃米尔签署了《费萨尔—克列孟梭协议》后，

在大马士革举行庆祝费萨尔返回叙利亚的游行活动期间（据称与庆祝他第一次从欧洲回国的游行相比，此次游行活动的热情程度要低得多），一些人显然对埃米尔试图在巴黎与协约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达成妥协及英国人绑架亚辛·哈希米感到愤怒，这些身份不明的人爬上阿拉伯俱乐部大楼的屋顶，向人群投扔印有反政府和反费萨尔标语的传单。其中一些口号有“杀死那些背叛巴勒斯坦的人”“费萨尔，请保卫先知和我们祖先的遗产”“你的最高统帅在哪里，费萨尔？”以及“阿拉伯民族是不可分割的”。[20]

在其他场合，群众自己也会拒绝扮演政府及其盟友设计的角色。1919年举行的配合向协约国提交请愿书的游行实际上既没有计划者预期的那么受欢迎，也没有那么规范。据一位明显很高兴的法国观察者估计，只有三四百人参加了这场仪式，其中包括一些好奇的旁观者，这与阿拉伯政府预期的数千人相差甚远。此外，音乐的表演、装饰性旗帜和彩旗的展示使游行带有欢庆的气氛，掩饰了这一场合的严肃性。[21]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活动中并没有冗长的系列演讲，只有两场面向群众的讲话。此外，通过他们的活动，游行者似乎在炫耀自己对仪式主要主题的超然态度和漠不关心。据参加了此次活动的阿萨德·达吉尔所说，尽管阿拉伯政府安排了这次游行活动作为提交请愿书的背景，以向外国使节展示叙利亚人支持埃米尔费萨尔作为他们的代表与协约国进行谈判，并且向他们展示叙利亚已经准备好加入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但是不耐烦的群众却在高呼一个违背上述目的的口号：“穆罕默德的宗教是剑的宗教。”[22]

然而，群众并没有完全脱离游行的中心剧目。相反，游行的焦点从向外国代表团托付甚至是秘密提交请愿书转移到向军事长官阿里·里达·里卡比集体提交请愿书的副本，他承担了转交的责任。[23] 因此，无论是由于其组织者对民众的冷漠或反感最后一刻采取的调整，还是游行者本身的主动或被动抵抗，或两者兼而有之，那些被动员起来观看游行中心剧目的

民众重新塑造了仪式，并扮演了积极参与者的角色。正如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那样，中心剧目展现顺序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改变了原本被设计来肯定一个社会明确的结构和政治纲领的事件，使之成为一个挑战结构和纲领的事件，这证明了存在于所有说教性仪式中的动员者的设计和被动员者的愿望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

人民委员会的游行

1919 年 9 月上旬，大马士革俱乐部回应了加速志愿民兵组建的动力，发动了一场不同于阿拉伯政府及其政治盟友之前规划的游行。尽管《9 月 15 日协议》尚未签订、亚辛·哈希米尚未被绑架和流放、人民委员会还未组建，但是阿拉伯政府此时却格外脆弱：金—克莱恩观察团到来又离去，虽然它的建议仍是秘密，但诸如英国在夏末接受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等挑衅，加剧了许多叙利亚人对阿拉伯政府外交努力及其实现独立和叙利亚统一承诺的有效性的怀疑。例如，根据《新叙利亚报》的报道，

> 除了分裂和精神痛苦，叙利亚没有从美国观察团那里得到什么。没有人怀疑欧洲会把这个国家的要求抛到九霄云外，并且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来努力解决这一问题。[24]

处于守势的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不得不对民众的焦虑作出回应，这种焦虑是阿拉伯政府自身在 1919 年春夏进行的动员中无意培育起来的。结

果，根据《首都报》的报道，9月9日，埃米尔费萨尔及其随从参加了这次游行活动，“通过坚持统一和独立的权利来歌颂阿拉伯军队”。[25]

多项证据表明，包括埃米尔和军事长官在内的政府官员将参与游行视为拉拢和缓和负面舆论的一种手段。例如，许多政府代表，包括那些随后的行动表明他们仍然对协约国和巴黎的谈判存有信心的人，呼吁自我防御，而非忽视或努力压制武装抵抗的情绪（在哈希米呼吁征募12 000名志愿者后不久，英国将哈希米驱逐到了巴勒斯坦）。在《地球报》上发表的一篇访谈中，阿里·里达·里卡比区分了“知识分子、领导者和义士”所主张的抵抗（通过使用一切与维持秩序和安宁相符的有效、合理的方式进行的抵抗）与“煽动家”所支持的抵抗。文章说：“他准备在物质与精神上尽一切努力，为真正的抵抗而努力，与他可信赖的爱国兄弟一起为国家服务，建立合理的有组织的国防。”然后，它警告采取替代方法进行抵抗的后果：“如果受到不和、自私和个人利益的毒牙玩弄，亲爱的祖国将退缩不前。”[26]此外，尽管包括埃米尔费萨尔及与其关系最近的支持者在内的高级官员给予了游行活动官方批准，并仔细检查了游行活动中的象征手法，但是游行的形态、游行者的活动及指定演说者的演讲内容展现了一个准备向其反对者割让象征阵地的政府。

游行的计划很复杂，由几个连续的序列组成。如《首都报》所述，[27]阿拉伯俱乐部组织的政党、行会和“每个街区的民族主义组织青年”的代表聚集在俱乐部总部，号召服兵役（tajnīd fī sabīl al-watan），游行自此开始。在俱乐部，他们加入了另一支游行队伍，正如随后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游行活动真正的焦点。在一支来自阿拉伯正规军的骑兵部队的带领下，这批游行队伍包括来自沙古尔、梅丹、卡伊马利亚、阿马拉和其他街区的“年轻人和显贵的儿子们”，他们已经在阿拉伯俱乐部建立的营队注册报名，跟在阿拉伯俱乐部旗帜的后面行进。紧接在他们之后的是一群由

来自卡纳瓦特区的刚入伍的青年组成的方阵，他们跟着一只生产多胎的骆驼，“骆驼象征的是民族的荣耀，民族的孩子们将保护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整个集会队伍从阿拉伯俱乐部出发，行进到不远处的埃米尔费萨尔及其兄弟和随从等候他们的地方，游行者和谢里夫们之间进行了谈话。三位对游行者发表讲话的人均由阿拉伯俱乐部选出：俱乐部主席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扎法尔；穆罕默德·舒拉伊奇（Muhammad Shurayqi）作为阿拉伯俱乐部的诗人，经常在仪式场合背诵他自己的诗句；[28] 还有一位是前马龙派神父尤素夫·伊思提凡（Yusuf Istifan），在这次游行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将服务于人民委员会，发表狂热的反法言辞。[29] 在费萨尔对三人作出答复后，人群换场到烈士广场参加另一个没有埃米尔参加的仪式。伊思提凡再次向群众发表讲话，但这次是在可以俯瞰政府惯常举行仪式的广场的市政大楼的阳台上。伊思提凡援引了烈士的形象，他宣称：“从他们的尘埃中仰望青年，以完成他们开始的任务。”伊思提凡的演讲结束后，人群返回阿拉伯俱乐部大楼，并在那里解散。

乍看之下，这次游行活动似乎与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之前和后续计划的其他仪式和游行活动相似：在埃米尔面前行进、交流讲话、对殉道者的呼唤、教学展览和一份发言人名单（用《首都报》的说法是，“一位阿里姆”“一位教士”和“一位受过教育的青年”），这些发言人都是精心挑选的有助于支持政府认可的社会“模版”的模范代表。费萨尔对游行者的演讲甚至也与其过去和之后所做的演讲没有什么不同：他介绍自己是“被托付利益和政治领导权的人”，他为协约国的正直辩护，向听众保证这些国家不会违背它们战时的承诺，并宣称与报纸所报道的相反，他没有做过、未来也不会做任何危害叙利亚统一和独立的事情。

然而，尽管有上述相似之处，但这次游行与之前描述的仪式有很大的

不同。例如，在其他仪式中，群众通常聚集在费萨尔官邸或政府大楼的石柱下，象征性地向费萨尔表示敬意。但是这一次，埃米尔不仅从他的官邸走出来，在他的官邸和阿拉伯俱乐部大楼中间的位置等待群众，而且群众在告别了埃米尔之后，举行了自己的仪式，没有邀请埃米尔参加。这个仪式就在发表官方声明的阳台下举行。此外，从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与埃米尔的会面不是请愿；埃米尔代表的不是权力的焦点，即利益的分配者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仲裁者，而是扮演了民族团结的偶像角色，他只是见证了民族的行动。用尤素夫·伊思提凡的话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在你面前和阿拉伯国旗下重申我们（志愿者）与国家之间的盟约”。如果报纸的转写准确，伊思提凡在演讲中重复了两次“我们与国家之间的盟约”这句套话。

通过给参与者分配的角色，此次游行也可以与之前描述的游行区分开来。与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组织的游行不同，在这次游行中，参与者扮演的是核心的富有表现力的角色，群众不是作为背景的被动角色被禁止直接参与焦点仪式。参与者不仅是主要的庆祝者，也是庆祝活动的对象。“我们此时已经成为士兵……”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扎法尔宣称：“这个民族的年轻人现在聚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感到自由和独立必然会继续下去，因为我们是士兵。”

此次游行的两个方面成为人民委员会发起的游行的预兆。首先，伊思提凡的开场演讲、游行者与费萨尔的相遇和随后在烈士广场举行的仪式都表明，游行象征性地将“民族”与统治机构相分离，并使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由于人民委员会声称代表民族并代表民族的意志，由它们发起的游行活动象征着民族的集会，这种分离和特别授权也是其游行活动的一贯主题。

其次，9月9日举行的游行不仅展现了群众的工具性，而且通过让他

们参与完全自我参照的活动来肯定他们的工具性和自主性。利用参与者作为推动游行中心剧目的动力将成为人民委员会发起的所有游行的特征。此外，随着阿拉伯政府的权威在 1920 年春和初夏的进一步削弱，以及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叙利亚城市街道的控制权交给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在它们发起的仪式序列中夸大了对阿拉伯政府及协约国政策的不满。通过删除与游行群众无关的所有指涉对象，人民委员会发起的游行除了再现一个自我指导和自给自足的民族缩影外，别无其他目的。这些赞美民族及其自治的游行活动不仅不带有其他象征信息，而且取代了它们。

人民委员会组织的第一次也是最为常见的大规模游行是请愿游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游行活动与阿拉伯政府组织的游行活动的根本区别可能在于中心剧目，其中心剧目是群众向阿拉伯政府代表提交请愿书。这些请愿书要么交由政府，要么经其转交协约国。请愿接收者身份的转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通过以民族的名义向阿拉伯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游行者在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不仅再现了民族与政府之间的对抗，而且象征性地重新确立了两个对手之间的适当平衡。因此，即使是那些以献身于一个偶像化的埃米尔为开场白的请愿游行（例如 1920 年 1 月 17 日的游行）也是对抗性的，而不是恳求式的。

例如，在哈希米被绑架后，新成立的高级人民委员会举行了请愿游行，抗议绑架事件。在游行期间，委员会代表卡米勒·卡萨布和阿萨德·达吉尔向埃米尔扎伊德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请他以民族的名义转交给协约国。请愿书中的警告显然不是只针对协约国的：请愿书称，虽然哈希米是法塔特的早期成员，他当时选择留在奥斯曼军队而不是加入谢里夫军，但是“国民认为哈希米将军是民族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这是协约国在东部能够获胜的重要因素”。“民族将不会为（逮捕）将军所产生的后果负责。”[30] 因此，就像在第三章中引用的题目为《民族向叙利亚国民大会表达其愿望》

的请愿书（该请愿书的感染力来自其在叙利亚国民大会需求前反复强调的“民族想要”的对抗性主题上）一样，这份请愿书的语气既不恭敬，也是不恳求式的。

根据英国当局估计，费萨尔统治时期在大马士革举行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可能是1920年1月17日人民委员会举行的游行示威，其参与者超过了10万人。[31] 游行前一天，埃米尔费萨尔已经与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乔治·克列孟梭起草了一份初步协议，也是他8个月来第二次回到大马士革。在埃米尔抵达大马士革时，法国和阿拉伯政府已经公布了《费萨尔—克列孟梭协议》的文本，有关其内容的谣言在大马士革广为流传。[32] 游行（两篇报纸文章的主题在第三章开头已经引述）从哈米底亚军营开始，到阿拉伯政府所在地结束。当费萨尔从政府大楼出来与街头游行者见面时，游行者们向他以宣言的形式提出了“他们的民族要求”，要求叙利亚在其天然边界内完全独立，并招募“一支将捍卫其独立并维护国内和外部安全的国家军队”。[33]

到了1920年春，人民委员会经常展开反映地方情况的联合行动，在整个东部地区发起了一系列请愿游行，更加直截了当地强调民族的首要地位和自主性。游行者没有请求政府作为民族的代表来与协约国交涉，而是完全无视阿拉伯政府直接向协约国请愿。大马士革高级人民委员会以及其在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的地方分支机构一道在1920年春和夏初组织了几次这种类型的游行，来就其选民特别关心的问题进行抗议，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法国在黎巴嫩的行动（发行新叙利亚货币、对周五宣讲的限制），以及将叙利亚划分为各独立托管领土的《圣雷莫协议》。[34]

人民委员会在抗议协约国行动和阿拉伯政府的优柔寡断时，持续组织主张民族自主和至高无上的游行活动，此外他们也组织仅仅是为了歌颂这种自主和至高无上地位的游行活动。这类游行活动与请愿游行活动大相径

庭，因为在删除涉及外部事件或当局的仪式序列后，它们自身仍然完满。此外，与上文讨论的游行活动不同，这些游行中的许多活动经常是喜庆的、小规模的、表面上没有领导或随意组织的。在某些情况下，武装游行者在居民区的游行中高呼口号或唱歌。在其他方面，游行活动以赞扬叙利亚民族的演讲或进行实际或象征性的效忠宣誓到达高潮，承诺参与者将保卫祖国，或制定将叙利亚的每个人团结在一起或将民族和国家团结在一起的社会契约。[35] 卡米勒·卡萨布在法国入侵前夕举行了一场这样的宣誓仪式。根据《基纳纳报》的报道，仪式在阿拉伯俱乐部总部举行，有 300 多名参与者出席。游行者从那里出发，集体唱着“爱国歌曲”行进到正在马德哈纳特沙赫姆举行的民主党会议上。在发表演讲后，卡萨布回顾了除了“腐败堕落和傲慢的花招”外的高级人民委员会的所有成就，并呼吁听众“重申他们的盟约”。他之后主持了一场约有 1 500 人入党的宣誓仪式。[36]

人民委员会组织的庆祝和请愿游行的主题通过其内部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与他们对手组织的游行（即通过游行向构成其国内观众的目标群体展示一种理想化的和陌生的社会“样板”）不同，人民委员会组织的游行的设计方式确认了社会的“模型”（即反映社会现状），这些游行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地方人民委员会，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都是在他们所属的地方委员会的支持下参与的。正如第二章所述，一方面，这些地方委员会承担了通常与治理相关的各种日常职能，例如维护社区治安和供应、组建民兵队伍等；另一方面，这些委员会，包括街区委员会、地区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一个金字塔结构中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游行实际上在重建了一个社会的“模型”的同时，阐明了具有功能性内容和民族范围的行动计划。[37]

在更为精心构建的游行中，人民委员会允许委员会以外的团体在游行中保持他们个人或团体的身份。但是，由于这些团体被安排在代表人民委员会

的先锋队的后面，并且由于他们在游行中的位置看起来是随意且没有层级结构的，不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团体被象征性地纳入委员会，因此也被纳入叙利亚民族。例如，国防委员会对 1 月 17 日游行的行进路线是这样安排的：为了将游行神圣化，领头的是烈士的妻女、乌里玛以及其他宗教领袖，他们代表民族的精神团结。紧随其后的是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和高级人民委员会的代表。最后是显贵和市政委员会成员、政府官员、领养老金的军人、医生、药剂师、新闻界人士、政党代表、职业学校和预备学校的学生、商人和工匠，队伍的末端是行会和军界领袖，他们的排布并无明显秩序。[38]

在政府支持的游行活动参与度下降的时期，由人民委员会发起的游行活动激起了群众的参与热情。例如，1919 年 11 月 9 日，一场以费萨尔官邸为终点的游行活动估计有 15 000 人到 20 000 人参加，参与者在行进中高喊“开战、开战”。而第二天举行的以大马士革市政委员会主席向外国领事提交请愿书为高潮的示威游行只有一小部分群体参加。[39] 法国观察家注意到类似现象，1920 年 1 月 16 日至 17 日，在埃米尔费萨尔从欧洲返回大马士革后，阿拉伯政府和人民委员会在游行活动上展开了竞争。[40] 这种情况的产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人民委员会比阿拉伯政府更有效率的资源调动能力，或向其活动区域内生活居民施加社会压力的能力，这些能力终究来自人民委员会已经享有的声望。此外，虽然阿拉伯政府的胁迫和劝说能力确实由于持续的财政困难而减弱，但是它从未完全消失。事实上，根据报道，1 月 16 日举行的由政府发起的游行完全是由警察、宪兵、阿拉伯军队、学童和行会负责人组成的。总体而言，人民委员会组织的游行是成功的，因为它们在仪式中以新的表演和象征形式建构了社会，这一建构比阿拉伯政府发起的游行活动能更为准确地反映参与者所设想的社会秩序。

这一结论得到了阿萨德·达吉尔的证实，他在回忆录中比较了阿拉伯政府和人民委员会发起的游行。根据达吉尔的描述，在第一次全国性请愿

活动之后由阿拉伯政府发起的示威游行中，从大马士革周围村庄被赶到首都参加游行的民众表现得像是在郊游，他们的举动包括高喊、向空中开枪等。达吉尔观察的后来由人民委员会组织的游行中，参与者显得更有纪律，更专注于民族的问题。此外，达吉尔指出，在后者发起的游行中，常见的各街区青年之间的竞争被“合作反抗外国人”的精神所取代，游行组织者不再需要依靠纵向的庇护网络来进行动员。[41]

总之，达吉尔发现，有证据表明，在由人民委员会发起的游行中，将参与者彼此联系起来的横向联系、协会联系和民族联系取代了那些垂直的、“原始的”（即亲属关系或社区关系）和纯粹的地方主义联系。我们不能全盘接受达吉尔的回忆叙述，因为从他在叙述中缩短了两次游行的间隔时间看，他回想距自己的回忆录出版 30 多年前的事件细节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他得出的这些游行带来了叙利亚人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关系根本转变的结论却进一步得到了查尔斯·蒂利研究的支持。

蒂利的论点可以概括如下：在所有社会中，表达不满的选项是有限的。有两个因素决定了这些组成“抗争集体行动的剧目”活动的种类和范围：资本主义关系在社会中渗透的程度（不仅影响经济关系的组织，而且影响了社会关系的安排）以及现代治理机构的力量和扩散程度（产生了类似的效果）。[42] 因为这些相似的因素同时决定了权力关系的组织，而且因为“集体行动的形式、频率和人员与政府和政治的既有结构密切相关”[43]，抗争性的集体行动不仅包含而且展现了潜在但不为人知的政治和社会关系，集体行动性质的变化与这些关系的变化并行，且显示着这些关系的变化。

根据蒂利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不是唯一或主导的生产方式的社会中，在中心化的市场关系被其他关系制衡或包含的社会中，在政府结构脆弱或疏远其所属者的社会中，抗争性集体行动的剧目是地方性的、经常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或垂直组织的竞争性集体行动，例如家族世仇和村庄间的敌

对。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和国家触角的扩张，群众抵抗越来越多地以短暂的反应性集体行动的形式爆发，例如土地占领和反抗收税。虽然规模通常比竞争性集体行动大，但这些抗争的爆发从根本上是防御性的，在社会方面具有保守性。最后是伴随“商人和国家制造者”的胜利的组织化的革命，有趣的是，这种革命促进了结社生活，在某些情况下还促进了群众性政党和运动的出现。这种革命使全国范围的、自主性的和结构复杂的抗争性集体行动成为可能。这些行动是主动的，它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表达群众的不满或对法律权威的蔑视，而是为了让试图控制国家机器的参与者能够表达对“未曾享有的权利、特权或资源的”需求。[44]

在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叙利亚，每个地方人民委员会、每个受到委员会组织的社区同时反映并提供了一个横向捆绑的民族共同体组织的微观模型。因此，提供了作为替代的政治共同体“模型”的示威游行成为了叙利亚民众“抗争性集体行动剧目”的一个选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阿拉伯政府将现代化的话语与对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纵向联系的“传统”的政治社交（sociability）的再现和主张相匹配；人民委员会却是利用“传统化的话语”来捍卫对叙利亚而言相对较新的政治社交。

仪式与叙利亚政治的转型

格尔奥格·L. 摩瑟在《大众的民族化》（*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一书中定义了18世纪欧洲出现的“新政治”，即伴随着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观念的发展和将“民族”（nation）与“公共意志”（general

will）相等同而自然出现的一种政治风格。[45]“公共意志变成了一种世俗的宗教，人们崇拜自己，而新政治试图引导和规范这种崇拜，”摩瑟认为，“新政治试图通过仪式和节日、神话和象征来吸引人民积极参与到民族的神秘仪式之中，使公共意志得到具体的表达”。除了经济和行政实践的长期变化导致的城市面貌的改变、公共动员的扩大、邻里凝聚力及先前存在的社会组织模式的破碎、国家影响和能力的扩大等变化外，费萨尔时期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和竞争对手开展的活动加速了叙利亚新政治的出现。

在后奥斯曼帝国时期，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率先使用组织群众的方法，试图向协约国证明它们的计划是得到了东部占领区绝大多数居民支持的。它们颁布了国家节日，旨在纪念那些能够确认合适的民族叙事的事件。它们在城市街区和紧邻大城市的农村派驻了马哈提尔和宪兵，让他们召集参与各种仪式的群众、征集请愿书上的签名，并强迫店主和房屋所有者在窗户中展示横幅和政治标语。他们不依赖建立已久的结构来进行治理或动员，而是建造或重建学校、行会和国家机器，然后让学童、行会成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示威游行。总的来说，与其他政府活动，例如传播民族象征符号、征兵、重组城市结构、教育改革等活动相结合，仪式活动的动员使阿拉伯政府能够扩展到之前相对不受国家监督和控制的领域，进而打破了以街区为基础的政治的狭隘、封闭，为人民委员会铺平了道路。尽管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在费萨尔时期首先使用仪式，但是它们的世界观和为实现独立所使用的战术方法使其仅能部分地和极有限地动员群众。但是，人民委员会的动员活动没有受到这些限制的约束。1919 年秋，由于阿拉伯政府明显没能阻止叙利亚的分裂以及英法对黎凡特的托管，人民委员会利用阿拉伯政府先前的动员活动，通过将与许多城市叙利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横向的、社团的和民族的权力关系制度化，点燃了一场组织革命。人民委员会在游行中展示和庆祝这些关系。因此，正如摩瑟所描述的德国节日表现了

“公共意志的物化”，人民委员会举行游行同时象征和激发了“新政治”在叙利亚的出现。

注释

［1］ al-‘Allāf，*Dimashq fī matla’ al-qarn al- ‘ishrīn*，120—123；J. Lecerf and R Tresse，“Les ‘arada de Damas.”

［2］ 在 Elie Kedourie，*Arabic Political Memoirs and Other Studies*，137 中被引用。另见 Lecerf and R Tresse，“Les ‘arada de Damas，” 261；Khoury，Urban Notables，56。

［3］ Lecerf and R Tresse，“Les ‘arada de Damas，” 261.

［4］ *al- ‘Āsima*，5 May 1919，1—2.

［5］ 1919 年 11 月，里卡比写信给赛义德·舒贾伊尔说：“我不认为发生在最发达国家的游行活动组织得更好、更和平。” DU SA/493/6，25 November 1919.

［6］ 请愿书的原件和翻译件保存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不同档案馆中。此外，许多请愿书刊登在叙利亚报纸上，如《首都报》和《地球报》。

［7］ AD 2368/10/2162，Cousse to HC，21 February 1919. 根据法国的报告，在盖泰纳的德鲁兹和基督教村庄，阿拉伯俱乐部预料请愿不会得到支持，据称，该俱乐部的代表通过将请愿书作为对税收制度改革的抗议来收集签名，因为这种改革会增加种植者的税收负担。报告还称，在穆斯林村庄，请愿是在法国 / 基督教政府和阿拉伯 / 穆斯林政府之间作出选择的语境下提出的。在请愿书散发期间，被确认为潜在的顽抗者的人被拘留了 24 个小时。此外，法国联络官还抱怨说，杜马居民被要求在一张空白的纸上签字，并之后在这张纸上写上：“我们，以下署名人，委托埃米尔费萨尔以我们的名义行事，在和平会议上代表我们要求叙利亚的完全独立……” AD 2430/154. Cousse to HC，19 February 1919；AD 2430，Cousse to HC，18 March 1919.

［8］ AD 2430/no no.，Cousse to HC，21 February 1919；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65，Cousse to HC，February 1919.

［9］ 关于这类游行的描述，参见 AD 2429/42，Mercier to Pichon，11 November 1918；AD 2430，Cousse to Dame，20 March 1919；MAE L：AH/vol.4/237—238，Picot to Pichon，22 May 1919；AD 2430/240，11 August 1919。

［10］ 例如，参见 AD 2430/no no.，Cousse to HC，21 February 1919；MD L：AH/vol.4/237—238，Picot to Pichon，22 May 1919；MD L：SL/vol.43/39—41，“Renseignements d’agent，” 12 July 1919；AD 2344/c1/310，Cousse to Picot，3 November 1919。

［11］ AD 2430，Cousse to Dame，20 April，1919.

［12］ 例如，参见 *al- ‘Āsima*，2 May 1919，2。

［13］ Ibid.，1.

［14］ al- ‘Iyāshī，*al-īdāhāt al-Siyāsiyya*，32.

［15］ *al- ‘Āsima*，7 May 1919，5—6.

［16］ AD 2344/c1/149-151，17 November 1919.

［17］ *al- ‘Āsima*，17 November 1919，3—4.

［18］ MAE L：AH/vol.4/237—238，Picot to Pichon，22 May 1919.

［19］ AD 2344/c1/310，Cousse to Picot，3 November 1919；AD 2344/325，Cousse to Picot，10 November 1919；MD 4H114/1/434，Cousse to Gouraud，28 December 1919. 关于在金—克莱恩

观察团访问期间、其离开后以及阿拉伯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天在大马士革设置机枪掩体的情况，参见 MAE L：SL/vol.14/897，Picot to MAE，27 June 1919；FO 371/4182/125032，"CPO：Report on a Conversation in Cairo with Michel Bey Lotfullah on His Return from Syria August 5th 1919"；MD 4H114/dossier 5/no no.，Cousse to Gouraud，20 July 1920；MD 4H60/dossier 1，"Bulletin quotidien 1270，" 23 July 1920；IO L/PS/10/802/P5841，GHQ（Egypt）to WO，24 July 1920。

［20］ AD 2372/dossier：propagande anti-française，17 January 1920.

［21］ AD 2430/no no.，Cousse to HC，21 February 1919；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65，Cousse to HC，21 February 1919.

［22］ AD 2367/10/1/146，Cousse to HC，14 February 1919；AD 2430/no no.，Cousse to HC，21 February 1919；AD 2430/65，Cousse to HC，21 February 1919；Dāghir，*Mudhakkarātī*，105.

［23］ AD 2430/no no.，Cousse to HC，21 February 1919；AD 2430/65，Cousse to HC，21 February 1919.

［24］ 在 Russell，*First Modern Arab State*，91—92 中被引用。

［25］ *al-* ‘*Āsima*，11 September 1919，4—6. 这次游行实际上是几个星期以来举行的第二次游行，目的是支持扩大征兵，并含蓄地提出更有力的外交政策。根据一份粗略的法国报告，在埃米尔扎伊德和尤素夫·伊思提凡（9 月 9 日示威的主要发言人之一）领导的第一次游行中，一支来自阿拉伯正规军的分遣队和三四百名志愿军战士一起向费萨尔的官邸进发。我未能获得有关这次游行的进一步资料。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257，Telegram to HC，4 September 1919.

［26］ *al-Kawkab*，6 January 1920，5.

［27］ 以下对这次游行的描述，以及游行期间发表的讲话的抄本，参见 *al-* ‘*Āsima*，11 September 1919，4—6。

［28］ 有关舒拉伊奇的信息，参见 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634，Cousse to HC，24 October 1919；*al-* ‘*Āsima*，12 July 1920，1；FO 317/5040/E13211/1171，Report by GL Easton，18 October 1920；Darwaza，*Hawla al-haraka al-* ‘*arabiyya al-hadītha*，1：27；Darwaza，*Mudhakkarāt*，2：99，112，143—144；Mardam Bek，*Dimashq wal-Quds fī al-* ‘*ishrīnāt*，29，47—48；Joarder，*Syria Under the French Mandate*，209—211。

［29］ 关于尤素夫·伊思提凡，参见 AD 2368/10/2，"Rapport à lieut. Wiet，" 2 January 1919；AD 2437/dossier：propaganda arabe/43，"Rapport sur les journaux du 26 et 27 mai，" 28 May 1919；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216，21 July 1919；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257，Telegram to HC，4 September 1919；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260，Telegram to HC，18 September 1919；MD 4H112/2B/44，"Rebseignements du 8 au 15 ami，1920（Ça et là dans Alep）"；MD 4H112/2B，United notebook by French agent；FO 371/5036/E6983/24—27/748，Shahbandar to Easton，1 June 1920；*al-Kināna*，15 July 1920，3；MD 4H114/5/no no.，Cousse to Gouraud，20 July 1920；Angelil，"L'occupation d'Homs，" 180—191；FO 371/5040/E13211/212—218/1171，G.L. Easton to Curzon，18 October 1920。

［30］ AD 2332/dossier a/sous-dossier Loutfallah/1，Kamil al-Qassab and As'ad Daghir to Amir Zayd，n.d.（in Arabic and French）. 在大马士革以外的城市，游行者向阿拉伯政府的地方代表提出请愿，并要求这些代表将要求清单送到首都。参见 MD 4H112/2bB/215，"Manifestation de protestation contre les actes du gouvernement du littoral，" 14 April 1920。在他的回忆录中，皇家卫队的首领和哈希米的竞争对手穆罕默德·阿里·阿支卢尼（Muhammad ‘Ali al-‘Ajluni）对为抗议逮捕哈希米而组织的游行活动提出了一个更加讽刺的观点。 在一次阿拉伯俱乐部、职业学校学生等参与的游行中，他写道，他在埃米尔官邸的阳台上，下面聚集了喧闹的人群。当有人从阳台上俯身向人群喊道："你们为什么想要哈希米？" 群众回应道："我们要惩罚他，把他分尸。" al-‘Ajlūnī，*Dhikrayāt* ‘*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85.

［31］ FO 371/5144/E360，"Letter of Proceedings #59，" Egypt and Red Sea Command，30 January 1920. 类似估计，参见 *al-Kawkab*，27 January 1920，5。法国联络官还说，这次游行者人数"极为众多"。MD 4H114/2/37，Cousse to Gouraud，17 January 1920. 这份报告将游行归咎于一个"极端主义"群体，其中包括高级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和阿拉伯俱乐部。一份宣传示威游行的传单（载于 AD 2372/dossier：propaganda anti-française）署名为"国民委员会大会"。

［32］ 关于在大马士革流传的谣言，参见 *al-Difā'*，17 January 1920，1；FO 371/5144/E360，"Letter of Proceedings #59，" Egypt and Red Sea Command，30 January 1920。

［33］ AD 2372/dossier：propaganda anti-française，17 January 1920；AD 2375/ chemise：division de Syrie/392/2，Arlabosse to GCDS，17 January 1920；*al-Kawkab*，27 January 1920，5.

［34］ 例如，参见 IO L/PS/10/802/P4953，"Renseignements：semaine du 18 au 24 mai 1920"；AD 2346，"Extraits des renseignements du 19 mai 1920"。

［35］ 例如，参见 AD 2344/327，Cousse to Picot，10 November 1919；MAE L：SL/vol.121/1-2，"Rapport de renseignements hebdomadaires，" 10—17 November 1919；FO 371/4185/152060/I.707S，GHQ（Egypt）to DMI，11 November 1919；FO 371/4238/160100/8—11，"Situation in Egypt，Syria，and Arabia，" 14 November 1919；AD 2344/c1/149—150—151，17 November 1919；FO 371/4185/158008/408—409，"Summaries of Telegrams，" 29 November 1919；USNA 59/867.oo/1035/1682，US Consul（Aleppo）to Sec. of State，1 December 1919；*al-Kawkab*，2 December 1919，6—7；FO 371/4186/165787/I.1224，GHQ（Eqypt）to DMI，23 December 1919；FO 371/4186/174490/FO 10（CPO 331/6），Meinertzhagen to GHQ，13 January 1920；MD 4H114/5/700，Cousse to Gouraud，16 July 1920；MD 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264，" 20 July 1920；MD 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266，" 21 July 1920。

［36］ *al-Kināna*，15 July 1920，3.

［37］ 有关类似的分析，参见 Mary Ryan，"The American Parade：Representation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Order，" 137—138。

［38］ 1920 年 1 月 17 日游行令载于 AD 2372/dossier：propaganda anti-fançaise，17 January 1920 中的一份传单。另见 al-Qassab's report in *al-Kawkab*，27 January 1920，5。

［39］ AD 2344/296，Cousse to HC，28 October 1919；AD 2430/dossier confidentiel-départ/325—326，Cousse to HC，10 November 1919；FO 371/4185/152060/I.707S，GHQ（Egypt）to DMI，11 November 1919；FO 371/4238/160100，Admiralty Report，"Situation in Egypt，Syria，and Arabia，" 14 November 1919.

［40］ MD 4H114/2/37，Cousse to Gouraud，17 January 1920.

［41］ Dāghir，*Mudhakkarātī*，105，107.

［42］ Charles Tilly，*The Contentious French*，10；Tilly，Tilly and Tilly，*Rebellious Century*，253—254. 值得注意的是，蒂利等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和国家影响力的不同步和不均衡传播，一个社会中可能同时存在着多种抗争政治剧目。*Rebellious Century*，54.

［43］ Charles Tilly，*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170.

［44］ Tilly，Tilly and Tilly，*Rebellious Century*，49—54，253—254.

［45］ Mosse，*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1—2.

结　论

本书首先描述了1920年7月法国入侵叙利亚内陆前夕在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发生的对阿拉伯政府机构和象征符号的物理攻击。正如导言中所述，目标的特异性、呼喊的口号，以及群众前后的活动都使得这些事件既无法完全被忽视，也无法被无差别地视为“暴民”的无政府活动。将这些事件整合到阿拉伯中东民族主义的全面叙述的努力引发了对史学史惯例的质疑。毕竟，如果所谓“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与大多数关于其起源和早期演变的经典著作中所呈现的是同质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攻击呢？答案现在应该很明显，即存在单一且无差别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假定是没有证据支持的。与那些将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炼化，或认为该地区出现的其他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完整的或是对“真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非自然切断”的历史学家相比，我试图找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产生民族和民族主义替代建构的原因，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立即形成的这些建构的特征。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战前和战时的民族主义构成与费萨尔统治第二年出现的人民委员会进行了比较。无论是法塔特还是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俱乐部，在结构或意识形态上都没有做好准备来领导或引导突然出现的代表日益焦虑不安和政治化的叙利亚民众利益的大众政治。一方面，法塔特因为内部分裂和组织缺陷而陷入瘫痪；另一方面，因为随着阿拉伯政府主导叙利亚

政治能力的退化，即使对政府政策和人事任命的幕后操纵能够实现，法塔特也越来越无法影响叙利亚的未来。类似的问题也削弱了阿拉伯大马士革俱乐部的效率，尽管阿拉伯俱乐部代表阿拉伯政府展开的动员活动（这是阿拉伯俱乐部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确实对之后人民委员会展开的活动起到了帮助和启发的作用。

与法塔特和阿拉伯俱乐部相比，人民委员会不仅在组织和功能上独立于阿拉伯政府，而且其结构反映并具象化了叙利亚城市政治权威不断变化的性质，以及一种先前处于萌芽阶段的替代性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马士革和其他城市，高级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及其分支委员会的领导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所有成年男性都享有选举权。因此，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对新型民族主义领导的赋权，并将大量叙利亚人纳入民族主义政治，这些人此前除了敷衍地参与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外，一直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委员会践行了代议制原则，消除了第三部分所述的作为阿拉伯俱乐部和阿拉伯政府结构和代表性活动标志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即使在那些地方人民委员会分支似乎复制了先前存在的社会安排的街区和村庄，人民委员会也通过将亲属关系或宗族关系网络整合到一个承担着治理职能和优先选举程序的政治机器中来改造社会关系。因此，人民委员会的出现预示着权力关系的转变，即大众政治，即摩瑟所说的“新政治”所依赖的权力关系。

然而，人民委员会获得支持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结构。正如在第二部分所讨论的那样，与阿拉伯政府和阿拉伯俱乐部一样，人民委员会充当了一个独特话语共同体的制度核心。它们通过为宣传者提供讨论平台和支持，通过将志同道合的活动家们聚集成为一个有形的、相辅相成的共同体，以及通过将这群人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和制度，确保了这一共同体的自主和延续。相反，由与人民委员会有联系的宣传者和活动家合成和传播的

话语场是通过证实委员会提供的民族共同体和社会组织愿景的有效性来使委员会的活动和他们自己的活动合法化。

与人民委员会相关的话语场和自诩穆塔纳维尔的人的话语场差异鲜明。穆塔纳维尔试图在叙利亚民众中宣传他们对社会和叙利亚未来激励性的和全面的愿景，这是一个由普世进步、自由价值观、“文明”益处等形象所维持的愿景。但是，这个愿景没有对大多数叙利亚人居住的世界作出任何让步。而那些隶属于或同情人民委员会的人却是用传统化的话语传达了一个有机的和相互依存的叙利亚共同体形象，而这个共同体受到了外国帝国主义和“那些将自己的国家像商品一样出卖”的阴谋的威胁。那些隶属于委员会的人享有声望，广泛参与委员会发起的活动，如会议、选举、游行、政治危机时期（“撤离危机”初期、《费萨尔—克列孟梭协议》的签署、宣布叙利亚独立、法国入侵前的最后几天）的民兵活动，以及委员会介绍或推广的修辞在大众民族主义话语中的突出位置，都证明了委员会有能力表达一种能够同时呼应并改造多数叙利亚人所持信仰的民族主义。

第三部分对仪式的考察汇集了前两个部分介绍的主题。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为了内部和外部目的而上演了公共节日仪式、戏剧作品和游行。一方面，政府及其穆塔纳维尔支持者利用公共和半公共空间向民众灌输“爱国价值”，象征性地展示他们所认为的正确的社会秩序，并传播能够维护他们统治的特定民族叙事表演。另一方面，他们为外部观察者举办了仪式，以展示一个“文明的”（即根据国联和威尔逊原则制定的准备好独立的标准）和计划实现统一的民族。为了确保这些仪式保持秩序井然和意义清晰，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有效地阻止了大多数叙利亚人的积极参与，而且使他们成为观众或戏剧背景的角色，与活动毫无关联。结果，这些仪式以戏剧性的形式再现了民族主义精英与其余民众之间的鸿沟。正是这一鸿沟导致无论协约国采取何种行动，都无法使谢里夫家族和穆塔纳维尔所设想的民

族主义计划摆脱失败的命运。

虽然人民委员会发起的许多游行活动表面上与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所发起的游行活动类似，但是剩下一些游行却取消了与请愿或抗议相关的戏剧性序列。这些游行不仅描绘了一种与政府发起的游行形成鲜明对比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叙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指涉的。通过消除对外导向的仪式序列和打破观众与参与者之间的区分，这些游行活动象征性地再现了民族的缩影，并证实了叙利亚城市社会关系的根本转变，使持续的和积极主动的抗争性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尽管人民委员会在费萨尔统治的第二年制造了高涨的热情，但是在法国人侵叙利亚内陆后，不论是高级人民委员会还是国防委员会的城市基础结构都没能延续太久。甚至在法国军队越过分隔西部和东部占领区的边界之前，对城市中人民委员会的镇压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迅速且彻底。1920年7月12日，阿拉伯政府内政部宣布关闭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因为该组织的成立“没有遵守法律”。政府下令扣押该组织的文件，并威胁对它进行额外的法律制裁。[1] 随着政府进一步和更加严厉镇压的可能性迫在眉睫，特别是在第二天实施军事管制制度后，许多委员会的领导人逃离了大马士革。其中包括卡米勒·卡萨布，据称他逃到了库奈特拉，在马哈茂德·法乌尔处避难。[2] 随着亨利·古洛将军军队的推进，其他委员会成员逃亡到巴勒斯坦、埃及、伊拉克或叙利亚东部。

法国军队于1920年7月23日进入阿勒颇，两天后进入大马士革。占领当局扩大了阿拉伯政府时期便已开始的对人民委员会的镇压。8月初，军事法庭在部分民族主义领导人缺席的情况下判处他们死刑。被宣告有罪的来自高级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的主要活动家有：卡米勒·卡萨布、阿里·哈勒奇（‘Ali Khalqi，他在战争期间与卡萨布一起在汉志，费萨尔时期在迈尔季欧云地区领导了一支由穆塔瓦里和贝都因游击队组成的500

人的队伍[3])、艾哈迈德·穆拉维德、马哈茂德·法乌尔、舒克里·塔巴、拉希德·塔里阿、欧麦尔·巴赫拉万（'Umar Bahlawan，商人和大马士革高级人民委员会成员[4])、阿卜杜勒·卡迪尔·苏卡尔、图菲克·亚兹齐（Tawfiq Yaziji，《国防报》的编辑，曾支持人民委员会的活动）、乌斯曼·卡西姆（'Uthman Qasim，据称他领导了导言中介绍的对大马士革城堡的进攻[5])、亚辛·迪亚卜、伊德勒·哈拉比、纳比赫·阿兹马、萨米·萨拉支、苏布希·巴勒卡特、穆尼布·纳图尔。参加贾巴尔·埃米尔和泰勒凯莱赫事件的23名战斗人员也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阿卜杜拉·坎支·丹达什（'Abdallah al-Kanj al-Dandashi）、哈立德·卢斯坦姆（Khalid Rustum）和哈桑·易卜拉欣·丹达什（Hassan Ibrahim al-Dandashi），他们都是地方国防委员会的成员。[6]

在判处死刑的同时，法国还逮捕和监禁了一些人民委员会的次要领导人和委员会的支持者，罪名包括抢劫、密谋和非法拥有武器。被扣押的人中有图菲克·比萨尔（Tawfiq al-Bissar）和哈只·努尔·吉斯里（al-Hajj Nur al-Jisri），他们是分别来自阿卡（'Akkar）和阿勒颇的叙利亚国民大会成员，曾担任阿勒颇阿拉伯俱乐部和在阿勒颇以外地区活动的武装团伙之间的中间人。[7] 法国人特别热衷于追捕大马士革人民委员会的前成员：由于担心贝都因人和非正规军在邻近地区和哈兰取得的成功会在首都引发公开叛乱，法国当局在占领首都一个月内逮捕了大量所谓的“煽动者”。[8] 军事法庭的判决非常严厉：其中一名被法国人指控策划突袭村庄的人被判处20年监禁；另一人因同样的罪名被驱逐出叙利亚。[9] 占领当局判处这种或类似严厉的刑罚不仅是为了惩罚他们认为是有威胁的人，而且是为了恐吓其他民众，用一份法国报告的话说，“砍掉”（decapitate）那些怀有反法情绪的最具影响力的叙利亚家族。总之，占领当局采用了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明显是用来确保叙利亚人“明白政治是有风险的，有时置身事外是

更明智的”。[10]

除了军事法庭之外，法国当局还采取了其他各种措施来安抚民众，增强对其托管权力地位的支持，并消除委员会组织和宣传的影响。例如，在大马士革占领当局“谨慎地”鼓励里达·阿比德（Rida al-‘Abid）以已经解散的大马士革阿拉伯俱乐部为蓝本建立一个俱乐部，以进行亲法宣传。他们为穆罕默德·库尔德·阿里在大马士革的新闻事业提供赞助，每月发放20—40埃及镑的补助金给阿勒颇的6家报纸（《进步报》[*al-Taqaddum*]、《雷霆报》[*al-Sā'iqa*]、《乌玛报》[*al-Umma*]、《叙利亚通讯报》[*al-Barīd al-sūrī*]、《纳达报》[*al-Nahda*] 和《法国—叙利亚报》[*Le Franco-Syrien*]），也很有可能收买了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法塔特报》（*Fatāt al-‘Arab*）和《新叙利亚报》（*Sūriyya al-jadīda*）。他们撤换了顽固不化的社区和村庄领袖，争取友好部落（如阿纳扎）的支持，让他们在与人民委员会组织的游击队的作战中充当非正规军，在阿勒颇传播请愿书来显示对北方省份支持的“公共意志”，组织大众游行来展示阿拉伯政府“狂热和压榨”统治的终结，并展现法国的军事实力。[1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和人民委员会率先使用的动员、监督和赢取叙利亚民众支持的许多策略被法国政府用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叙利亚内陆的无政府状态助长了法国人进行这样的设计。在法国军队进入城市的前几天，多数叙利亚城市居民面对着一系列艰难困苦，这些困难妨碍了日常生活，并挫败了对法国占领的有组织抵抗。阿拉伯政府实施的戒严令不仅扰乱了城市活动的正常模式，还限制了民众抵抗法国人的能力：在阿拉伯政府溃退之前，它实施宵禁、关闭市场、禁播新闻、禁止政治集会、驱散游行、逮捕异见人士，并在其能力范围内征用交通工具及没收储存的武器。即使叙利亚人选择抵制这些措施，大量贝都因人涌入东部地区的城市（大马士革及其周边地区估计有1万人，阿勒颇约有3 000人，

霍姆斯和哈马估计有 1 500 人），这也使他们不敢走出家门。[12] 随着埃米尔费萨尔及其随行人员撤离到大马士革以南的基斯瓦村（Kiswa）以及地方治理结构的崩溃，无政府状态开始蔓延开来。在大马士革，店主试图通过在商店顶上悬挂意大利国旗来阻慑抢劫者；在霍姆斯，住在城郊的人被迫撤离家园，并被迫在武装志愿者的监督下建造防御工事；在阿勒颇，美国领事说服当地军事指挥官和警察局长留守岗位并组织武装巡逻来保障秩序。[13]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观察家在描述多数叙利亚人在法国入侵时期的情绪时经常使用诸如“沉闷的”和“疲倦的”的词语也就不足为奇了。[14]

当然，也存在例外：大马士革梅丹和沙古尔两区的居民在叙利亚首都被占领的初期确实与法国军队进行了枪战。易卜拉欣·哈纳努、萨利赫·阿里、马哈茂德·法乌尔和其他人在农村进行的斗争仍在继续。法国的资料（也许是真实的，也许是殖民者幻想的产物）证实了各类政治活动家重组已经转入地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秘密尝试。[15] 法国的担忧并非完全是幻想：1920 年 8 月 30 日，一支车特侦查纵队深入阿勒颇市中心，不仅引发了与法国军队的枪战，还制造了这样一种传言，即该纵队是土耳其人全面进攻该市的前兆，土耳其想要将它从法国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大约在同一时间，不明身份的袭击者伏击并杀害了阿拉丁·杜鲁比（‘Ala al-Din al-Durubi）和总理兼协商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拉赫曼·尤素夫，他们是费萨尔任命的最后一届阿拉伯政府的成员，留任以协助占领军的工作。[16]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件，法国人遇到的大多数抵抗不仅是防御性的和无组织的，而且是非暴力的。法国和英国的资料指出，叙利亚人普遍逃避要求交出武器的命令，阿勒颇的大量穆斯林居民不顾威胁，逃避在法国人散发的呼吁阿勒颇自治的请愿书上签名。相反，他们向当地美国领事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抱怨法国人的策略，并代表叙利亚人民要求其他协约国成员进行干预。[17] 叙利亚人还展开了针对占领者的小规模破坏行动。例如，

据称，古洛将军第一次来到大马士革时，一位参加过梅萨伦战役的高级人民委员会组织者的父亲阿布·舒克里·塔巴和一个同伴放开了将军马车的马匹。[18] 在法国占领叙利亚的最初几个月里，许多叙利亚人的反抗情绪受到了压制，这一情感最终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解放甚至奇迹般的新生的广泛谣言中得到了表达。1920 年夏末，在东部占领区最为流行的一个谣言称英国已经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占领者从东部占领区撤出，英国军队已经占领德拉的南部城镇并准备向北行进，土耳其支持的游击队团伙正准备入侵阿勒颇，世界末日正在临近。[19]

尽管零星的抵抗行为和关于解放的谣言表明，在梅萨伦的短暂、小规模冲突后，东部占领区的居民并没有一致地以被动姿态或宿命论来回应法国的入侵和占领，但是它们也没有证明过去几个月发生的民众动员具有非凡的意义。在叙述这些事件，以及描述费萨尔 22 个月的统治时期中争夺主导权的对立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建构时，我并未打算提供这样的证据。我也无意用一种民族主义神话替代另一种民族主义神话。相反，这项研究隐含的争论是费萨尔时期值得注意，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从奥斯曼军队撤出叙利亚到法国 25 年占领的开始，这段时间标志着阿拉伯中东民族主义历史上一个明显的划界性插曲，在此期间，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斗争尤为突出且争议不断。因此，这一时期提供了对那段历史更为广泛范围的颇具揭示性的一瞥。第二，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叙利亚民众动员加快并强化了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一直进行的两个进程：民族国家框架的传播，以重建被社会和政治动乱破坏的共同体；权力关系的转变带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扩散的加速。

20 世纪初，阿拉伯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具备民族主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先决条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许多因素——区域和全球范围内一体化市场的扩大、国家能力的增强、城市集中度的增长、新交通和通信技

术的引进、劳动力商品化的加剧等——加速了经济狭隘主义的瓦解，削弱了地方的、非正式构成的庇护主义纽带的整体效力，并打乱了越来越多民众的生活。虽然这些先决条件的出现本身并不足以确保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但它确实增加了在适当情况下有支持者接受民族主义者理念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受变革进程影响的人数的增加，支持者群体得到了扩大。

虽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民族主义的“文化体系”在阿拉伯中东居民中的扩大与深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它既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不是一个无差别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偶发的过程，由危机驱动，并受到组织者的影响，这些组织者从前人的努力中学习，并扩充这些努力。本书重点关注的是引发此类事件的长期和近期危机及政治活动家的行动，他们定义和塑造了一个暂时容纳大部分叙利亚人口的民族共同体。这些活动家在费萨尔时期进行的动员活动被证明是许多类似事件的前兆和先驱。1925—1927 年的叙利亚大起义和 1936—1939 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只是后续民族起义的两个例子，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本书所讨论的事件。[20]

尽管点燃和塑造每一个事件的本土、地区和国际层面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独特的，尽管在这些事件中激发民族主义者行动的意识形态断言（之后由他们转播）经常不同，但是这些事件有两个基本的共性。第一，上述变革过程的不平衡性和差别效应不仅决定了起义联盟的形式，还决定了联盟所表达的方案，以及为实现这一方案所采取的策略。结果，每个联盟都使用了话语修辞，并以世界各地民粹起义特有的方式对自己进行组织及开展活动。[21] 第二，每次起义都促进了进一步的社会转型，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的缺失事实上确保了类似起义在未来的发生。因此，费萨尔时期的事件远非孤立的历史奇事，它们预示着阿拉伯中东大众民族主义政治的到来，并且以某种形式一直持续延续到今天。

注释

［1］ *al-'Āsima*，12 July 1920，2. 根据同一消息源，阿拉伯政府对阿拉伯俱乐部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尽管该俱乐部是“为了科学和文学的目的而成立的……但它钻研的却是与其创立原则相反的政治问题”。

［2］ Général C. J. E. Andréa，*Thawrat al-Durūz wa tamarrud Dimashq*，32. 此后不久，卡萨布离开库奈特拉前往海法。

［3］ 关于哈勒奇的更多信息，参见 MD 4H114/1/83，“Rapport journalier de Damas，” 25 November 1919；MD 4H114/2/141，Cousse to Gouraud，26 March 1920；IO L/PS/10/802/P5598/48，Wratislaw to Secretary of State，22 June 1920；FO 371/5049/E6473/216 ff.，Report of French Liaison Officer，18—24 May 1920；MAE L：SL/vol.33/119，Gouraud to Millerand，“Note au sujet des rapports entre le haut-commission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Syrie-cilicie et l'emir Fayçal，” 22 September 1920；MD 4H114/8，Arlabouse to Catroux，13 October 1920。

［4］ Khayr al-Dīn al-Ziriklī，*Ma ra'aytu wa ma sami'tu*，14—16.

［5］ 关于卡西姆的更多信息，参见 Qadrī，*Mudhakkarātī*，248；Hindī，*Ma'rakat Maysalūn*，61—62；AD 2324/a1，25 June 1919；FO 371/4183/136154，Lutfallah to Lloyd George，16 September 1919；AD 2375/chemise：division de la Syrie，1919-1920/361a，Col. Sousselier to GC，7 February 1920。

［6］ 1920 年 8 月 9 日，法国建议处决 36 名民族主义组织和阿拉伯政府的成员；哈伊尔丁·兹里克里（Khayr al-Dīn al-Ziriklī）列出了 58 名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名单。MD 4H109/1，Général Gouraud，12 August 1920；al-Ziriklī，*Ma ra'aytu wa ma sami'tu*，14—16；Hindī，*Kifāh al-sha'b al-'arabī al-sūrī*，89.

［7］ FO 861/68，“Report on the Situation in Aleppo，” 9 September 1920.

［8］ MAE L：SL/vol.116/1726—1733，Gouraud to Guerre section orientale，28 August 1920.

［9］ MD 4H109/dossier 1，Gouraud to Généralsommandants 2ème et aème divisions，12 August 1920.

［10］ MAE L：SL/vol.33，La Marine dans le Levant，“Rapport hebdomadaire sur la situation politique，” 20 August 1920.

［11］ MD 4H109/1，“Projet d'instructions pour le general Goybet，” 30 July 1920；MD 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324，” 11 August 1920；FO 861/67，“General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at Aleppo，” 21 August 1920；FO 861/68，“Report on the Situation at Aleppo，” 9 September 1920；MAE L：SL/vol.33，Capitaine de Lestapis，“Notes de la press 10，” 15 September 1920.

［12］ *al-'Āsima*，15 July 1920，1—2；IO L/PS/10/802/p6248，Consul General，Beirut to FO，16 July 1920；FO 371/5037/E8509，Mackereth to FO，16 July 1920；MD 4H114/dossier 5，Cousse to Gouraud，17 July 1920；MD 4H60/dossier 1，“Bulletin quotidien 1260，” 19 July 1920；MD 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266，” 21 July 1920；FO 371/5037/E8880/80，Mackereth to FO，23 July 1920；Kersante，“Syrie：L'occupation d' Alep.”

［13］ MD 4H60/dossier 1，“Bulletin quotidien 1266，” 21 July 1920；FO 371/5039/E10316，J. B. Jackson，30 July 1920；Angelil，“L'occupation d'Homs”；Kersante，“Syrie：L'occupation d'Alep.”

［14］ MD 4H58/dossier 2，“Rapport hebdomadaire：29 juillet à 4 août”；MD 4H60/dossier 1，“Bulletin quotidien 1324，” 11 August 1920；23.12 MD 4H60/dossier 1，“Bulletin quotidien 1327，” 12 August 1920；MAE L：SL/vol.33，“Rapport hebdomadaire sur la situation politique，” 20 August 1920；FO 861/67，“General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at Aleppo，” 21 August 1920；Angelil，“L'occupation d'Homs”；Kersante，“Syrie：L'occupation d'Alep.”

［15］ 参见 MD 4H58/2，“Rapport hebdomadaire：29 juillet à 4 août”；MD 4H114/5/714，Toulat to HC，n.d.；MD/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324，” 11 August 1920；MD 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327，” 12 August 1920；MAE L：SL/vol.116/1726—1733，Gouraud to MD，28 August 1920。

［16］ FO 861/68，Report on the Situation at Aleppo，9 September 1920；Khoury，*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98—99.

［17］ FO 861/68，“Report on the Situation at Aleppo，” 9 September 1920.

［18］ al-Amīn，*Dhikrayāt*，28.

［19］ MD 4H58/2，“Rapport hebdomadaire：29 juillet à 4 août”；MD 4H60/1，“Bulletin quotidien，” 12 August 1920；FO 861/68，“Report on the Situation at Aleppo，” 9 September 1920.

［20］ 许多参与了本书所述事件的人后来又参加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起义。在1919年至1920年期间，在1925—1927年叙利亚大起义中，各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和支持者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有阿卜杜勒·卡迪尔·苏卡尔、拉马丹·沙拉什、穆罕默德·阿什马尔（Muhammad al-‘Ashmar）、伊德勒·哈拉比、哈桑·哈拉特和艾哈迈德·穆拉维德。

谢赫伊兹丁·卡萨姆（Shaykh ‘Izz al-Din al-Qassam）是一位受欢迎的学者，他组织活动，随后于1935年在一次命运多舛的袭击中死于英国人之手，成为引发巴勒斯坦大起义的主要因素。他还对叙利亚人民委员会的活动了如指掌。在费萨尔时期，卡萨姆不仅参加了萨利赫·阿里的非正规军在拉塔基亚地区的游击活动，而且在法国入侵叙利亚内陆后，他在卡米勒·卡萨布的协助下逃往海法。两人在流亡期间继续合作，先是一起在伊斯兰学校教书（直到1925年他们发生争执），然后在乡村巡回宣扬反抗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参见 al-Jundī，*Tārīkh al-thawrāt al-sūriyya dī ‘ahd al-intidāb al-faransī*；al-Hāfiz and Abāza，*Tārīkh ‘ulamā’Dimashq*；Khoury，*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174—182；Hamūda，*al-Wa’ī wal-thawr*a，42—43，45，50。

［21］ 在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使用的一些常用比喻，参见 Nels Johnson，*Islam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Ted Swedenburg，*Memories of Revolt：The 1936—1939 Rebellion and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Past*。

参考文献

档案资料

Archives diplomatiques, Nantes, France

Boston University Archives (William Yale Papers)

British Library, London (Arthur James Balfour Papers)

Foreign Office, London

India Office, London

Markaz al-wathā'iq al-tārīkhiyya, Damascus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Vincennes, Franc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Paris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Salafiyya Library, Cairo (Lajna Waṭaniyya, Lajnat al-Difā', al-Fatāt, Kāmil al-Qassāb files)

Suda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Durham, England (Shuqayr Papers, F. R. Wingate Paper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Albert H. Lybyer Archives)

War Office, London

报纸和杂志

al-Ahrām

Arab Bulletin

L'Asie français

al-'Āṣima

al-Bashīr

al-Difā'

al-Fallāḥ

al-Ḥaqiqa
al-Jundī
al-Kawkab
al-Kināna
al-Manār
al-Muqtabas
The Near East
Petite relations d'orient
al-Qibla
Sūriyya al-jadīda

书籍、文章和未发表的手稿

Abrahamian, Ervand.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1983.

Adamson, Walter L. *Hegemony and Revolution: A Study of Antonio Gramsci'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Berkeley, 1980.

al-'Ajlūnī, Muḥammad 'Alī. *Dhikrayāt '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 Amman, 1956.

Alexān, Jān. "Zaynab fī Maysalūn." *al-Jundī*, 19 April 1960: 32—33.

al-'Allāf, Aḥmad Ḥilmī. *Dimashq fī maṭla' al-qarn al-'ishrīn*. Edited by 'Alī Jamīl Nu'īysa. Damascus, 1976.

Allcock, J. B. "'Populism': A Brief Biography." *Sociology* 5 (September 1971): 371—387.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London, 1969.

al-Amīn, Ḥasan. *Dhikrayāt, al-Juz' al-awwal: Min al-ṭufūla ilā al-ṣibā*. Beirut, 1973.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1983.

Andréa, Général C. J. E. *Thawrat al-Durūz wa tamarrud Dimashq*. Translated into Arabic by Ḥāfiẓ Abū Musliḥ. Beirut, 1985.

Angelil, P. G. "L'occupation d'Homs: Angoisses et délivrance." *Petite relations d'orient* 6 (November 1920): 180—191.

Antonius, George. *The Arab Awakening: The Story of 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 London, 1938.

Arjomand, Said Amir. "Tradition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Iran." In *From Nationalism to Revolutionary Islam*, edited by Said Amir Arjomand, 195—232.

London, 1984.

'Askar, Iḥsān. *Nash'at al-ṣiḥāfa al-sūriyya: 'Arḍ lil-qawmiyya fī ṭawr al-nash'a min al-'ahd al-'uthmānī ḥattā qiyām al-dawla al-'arabiyya*. Cairo, 1972.

Ayalon, Ami. *Language and Change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1987.

al-'Aẓm, Khālid. *Mudhakkarāt Khālid al-'Aẓm*. Vol.1. Beirut, 1973.

al-'Aẓma, 'Abd al-'Azīz. *Mir'āt al-Shām: Tārīkh Dimashq wa ahlihā*. London, 1987.

Bābīl, Naṣūḥ. *Ṣiḥāfa wa siyāsa: Sūriyya fī al-qarn al-'ishrīn*. London, 1987.

Badawi, M. M. *Early Arabic Drama*. Cambridge, England, 1988.

Baer, Gabriel. *Fellah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 Social History*. London, 1982.

——. "Village and Countryside in Egypt and Syria: 1500—1900." In *The Islamic Middle East 700—1900*, edited by A. L. Udovitch, 595—652. Princeton, 1981.

Baker, Ray Stannard, and William E. Dodd, eds.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s.5—6: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5)*. New York, 1927.

Bakhtin, M.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Edited by Michael Holquist. Translated by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1981.

Balāwī, Muṣṭafā. "al-Aḥzāb al-siyāsiyya fī Sūriyya (1920—1939)."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Damascus, 1985.

Balibar, Etienne. "The Nation Form: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edited by Geoff Eley and Ronald Grigor Suny, 151—178. Oxford, 1996.

al-Bārūdī, Fakhrī. *Mudhakkarāt al-Bārūdī*. 2 vols. Beirut, 1951.

Baṣrī, Mīr. *A'lām al-siyāsiyya fī al-Irāq al-ḥadīth*. London, 1987.

Bayhum, Muḥammad Jamīl. *Sūriyya wa Lubnān 1918—1922*. Beirut, 1968.

Bernstein, Michael André. *Bitter Carnival: Ressentiment and the Abject Hero*. Princeton, 1992.

Berque, Jacques. *Egypt,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Jean Stewart. New York, 1972.

Birrū, Tawfīq. "al-Muntadā al-adabī wa dawruhu fī al-niḍāl al-'arabī." *al-Ma'rifa* 38 (April, 1965): 35—44.

Bourdieu, Pierre.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In *Algeria 1960*, 1—94.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England, 1979.

——.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Stanford, 1990.

——.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ited by John B. Thompson. Translated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Mass., 1991.

——.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England, 1972.

Breuilly, John.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1982.

Brown, L. Carl. "Patterns Forged in Time: Middle East Mind-Sets and the Gulf War." In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the Gulf War*, edited by Stanley A. Renshon, 3—21. Pittsburgh, 1993.

Calhoun, Craig Jackson. "The Radicalism of Tradition: Community Strength or Venerable Disguise and Borrowed Langua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March 1983): 886—914.

Cannadine, David. "The Context, Performance and Meaning of Ritual: The British Monarchy an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 1820—1977."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ited by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101—164. Cambridge, England, 1983.

Canovan, Margaret. "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 *Political Studies* 30 (December 1982): 544—552.

"The Case of Emir Feisal." *Current History* 13(2) (February 1921): 254.

Castoriadis, Cornelius.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Kathleen Blamey. Cambridge, Mass., 1987.

al-Charkas, Maḥmūd. *al-Dalīl al-muṣawwar lil-bilād al-'arabiyya*. Vol.1. Damascus, 1930.

Chatterjee, Partha.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Colonized Women: The Contest in India." *American Ethnologist* 16 (1989): 622—633.

——.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1993.

——.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Minneapolis, 1986.

Chevallier, Dominique. "Consciences syriennes et représentations cartographiques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et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In *The Syrian Land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ommon and the Specific i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edited by Thomas Philipp, 1—10. Stuttgart, 1992.

Clark, John et al. "Sub Cultures, Cultures, Class." In *Culture, Ideology, and Social Process: A Reader*, edited by Tony Bennett et al., 53—79. London, 1981.

Cleveland, William L. *The Making of an Arab Nationalist: Ottomanism and*

Arabism i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Sati' al-Husri. Princeton, 1971.

Cohen, Anthony P.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ondon, 1985.

Coke, Richard. *The Arab's Place in the Sun*. London, 1929.

Comaroff, John L. "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 *Ethnos* 52 (1987): 301—323.

Commins, David Dean. *Islamic Reform: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e Ottoman Syria*. New York, 1990.

——. "Religious Reformers and Arabists in Damascus, 1885—19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8 (1986): 405—425.

Cotler, Julio. "State and Regime: Comparative Notes on the Southern Cone and the 'Enclave' Societies." In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edited by David Collier, 255—282. Princeton, 1979.

Crossick, Geoffrey. "From Gentleman to the Residuum: Languages of Social Description in Victorian Britain." In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edited by Penelope J. Corfield, 150—178. Oxford, 1991.

Dāghir, As'ad. *Mudhakkarātī 'alā hāmish al-qaḍiyya al-'arabiyya*. Cairo, 1956.

Darwaza, Muḥammad 'Izzat. *Ḥawla al-ḥaraka al-'arabiyya al-ḥadītha*. Vol.1. Sidon, 1950.

——. *Mudhakkarāt wa tasjīlāt*. Vol.2. Damascus, 1984.

Davis, Eric. "The Concept of Revival and the Study of Islam and Politics." In *The Islamic Impulse*, edited by Barbara Freyer Stowasser, 37—58. Washington, D.C., 1987.

Davis, Natalie Zemon. "The Rites of Violence: Religious Rio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59 (1973): 51—91.

Dawn, C. Ernest. *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Urbana, 1973.

——.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I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edited by Rashid Khalidi et al., 3—30. New York, 1991.

de la Torre, Carlos. "The Ambiguous Meanings of Latin American Populisms." *Social Research* 59 (Summer 1992): 385—414.

Deringil, Selim. "Legitimacy Structures in the Ottoman State: The Reign of Abdulhamid II (1876—190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3 (1991): 345—359.

di Tella, T. S. "Populism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In *Obstacles to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edited by C. Veliz, 47—74. Oxford, 1962.

Doumani, Beshara. *Rediscovering Palestine: Merchants and Peasants in Jabal Nablus, 1700—1900*. Berkeley, 1995.

Drake, Paul W. "Requiem for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Michael L. Conniff, 217—245. Albuquerque, 1982.

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1995.

Dubois, Jean. *Le Vocabulaire politique et social en France de 1869 à 1872: à travers les oeuvres des écrivains, les revues et les journaux*. Paris, 1962.

Duggan, Stephen P. "Syria and Its Tangled Problems." *Current History* 13(2) (February 1920): 238—248.

Durkheim, Emil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anslated by J. S. Swain. New York, 1961.

——.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 Translated by Cornelia Brookfield. Glencoe, Ill., 1958.

Eagleton, Terry. *Ideology*. London, 1991.

Esherick, Joseph W.,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 (November 1990): 835—865.

al-Fāḍil, Ilyās, and Rāmiz Ḥīthāwī. *al-Kitāb al-dhahabī lil-mujāhidin al-sūriyyin*. Damascus, 1972.

al-Farḥānī, Muḥammad. *Fāris al-Khūrī wal-ayyām la tunsā.* Beirut, 1965.

Farzat, Muḥammad Ḥarb. *al-Ḥayā al-ḥizbiyya fī Sūriyya: Dirāsa tārīkhiyya li-nash'at al-aḥzāb al-siyāsiyya wa tatawwurihā bayna 1908—1955*. Damascus, 1955.

Fawaz, Leila Tarazi. *Merchants and Migra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Beirut*. Cambridge, Mass., 1983.

Femia, Joseph V.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Hegemony,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xford, 1987.

Fromkin, David.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1989.

Furet, François.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Elborg Forster. Cambridge, England, 1981.

Geertz, Clifford.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Fate of Nationalism in New Stat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234—254. New York, 1973.

——. "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edited by Michael Banton, 1—46. London, 1966.

Gellner, Ernest. "The Sacred and the National." In *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 59—73. Oxford, 1994.

——.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1983.

Gelvin, James L. "Demonstrating Communities in Post-Ottoman Syria."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5(1) (summer 1994): 23—44.

——. "Demonstrating Communities in Post-Ottoman Syri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5 (summer 1994): 23—44.

——. "The Ironic Legacy of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eassessment*, edited by David W. Lesch, 11—27. Boulder, 1995.

——. "The Other Arab Nationalism: Syrian/Arab Populism in Its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s." In *Rethinking Nationalisms in the Arab World*, edited by James Jankowski and Israel Gershoni, 231—248. New York, 1997.

——. "The Social Origins of Popular Nationalism in Syria: Evidence for a New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6 (November 1994): 645—662.

Ghazzī, Kāmil. *Nahr al-dhahab fī tārīkh Ḥalab*. 3 vols. Aleppo, 1923—1926.

al-Ghuṣayn, Fā'iz. *Mudhakkarātī 'an al-thawra*. Damascus, 1956.

Gilbar, Gad G. "Chang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Ties: The Syrian and Iraqi Province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In *The Syrian Land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Common and the Specific i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edited by Thomas Philipp, 55—68. Stuttgart, 1992.

Gilsenan, Michael. "Against 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Patrons and Clients in Mediterranean Societies*, edited by Ernest Gellner and John Waterbury, 167—183. London, 1977.

Gontaut-Biron, Roger de. *Comment la France s'est installée en Syrie (1918—1919)*. Paris, 1923.

Graham-Brown, Sarah. "Agriculture and Labour Transformation in Palestine." In *The Rural Middle East: Peasant Lives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edited by Kathy and Pandeli Glavanis, 53—69. London, 1989.

Gramsci, Antonio.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1987.

Guha, Ranajit.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 Delhi, 1983.

——. "On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 In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edited by 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37—44. Oxford, 1988.

Habermas, Ju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and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ss., 1993.

al-Ḥaffār, Wajīh. "al-Ḥukūmāt allatī ta'āqabat 'alā al-ḥukm fī Sūriyya." *al-Shurṭa wal-amn al-'āmm* 1(2 ramaḍān 1372—ḥazīrān 1373).

al-Ḥāfiẓ, Muḥammad Muṭī', and Nizār Abāẓa. *Tārīkh 'ulamā' Dimashq fī al-qarn al-rābi' 'ashar al-hijrī*. Damascus, 1986.

Haim, Sylvia.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Berkeley, 1962.

al-Ḥakīm, Ḥasan. *Khubarātī fī al-ḥukm*. Amman, 1978.

——. *al-Wathā'iq al-tārīkhiyya al-muta'alliqa bil-qaḍiyya al-sūriyya fī al-'ahdayn al-'arabī al-fayṣalī wal-intidābī al-faransī, 1915—1946*. Beirut, 1974.

al-Ḥakīm, Yūsuf. *Dhikrayāt*. Vol.3: *Sūriyya wal-'ahd al-fayṣalī*. Beirut, 1966.

Hall, Stuart. "Ethnicit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edited by Geoff Eley and Ronald Grigor Suny, 339—351. Oxford, 1996.

Ḥamūda, Samīḥ. *al-Wa'ī wal-thawra: dirāsa fī ḥayāt wa jihād al-Shaykh 'Izz al-Dīn al-Qassām, 1868—1935*. Amman, 1987.

Handelman, Don. *Models and Mirror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Public Events*. Cambridge, England, 1990.

Hassan, Najate Kassab (Hasan, Najāt Qassāb). *Ḥadīth dimashqī 1884—1983*. Damascus, 1988.

Haut-commissaria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Syrie et au Liban. *La Syrie et le Liban en 1922*. Paris, 1922.

Hindī, Iḥsān. *Kifāḥ al-sha'b al-'arabī al-sūrī, 1908—1948*. Damascus, 1962.

——. *Ma'rakat Maysalūn*. Damascus, 1967.

Hobsbawm, E. J.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1987.

——.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ited by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1—14. Cambridge, England, 1983.

——. "Mass-Producing Traditions: Europe, 1870—1914."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ited by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263—308. Cambridge, England, 1983.

——.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England, 1990.

——.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1959.

Hofstadter, Richard. *Age of Reform*. New York, 1955.

Holmes, William F. "Populism: In Search of Context." *Agricultural History* 64(fall 1990): 26—58.

Hourani, Albert. "*The Arab Awakening* Forty Years After." In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edited by Albert Hourani, 193—215. Berkeley, 1981.

——.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Cambridge, Mass., 1991.

——. "Ottoman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Notables." In *Beginning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edited by W. R. Polk and R. L. Chambers, 41—68. Chicago, 1968.

Howard, Harry N.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 An American Inquiry in the Middle East*. Beirut, 1963.

Hroch, Miroslav.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Patriotic Groups Among the Smaller European Nations*.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Cambridge, England, 1985.

Hunt, Lynn.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1984.

Hurewitz, J. C.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Record*. Vol.2: *British-French Supremacy, 1914—1945*. New Haven, 1979.

al-Ḥusnī, Muḥammad Adīb Āl Taqī al-Dīn. *Kitāb muntakhabāt al-tawārīkh li-Dimashq*. 3 vols. Beirut, 1969.

al-Ḥuṣrī, (Abū Khaldūn) Sāṭi'(al-Husri, Abu Khaldun Sati'). *The Day of Maysalun: A Page from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Arabs*. Translated by Sidney Glazer. Washington D.C., 1966.

——. *Yawm Maysalūn*. Beirut, 1947.

al-Ḥuṣrī Khaldūn Sāṭi'. *Mudhakkarāt Ṭaha al-Hāshimī, 1919—1944*. Beirut, 1967.

Ibn Dhurayl, 'Adnān. *al-Adab al-masraḥī fī Sūriyya: Dirāsa fī al-masraḥiyya al-'arabiyya al-sūriyya mundhu Abī Khalīl al-Qabbānī ilā al-yawm*. Damascus, n.d.

——. *al-Masraḥ al-sūrī mundhu al-Qabbānī ilā al-yaum*. Damascus, 1971.

Ibrāhīm Pāshā, Jamīl. *Niḍāl al-aḥrār fī sabīl al-istiqlāl*. Aleppo, 1959.

al-'Iyāshī, Ghālib. *al-Īḍāḥāt al-siyāsiyya wa asrār al-intidāb al-faransī 'alā Sūriyya*. Beirut, 1955.

——. *Tārīkh Sūriyya al-siyāsī min al-intidāb ilā al-inqilāb: 1918—1954*. Beirut, 1955.

Izutsu, Toshihiko. *Ethico-Religious Concepts in the Qur'an*. Montreal, 1966.

Jamāl Bāshā. *Mudhakkarāt Jamāl Bāshā*. Translated into Arabic by 'Alī Aḥmad Shukrī. Cairo, 1923.

James, Daniel. *Resistance and Integration: Peronism and the Argentine Working*

Class, 1946—1976. Cambridge, England, 1988.

Jankowski, James. "Egypt and Early Arab Nationalism, 1908—1922." I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edited by Rashid Khalidi et al., 243—270. New York, 1991.

Joarder, Safiuddin. *Syria Under the French Mandate: The Early Phase, 1920—1927.* Dacca, 1977.

Johnson, Michael. "Political Bosses and Their Gangs: Zu'ama and Qabadayat in the Sunni Muslim Quarters of Beirut." In *Patrons and Clients in Mediterranean Societies*, edited by Ernest Gellner and John Waterbury, 207—224. London, 1977.

Johnson, Nels, *Islam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in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London, 1982.

al-Jundī, Adham. *Shuhadā' al-ḥarb al-'ālamiyya al-kubrā.* Damascus, 1960.

——. *Tārīkh al-thawrāt al-sūriyya fī 'ahd al-intidāb al-fransī.* Damascus, 1960.

Kandiyoti, Deniz. "Identity and Its Discontents: Women and the Nation." I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376—391. New York, 1994.

Karpat, Kemal 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1789—190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 (1971): 243—281.

Kasaba, Resat. "Populism in Turkey, 1946—1961." In *Rules and Rights in the Middle East: Democracy, Law, Society*, edited by Ellis Goldberg, Resat Kasaba, and Joel S. Migdal, 43—68. Seattle, 1993.

Kasmieh, Khairia (Khayriyya Qāsimiyya). "An Evaluation of the Arab Government in Damascus, 1918—1920." In *State and Society in Syria and Lebanon*, edited by Youssef M. Choueiri, 27—31. New York, 1993.

——. *al-Ḥukūma al-'arabiyya fī Dimashq bayna 1918—1920.* Beirut, 1982.

al-Kawākibī, Nazīh. "al-Maẓhar al-'umrānī li-Dimashq fī al-muntaṣaf al-thānī lil-qarn al-tāsi' 'ashr." In *Dimashq: dirāsāt tārīkhiyya wa athariyya,* 187—201. Damascus, 1980.

al-Kaylanī, Fakhrī Nūrī. "Qirā'a fī milaff al-ṣiḥāfa bayna 'āmī 1727 wa 1928 fī bilād al-Shām." n.p., n.d. (Handwritten manuscript.)

Kedourie, Elie. *Arabic Political Memoirs and Other Studies.* London, 1974.

——. "The Capture of Damascus, 1 October 1918." In *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and Othe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3—51. Hanover, N.H., 1970.

——. *Nationalism.* Oxford, 1993.

——. *Nation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London, 1971.

——. "Pan-Arabism and British Policy." In *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and Othe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13—235. Hanover, N.H., 1970.

Kersante, Jules. "Syrie: L'occupation d'Alep." *Petite relations d'orient* 6 (November 1920): 170—177.

Khalidi, Rashid. "'Abd al-Ghani al-'Uraisi and *Al-Mufid*: The Press and Arab Nationalism before 1914." In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Arab East, 1890—1939*, edited by Marwan Buheiry, 84—91. Beirut, 1981.

——. "Arab Nationalism in Syria: The Formative Years, 1908—1914." In *Nationalism in a Non-National Stat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edited by William W. Haddad and William Ochsenwald, 207—238. Columbus, 1977.

——.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Introduction." I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edited by Rashid Khalidi et al., vii—xix. New York, 1991.

——. "Ottomanism and Arabism in Syria Before 1914: A Reassessment." I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edited by Rashid Khalidi et al., 50—69. New York, 1991.

——. "Society and Ideology in Late Ottoman Syria." In *Problems of the Middle Eas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ssays in Honour of Albert Hourani*, edited by John Spagnolo, 119—131. Reading, England, 1992.

al-Khaṭīb, Muḥibb al-Dīn. "Mudhakkarāt Muḥibb al-Dīn al-Khaṭīb." *al-Thaqāfa* (Algiers) 1—3 (January 1972—August/ September 1973).

——. *al-Mu' tamar al-'arabī al-awwal*. Cairo, 1913.

Khoury, Philip S.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The Politics of Arab Nationalism, 1920—1945*. Princeton, 1987.

——. "Syrian Political Cultur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Syria: Society, Culture, and Polity*, edited by Donald Quataert and Richard T. Antoun, 13—27. Albany, 1991.

——. *Urban Notables and Arab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Damascus 1860—1920*. Cambridge, England, 1983.

Kohn, Hans. *A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the East*. London, 1929.

Kubik, Jan. *The Power of Symbols against the Symbols of Power: The Rise of Solidarity and the Fall of State Socialism in Poland*. University Park, 1994.

Kurd 'Alī, Muḥammad. *Khiṭaṭ al-Shām*. 6 vols. Damascus, 1983.

Laclau, Ernesto.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Fascism—Communism*. London, 1977.

Landau, Jacob M. *Studies in the Arab Theater and Cinema*. Philadelphia, 1958.

Landes, Joan B.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1988.

Lane, Christel. *The Rites of Rulers: Ritual in Industrial Society—The Soviet Case*. Cambridge, England, 1981.

Lasswell, Harold D. "The Language of Power." In *Language of Politics: Studies in Quantitative Semantics*, edited by Harold D. Lasswell et al., 3—19. New York, 1949.

Lawrence, T. E. "Emir Feisal II: The Sykes-Picot Treaty, Impatient Arabs." *Times* (London), 11 August 1920, 9.

——. *Evolution of a Revolt*. Edited by Stanley and Rodelle Weintraub. London, 1968.

Lecerf, J., and R. Tresse. "Les *'arada* de Damas." *Bulletin d'études orientales* 7—8 (1937—1938): 237—264.

Lesch, Anne Mosely. *Arab Politics in Palestine, 1917—1939: The Frustration of a Nationalist Movement*. Ithaca, 1979.

Lincoln, Bruce. *Discour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Myth, Ritual, and Classification*. New York, 1989.

Link, Arthur S.,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s. 56, 58. Princeton, 1987.

Loder, John de Vere. *The Truth About Mesopotamia, Palestine, and Syria*. London, 1923.

Longrigg, Stephen Hemsley. *Syria and Lebanon under French Mandate*. London, 1958.

Lukitz, Liora. "The Antonius Papers and *The Arab Awakening*, Over Fifty Years 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0 (October 1994): 883—895.

Luxemburg, Rosa. "The Mass Strike,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 In *Rosa Luxemburg Speaks*, edited by Mary-Alice Waters, 153—218. New York, 1970.

MacCallum, Elizabeth P. "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 *Muslim World* 25 (October 1935): 359—374.

Mach, Zdzislaw. *Symbols, Conflict, and Identity: Essays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lbany, 1993.

MacRae, Donald. "Populism as an Ideology." In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dited by Ghita Ionescu and Ernest Gellner, 153—165. London, 1969.

Mallon, Florencia E. *Peasant and Nation: The Making of Postcolonial Mexico and Peru*. Berkeley, 1995.

Ma'oz, Moshe.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on Syr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during the Early Tanzimat Period." In *Beginning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William R. Polk and Richard L. Chambers, 333—350. Chicago, 1968.

Mardam Bek, Khalīl. *Dimashq wal-Quds fī al-'ishrīnāt*. Edited by 'Adnān Mardam Bek. Beirut, 1978.

Masters, Bruce. "Ottoman Policies toward Syria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n *The Syrian Land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The Common and the Specific i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edited by Thomas Philipp, 11—26. Stuttgart, 1992.

Meinertzhagen, Richard. *Middle East Diary, 1917—1956*. New York, 1960.

Minogue, Kenneth. "Populism as a Political Movement." In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dited by Ghita Ionescu and Ernest Gellner, 197—211. London, 1969.

Moghadam, Val. "Islamic Populism, Class, and Gender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in Iran*, edited by John Foran, 189—222. Minneapolis, 1994.

Monroe, Paul et 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Near East*. New York, 1924.

Moore, Sally F., and Barbara Myerhoff,, eds. *Secular Ritual*. Amsterdam, 1977.

Mosse, George L. *Fallen Soldiers: Reshaping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Wars*. New York, 1990.

——. *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Madison, 1985.

——.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75.

Mouzelis, Nicos. "On the Concept of Populism: Populist and Clientalist Modes of Incorporation in Semiperipheral Polities." *Politics and Society* 14 (1985): 329—348.

Muḥammad, Nadīm Mu'alla. *al-Adab al-masraḥī fī Sūriyya: nash'a-taṭa-wwur*. Damascus, 1982.

Mūsā, Sulaymān. *al-Ḥaraka al-'arabiyya: al-Marḥala al-ūlā lil-nahḍa al-'arabiyya al-ḥadītha, 1908—1924*. Beirut, 1986.

——. *al-Murāsalāt al-tārīkhiyya*. Vol.1: 1914—1918. Amman, 1973.

——. *al-Murāsalāt al-tārīkhiyya*. Vol.2: 1919. Amman, 1975.

——. *al-Murāsalāt al-tārīkhiyya*. Vol.3: 1920—1923. Amman, 1978.

Muslih, Muhammad Y. *The 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New York,

1988.

——. "The Rise of Local Nationalism in the Arab East." I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edited by Rashid Khalidi et al., 167—185. New York, 1991.

Nairn, Tom. "The Modern Janus." *New Left Review* 94 (1975): 3—29.

Nietzsche, Friedrich.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Edited by Walter Kaufmann.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1969.

——. *The Will to Power*. Edited by Walter Kaufmann.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1967.

Ochsenwald, William. "Ironic Origins: Arab Nationalism in the Hijaz, 1882—1914." I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edited by Rashid Khalidi et al., 189—203. New York, 1991.

Ortner, Sherry B. "On Key Symbol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5 (1973): 1338—1346.

Owen, Roger.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1981.

Ozouf, Mona.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ss., 1988.

Ozveren, Y. Eyup. "Beirut." *Review* 16 (fall 1993): 467—497.

Pascual, Jean-Paul. "La Syrie à l'époque ottomane (le XIXe siècle)." In *La Syrie d'aujourd'hui*, edited by André Raymond, 31—53. Paris, 1980.

Peukert, Detlev J. K.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Richard Deveson. New York, 1989.

Philipp, Thomas. *The Syrians in Egypt, 1725—1975*. Stuttgart, 1985.

Porath, Yehoshua.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Arab National Movement, 1918—1929*. London, 1974.

Qadrī, Aḥmad. *Mudhakkarātī '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 Damascus, 1956.

al-Qāsimī, Ẓāfir. *Maktab 'Anbar: ṣuwar wa dhikrayāt min hayātina al-thaqāfiyya wal-siyāsiyya wal-ijtimā'iyya*. Beirut, 1964.

Rafeq, Abdul-Karim. "Arabism, Society, and Economy in Syria, 1918—1920." In *State and Society in Syria and Lebanon*, edited by Youssef M. Choueiri, 1—26. New York, 1993.

al-Rayyis, Munīr. *al-Kitāb al-dhahabī lil-thawrāt al-waṭaniyya fī al-mashriq al-'arabī: al-Thawra al-sūriyya al-kubrā*. Beirut, 1969.

Reilly, James Anthony. "Origi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in the Damascus Region, 1830—1914." Ph.D. dissert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87.

——. "Women in the Economic Life of Late-Ottoman Damascus." *Arabica* 42 (1995): 79—106.

Rengger, N. J. *Political Theory,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Oxford, 1995.

Riḍā, Rashīd. *Mukhtārāt siyāsiyya min majallat "al-Manār"*.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Wajīh Kawtharānī. Beirut, 1980.

al-Rifā'ī, Anwar. *Jihād nuṣf qarn: Sumūw al-amīr Sa'īd al-Jazā'irī*. Damascus, n.d.

al-Rīḥānī, Amīn. *Mulūk al-'arab, aw riḥla fī al-bilād al-'arabiyya*. Beirut, 1951.

al-Rīmāwī, Suhayla. *Jam'iyyat al-'arabiyya al-Fatāt al-sirriyya: Dirāsa wathā'iqiyya, 1909—1918*. Amman, 1988.

——. *al-Tajriba al-fayṣaliyya fī bilād al-Shām*. Amman, 1988.

Robin, Regine. *Histoire et Linguistique*. Paris, 1973.

Roded, Ruth. "Ottoman Service as a Vehicle for the Rise of New Upstarts among the Urban Elite Families of Syri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Ottoman Rule."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7 (1983): 63—94.

Rothenberg, Winifred Barr. *From Market-Places to a Market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Massachusetts, 1750—1850*. Chicago, 1992.

Rowe, William, and Vivian Schelling. *Memory and Modernity: Popular Culture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1991.

Rudé, George. *The Crowd in History: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1730—1848*. London, 1964.

Ruedy, John.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Bloomington, 1992.

Russell, Malcolm. *The First Modern Arab State: Syria under Faysal 1918—1920*. Minneapolis, 1985.

Ryan, Mary. "The American Parad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Order." I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by Lynn Hunt, 131—153. Berkeley, 1989.

Sachar, Howard N. *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East: 1914—1924*. New York, 1969.

al-Safarjalānī, Muḥī al-Dīn. *Fāji'at Maysalūn wal-baṭal al-'aẓīm Yūsuf al-'Aẓma*. Damascus, 1937.

Ṣāfī, Riḍā. *'Alā janāḥ al-dhikrā*. Part 1. Damascus, 1982.

Sahlins, Marshall.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Structur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andwich Islands Kingdom*. Ann Arbor, 1981.

Sa'īd, Amī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ā: Tārīkh mufaṣṣal jāmi' lil-*

qaḍiyya al-'arabiyya fī rub' qarn. Vol.2: *Niḍāl bayna al-'Arab wal-Faransāwiyyīn wal-Inklīz.* Cairo, 1934.

——. *Thawrāt al-'Arab fī al-qarn al-'ishrīn.* Cairo, n.d.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1994.

——. "Third World Intellectuals and Metropolitan Culture." *Raritan* 9(winter 1990): 27—50.

Ṣāliḥ, Rushdī. *al-Masraḥ al-'arabī.* Cairo, 1972.

Scheler, Max. *Ressentiment.*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Lewis A. Coser. Translated by William W. Holdheim. New York, 1961.

Schilcher, Linda Schatkowski. *Families in Politics: Damascene Factions and Estates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Stuttgart, 1985.

——. "The Famine of 1915—1918 in Greater Syria." In *Problems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ssays in Honour of Albert Hourani*, edited by John Spagnolo, 229—258. Reading, England, 1992.

——. "The Impact of the Railways on the Grain Trade of Southern Syria, 1890—1925." In *Infrastructures and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of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in Bilad al-Sham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Mandatory Period*, edited by Thomas Philipp and Birgit Schäbler. Gotha, forthcoming.

——. "Violence in Rural Syria in the 1880s and 1890s: State Centralization, 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World Market." In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edited by Farhad Kazemi and John Waterbury, 50—84. Miami, 1991.

Scott, James.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1985.

Shamir, Shim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yria: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Abdulhamid." In *Beginning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William R. Polk and Richard L. Chambers, 351—382. Chicago, 1968.

Sharabi, Hisham. *Arab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The Formative Years 1875—1914.* Baltimore, 1972.

Shibutani, Tamotsu. *Improvised New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 Indianapolis, 1966.

al-Shihābī, al-Amīr Muṣṭafā. *Muḥāḍarāt fī al-isti'mār.* Vol.2. n.p., 1956.

al-Shihābī, Qatība. *Dimashq: Tārīkh wa ṣuwar.* Damascus, 1986.

Simon, Reeva S. "The Education of an Iraqi Ottoman Army Officer." I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edited by Rashid Khalidi et al., 151—166. New York,

1991.

Sluglett, Peter, and Marion Farouk-Sluglet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1858 Land Code in Greater Syria: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In *Land Tenur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edited by Tarif Khalidi, 409—424. Beirut, 1984.

Smith, Anthony D. "Gastronomy or Geology? The Role of Nationalism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 (March 1995): 3—23.

——. "The Myth of the 'Modern Nation' and the Myths of N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1 (January 1988): 1—26.

——. *National Identity.* Reno, 1991.

Stewart, Angus. "The Social Roots." In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dited by Ghita Ionescu and Ernest Gellner, 180—196. London, 1969.

Sulṭān, 'Alī. *Tārīkh Sūriyya 1918—1920: Ḥukm Fayṣal b. Ḥusayn*. Damascus, 1987.

al-Suwaydī, Tawfīq. *Mudhakkarātī: Nuṣf qarn min tārīkh al-'Irāq wal-qaḍiyya al-'arabiyya.* Beirut, 1969.

Swedenburg, Ted. *Memories of Revolt: The 1936—1939 Rebellion and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Past*. Minneapolis, 1995.

——. "The Role of the Palestinian Peasantry in the Great Revolt (1936—1939)." In *Islam,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Edmund Burke III and Ira M. Lapidus, 169—203. Berkeley, 1988.

Tabak, Faruk. "Agrarian Fluctuations and Modes of Labor Control in the Western Arc of the Fertile Crescent, *c.*1700—1850." In *Landholding and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the Middle East*, edited by Çaglar Keyder and Faruk Tabak, 135—154. Albany, 1991.

Tauber, Eliezer. *The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 London, 1993.

——. *The Emergence of the Arab Movements*. London, 1993.

——.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yria and Iraq*. London, 1995.

——. "The Struggle for Dayr al-Zur: The Determination of Borders between Syria and Iraq."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3 (1991), 361—385.

Terdiman, Richard. *Discourse/Counter-Discours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ymbolic Resistan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Ithaca, 1985.

Tergeman, Siham. *Daughter of Damascus*. Introduced and translated by Andrea Rugh. Austin, 1994.

Thompson, E. P. *Customs in Comm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1991.

——.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 3 (May 1978), 133—165.

Tibawi, A. L. *A Modern History of Syria, Including Lebanon and Palestine*. New York, 1969.

Tibi, Bassam. *Arab Nationalism: A Critical Enquiry*. New York, 1971.

Tilly, Charles.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Mass., 1986.

——.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1978.

——. Louise Tilly, and Richard Tilly.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Cambridge, Mass., 1975.

Turabein, Ahmed. "'Abd al-Hamid al-Zahrawi: The Career and Thought of an Arab Nationalist." I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edited by Rashid Khalidi et al., 97—119. New York, 1991.

Turner, Bryan S.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In *Capitalism and Class in the Middle East: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93—110*. London, 1984.

Turner, James. "Understanding the Populist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7(September 1980): 354—373.

Turner, Victor. "Hidalgo: History as Social Drama." In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98—155. Ithaca, 1974.

'Ubaydāt, Maḥmūd. *Aḥmad Muraywid: 1886—1926*. London, 1997.

al-'Ulabī, Akram Ḥasan. *Khiṭaṭ Dimashq: Dirāsa tārīkhiyya shāmila*. Damascus, 1989.

al-'Umarī, Ṣubḥī. *Maysalūn: Nihāyat'ahd*. London, 1991.

Vashitz, Joseph. "*Dhawat* and '*Isamiyyun*: Two Groups of Arab Community Leaders in Haifa During the British Mandate."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17 (1983): 95—120.

Vatter, Sherry. "Militant Journey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Damascus: 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ern Labor History Agenda." In *Workers and Working Classes in the Middle East: Struggles, Histories, Historiographies*, edited by Zachary Lockman, 1—19. Albany, 1994.

Vilas, Carlos M.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A Structural Approach." *Science and Society* 56 (winter 1992—1993): 389—420.

Weber, Max.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1958.

——.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Edited by Talcott Parsons. Translated by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1947.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73.

——.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1978.

Wiles, Peter. "A Syndrome, Not a Doctrine: Some Elementary Theses on Populism." In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dited by Ghita Ionescu and Ernest Gellner, 166—179. London, 1969.

Wilson, Mary. "The Hashemites, the Arab Revolt, and Arab Nationalism." I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edited by Rashid Khalidi et al., 204—221. New York, 1991.

Wolf, Eric R.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69.

Worsley, Peter. "The Concept of Populism." In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dited by Ghita Ionescu and Ernest Gellner, 212—250. London, 1969.

Wrightson, Keith. "Estates, Degrees, and Sort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ociet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In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edited by Penelope J. Corfield, 30—52. Oxford, 1991.

Wuthnow, Robert.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Ide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Reformati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European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 1989.

Yakobson, Sergius, and Harold D. Lasswell. "Trend: May Day Slogans in Soviet Russia, 1918—1943." In *Language of Politics: Studies in Quantitative Semantics*, edited by Harold D. Lasswell et al., 233—297. New York, 1949.

Zakariyyā, Aḥmad Waṣfī. *'Ashā'ir al-Shām*. Damascus, 1983.

Zamir, Mei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Lebanon*. Ithaca, 1985.

Zeine, Zeine N. *The Emergence of Arab Nationalism with a Background Study of Arab-Turkish Relations in the Near East*. Delmar, 1958.

——. *The Struggle for Arab Independence: Western Diplomac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isal's Kingdom in Syria*. Delmar, 1960.

Zerubavel, Eviatar. *Hidden Rhythms: 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 Chicago, 1981.

al-Ziriklī, Khayr al-Dīn. *al-A'lām: qāmūsa tarājim li-ashhar al-rijāl wal-nisā' min al-'Arab wal-musta'ribīn wal-mustashriqīn*. n.p., 1984.

——. *Dīwān al-Ziriklī: al-A'māl al-shi'riyya al-kāmila*. Amman(?), n.d.

——. *Ma ra'aytu wa ma sami'tu*. Cairo, 1923.

Zubaida, Sami. *Islam, the People, and the State: Political Ideas and Move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93.

访谈

Daghmush, Kamil. Damascus, 2 November 1989.
Daqqar, ‘Abd al-Ghani. Damascus, 2 January 1990.
al-Halabi, Shaykh ‘Abd al-Rizaq. Damascus, 3 January 1990.
Haqqi, Ihsan. Damascus, 10 November 1989.
al-Jaza’iri, Abu Ribah. Damascus, 15 November 1989.
al-Kaylani, Fakhri. Damascus, 8 November 1989.
al-Khatib, ‘Adnan. Damascus, 8 November 1989.
al-Khatib, Muhammad Rida. Damascus, 6 January 1990.
al-Qasimi, Shaykh Ahmad. Damascus, 6 November 1989.
al-Saruji, ‘Umar Khadim. Damascus, 31 December 1989.
al-Tabba‘ , Muhammad Murad. Damascus, 2 January 1990.
‘Urufa, Shaykh Yasin. Damascus, 2 January 1990, 4 January 1990.
al-Yafi, Dr. ‘Abd al-Karim. Damascus, 21 November 1989.

Divided Loyalties: 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c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

By James L.Gelvin

Copyright © 1999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24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